

日本军国主义

(日) 井上清 著

第 2 册

商务印书馆



日本军国主义

第二册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日〕井上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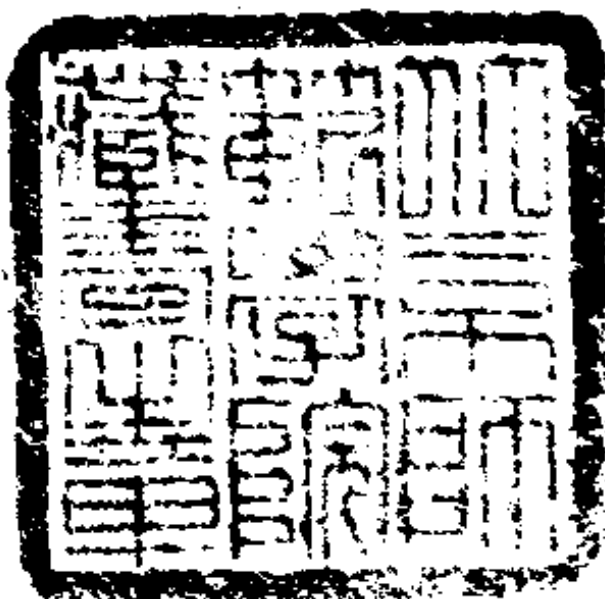
尚永清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1754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1011754

目 次

第一篇 征韩论和军国主义的确立	1
序 章 明治维新的对外任务	1
第一章 屈服和侵略	16
——明治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一节 对强者的屈服	16
第二节 “主权外交”	22
第三节 侵略中国之梦	30
第二章 野心的焦点——朝鲜	39
第一节 明治前的日朝关系	39
第二节 征韩外交的开始	48
第三节 朝鲜“侮日”的真相	62
第三章 关于征韩的争论	73
——士族军国主义和官僚军国主义——	
第一节 征韩论的意义	73
第二节 西乡、板垣派的立场	81
第三节 大久保、木户派的立场	96
第四章 军国主义的确立	101
第一节 明治六年十月的政变	101
第二节 官僚独裁政权的确立	107
第三节 征韩派——士族军国主义的去向	112
第四节 新军国主义	116
第二篇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性质	125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第一章	甲午战争的本质	125
第一节	谁是主角.....	125
第二节	客观条件.....	130
第三节	开战的时机和战果.....	137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农业的变化	143
第一节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143
第二节	农业的变化.....	147
第三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155
第一节	垄断资本的早产和对大陆的野心.....	155
第二节	世界和日本.....	165
	——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	
第三篇	对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干涉	180
	——日本帝国主义毁灭的预兆——	
序章	米骚动和入侵西伯利亚	180
第一章	武装干涉的主角	183
第一节	外务省和参谋本部.....	183
第二节	西伯利亚缓冲国的幻想.....	190
第二章	“双重外交”？	196
第一节	种种的反对.....	196
第二节	出兵.....	204
第三章	不可避免的失败	214
第一节	军事和政治的矛盾.....	214
第二节	革命的力量.....	222
第四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233
第一节	庙街事件和占领库页岛.....	233
第二节	帝国主义毁灭的预兆.....	240

第一篇 征韩论和军国主义的确立

序章 明治维新的对外任务

幕府末期，明治维新时，日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对外要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把日本国家和日本人民解放出来，建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另一方面要废除封建的闭关自守的排外主义及其另一表现形式——领土侵略主义，并广泛同世界各国建立互不侵犯、平等互惠的友好关系。明治政府屡次提出“国权外交”的口号，但这一口号只有在完成上述历史任务的前提下才可以说是正确的。

然而，怎样才能达到所谓独立自主呢？明治政府的中心人物之一佐佐木高行在1871年（明治四年）4月28日的日记内写道：“凡是稍具远见的人都说：国内人民如果不能平等，就不能扬国威于海外。”（见《明治圣上和臣高行》）。就连专制官僚的头子木户孝允也说过：“人人自立，其国自然独立。”（明治十年十一月三日致三浦梧郎书）。这就是说，为了完成维新的对外任务，基本条件是必须确立国民的独立自由。明治政府是否果然做到了这一点呢？在阐述这点以前，且先看一下维新前的日本同欧美的关系和东亚的大势。

旧幕府的武士贵族，在国内对一般人民发挥无限的特大权力。正因为如此，对西洋各国却完全软弱无能。不仅幕府及其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甚至整个日本民族势将变成欧美各国的半殖民地，独立自主的国权已经不复存在。

卑鄙懦弱的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幕府各藩的封建制度而牺牲国民的进取精神和日本国家的进步，闭关自守，甚至禁止制造大船，对内用士农工商秽多非人^①的身分制度、村落制、五人组制^②、行会制等等来束缚人民；对农民则肆无忌惮地实行所谓“榨芝麻油”式的剥削，同时“禁止一切新的创举”，压制所有的独立思考。他们竟然这样害怕历史的进步，以一个多点的武士来对付十个老百姓的比例在国内施行镇压，用来夸耀天下太平。殊不知他们所说的太平，只是把社会的停滞误认为政治的安定罢了。

然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世界在这个时期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

江户时代初期，幕府在各诸侯国乡村颁布布告：“农民不得食大米，应以甘薯叶、豆叶为常食，大米要上缴，饮茶过多的女人其貌虽绝美、也应同她离婚。”但同年，即1649年（安庆二年），英国已经确立了议会政治制度。

十八世纪末，英国发明蒸汽机和纺织机，完成了飞跃发展的产业革命。此外，还有美国的独立自由宣言和法国的大革命，以及这些国家的产业革命等等，到处都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国家，代替了封建专制。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性的贸易经济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代替了闭关自守的小规模的孤立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

欧洲人之所以能够侵略亚洲，正是因为他们国内有了这种发展，而发展最快的英国终于先后排挤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兰西等国，到十八世纪末成了欧亚两洲的胜利者。当时整个印度已经处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下了。

进入十九世纪后，英国急于建成新的殖民地统治体系而彻底摧毁了旧印度，随即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廷接受南京条

① 秽多、非人都是江户时代遭受歧视和压迫的所谓“贱民”。——译者

② 五人组是江户时代的一种压迫人民的连坐制度。——译者

约，割让香港，开辟广州和上海等五个商埠，建立治外法权，缔结关税协定（1840—1842年）。从此以后，中国沦为欧美各国的半殖民地。

被称为“欧洲野蛮国家”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在亚洲北部以强大的武力弥补它落后的经济侵略，猛烈向东扩张。当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它已把实力扩张到白令海峡，沿满洲东岸南下，在千岛、库页岛开始与日本势力发生冲突。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也完成了产业革命。1847年（弘化四年）穆拉维耶夫出任东部西伯利亚总督，从此以后，远东经营开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858年（安政五年）迫使清国签订璦琿条约，割取了黑龙江左岸的土地，两年后，又从清国夺取了乌苏里地区，开辟了符拉迪沃斯特克（俄语是控制东方之意，即海参崴）。

幕府各藩对这样的世界形势、尤其是东亚的形势，没有任何明确的远见和坚定的对策。相反地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那些热心研究世界文化和世界形势的学者林子平、高桥作左卫门、高野长英、渡边崋山等先驱一一处刑，说西洋人是夷狄禽兽，且侮且惧。一看到西洋船只，即便是救护海上日本漂流难民送他们回国的船只也下令坚决击退。但同时还命令，对没有肇事企图的船只要供给用水和燃料，设法使其平安离去，可见方针摇摆不定。

鸦片战争期间，长崎的市政官吏高岛秋帆认为清廷的失败就是日本的危机，不忍坐视，决心建议幕府采用现代武器及炮术，在江户郊外演习新式军事操练，江川太郎左卫门等有见识的人深为感叹。可是，幕府的枪炮专家硬说西式兵术不合实用，加以卑鄙的谩骂，不久高岛秋帆被扣上走私者和擅自练兵等罪名而入狱。水户烈公^①主张采取夷狄之长，在藩内延聘兰学家^②兴建铸造枪炮

^① 即水户藩主德川齐昭。——译者

^② 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学习荷兰语，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洋学术（包括医学、数学、兵学、天文学、化学等），称为兰学。——译者

用的反射炉。表面看来，他好象是位先驱，但他又决不许民间自由研究兰学，主张必须严加禁止。水户藩的领导人会泽正志斋在文政末年曾发表一篇“新论”，主张采取夷狄的长处，但当水户藩决定兵士一律使用枪炮时，却立即上书激烈反对，说模仿蛮人兵法会丧失大和魂（参照《水户藩史料》别记及该书上册）。

既然被称为先驱的部分执政者都是这种情况，难怪1853年（嘉永六年）佩里舰队来寇时，幕府当局固不必说，即便受谘询的诸侯以下人等，也拿不出坚定的对策，因而陷入佩里的“诳骗”政策的圈套，不得不和清廷一样签订安政开港的辱国条约。

不久，到1861年（文久元年），日本领土也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对马岛是东亚海上的要冲，列强早就注目，特别是沙俄，它根本不重视对日本的贸易，而是虎视眈眈地企图伺机占领北海道和对马。

1861年3月，沙皇军舰“波萨德尼克”号借口修舰开入对马岛的芋崎浦，任意砍伐山林，建筑房舍，实际上已将该地占领，然后强迫该岛领主对马太守宗氏让它永久租借这一地方。幕府急忙派外交长官小栗（丰后太守）前往交涉，要求该舰撤走。然而小栗到对州（即对马岛）后，竟轻易地向俄人表示屈服，甚至答应舰长提出的会见藩侯（即对马太守宗氏）的要求，发给他会见的证件。小栗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对州人，摆摆官架子就匆忙返回了。后来，舰长拿着小栗的证件要求会见藩主。对州的全体人民对小栗这种卑鄙行为非常痛恨，但已无可奈何。

对州藩说来，这是宗氏一族存亡之秋，4月13日，号召武士和平民必要时对俄人进行殊死抵抗。然而这究竟有几分诚意，颇有疑问，因为对州藩于5月向小栗提出的《商讨书》里说：“芋崎一带事实上已经成为彼等领土，长此下去，势必扩张地盘，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此危急之际，“公虽欲使彼等今后不来，岂非难事”。可

见，一开头就是一种失败主义，于是请求说：“事已至此，希望我公或拨浅海之地作为补偿，或者年年给与大致与该地出产额相同的粮谷，或一次补偿，钱、粮均可。”

这样做，对宗氏一族或对州的藩士来说，也许是一条生路，然而对于日本和日本人民来说会如何呢？只有对马岛的人民，才对不法的侵略者拼命斗争到底（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论文。拙著《明治维新》、《日本现代史》第一卷也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论述）。

幕府并没有就这件事呼吁全国人民给予协助，而是把它隐瞒起来，求援于英国舰队。英国认为对马岛被俄国占领，不能容忍，便强烈要求波萨德尼克号撤走。在这期间，对马岛民，直到国际对立发生为止，一直英勇奋斗，阻止该岛变成租界地和基地化。半年以后，俄舰终于撤走了。这一事件在4、5月间国内已经盛传，但攘夷党的志士却热衷于谋杀外国人，竟没有一个人赶赴对州援助，或组织援军。他们只是闯进江户的对州藩邸辱骂他们软弱无能。有的人则凭占卜相信俄舰撤走来聊以自慰（文久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久坂玄瑞的信，真木保臣的《南迁目录》）。

1830年初，朝鲜也有西洋船前来要求通商。中国和日本开埠通商后，这个国家看来也迟早难免发生某种事变。但朝鲜当局毅然采取了排外主义。尤其是高宗（后为李大王）即位后（1864年，日本的元治元年），执政大院君顽固地执行强烈的排外主义，首先想消灭国内的天主教徒。十八世纪后半期，朝鲜从中国开始传入天主教，虽然经过数次的大镇压，但天主教并没有屈服，反而有了广泛深入的发展。这时，法国人张敬一^①、达布路易等数名传教士潜入朝鲜传教，信徒已达三万人。

^① 张敬一（Siméon François, Berneux, 1814—1866）法国传教士，在朝鲜传教受迫害而殉教。——译者

大院君在高宗即位第三年(1865年)1月,首先逮捕张敬一等三名洋人,梟首示众,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批屠杀教徒。殉教者达一万人^①。朝鲜的对外危机便因此而起。

好容易逃到天津的两名法国传教士,向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官罗兹及驻中国公使伯洛内报告了朝鲜事件。公使立刻向清廷交涉,结果清廷声明对朝鲜内政外交概不负责。于是,伯洛内大放厥词说:“朝鲜国王对我国不幸公民下毒手的日子,也就是他统治朝鲜的末日,”并扬言“朝鲜民众盼望我们前来解放他们。我们将开始维护秩序、正义和繁荣。”^②他不等待本国的命令就派罗兹率领六艘军舰开往江华,向朝鲜政府交涉,要求惩办杀害传教士的人犯并开港通商。

法国舰队于同年9月驶抵江华,数百名陆战队士兵从江华南门登陆,占据京畿要冲达一月之久。但是,他们因遭到朝鲜猎民组成的勇敢的狙击队的奇袭而折兵,又因江华海上有结冰之虞,乃于10月5日撤走。大院君为胜利冲昏头脑,便越发“坚定了攘夷保国的信心”。当时朝鲜对洋船也决定坚决予以击退。两个月前,当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侵入大同江搁浅时,即被烧毁,船员也全都遭到惨杀。同时,严禁使用和携带洋货,并屡次进行搜查(《李大王朝史》)。

为了抵抗欧洲各国对远东的压迫,日本、清廷及朝鲜都在实行“攘夷”。但是,这种只从视夷狄为禽兽的封建排外观点出发的斗争和杀害洋人的办法,反而被贪婪的英、美人所利用,他们借此从

①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U. S. A.)1871年, China Despatch. 这是1871年美国舰队驶来朝鲜时,登舰访问的朝鲜信徒所说的数字。美国公使罗从种种角度证明,这番话是可以充分凭信的。根据朝鲜史料,被残杀者达二十万人。参照《朝鲜史大系》、《最近世史》。

② W. E. Griffis: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pp. 378. footnote. 关于这件事的前后叙述,参照朝鲜总督府编《朝鲜史》第六编之四,《李大王史》。

日本人民手中掠夺赔款，压低关税，并在我国国内驻扎军队等等，只能给日本人民造成了进一步受压迫受屈辱的因素。

于是，所谓志士们认为不能退守，必须进攻，便纷纷主张向海外扩张势力，侵略朝鲜和中国。

例如，吉田松阴说：“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①，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夺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然后‘爱民养士’。”（普及版《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幽囚录》）。又如，日本同美、俄两国缔结友好条约后，1855年（安政二年）4月，吉田松阴从获^②的野山狱将《狱是帖》寄给其兄，作为“同志的一致意见”。他在上面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同上《全集》第八卷所收）

他梦想把封建主义因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交易所遭到的损失，借助于掠夺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封立诸侯，即借助于把封建制度推广到海外去的办法来取得补偿。但是，如果说只要对“容易攫取的”朝鲜和满洲可以完全不讲信义，那末这样取得的土地也当然要在“贸易中”被欧美资本主义夺走。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海外扩张、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主张，乃是攘夷主义的一个侧面，是从封建主义中引伸出来的一种海外扩张论，这种东西又怎能用来同扬弃了封建制度的欧美各国相对抗呢。

与吉田松阴齐名的幕府末期的知名人士桥本佐内在他的“日俄同盟论”中也说：“加上现在力量不足，根本无法同西洋各国的兵

① 即北海道。——译者

② 长州的首邑。——译者

力抗衡，进行长期战争，不如暂且结为同盟”。他认为选俄罗斯结盟最好，因为“我国孤立，不能对抗西洋同盟各国，如果有俄国作后盾，即便战败，也不至于彻底灭亡”。这样就完全令人无法相信他的主张是具有独立自主的气概和信心，并在战略上利用英、俄对立的策略（安政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致村田氏寿的信，〈桥本景岳全集〉新版上卷）。

胜海舟在1862年（文久二年）11月同横井小楠谈话时说：“开埠通商还是闭关自守的争论全然无用。人心如能一致，西洋又何足惧。今若争雄宇内，如无威权，恐怕开埠通商和闭关自守都办不到。”他又说，杀伤夷人并非攘夷，“当务之急首先在于兴国大业”。可见这两个人不愧为有远见的人。不过，这里所说的“威权”，并不是幕府专制的威权，而应该指的是国民的威权。因此，规避讨伐幕府的“兴国”之策，实际上是封建制度的“兴国”之策，他和吉田松阴一样，也是海外侵略主义者，他们的具体主张就是征韩论。

《海舟日记》1863年（文久三年）4月2日记载胜海舟对长州的桂小五郎（即木户孝允）和对州藩的大岛友之允说：“现在应由我国派出船舰，向亚洲各国君主游说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免受西洋的蹂躏。应首先说服邻国朝鲜，其次是中国。”据说桂小五郎等对此表示同感。单看这一段话，可以说“攘夷必须首先兴国”，向前迈进了一步，无可非议。

但数日后，又有这样的记载：“向司农监察解说征韩之深义。今日城中有此议论，俗吏大哗，皆不同意。”又说：“大岛友之允来。征韩之议，因循不决，叹息时机之将失”。仅仅遇到俗吏反对，便大失所望，还谈什么兴国的远大理想呢？况且，如果是和平的、文化的日韩同盟，我想俗吏们也不会反对。征韩两字，顾名思义，就是征服朝鲜，所以俗吏也好，不是俗吏也好，都不会轻易赞同。胜海舟的意见，总的说来，不外是先向朝鲜提议建交和结盟，如不听从，

就征服它。胜海舟本人虽然没有这么说过，但倾听他的议论的大岛友之允却是说过的（维新史料编纂会：《大岛家文书拔粹》抄本，原平三《征韩论和明治六年十月政变》，载《历史学研究》第35期）。

这种议论，是在1863年8月政变以前，尊王攘夷派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想把幕府的危机转移到对外问题上去的反动议论。这与当时的老中^①板仓侯的儒臣山田方谷屡次向其君主献策“转内讷为外征，把士气（即讨伐幕府的士气）转向对外”的征韩论是相同的。所以，尽管俗吏反对，但老中板仓却还要实行。这在第一章另有叙述（参照《方谷先生年谱》、《德川庆喜公传》四）。

至于对州藩的征韩论，其实不过是假借征韩名义，请求幕府拨给“军粮”而已。这一点，参看《方谷先生年谱》即可了然。此外，对州藩吏安达土肥之亮向藩厅汇报朝鲜情况的序言部分，也坦率地透露了这一点。报告书说，由于对州藩疲弊，1863年（文久三年）请求幕府拨粮补助，但因其他藩侯也有类此请求，“按幕府内意，除非征韩，否则难以照准，不得已乃以此为理由”云云。

幕府末期的一切攘夷论，并非丝毫都没有进步思想。佩里来犯以后，幕府提出的开港论，实质上不过是掩饰对外屈辱的辩解。为了反对这种辩解而提出的攘夷论中，也部分反映了人民对外独立平等的要求。因此，长州藩的久坂玄瑞看破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是对幕府的一种妥协论时，便加以反驳，提倡攘夷，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必要性（文久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久坂玄瑞致入江子远的信）。例如，推崇高杉晋作的土佐藩浪士中冈慎左郎，认为“攘夷”两字意味着类似美国独立战争那种民族独立战争（尾崎卓尔著《中冈慎太郎先生》）。

总之，依靠封建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加强来真正地抵抗欧美，是

^① 幕府的最高执政官。——译者

根本办不到的。必须首先打倒内部幕府各藩武士的独裁专制，建立和欧美同样或更高的国民秩序和权威。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抵抗外敌，这是对州事件所证明的。1863年夏，在长州炮击外国船舰时，高杉晋作就曾道破：“吃肉的武士皆不堪重任”，他认为唯一可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打破封建的身分制度，把被称为“秽多”而受到鄙视的人民也都组织成为军队，一旦发生对外战争的危机时，准许全体人民自由武装，自由制造武器。长州借助于这种平民的力量，不仅闯过了对外的危机，并且于1865年击溃了从四面八方进攻的幕府诸藩的封建武士军队。

中国也是一样。清廷对欧美并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群众对内则打击清廷的压制和地主的剥削，不久逼近长江沿岸，使欧美的殖民地统治者为之胆寒。英、法之所以未能对我日本恣意加以暴力压迫，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太平天国的牵制。久坂玄瑞在他1862年著的《解腕痴言》中说：“英法所以没有逞虐，对皇国动武，盖因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威势甚强，如太平天国向英、法屈服，英、法必将进犯我国。”英法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但因在中国尝到了苦头，认为对日本用武并非上策，对日政策必须慎重^①。

在朝鲜，迫使侵入江华的法国舰队撤走的，并不是两班贵族，而是平民的猎人。朝鲜国民的大多数农民，被称为“驮重载的牲畜”、“政治上的零”（前引 Griffis 著书）。但是他们不仅抵抗外敌，并且在国内奋起反对封建统治。自哲宗末年到高宗初年，朝鲜民众为抵制压迫，曾经屡次发动大规模的暴动。尤其是哲宗十二年（1860年，日本万延元年）朝鲜八个道到处爆发人民起义，光是

^① R.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Narrative of the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关于英国的对日纲领，参照拙著《明治维新》。

大规模的起义就有二十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的地方官都企图叛乱（《朝鲜史》第六篇之三、四）。在这类民众中间，天主教和东学活跃起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两种宗教虽然教义相反，但都是群众希望打倒封建制度、实现天国的表现。天主教徒早就主张聘请洋人、开放门户和信教自由等国内改革，早在纯祖元年（1801年，享和元年）就发生过黄嗣永等为此掀起的斗争。

在日本维新当时，这类朝鲜民众中间有人想到维新的日本来求援。1868年（明治元年）闰四月，朝鲜天主教徒朴根基和徐景端听说日本已摆脱封建闭关自守的旧习，“洋人与倭国通商”，为求援于我国，同洋人联系，来到釜山附近，想伺机潜入当地我国对马藩的商馆（倭馆），但不幸被捕（《李大王朝史》五年闰四月）。这种教徒的动向最后也决不至于在政治上屈服于欧美或其他外国，这一点可以从天主教徒洪秀全等非但没有成为欧美的走狗，相反地却成了最尖锐、最彻底地反对欧美的唯一的中国势力这一事实中推断出来。

那末，当时东亚最先进的国家日本如能对内依靠勇敢爱国的国民大众的力量，用革命方式推翻封建制度，确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对外也必能在欧美诸国面前保持独立自主的国权。而这种独立自主的、平等的日本，如果向勇敢爱国的朝鲜和中国的人民大众伸出友好互助的手，那末，实际上这一定会比夺取朝鲜和满洲土地的阴谋以及内心企图加以征服的修好提议对日本更为有利。

然而，现实并不如此。国内人民没有自主平等，对外没有独立的国权，只是企图向欧美屈服和侵略朝鲜、中国。

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废除了藩侯制度，把全国统一成为不可分割的国家，从而迈出了走向靠独立自主的人民来确保独立自主的国权的伟大的第一步。然而它的第二步，却裹足不前了。

维新政府最高和一贯的领导人大久保利通，于1868年（明治

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在建议迁都的奏折中说:“一改数百年来的因循腐朽,撇开文武之别,使国内同心一致,深感一天之主皇恩浩荡,苍生如此效忠可赖,上下一体,万人感涕,此为今日急务中之最急者也”,并慷慨陈词地说,除此以外,就“不能扬皇威于海外而抗衡万国”(《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三)。虽然幕府已经推翻,但江户城还没有陷落,支持幕府的势力还很强大。此时,大久保决不认为人民愚蠢而不足恃。东征的官军向人民呼吁,声称拯救万民,使之摆脱涂炭之苦,并决定将旧幕府领地的当年赋税减半^①。东山道镇抚总督出兵时布告该道各村说:“德川的领地自不待言,各知行^②、兵营、寺社等的领地,年来亦皆苦于苛政,此外凡有意见者,均可前来本军申诉,经审查后必予公正处理”。后来,一有机会,各道军也都发布了同样布告^③。

人民响应倒幕军的号召,越后和东北两地方都不听旧幕府的宣传,各地蜂起抵抗旧藩主军队,4至6月间,越后地方的农民屡次起义,进行游击战。当时有些地方实行完全自治的村政,罢免藩主任命的村吏,改由村民选举,也有人认为“不这样,就不能纠正专制政治,促其革新”(新潟县内务部编述《越后左渡农民骚动》,羽仁五郎《明治维新史研究》,《幕府末期的政治动向》)。

6月,越后地方的新发田侯为参加奥羽越的反新政府同盟来到新津驿站时,该地的大庄头慎吾等人蜂起阻拦,形成“新发田领爆发大骚动,农民数千成群,道路梗塞,通信杜绝,秩序混乱,令人不胜痛心”,致使米泽藩惊慌失措,其势大挫(参照史籍协会《米泽藩戊辰文书》,《内外新闻》)。

① 见《复古记》明治元年正月十二日条,其实施的例子见《复古外记》,《东山道战记》第一,正月二十二日条。

② 封给武士的土地。——译者

③ 参照《复古外记》,《东山道战记》正月二十二日,同二月九日,《复古记》六月七日,同十六日,八月三日,同七日,同十三日、同二十四日各条。

东北地方的情形也是如此。8月，仙台藩和会津藩等逐渐受到压迫。仙台藩在伊达和信夫两郡悬赏招募农民，但无人应募。而当8月3日仙台藩企图出兵收复福岛时，中途却出现农兵一千余名，加以阻拦。第二天“福岛农民大概受了敌人（官军）的煽动，起来暴动，蜂拥来到瀨上”。一般的情况是“仙台方面经常陷于被动，因敌人善于抚慰农民，便常顺从仁心，指点近道，密告仙藩情况，致使其计应时而取胜”（《仙台戊辰史》、《石母田赖至日记》）。

这类事例在其他各地也很多^①。身为东山道军和会津征讨主力军的参谋板垣退助，最关心民心向背。据说，他深知会津的失败，是“由于上下隔绝，不能同甘共苦”，痛感如要维持国家于万世，就必须四民平等和自由民权。这决不可能是无稽之谈^②。

幕府的势力就这样在全国人民一致的力量下被推倒了。但是，维新的第二步却在这时停止不前了。

1868年8月，中央政府改变当初赋税减半的诺言，宣布“税法暂从旧例”，对越后府判事前原一诚等擅自在管区内发布减税令一事，认为是“中国式的粉饰太平”，给予惩罚（《前原一诚传》，《大隈伯爵日谭》）。

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从1868年5月起发行太政官札^③。这时对于三井、鸿池等大商业资本给予巨额利益的保证，而对一般人民则硬说是“仁恤”，强制和金币一样流通这种完全不能兑现的纸币，凡是贬值授受者，一律逮捕下狱。1869年4月，京都府逮捕这类商人以压服人民时，府知事向大久保利通夸耀说：“市民极其浅见，官府稍施压力，马上就有转变”。然而“人心惶惶，贫穷百姓尤感困

^① 在《米泽藩戊辰文书》中有庄内地方的事例。在《都鄙新闻》、《明治文化全集》中也有越后的庄头喜三七等勇敢行动的事例。参照拙著《明治维新》。

^② 关于这一点，在川田瑞穗《片冈健吉先生传》中有详细叙述。参照《自由党史》和《明治宪政经济史论》所收板垣的论文等。

^③ 即纸币。——译者

难”，甚至有人在大久保利通的旅馆前张贴请愿书，各处都发生大暴动，就连大久保本人都承认这“远不如旧幕府的恶政”。政府既然施行这种恶政，那么“天下人心不信政府，怨声载道，反而留恋武士旧政”，也是不可避免的了^①。

天皇政府事事失信于人民。五条誓文中明文规定“万机决于公论”，然而早在1868年末，大久保就说：“不教之民，决不能使之惯于各国充分开化之政”，他甚至在政府的部衙内说：“固然，广开言路是明政之本，然而也大有以卑凌高之弊”。大久保仿佛忘记，他自己就是以卑下的藩士身分凌驾于高高的幕府的（《大久保利通文书》二、三）。大久保等人在没有确保自己的权力以前，刚刚说过苍生庶民可以依靠，而现在却说什么不教之民了。木户孝允也在1873年（明治六年）教导后辈伊藤博文时说：“建国的大法，非专制不可”（《木户孝允日记》，明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推翻数百年来的封建制度，建立新日本，其困难不容讳言，当局的苦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把江户城开城前的方针贯彻到底，信赖人民，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坚定不移地把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话，建国的事业一定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彻底。然而，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指望于大久保等人，事实竟如上所述。他们推翻幕府后，并没有趁势立即实行废藩置县，而是一直拖到1871年（明治四年）7月才实行。而当那时，政府也没有把人民的反封建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反而压制这种力量，把萨、长、土三藩的士族武力当作后盾。因此，废藩置县以后，士族的封建世禄也没有废除。

然而，士族的世禄是不能留下不废的，因为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烈了。例如1869年（明治二年）末至1870年初这段时期，长州

^① 参照《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三，明治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久保致岩仓的信，二年春致岩仓的建议及其他在此前后的信。

发生了旧奇兵队^①的骚乱和农民的大暴动，当时前往镇抚的井上馨认为必须“着手民政，减轻粮税率(地税剥削率)”，“不束缚人民的自由权”，同时“如果不一律废除世禄”，恐怕连五千名士兵都养不起。1871年5月，三田藩摄津知事在奏折中说：“盖对抗万国之道，其要只在于使人民自主，各得其所”，“而所谓的世禄却大大妨碍人民的独立之道”(《世外井上侯传》一，《太政官日志》)。因此，如果不把占政府支出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禄废掉，国家财政也将支持不了，政府从1872年2月后，才好容易认真订出废除计划。

当时为筹措家禄偿还基金而前往欧美募集外债的吉田清成说：“所谓禄者并非家产，政府予以没收，亦未尝不可”(《明治政史》)。这话说得很对，禄是封建身分的特权，封建制废除后，由人民的国家予以无偿没收乃属当然。然而，不相信人民的天皇政府，因害怕一百六十万士族，不敢这样做，竟以发行公债来代替家禄，分别在1873年12月发行秩禄公债，1876年8月发行金禄公债，这才算得到解决。其总额约达两亿日圆之巨。偿还基金虽然依靠募集外债，但是本利的偿还，结果还是要靠由劳动人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所征的租税，而农民还象旧幕府时代一样供养了士族，并且还要担负现代国家的各种费用，这可以说是双重的负担了。所以，在改革地税时，也不得不以“不减旧时的岁收”为目标，农民的负担丝毫也没有减轻。这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虽然得到确认，但不久很多农民就不得不出卖他们的田地了(《秩禄处分参考书》，《秩禄处分颠末略》，《明治财政史》)。

这样，作为国家独立基础的人民的独立自由，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不论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没有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木户、大久保、岩仓等人苦心经营的“专制主义”政府内部的暗斗，

^① 奇兵队系高杉晋作向长州藩厅建议创建的非正规军队，其成员主要是下级武士、农民和中下层市民。——译者

也变得不可避免了，早就发生了大久保所承认的那种“百官各自擅专，其乱如麻”的状态了（1869年春，关于政府的形式信，《大久保利通文书》三）。尽管大久保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种形势后来仍然继续存在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因而木户在1873年秋说：“即便是非常专制臆断的国家，倘若年年始终如此，也决不能称其为国家，难免日益遭受外人的嘲笑，因此，虽经百年之久，亦决难望发扬国威”（明治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致伊藤博文的信）。

因此，我国对欧美各国，一时很难获得独立和平等，而另一方面，征韩的主张却甚嚣尘上了。

第一章 屈服和侵略

——明治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一节 对强者的屈服

明治时代的日本对欧美外交，是极其屈辱的。如果说这种屈辱外交只是因为外交当局的软弱，或是因为缺乏外交惯例的知识和经验，那实在是肤浅之谈。这些仅仅是极其次要的因素。还有人说，这是因为我国兵力不足，这也完全不对。“现在皇国实患兵多而不患兵少”（佐田白茅《征韩论》），所缺少的只是没有把全民的力量，包括国民的兵力在内，集结起来。

日本与欧美之间难以解决的问题，理应由维新政府主动解决，外国没有理由提出什么抗议。譬如，明治初年的对欧美外交上的两大困难事件；即二分金币伪造问题和基督教徒的处理问题，就是如此。

1868年至1869年（明治元年到二年），萨摩、筑前、土佐、安艺各藩以及会津、仙台各藩，大肆伪造金币，政府也从1868年5月起

大肆改铸低质量的一分银币和二分金币。因此，不仅人民遭到莫大的危害，外国商人也大受损失(泽田章《明治财政的基本研究》，《世外侯事历》)。那时对日贸易最多的是英国。英国早就要求日本实行非革命性的自上而下的稳步改革，建立新秩序。1863年萨英战争、1864年炮击下关事件媾和以后，英国同萨、长、土等讨伐幕府的各藩进行密切合作。1867年(庆应三年)萨、长、土的人士同英国公使馆员往来频繁，甚至通知外国的有关王政复古的程序草案都是由萨藩的寺岛陶藏在大久保的授意下同英国公使馆秘书萨道义进行了协议的(参照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二,《大西乡全集》二,《维新史料纲要》五等)。

因此，英国公使巴夏礼在外交团中很自然地成为对日本最有发言权的人了。1869年正月，这个巴夏礼及法国公使乌特雷等以共同照会向日本抗议说：传说一分银币和二分金币的成色降低，有伪币流通，这是违背1866年(庆应二年)条约的，作为一国的政府“从保护人民的观点来说，也是失策，希望从速采取适当措施”^①。

政府对此暂不作答，仓猝派大隈重信(会计官副知事兼任外交官)前往大阪调查实情，此后对公使团的催促答复，则以目前正在调查等等为借口拖延时日。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因遭到太政官札和伪币、劣币的损害，各地发生骚动。于是大久保、木户等政府首脑为之震惊。大久保向其原籍的萨藩提出长篇建议书，促请“始作俑者”的该藩自动停止伪造。伪币种类达十八种，“某种属于某藩，皆有详细区别”。政府由于完全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不能对各藩给以任何约束(《大久保文书》三)。

外国公使的抗议皆有事实，“政府无言可对”，担任交涉的外交官知事伊达宗城由于无法忍受巴夏礼的怒斥而辞职了(《大久保利

^① 外务省编《大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卷第一册。以下本章及第二章有关外交交涉事项，除有特别注释者外，皆根据上述外交文书。该文书每年编为一卷。

通文书》三,《岩仓具视关系文书》四)。

公使团鉴于日本政府态度游移而大为震怒,7月6日,提出一份全文为三条的备忘录。同月12日,太政大臣^①三条实美、大纳言^②岩仓具视、外务卿^③泽宣嘉以及大隈、寺岛等政府要人,一起被巴夏礼叫去和外交团见面。政府托词伪币完全系旧幕府所造,政府并未铸造劣币云云,企图搪塞,但公使团洞悉事实,严加追究。同月17日再次会见,政府终于答应凡由政府许可通用的非正式货币、二分金币和一分银币,概由政府兑换标准货币。本来政府完全无需替诸藩随意铸造的伪币负责,但因政府许可劣币流通,结果只好负起这种不应担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在这以前,1869年6月,政府为设立造币厂,与英国东洋银行签订一项合同,规定雇用该行推荐的外籍造币技师,“日本政府除非通知东洋银行及雇用的外国人外,不得擅自从造币厂运出货币或铸造货币”。除此以外,其他各项细节,也都甘心接受英国资本的领导(《大藏省沿革志》)。

这样一来,各国(尤其是英国)固然十二分满意,但国内情况就不好了,政府于10月下令规定银胎的劣质金币,以一百两兑换金札三十两,在通告地方官的公文中说:“现在规定以百两兑换三十两,贫民的困难实属可悯”,因而要妥加说服教育,以免穷人暴动(《法规分类大全》,政体、货币三,前引泽田氏著书)。

政府深知这种兑换率很不合理。当时,大阪天满的商人批评说,政府规定兑换的银胎二分的金币百两,如果加以化验,其价值等于纸币一百二十两,“要是政府不知道这点而下的命令,可以说是官愚人民也愚,要是官吏心中有数而发此命令,可以说是欺骗愚民,贪图非法之利”云云(《改订肥后藩国事史料》十)。

① 相当于首相。——译者

② 类似副首相的官。——译者

③ 外交大臣。——译者

因此，信州地方的上田和饭田，美浓地方的土岐，丰后地方的冈，摄津地方的高槻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其中，上田的民变除伪币问题外，还提出民选村吏的要求，数万民众涌集城下，这诚然是万不得已（《明治初年农民骚乱录》，《改订肥后藩国事史料》十，《维新史料纲要》十）。

政府在对外对内关系上既然这样截然不同，当然不可能产生出一致对外的抵抗力量。所以这一年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比幕府签订的安政条约更为变本加厉，更为屈辱。这种条约根据最惠国条款，马上就牵涉到对英美法的关系，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明治初年外交上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天主教问题。肥前地方的浦上或五岛等地方的村民，在幕府近三百年的彻底镇压下并未屈服，坚决信仰基督，表现了日本人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到了幕府末期，对外交通开放，传教士入境，在长崎、横滨等地修起教堂以后，教徒越发得到鼓励，“切支丹^①的复活”有了迅速的进展。1867年，仅仅浦上一地就有了四千名教徒。幕府未及处理这些信徒，就已王政复古，问题留待维新政府来解决了。

政府在1868年3月14日发出“打破旧日陋习”云云的五条诺言，同一天又发布了五条禁令。其中第三条规定，“切支丹邪教照旧严禁”。接着参与^②木户孝允便前往长崎，企图逮捕教徒，给予处分。

英、法公使4月命令驻长崎领事向木户孝允提出抗议：“现在日本既然宣布前进，就不该后退采取旧时的措施”。闰4月，他们以天主教并非邪教为理由，要求政府撤消上述布告。因此，政府才把天主教同邪教分开，更改布告字句。此后各国公使团屡次要求政府放宽对教徒的措施，指摘政府有拷问教徒的事实。政府允以

① 即天主教。——译者

② 官名。——译者

宽大处理。可是，政府为迎合攘夷的士族，于1869年的10月至12月间逮捕教徒三千余人，分别送往加贺、萨摩、土佐等十八个藩加以管制。各国公使大为吃惊，抗议日本政府违背宽大处理教徒的诺言。而政府的答复则是：“这些教徒照理应该一律斩首，但为顾及外国友谊，才这样从轻发落”（12月2日，渡边弹正大忠在长崎同巴夏礼的谈话）。巴夏礼等人甚为愤慨，威胁日本政府说：“新政府成立后，本来希望一改德川旧政，现在这种作法完全是恢复野蛮行为。我们基本上已经答应日本政府的请求，准备撤退横滨的英国驻军，但鉴于这次事件，为防备今后发生不测，撤兵一事，暂不考虑。我们并无侵犯日本独立之意，为了友谊，特予忠告”（12月16日，英国亚当^①书记同寺岛外务大辅的谈话）。

12月18日，三条、岩仓、泽、寺岛和参议副岛种臣等人，同英、法、美、德公使团会见，说明处分教徒是根据国法，不得已而为之。公使们坚决要求思想信仰自由，不肯让步，并且声言人民和政府形成一体的欧洲各国政府，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恐将难以同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结果，日本政府提出备忘录，声明教徒如系单纯信仰异教，决不加以苛刻处分。第二年1870年正月，各国公使对此提出要求，在不让外国传教士出入居留地以外地区的条件下，允许教徒回村。日本政府没有接受这个要求。

后来，金泽藩也发生过残酷处分教徒、引起英国领事前往调查实际情况的事件。土佐藩为使教徒改宗，竟把婴儿同母亲隔离开来，使婴儿在邻室啼哭以至饿死，或为使教徒堕落，把一对年青男女关在一间屋内，使尽封建主义的卑鄙手段。另一方面，命令儒家和神官^②对教徒讲述忠孝仁义或皇国神道的神圣。但是，说教者本身的这种行为可以说就是对儒教或神道的一种侮辱（川田瑞穗：

① 日本名为三浦按针。——译者

② 日本神道的司祭。——译者

《片冈健吉先生传》)。

对基督教的这种禁止和压迫，不止是对一个宗教的压迫，而是意味着更广泛地对思想信仰乃至良心自由的普遍禁止和压迫。外国公使也正是抱着这种看法。这种措施完全是封建残余，不论外国抗议与否，维新政府应当认识到这是“旧日陋习”中最大的陋习，首先应予废除。

这种对良心自由的压迫，造成屈辱条约长期存在的直接的重大口实。不仅英国把这当作拒绝撤退横滨驻军的托辞，当1872年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等在美国华盛顿商议修改条约时，美国方面也一再主张在新条约内载明，“许可美国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发行报纸，信仰自由，并请把这种自由施给贵国^①人民”。岩仓等人虽然百般辩解，但结果只好承认“思想之权，乃属大自然的天赐”，并说我国政府对此充分保护，不必载入条约。但美国方面马上要求“提出确凿证据”，我方为之语塞。接着，同年10月在英国举行谈判时，英国方面也提到“专制和自由政治在英国实验的结果，我们终于知道了自由的很大好处”，因而为修改条约，要求日本承认自由，特别是承认信仰和良心的自由。1873年1月在法国，同年2月在比利时，都有过同样内容的谈判。在国内，1872年4月，法国驻日代理公使也劝告副岛外务卿说，如果不承认信仰自由，法国政府将难以同意修改条约的谈判。另一方面，教徒也表示坚决不屈的态度，因而虽然进行种种说教，但由于说教者本身对自己的说教就是一种侮辱，所以毫无成效。井上馨、木户孝允等人这才有所醒悟，1873年2月，政府终于撤回严禁基督教的布告，3月，把分发各藩管制的教徒、遣回故乡。然而“这并不等于默许异教，而是说布告内容已属人所周知之事，故而撤回”。当局尽管承认信仰、思想、言论等等的自由和“思想之权”乃是“大自然的天赐”，但没有彻底允许人民

^① 即日本。——译者

享有这些自由。因此，中央始终没能组织起国民的力量，用来作为修改条约的后盾。后来寺岛、井上、大隈等人进行的修改条约谈判，对国民严守秘密，打算略加修改，即便是极其屈辱的条约也就满意了，但因这个秘密谈判泄露出去，才不得不停止进行。

第二节 “主权外交”

当时日本政府最感困难、也是各国十分注目的问题之一，就是“虾夷”——北海道、库页岛的开发和日俄边界划分的问题。

这个问题同征韩论直接有关。日本在千岛和库页岛同俄国公开发生冲突，开始于1806年（文化三年）。后来，由于松前藩扣留俄国海军少校格洛宁，双方谈判释放时才发生划分日俄边界的问题。当时俄国对库页岛没有任何权利，而松前藩却已在“北虾夷”即库页岛久春古丹等处设立渔场并进行殖民。日本自不必说，就是俄国也承认这点。当时俄国使节列扎诺夫出使日本时所乘的克鲁森施滕号的航海日记中也明确载有此事^①。

因此，倘如德川幕府允许科学自由和通商航海自由，那末，第二、第三个近藤重藏、最上德内、间宫林藏这类人也将继续出现，后来也就不会留下惹起纠纷的余地了。

后来，俄国南下之势日益加速，1853年普提雅廷前来要求签订友好条约时，俄国在库页岛的势力已经超过了日本。日本在维新前后只是模糊地认识到库页岛是“北门的锁钥”，而这时俄国则看到“库页岛富于俄国最缺乏的煤炭”，把它当作原料资源地并且明确

^① 《异国丛书》，羽仁五郎译《克鲁森施滕日本纪行》上。《通航一览》俄国部分所载的文化十年幕府拟向俄国提出的国界划定书内，只就千岛提出问题，没有一字涉及库页岛。可见，当时俄国对库页岛没有任何权利，已属自明。（Kruzenshtern, T. F. <1770~1846>，俄国海军提督，探险家，1803~1806 探测东亚沿岸，1814 年发表旅行记，1815 年探测白令海峡。——译者）

认识到它作为北太平洋称霸据点的重要性。所以，俄国的态度很强硬，当普提雅廷同幕府签订友好条约时，意欲占领整个库页岛。日本全权代表对此加以拒绝，提议以北纬五十度为彼此分界。这一提议的根据并未经过具体调查彼此殖民的实际情况和沿革，而是由于译员偶然看到俄国船上的地图在五十度处分别涂有不同颜色而想到的，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凭证和说服力，于是库页岛问题仍然和从前一样，日俄杂居，边界未分。（1869年2月关于库页岛边界谈判的旧幕臣小出大和太守的呈报，〈大日本外交文书〉三所载）。

后来，幕府和俄国曾经两次商议库页岛分界问题，在1867年的条约上规定库页岛照旧由两国人民杂居，直到明治年间。1868年6月，箱馆法院的法官冈本监辅前往久春古丹，由旧幕府官吏手里接管岛务，宣布王政复古。明治政府极为重视北海道和库页岛，1869年5月，箱馆的榎本武扬等尚未平定，岩仓具视就决定财政、外交和开发虾夷地方是政府的三大急务。然而开发的具体方针却是“给土著少许烟酒即可使用”，“内地移民则以纸币充其费用即可，不必拘泥收支不相抵之论”（〈日本外交文书〉二）。同年5月，政府当局举行会议，天皇谕询开发虾夷地方的问题。会议的报告说：“虾夷之地乃皇国之北门，接近山丹满洲，虽分界粗定，而北部则中外杂居，以前官吏使役土著极其苛刻，而外国人颇施爱恤，以至土著往往怨离我邦之人，尊信于彼。一旦有人以拯救民苦为名加以煽动，其祸必将转瞬延及松前箱馆。当务之急，应防祸于未然”云云。1870年正月，俄国兵对我官吏施加暴行时，也曾有过“库页土著内通俄国”的事情（〈日本外交文书〉三）。既然抱着给以少许烟酒就能驱使土著的想法，那末事情演成这种地步也就在所难免了。

后来，我方也曾施惠于土著，然而“并无一定方针，既没有使她们与祖国人民同化的企图，也没有授以先进的工艺技术，使其足以自立”，因只限于封建的仁惠，费用不继，仁惠便逐年减少下去（桦

太厅《桦太施政沿革史》)。

同时，俄人也常因欺凌土著而遭到反抗(同前书)。不过，俄国对库页岛的经营是有组织有系统的。而令人吃惊的是，直到庆应三年十一月，即大政奉还之后，德川幕府才许可武士和平民自由迁移，在这以前，人民连去库页岛的自由都没有(《续德川实纪》、《维新史料纲要》五)。这还谈什么北门的锁钥呢？维新政府也是大同小异，虽然大嚷北方危急，但从未做过有组织的科学调查；1873年(明治六年)3月才初次用华氏寒暑表测量库页岛的气温，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桦太施政沿革史》)。

这样怎能对抗俄国呢？就本质而言，正如克鲁森施滕早在1805年所说的那样，“要占有库页岛，不得到库页岛真正主人虾夷人的同意不行”。可见日本理应对俄国可以主张对库页岛的历史优先权。为了确保这种优先权，应该在国内保证人民的独立自由，对虾夷人要超出一时的恩惠或俄国式的殖民统治，“不剥夺虾夷人的自由，采取措施，使虾夷人不要求撤换他们的统治者”，使国民与土著的虾夷人一致协力，这“不论从人道上说，还是从政策上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前引克鲁森施滕书。本多利明著《经世秘策》中也有同样的主张)。

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宁愿依靠英国和美国，它们同俄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对立地位。从1869年初开始，巴夏礼与外务当局间就库页岛问题接触频繁，到7月前后，俄国开始向库页岛派遣大军。巴夏礼比日本政府提前获悉，对这件事很重视，8月1日和9日两次同外交当局悬谈，商讨对策。日本外交最高首脑岩仓、泽等人完全不了解库页岛情况，反被洋人巴夏礼嘲笑说：“贵国的事情，你们当然知道”，一面打开地图说明。情况使巴夏礼大为失望，感到问题不仅限于库页岛，甚至连北海道都有丢失的危险。于是，他建议日本应该放弃库页岛，把防御力量集中于北海道。当时(公历

1869年8月13日)巴夏礼在寄给他妻子的信里表明了他的见解：“虾夷的北方，即库页岛上发生了重大问题，日本政府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日俄间有发生争端之虞。(中略)俄国向库页岛南端派去一千二百名军队，目的恐怕是要占领虾夷(北海道)。如果日本不慎丢失虾夷，这对日本将是一大损失，而对俄国则是一大利益。我劝告日本政府向虾夷派兵，不要在库页岛问题上同俄国抗衡。库页岛已不可救药，但虾夷还有挽救希望”云云^①。巴夏礼的建议，作为日本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可看出他对这件事的痛切关心。因为北海道如被俄国蚕食掉，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就要受到威胁了。

日本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明确措施，仅仅在9月赶紧派外务大丞丸山作乐等前往库页岛。丸山是个激烈的排外主义者，他被派往库页岛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尽管他是个对外强硬论者，然而这种旧时代的人物根本不能抗衡资本主义的俄国而作好经营库页岛的工作。当丸山出发时，外务省及三条大臣对丸山和开拓使指示说，俄国来势非常凶暴，如与之抗争，势必火上加油，“这时，必须应用柔能克刚之理”，加以忍耐。这事实上就等于放弃库页岛。大久保利通、广泽真巨等人本来就十分关心库页岛问题，但大久保也认为还不到采取“断然措施”的时机，主张只好“暂且应付一时”，表现出退缩不前的态度(8月12日，11月13日致岩仓的信)。

政府于1870年2月设置桦太开拓使。5月，任命黑田清隆为开拓使次官兼摄库页政务，7月，前往库页岛与俄国军官进行协商。当时黑田对所有一切争端，都草率表示让步，9月，回京提出建议说：“库页岛的经营应该断然放弃，委诸俄国，免得浪费国力于无用之地，此为上策。退一步说，划定边界是中策。仍旧杂居，伺

^① Dikins, F.V. & Lane-pook; S.: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Vol.2.

机断然放弃，乃是下策”。这种屈服是令人吃惊的。冈本和丸山这类排外主义者处在这种长官下本来应该愤然辞职才是（森谷秀亮氏著《明治时代》）。

另一方面，政府在巴夏礼对此事撒手不管以后，求助于美国公使德朗，同他商议“如何处理库页岛”。1870年10月，俄国驻清国公使布策来日游览，会见了参议副岛种臣和寺岛外务大辅，就库页岛问题交换意见。副岛向他说：“鉴于人心不安，倘贵国能将库页全岛交给我方，我国人民将永久安定，还将永久尊敬俄国”。这番话与其说是维护我国主权，毋宁说是乞求对方施舍（参照《日本外交文书》三，七六号文书）。令人有必要记住副岛这个名字。但是，当时因为布策反对，便不再恳求美国公使调停，而且后者对于这一问题也拒绝斡旋，并劝我国放弃库页。翌年1871年，副岛打算前往波谢特湾同俄国进行交涉，但事前没有弄清对方公使是否前来，就来到箱馆。待得知对方不来便返回了。1872年4月，布策来日就任驻日代理公使，同副岛开始谈判划定边界问题。经过几次接触之后，他不同意在岛上分界。于是，我方首先提议将全岛卖给俄国，但他说没有收买资金。后来法国公使向副岛透露俄国有意出卖库页岛，于是我方提议收买全岛。1873年，对方明确表示拒绝出卖，说：“库页岛是俄国不可缺少的土地，不能交给日本，亦不能出售”。结果，我方再次决意出售，“如果决定将全岛交给俄国，俄国政府将对日本政府或人民给予相当利益，于是谈判进行到两国间可以为此签订条约的阶段，并讨论了上述利益和签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已经进入协商细节了。由于副岛不久前往中国，他同俄国的谈判也就随之中断，接着征韩论决裂，副岛便下野了（《日本外交文书》六，172号文书，明治七年二月外务省官员田边笔记，这不能说没有史料价值吧）。

向来的说法是，《开国五十年史》内载副岛的《外交史》和其他

各书均未提出任何确凿史料，副岛曾提议以二百万日圆收买库页岛，事已垂成，他即下野，后来黑田放弃库页岛的意见占了上风云云。但据正确史料，事实显然恰恰相反^①。

据认为，西乡隆盛作为当时的政府最高首脑，也支持过副岛的出售库页岛方案。据木户的信说（1873年11月20日致伊藤博文）：“昨天黑田的话里有这样一段：仿佛西乡曾说过，库页岛与千岛群岛交换确将成为事实，据说这话可能出自副岛。果真如此，便与花言巧语云云相符合了”。这是主张对俄妥协的黑田说的话，也许可以看作黑田故意拿西乡作挡箭牌，但对上述谈判经过，作为政府最高首脑，西乡也是有责任的，并不能认为是黑田的随便胡说。

在这期间，俄军事实上已经占领我方根据地久春古丹地方，不顾我方的严重抗议，肆无忌惮地进行修筑码头工事。1873年3月，俄军公然白昼纵火烧毁我方官员宿舍，民众挺身抢救时，俄国兵竟投石拦阻，暴行逐日加剧（《桦太施政沿革史》，《日本外交文书》六）。日本方面对此提出抗议，也丝毫不得要领。同时，西乡、副岛、板垣等政府最高领袖也都无意经营库页岛，而急于向朝鲜扩张。这一点容在下文详述。

副岛的主权外交十分著名，尤其玛利亚鲁士号事件值得大书特书。

1872年6月5日，秘鲁国轮船玛利亚鲁士号从澳门载中国工人驶入横滨。7日，有一名工人因不堪虐待从船中逃出，经英国军舰营救，交给神奈川县。县当局传讯玛利亚鲁士号船长，据称并未虐待工人并保证将来也不虐待，于是便把工人交还船长，了结这件公案。然而，英国代理公使沃森详细调查了玛利亚鲁士号上中国

^① 与此有关的参考史料有1873年（明治六年）5月2日驻俄美国公使欧尔向美国国务卿提出的报告。该报告说，俄国首都外交团间传闻俄国对4月1日到达此地的岩仓全权大使等提议以千岛交换库页岛云云。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U. S. A.) 1873, Russia, No. 939.

工人的惨状后，汇报给副岛外务卿，要求审讯船长。他建议说：“对买卖奴隶，应该竭尽国力坚决予以阻止，并应向世界表明这种决心”。同时，还鼓励他说，日本有权审判这一事件，决不会引起外国干涉，甚至说审判时可以用我(沃森)的控诉作为证据。同时，美国代理公使也有同样的提议，并言明秘鲁在日本的事务虽由美国官吏代行，但关于这一事件决不支持秘鲁。这时，副岛才不顾司法卿江藤和神奈川县令陆奥等人主张不要介入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问题的反对，决心再度过问这一事件，让美国顾问斯密士和希尔两人与神奈川县的副县令大江卓，共同担任玛利亚鲁士号船长的审判。正当进行审判时，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和法国及德国驻横滨领事等提出抗议，说日本无权审判此案。但因英国绝对支持，终于在8月25日，使中国工人“取得自由权，返回祖国”(《玛利亚鲁士船裁判略记》，《明治文化全集》外交篇，《大江天野传》，《日本外交文书》五)。

于是，副岛外务卿就以主持“正义人道”而扬名了。同时也曾有过这样一个场面，即秘鲁船长以日本艺妓和娼妓为例，指出日本国内也存在着买卖奴隶的事实。

这一事件的幕后还有另一个国际关系。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以后，当地对劳动力的需要有了激增，中国工人成了供给这项劳动力的巨大源泉。他们先从香港或澳门被运到秘鲁或古巴，在那里当作奴隶进行买卖。1855年(安政二年)香港英国当局对此严加取缔，所以后来澳门便成了买卖工人的最大中心。香港英文报纸连日揭露这种工人的惨状，大肆攻击澳门葡萄牙当局。结果1866年(庆应二年)，在北京由清朝政府和英法美德各国代表想就“移民”境遇改善措施签订协定。在行将达成协议时，因为法国提出异议而告失败，只有英国一国极力主张废除奴隶贸易。美国在这以前就如同它后来排斥移民那样，

极力排斥中国工人的移民(Michie, A.: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1890, Vol. II Chap. XX.)。

一考虑到这个背景，玛利亚鲁士号事件之所以在日本一度结束、后经英美提议再度审判的全貌就十分明显了。

情况尽管如此，这当然也是副岛的功绩和有关我国的名誉。此外，副岛外务卿就任后，纠正了外国公使随便召唤我国大臣的丑态，这也是值得赞扬的。当然，这也是由于实现了废藩置县和国内统一等，维新事业有了前进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由于这种前进并不彻底，不仅暴露了日本国内也存在着奴隶的丑事，而且副岛的外交实际上也还不能抗拒英美俄的利益以维护我国主权。不仅库页岛的转让问题，甚至 1873 年以副岛为全权代表同上述南美三等国秘鲁签订友好条约时，还不得不给与这个国家和英美俄同样的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而且副岛身旁还经常有美国公使德朗、美国顾问佩先·斯密士、李仙得等人为之策划，这也是周知的事实（这点后面还要谈到）。

当时美国正值奴隶制度废除后，国内市场有了迅速发展，“美国夺得大陆西部地方，国内遍设铁路，保证了发达的工业品的销路。因为有了这些非常了不起的发展，野心最大的人也可以不出国境而满足侵略欲望了”。因此，美国国会对政府当局在 1867 年（庆应三年）从俄国手里收买阿拉斯加一事加以责难，禁止以后收买领土，并且否决了 1871 年（明治四年）格兰忒总统时签订的合并圣多明各岛的条约，废除同夏威夷间的关税协定，在这种情形下，对遥远的亚洲海上冒险就更加反对了^①。1871 年美国舰队为了要求朝鲜赔偿烧毁的美国船只舍门将军号签订条约而开赴朝鲜江华掀起战端时，虽然驻清国公使罗极力主张强硬方针，但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由于受到国会的掣肘而不允许这种主张（奥平武彦《朝鲜

^① 堪特罗维奇著，广岛定吉等译《在中国争霸的战争和太平洋》上。

开国交涉始末》)。同时，美国向远东市场的扩张大大落后于英、法、俄等国，因而不希望日本和中国变为英、法、俄等国的半殖民地，唯其如此，它才得以伪装成“友好的”。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由于民主党资本家煽动，排斥中国工人移民的风气很盛，还如后面所述，它害怕日本与中国结成同盟，便越发设法接近日本。日本当局也正因不满英国公使巴夏礼的高压态度，而把讨伐幕府以来的对英依赖关系改为依赖美国了。

小笠原群岛的归属问题，轻易决定归属日本，这如果考虑到当时美国的一般对外政策，是容易理解的。日本政府的大藏省^①方面直到1873年还没有完全认为该岛是我国领土，该年5月停泊于横滨的一只美国船申请开往二见港时，横滨海关和大藏省认为那里属于外国港口而予以照准（如果是我国领土，则因二见港是不开放港口，不能批准）。但外务省则认为我国领土，却禁止开往该港。另一方面，1853年，佩里曾经把当时我国称为“无人岛”的该岛宣布为合众国领土，后来有数名美国人移居该岛，如果美国主张对该岛的领有权，这种主张也并非毫无根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美国远东政策，它表明“当初科莫多尔、佩里驶往日本时，舰队中的一艘军舰以合众国名义占据了该岛，但此事未经国会许可，而且后来本政府亦无意继续支持该海军军官（下略）”云云。美国表示对小笠原群岛没有任何野心，因而该岛很容易地确定为日本领土了（《日本外交文书》六）。

第三节 侵略中国之梦

以上是日本外交对欧美及俄国屈服的一面。但它还有另一面，作为前一方面的补偿。那就是从明治初年，也可以说从幕府

^① 即财政部。——译者

末期起，策划对朝鲜、“满洲”、台湾、中国大陆方面的侵略。所谓经略大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朝鲜。关于对朝鲜的政策将在下章内详细分析。这里主要考察一下具有经略朝鲜准备工作意义的对华政策。

德川时代，经幕府许可的少数中国商船只限于航行长崎一港。但日本人到中国去，当然不许可。开港后，1861年，幕府派官吏到上海去刺探情况，并会见上海道台，协商日本船只开往中国进行贸易的办法等等。同行的有长州的高杉晋作，萨摩的伍代才助，佐贺的中牟仓之助等人。后因国内多事，没有任何进展。到1867年末，长崎奉行^①河津祐邦委托英国官员致书上海道台，请发给日本人为了经商或留学前往中国的入境、居住护照。上海道台的回文是在幕府垮台后1868年（明治元年，清朝同治七年）3月寄给河津的，这封信由新政府的九州镇抚总督收到。从此以后，我国长崎官宪和上海道台间有了书信往返。同年10月，上海道台的信中说，为学习前来中国者，不需要印信，商船只要不违犯清朝法律就可得到优厚待遇，也不需要签订条约。这就等于拒绝确立交际方式，只准前往上海，而且说：“日本人如违犯清政府法律者按当地法律惩罚，如同旅日中国人遵从日本法律一样，各该本国官吏不得干预”，这就是说不承认彼此的治外法权。长崎府对此立即表示同意（《日本外交文书》二）。

上述长崎府的交涉并非根据中央政府的指令。日本政府平定东北^②地方的问题以后，才正式着手对华政策。1869年5月，外国官^③才训令长崎府呈报日清往复信件及处理华侨的规章。

同年7月，寺岛外国官副知事^④呈请通过英国公使通知清政

① 行政长官。——译者

② 指日本东北地方及北海道。——译者

③ 即外交部长。——译者

④ 即外交部次长。——译者

府表示我方有意派遣使节来华议订条约。11月，外务省（前称外国官）举行部务会议，决定首先派遣“职位较低的使节”，前往北京观察情况，“如日商贸易大有意外进展的可能，再仿效西洋各国谈判条约，也不算晚”。

从这个部务会议（或寺岛的呈文）中可以看出，如单从经济观点出发，当时我国工业还很不发达，所以没有必要急于签订日清通商条约。但上述寺岛的呈文以及1870年5月的“外交急务三条”中也曾提到，最初随欧美人来到日本的中国人，独立经营商业后，遇事则受外国领事保护，我国对它不能行使权利，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和更重大的根本目的——即所谓“宇内形势一变，今非昔比，隔海咫尺之地，若无使节往还，实非经略之远图”的政治目的，这才急于同中国签订条约（《日本外交文书》三）。

“经略之远图”的第一个步骤，指定是朝鲜。当时朝鲜责难日本政府致朝鲜政府的国书中有“敕”、“皇”等字样。它认为这种字样只有上国大清帝国才能使用而不接受日本的国书。而日本国内则以朝鲜不接受国书为理由之一，征韩论在政府和民间士族间盛极一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同中国的交往虽不比同朝鲜的交往更急，但从怀柔朝鲜的观点来说，也应该首先着手进行”（明治三年四月，外务省的朝鲜政策，《日本外交文书》三）。

于是，取消往北京派遣“职位较低的使节”的方案。1869年12月3日，敕命当时最激烈的征韩论者木户孝允从三位为钦差全权大使，前往清国和朝鲜。但木户因国内多事，此行未果。明年1870年6月，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先将等人前往清国进行签订友好通商条约的预备谈判。柳原的权限只限于专门进行签订条约的预备谈判，并不包括调查朝鲜同清国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签订条约的目的与朝鲜完全无关。

8月，柳原等抵达上海，然后转道天津，将他的使命通知清政

府。清政府最初说“古语云‘大信不约’，中日两国自古友好，无需仿照西洋，签订条约”，意欲限于上海一港照旧通商。柳原不屈，会见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国第一流大官，力陈签约的必要。

据李鸿章的上奏折载，柳原向李鸿章等陈说：“西人常逼该国（日本）通商，心虽不满，但力难抗拒，亟欲与中国通好，同心协力。又华人在该国通商者，西国领事每欲代管，故须互定条约，自为钤束”。李为这种说法所动而在奏折中说：“日本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则为我用，拒绝之则为我仇”。李还屡次建议政府应该同意缔结条约谈判说，我若拒之太甚，彼若他日委托泰西各国提出要求，终难拒绝，反招耻辱。于是朝廷终于10月11日照准（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

柳原的中日合作对抗欧美的说法，本来是临时的托词，柳原本人和日本政府根本就没有这种意图。不仅如此，明治政府的实际最大首脑大久保利通，在柳原去华以前，1870年3月，当天津发生杀害传教士事件，英法开始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时，曾向岩仓具视说过这样的话：

1. 关于中国发生混乱一事，鉴于“各国交往本以亲睦为主”，希速派外务卿或大辅前往横滨，慰问公使团，以表示我“对外国遵守信义”。

2. “英、法如果出动军舰、陆军，必有确实报导。那时尽管英、法早有应变的全部准备，我方可向它们致意，愿在食粮、薪、水方面以及只要日本能做到的其他事情都尽力帮忙，请它们不客气地提出来”（《大久保利通文书》三）。

但欧美对中日同盟也倍加警惕。第二年5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代表，柳原等人为随员，前往中国签订中日条约时，横滨外文报纸报称，中日间有意签订攻守同盟（1871年6月5日〔明治四年四月十八日〕法文报《日本之声》）。因此，英、法、美各

国公使立刻质问我外务省是否属实，并威胁说：“倘与清朝修约，犄角连衡，恐非日本之福”。政府当然没有同盟之意，便于五月十日（6月27日）发表辟谣声明（《日本外交文书》四）。

6月7日伊达全权代表等抵达天津，立即开始谈判。我方的条约草案，以中国同欧美的条约为蓝本，把日本摆在欧美各国的同等地位，是个不平等条约的草案。清廷大为吃惊和震怒，认为日本草案“全部照抄西人约书，只是一面之词，与我政府（清廷）所望大为背谬”（《日本外交文书》）。接着，提出中国的方案。其中第二条说：“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乍一看来，分明是一种同盟方案。我方代表当然未予接受。日方宣称：“西方各国已在怀疑中日同盟，故必须按照西洋成例订立条约，以使彼等不致生疑”云云，一再援引西洋进行辩论。对此，中国对此答道：“若虑西人之忌，则伊达大臣不来中国，即无此虑，更可周全西人，岂非上策”。伊达全权代表无言可驳，结果把第二条看作中美条约或日美条约中所有这类条款一样，单纯解释为平时的细微纷争要以友国之谊加以调停之意而接受下来，7月29日，签订了修好条约和其他文件。

日本提出的最惠国待遇的要求未被接受，关于审判权是：本国人民之间的诉讼由驻在各该口岸的理事官根据本国法律审判；中日两国人民间的诉讼则由双方官吏协议审判。关于关税率也由双方互相协定。一切权利固然都是双方平等的。但是，既然两个国家在法权方面也好，在税权方面也好，当时已被欧美剥夺无遗，再没有任何国权可以被欧美援用最惠国条款剥夺的了，为什么两国没有按照彼此都是独立自主国家来签订一个真正平等的条约呢？实际情况是，我国政府希望我方取得完全自主审判权，而为了取得这种审判权就必须同样也赋与中国以自主审判权，于是我方认为

“其结果虽然彼此平等，但使我国国民处于彼方严酷法律之下是不适宜的”，便在预料中国领事不会来驻日本的情况下，企图事实上唯有我方可以确保治外法权，才订立了这样的条约（《日本外交文书》六）。关于税权也是如此。

同盟根本谈不到，企图对朝鲜和中国进行“经略之远图”的政府，当然对这个条约大为反对。首先反对第二条自不待言，此外，对条约的前文没有明白写上“天皇陛下”的尊号（为了说服朝鲜接受日本国书的“皇”、“敕”等字样，进而说明朝鲜是日本的下国，这种尊号也是必须写上的），（参照外务权少丞官本小一郎的《朝鲜意见书》，《日本外交文书》二）、第十一条两国商民往来不许携带刀剑的规定、第十四条两国兵船不准驶入未经指定口岸以及内地河湖支港的规定以及其他条款，都认为必须删除或修改。

以上是岩仓和大久保出使欧美以前的情况，“对华强硬”的方针，并不是由西乡留守内阁和副岛任外相时开始的，而是日本政府起首的一贯方针。

当时欧美各国把我国视为非文明国家，并以此为借口强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种不合理的办法，我国人民当然是人人切齿的。假如当时我方当局不希望在同受欧美压迫的中日两国之间，把一方视为非文明国而订立不平等条约，并且排除上述大久保意见书内的那种追随欧美的侵略主义，而订立一个两国真正独立自主的平等条约，其第二条不拘中国意图如何，由我方积极加以扩大解释，相互协力，打击欧美最害怕的要害，那末，对增进中日两国的地位和幸福可能是一个极其有效的办法。条约签订后，驻日各国公使认为第二条与政府的前言不符，提出抗议性的质问（《日本外交文书》，四）。驻中国的美国公使罗也认为第二条是“真正的灾害”，曾千方百计力求删除（Demen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前引堪特罗维奇《在中国争霸的战争和太平洋》）。

我国政府解释第二条决非同盟之意，使彼等放心，并于1872年5月，派柳原为驻中国公使，令其交涉在互换批准前删除第二条并修改其他条款。另一方面，这时政府在美国公使德朗的支持下早就开始了向中国领土台湾出兵的计划。

在这以前，1871年11月，琉球的渔民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牡丹社住民杀害，十二名仅以身免，请求中国官宪保护。这件事于1872年4月由柳原驻中国公使报告到外务省，7月，琉球当局也报告到鹿儿岛县。

琉球数百年来既附属于萨摩的岛津氏，同时又对明、清纳贡，受明、清的封册，即所谓处于中日两属状态，同时又和法、美等国作为独立国家订立了条约。废藩置县的时候，日本把它置于鹿儿岛县管辖之下。1872年1月，该县官吏前往琉球通知本国的变革，促其改革岛政，并豁免它对岛津氏所负的债务，试图逐步定为日本领土。正当这时发生了上述事件，鹿儿岛县大参事大山纲良立即上书请求政府借与军舰，深入“蛮地”^①进行讨伐，以雪民冤而扬皇威于海外。

陆军少校野津镇雄、陆军少将桐野利秋(均为鹿儿岛士族)等也相继晋京向西乡、板垣等当时的政府首脑(大久保当时正在国外)建议“征伐台湾”，并得到他们赞许(《西南记传》一)。于是，基本上由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出身的士族成立的近卫兵及其他海陆军人之间，竟“有沙中偶语，不待朝命，而图谋擅自征讨生番者”(《副岛大使适清概略》，《明治文化全集》外交篇)。西乡，副岛等人唯恐他们轻举妄动，为了预防欧美的干涉和领有台湾的中国的抗议，说服他们暂时待机，“然后再用诸君之力，取得此地以为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同上)。

因此，政府首先要求各国公使团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另

^① 指台湾。——译者

一方面,9月,敕立琉球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列为华族。美国公使首先承认琉球为日本领土,并要求日本政府继承琉美条约,我政府接受了这个要求,接着各国也办理了同样手续。

副岛就这样在得到美国公使德朗的援助下,进行了出兵台湾的准备。此时,恰好美国驻澳门领事李仙得在归国途中路过横滨。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867年(庆应三年),他曾率领美国军舰讨伐台湾,后来又曾随同中国兵渡台,直接会见牡丹社酋长,使酋长宣誓,以后非但美国人,即使其他西洋人来台,也一概不施暴行(吉野作造《日本外交的恩人李仙得将军》、《明治文化研究》三之七、八)。

1872年9月23日,副岛外务卿与德朗会见,讨论台湾问题,并经介绍认识了李仙得这个人物。当时副岛十分露骨地说:“台湾也是我国的渴望之地”,德朗也明目张胆地鼓励副岛说:“美国向不占有他国土地,但我友邦如占他国土地而有所扩张,则为我所好”(《日本外交文书》七)。翌日,副岛与李仙得会见,问他出兵台湾前后同中国交涉的始末,中国统治台湾的实际情况以及其军备等,并将李仙得所携的台湾地图、海图、照片等全部借来。副岛因为有了李仙得而十分喜悦,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后来副岛还和德朗保持密切联系,有一次两人曾彻夜协商对台湾的策略。德朗在副岛的委托下,曾致函驻华美国公使罗,请他替日本向清政府进行斡旋(美国政府外交文书,1873年,日本部,1872年11月6日,德朗报告书)。美国政府并没有认可德朗提议的援助日本的军事行动(同上,1872年12月30日国务卿菲什对德朗的训令)。但是李仙得却于同年11月(阴历)辞却本国官职来日本外务省担任二等官(大辅)待遇的顾问。

同时,政府内部征韩之议已经成熟(后述)。因此,为了准备工作,有必要明确中国同朝鲜的宗主关系的实际情况。

1873年(明治六年)2月,副岛外务卿为了批准中日条约的换文前往中国。但其真实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兵台湾和朝鲜的外交准备,这也是副岛对驻华美国公使罗所谈到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书,1873年,中国部分)。

因此,删除条约第二条等已非重要问题,1873年4月3日,伊达全权代表签署的条约原封不动地互换完毕。

另一方面,副岛为了来华的真实目的,6月18日,访问驻华美国公使罗,就台湾蛮地对策及朝鲜政策交换意见,索取了美国同朝鲜发生争执时(1870年,明治三年)美国同中国交涉的文件抄本,并弄到了中国答复美国的中国对朝鲜内政外交不加干预的声明书。副岛也访问了英国公使威妥玛,讨论了日本对朝鲜、台湾的政策,并透露可能向台湾出兵(前引《副岛大使适清概略》,“《日本外交文书》六”,前引美国政府外交文书,1873年,中国部分)。

同时,柳原公使于6月21日前往中国总理衙门质问中国对朝鲜的关系。清政府如同前年答复美国公使或法国公使一样,告以朝鲜的内政外交皆听任朝鲜自主。柳原又要求说明为什么台湾原住民杀死了“日本琉球藩民”。清政府答称,台湾人杀死“中国属国之民”是有其事,但并未闻有杀死日本人事,于是便争论起琉球的归属问题。但是,柳原没有深入这个问题,对中国方面说的“台湾全岛固然是中国领土,不过生番是化外之民,为中国的政策所不及”这句话感到满意。他说:“既是化外孤立的番夷,只好归我单独处理”而辞去(《副岛大使适清概略》,《日本外交文书》六)。

这样,日本政府出兵台湾已成既定方针。副岛对于他赴华主要目的的这件事没有亲自进行谈判而让柳原来办,对中国的声明以及柳原的发言都没有要求写成书面,这一点一般人说是个“过失”。然而这决非无意识的“过失”,而是副岛有意识的策略。副岛和柳原岂不知道口头声明不能成为充分证据,而作顾问随行的李

仙得更不会不知道这点，他们是明知而故意这样做的。从柳原的问答态度上就可看出，他巧妙地引诱中国方面无意中说出“化外之民”这句话，说完后，他对中国方面的其他发言便置之不理了。他深知把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由彼此的全权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会引起纠纷的。

副岛于7月末趾高气扬地回国了。在他出国期间，西乡隆盛已在筹划出兵台湾的准备。他要求他的从弟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一定要使别府晋助率领鹿儿岛兵一大队去参军”（明治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书信，〈大西乡全集〉二）。

后来不久，征韩论或作为它第一阶段的派驻朝大使的议论成了西乡内阁的第一目标，因而出兵台湾问题便搁置起来。不过，明治政府的侵略和对外战争的枪口是指向台湾，还是指向朝鲜，这时都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是明治政府一面屈服于欧美，一面还一贯执行进攻弱邻的方针。

第二章 野心的焦点——朝鲜

第一节 明治前的日朝关系

日本同朝鲜的交往，和日本历史同样悠久。上古时代，日本列岛的政治势力虽然也曾到达南朝鲜的一隅，但朝鲜人民及其文化在我国文化的黎明时期经常起着指导作用。纵令古代日本的统治者把朝鲜半岛当作侵略的对象，但日本人民却认为朝鲜人民是传授农业、陶器、纺织等进步生产方法和文字、学问的恩人。从平安朝时代^①的末期起，以中国宋朝商人^②为中心，发展了东亚的海上交通，日本人民凭自己的力量主动地开始向海外发展。

^① 794—1192年。——译者

鎌仓时代^①、室町时代^②、十四—十五世纪,出现了所谓的倭寇的全盛时代。日本人在中国和朝鲜的沿岸,或是作为和平的商人,或是作为海盗,自由自在地活跃起来。但是室町幕府不愿意国民自由活动,而朝鲜和中国也苦于倭寇滋扰,于是室町幕府便与高丽朝为交涉禁止倭寇而开始了接触。

1368年(日本正平二十三年,高丽恭愍王十七年)室町幕府和对马国守护^③宗经茂各派使者前往高丽,协商取缔倭寇事宜。这时宗氏从高丽王处取得大米一千石。日本人的进入朝鲜从这时起有了迅速发展。李成桂自立为王,朝鲜国开国之初(1392—1393年),日本人被授以官职的称谓“受职倭人”和定居朝鲜的日本人也多了起来,仅庆尚道一地,就达两千人。

但后来对倭寇的禁止,发展到限制日朝交通,因而私人贸易,即两国人民间的自由贸易往来,受到了压制。朝鲜王制定了图书(即勘合印)、通信符等制度,凡是没有领得图书和通信符的人不得入境。取得这种图书的幕府、宗氏和大内氏等九州西部的有势力者和大商人等,由于这种制度可以防止出现新的竞争者,垄断对朝鲜的贸易,反而甘心拥护这个制度。当时朝鲜王利用对马岛的地理位置,对宗氏给以种种特权,并把宗氏看做是李朝官员,为替李朝服务的日朝通交的中心机关。根据1435年(日本永享七年,朝鲜世宗十九年)和三年后的1438年以及又五年后的1443年(日本嘉吉三年,朝鲜世宗二十五年)的对马同朝鲜的条约规定:

(1) 凡从日本乘船前来朝鲜者,除将军、管领等使者外,均须持有宗氏的渡航证件(称为文引),没有这个证件者,一律视为海贼。

(2) (甲)朝鲜特许宗氏岁遣船五十只;(乙)每年给与米豆

① 1193—1392年。——译者

② 1394—1572年。——译者

③ 即对马岛的藩主。——译者

共二百石；(丙)紧急时作为“特送”，可以不限船数，给与入境权利。

根据(1)的规定，宗氏可以征收发行文引的手续费，甚至可以对贸易品课税，取得巨大利益，并可随意限制贸易而进行垄断。同时正象岁赐米豆所具体表现的那样，宗氏俨然成了朝鲜的半属国，完全依靠朝鲜的恩惠。彼此的贸易场所限定于荠浦、釜山浦、盐浦三港，在这里修建了“倭馆”。

但是，由于私人贸易的废止，日本商人与朝鲜当局间发生争执，1510年(日本永正七年，朝鲜武宗五年)，上述三港的日本商人发动兵变，结果失败。后来贸易进一步受到限制。根据1512年的条约，贸易场所被限定为荠浦一港，后来迁至釜山浦。这就是截至1876年(明治九年)缔结日鲜条约以前彼此唯一的交涉场所草梁倭馆的由来。宗氏的岁遣船也被减为三十只，岁赐米豆减为半数。

这样一来，日朝的交通和贸易，变得和一般人民无关的事情，因而宗氏本身也失去抵抗朝鲜的后盾，后来也就不得不听从朝鲜统治者的任意行事和限制贸易了。丰臣秀吉大举侵略朝鲜以后，彼此的往来暂时中断了。1607年(日本长庆十二年)德川幕府同朝鲜和好，恢复了往来。后来，又曾发生过细微的日朝纷争，1635年(日本宽永十二年)幕府及宗氏同朝鲜当局之间的图书公文有了一定的体例。这个体例问题与日本的征韩论有重大关系，下面加以说明。

宗氏致朝鲜的书信署名为“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加盖朝鲜颁发的铜印(图书)。日本将军更换时，朝鲜方面派遣“信使”前来江户。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者，关于幕府的庆吊、藩主的吉凶、朝鲜的庆吊、信使的送往迎来等等事宜，由对州藩派规定的“参判使”(也有临时规外参判使)办理。参判使不得进入朝

鲜京城，只能留在东莱和釜山之间，由朝鲜中央政府派“接慰官”招待。朝鲜的“信使”可以谒见德川将军，而日本的使节不但不能谒见朝鲜国王或政府长官，甚至连相当于德川幕府的外国奉行的官员也都不能谒见，这根本不能说是平等的交往。1809年（元化六年）改为“易地聘礼”的办法，即幕府派使者到对马，在这里接待朝鲜使者。但这是出于对州藩和朝鲜方面的财政原因，并非为了彼此交往保持平等。

关于贸易方面，1609年（庆长十四年）宗氏同朝鲜当局签订“送使约定”。其内容不外是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壬辰之役，1592年）以前的状态更加缩小范围，允许由日本赴朝鲜的人限于国王（将军）和对马岛藩主的使臣和对马岛人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为朝鲜立过功劳的“受职倭人”，岁遣船包括遣使船在内限为二十只以内。图书、宗氏的文引等制度照旧，宗氏由朝鲜领受的岁赐米豆也一如从前，只是数量减为米豆合计一百石。

后来不久，1613年（长庆十八年）规定贸易定额，建立了所谓公贸易制。后来在手续上有过种种变更，对倭馆章程也重新有所规定。在所谓公贸易之外，也多少进行一些以输入棉布为主的私贸易，但由于日本棉纺织业的发达，贸易逐渐衰落，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即1775年（安永四年），贸易完全停顿了。

对州藩的财政完全依赖于朝鲜的贸易，贸易的衰落对该藩来说是致命打击。所以，私贸易停顿后，对州藩屡次请求幕府给予借款以维持财政。后来由于加增禄米两万石，幕府还拨给铜铤用来进行公贸易，藩的财政才勉强维持下来^①。

倭馆章程经过数次修改，截止明治维新前夕，其重要条目如下：

^① 以上根据中村荣孝《室町时代的日鲜关系》同《江户时代的日鲜关系》、《朝鲜更大关系》、《最近史》。

(1) 朝鲜人每月六次,按规定日期,在双方官吏监督下进入倭馆交易,此外绝对禁止出入。即便在规定日期,也只限于白昼,晚间检查馆内,内外两道门都予关闭,派人看守。

(2) 馆内对州人绝对不得越犯标定界限(即所谓闯出倭馆之禁)。

(3) 入馆的两国人不得交谈本国国情。

(4) 妇女一概不得入馆。馆内日本人如出馆行奸,处以死刑或流刑,带女人入馆者斩首,女人处流刑。

(5) 馆内所需之鱼菜日用品,每晨馆前开市供应(即所谓朝市),薪炭免费奉送,不令缺乏(这叫作供菜或供餐)。

(6) 宗氏的使节入馆时,一定期间内的伙食由朝鲜当局免费供给(《通航一览》卷一百二十五以下)。

倭馆的章程以及彼此交往和文书的形式,必须严加遵守,文书若有一点一画违反,即便由日本送来朝鲜海上难民,也不予接收。对州藩为了书写发给朝鲜的公文,特令五山的学僧轮流住在藩内。如果违反倭馆章程,朝鲜方面马上“撤市撤供”,即撤消朝市和供菜,使馆内日本人陷于饥俄。这种实例在《通航一览》中屡见不鲜。

正如在供菜和对宗氏的岁赐米豆上表示出来的那样,这种交往完全是朝鲜施给宗氏或幕府的一种恩惠。1611年(庆长十六年),宗氏请求增加岁遣船时,朝鲜予以批驳,甚至说:“贵岛之于我国,因自先世忠顺不懈,故我朝对之恩宠备至。因此,贵岛本应对我朝恪守信义,为我防卫,反而发生壬辰意外之变(秀吉侵略朝鲜)。(中略)然而日本痛悔前非,特遣专使乞好。贵岛亦悔其罪表示诚意,因以不念旧恶,是为大德,姑许其交往”(《通航一览》第一百二十二卷)。宗氏和幕府对此非但没有提一点抗议,宗氏还承认这种“几乎等于对外国执行藩臣之礼”,并且甘愿接受一切屈辱,甚

至到1870年(明治三年)明治政府有征韩之意时,宗氏的重臣大岛友之丞还说:“当然就对州而言,朝鲜之祸即眼前对州之祸”(《日本外交文书》3卷95号)。(大岛的征韩论的真意已如前述)。

以上是维新前数百年来本质上毫无变动的我国同朝鲜交往的常例。这种关系和德川幕府给荷兰人的待遇的情况相反,完全只是宗氏和幕府接受朝鲜恩惠的关系,而不是日本国对朝鲜国的交往。除了对州人以外,其他日本人绝对不能在朝鲜停留,甚至我国海上难民被朝鲜营救的时候,也不能进入倭馆,只在馆前海滨上交给对州官吏,然后马上送回对州。

这种交往恰恰是这样,即朝鲜也好,我国也好,国民内部不允许有自主平等的交往,在朝鲜是两班和平民,在日本是武士和平民,而每一等级内部还有若干阶层,身分等级森然,所有的人都仰仗上一级的人的恩惠而得到生存。因此,这种交往是根据施给恩惠的一方的意志和情绪,随时可以改变或废止的关系。

出岛^①的荷兰商人虽然为了贸易而甘心忍受屈辱,但他们原来是从事世界贸易的自主独立的商人,他们迅速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宗氏所享受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特权。出岛的荷兰甲比丹^②取得了日本的有志之士的尊敬,后来向幕府解说世界形势,指导了日本的建国,而草梁的宗氏官吏和他们相比,则有天壤之别,数百年来始终甘心忍受屈辱,几乎辨别不出他们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了。明治初年对朝鲜的交涉所以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草梁的宗氏官吏和商人等唯恐建立平等自由的日鲜新关系,竟至经常勾通朝鲜当局阻挠谈判。

当朝鲜,日本和中国互相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世界已经起了变化,结果这三个国家全都遭到欧美的压迫。同时,日本和朝鲜之

① 出岛是长崎市的一个海岸地区,江户时代荷兰商馆的所在地。——译者

② 荷兰甲比丹是荷兰商馆的馆长。——译者

间也出现了新局面。

1860年(日本万延元年,朝鲜哲宗十一年)对州藩乘大庆参判使(通知日本更换将军和使节,朝鲜称作“关白承袭告知差倭”)赴朝鲜之便,另修一书托该使通知朝鲜说:俄、法、英、美四国已经“与敝国通商”,告知日本开港之事,并提醒朝鲜要防范基督邪教,严戒边防(《朝鲜史》第六篇之三,《朝鲜史大系》,《最近世史》等)。

这时正是对州藩有机会象荷兰甲比丹对我国的开港那样,对朝鲜开港起到指导性作用,但是这当然指望不上,恰恰相反,它却提出禁止邪教和严戒边防的意见,从而助长了朝鲜的排外心理。朝鲜接到这样的通知,认为这是邻国对边境危险的一种友好忠告,殊不知这个邻国日本在开港以后,为了扭转幕府封建统制所面临的日益增大的危机,却叫嚣着上述的征韩论。

1863年(文久三年)胜海舟等人,如前所述,提出日韩“修交”论,声称如不达到目的,即便发动征韩战争也在所不辞。同时加上大岛等人发起的救济对州藩运动和板仓侯的儒臣山田方谷的建议,于是老中板仓乃主张“转内讷为外征”,以扭转反对幕府的情绪,因而采纳了这个日韩“修交”论。同年5月,幕府批准对州藩请求拨给的粮米,晓谕该藩说:“据闻外夷来朝,修建屋宇,我与该国素有信义,应派员前往援助,击破外夷根本之策,因时制宜,以兵威制服之”(《修订防长回天史》四)。这里所说的“制服”的对象,是指入侵朝鲜的洋人吗?日本国内正在苦于洋人的压迫,幕府尚且无力抵抗,若说派员前往海外去制服洋人,岂不是痴人说梦话。6月,幕府派胜海舟前往对州探查朝鲜国内情况,同年8月的政变消灭了反幕派,外征的必要不复存在,如果发动外征,反会造成内部危机,因而也就自然作罢了。

不久,1866年(庆应二年),十四代将军家茂去世,一桥庆喜当了将军。前此一年,朝鲜由于迫害天主教徒发生了前述的对法国

舰队的交战和烧毁美国船舍门将军号事件。关于这两件事，对州藩和驻日法国公使均通知了幕府，朝鲜在法国军舰退去后的1865年10月15日也通过草梁寄出公函，1866年3月收到。

该函开头就说：“敝邦与贵国讲信修交垂三百年，凡事关边警，无不陈述困由，开示方略，如庚申之贵国书契（即指1860年开港通知），即所以申旧约而敦邻睦”，并详述事件经过，说这次胜利并非已经杜绝将来之患，又说：“敝邦近海，夷船往来无数，不知贵国有何防备？是否击退洋夷或不知其‘内情’，敝邦不胜忧虑，故特通知事件始末”云云。

这显然是对前次日本向它通知开港的回答，是对边防的善意的忠告，而幕府却把它领会为朝鲜示弱和求援的呼声了。庆喜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朝鲜与美法两国之间进行调停，以使天下耳目为之一新。庆喜的这个企图的推动力是法国公使罗修（此人企图协助幕府，统一国内而使日本从属法国），他在1866年2月3日劝告幕府“应该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向世界各国宣扬贵国的国威和信义”（尾佐竹猛《从国际法来看幕末外交》，田保桥洁《李大王丙寅洋扰和日本的调停》，《青丘学丛》第十号）。

幕府于2月内定派外国总奉行^①平山敬忠前往朝鲜，4月将此事通知对州藩，并向美国公使告以调停朝美关系之意，取得了谅解。对州藩致书朝鲜当局说，幕府出于邻国的友谊将派遣调停使节前往谒见国王，开陈时势。可是，朝鲜东莱府使认为日本文书不合先例，拒绝接收，延至7月才勉为收下。

在这以前，1865年12月，香港的一家报纸刊登一篇署名“日本名儒八户顺叔先生”的谈话，其大意是：近来日本日新月异，大力学习西洋的军备学术，现在拥有火轮兵船八十余艘。又有江户政府督理船务将军中滨万次郎在上海制造火轮，已经驶回本国，国内

^① 即外交部长。——译者

诸侯会于江户议政，大扬国威，现在有意讨伐朝鲜。朝鲜自古属于日本，近代每五年国王照例必至江户拜谒大君将军，而现在玩忽此例，故将征伐。据田保桥浩的考证，八户是幕府代官之子，他所以散布这种流言，决非出于自己的妄想，连幕府臣下和部分藩士之间都普遍存在着这种希望和幻想。

这篇文章马上被报告给清政府。清廷的判断是：“日本近来败于英、法，因而大为发奋。果如报纸所载，英、法各国只是希望通商传教，而日本则是意欲侵占领土。倘若日本据有朝鲜，与中国接壤，其患更为切肤，远非传教通商之比，日朝之战较朝法之战更为可怕”，并将此意于1866年2月秘密通知朝鲜。

朝鲜马上对幕府发出严重质问：“流言虽不可骤信，但不胜遗憾”(5月)。幕府对此正式加以否认，并命令对州通知朝鲜说，日本为了朝鲜的幸福，派遣使节的日期已经迫近。这件事就此结束，但是，朝鲜对日本的疑虑并没有因此而冰释，尤其因为幕府在正式否认这件事的同时又通知它派遣特使，反而增加了朝鲜的疑虑和戒心。朝鲜以时值歉收、洋祸和疫病流行不能接待宾客为理由，拒绝了幕府派遣特使(9月上旬)。

幕府虽然接到了拒绝来函，仍旧决定于11月派出特使。庆喜将军亲自修书命平山携带前往。当时的方针是：“彼国国情，顽固之习，并无轻易说服之迹象，倘果如此，只好等待日后悔悟，暂先告辞回国”。

同时预料可能遭到朝鲜拒绝，因而准备一份文件，以便那时交给朝鲜。文件里说：“此番渡海来至对州，尚未接到今春回音”，这就是说明明明接到朝鲜拒绝派使的回答，却故意说没有接到，“既然杳无消息，不知国情如何”，“特远涉海洋派遣使节以尽邻国之谊，竟置之不答，可谓过于冥顽不灵”，“将来必有悔悟之时，彼时斟酌情形，或将以我君王天地之宏量，重敦旧交，以伸信义”云云，可谓

狂妄已极。当然完全不是什么为了克服东洋的危机而提议日鲜合作了。这时所以只说居间调停而没有征韩字样，只是因为幕府已经濒于崩溃，根本没有考虑向海外动兵的力量和财力，可是平山等人始终主张使用武力。

10月，庆喜实行“大政奉还”^①以后，外交事务仍暂委任给幕府，遣韩使节的问题也继续由幕府办理。11月，平山等人准备渡韩，但因幕府和讨幕派武装冲突迫在眉睫，这个计划便告吹了。幕府根本没有赴韩真意，从前述的文件看来是很显然的，只是因为美国公使问到遣韩使节的事情如何(11月)，为了掩饰门面，才虚张声势一番而已。由于幕府这么信口开河，以致给新政府也留下了后患。朝鲜方面因为早在8月就已正式拒绝遣使，后来又接到了使节出发日期的通知，便越发加深了对日本的猜疑，12月，向对州藩再次坦率地拒绝了遣使来访，文件里说：“方今我国深海防务，愈益严固，固不致遣悔于邻国。东武(幕府)亦何须远劳神思，遣使涉海，窃惟大惑不解”云云。

第二节 征韩外交的开始

维新政府在对朝鲜关系上承袭了以宗氏为媒介的室町时代以来数百年的卑鄙惯例，同时也一并继承了征韩论或服韩论以及朝鲜对我国的深刻的怀疑和戒心。

朝鲜问题，如上所述，对对州藩说来，是个死活问题。维新后，也是首先由对州提出了这个问题。1868年(明治元年)3月23日，新政府准许该藩的请求，通知藩主宗义达，“照旧”掌管日朝两国的交往，说这是宗氏一家的职务，并说：“当此王政一新之时，对海外事务应特别用心，一洗旧弊，为国家效力”，同时将这次王政复古，

^① 即还政于天皇。——译者

以及今后对朝关系既归“朝廷”处理等情通知朝鲜。殊不知所谓宗氏一家职务，却是一切旧弊的根源。

新政府在外交上忙于应付欧美，无暇顾及朝鲜，只有对州藩干焦急。闰四月，该藩上书，陈述该藩过去同朝鲜的关系，坦率指出该藩仰食于朝鲜，甘心忍受几乎等于做朝鲜外藩的屈辱，建议更改旧弊，更改朝廷对朝鲜的公文格式，树立恩威并施的规范，对方如果无礼，可以断然予以惩戒。

政府对此暂未答复，而这时对州的大岛友之允等人热烈向各有关方面要求政府树立对朝政策。政府也没有忽视朝鲜问题，5月，当大岛到外国官访问小松带刀^①请示对上述建议给予指示时，小松回答说，外国官并未忽视朝鲜问题，准备在俄国侵略朝鲜前“采取步骤”，但在国内安定以前没有余力。这时大岛恳求新政府设法考虑偿还宗氏对朝鲜的负债和几年前旧幕府允许拨给的三万石救济米。对州藩要求早日树立朝鲜政策的真实目的就在于这一点。6月，大岛的奔走奏效，政府通知他“不久可给予明确答复”。

1869年9月，会津城陷落，国内在天皇政府下得到了统一。10月，政府命令对州藩把大政一新事通知朝鲜。

11月，对州藩为了通过草梁馆司向朝鲜的东莱府使送递派遣大差使的通知书（“先问书契”），事前将抄件送交任译训导（朝鲜中央派在草梁的日朝交通事务官，也受东莱府使的指挥）。凡是两国间的例外书契必须事前送去抄件，得到他的同意后，方可正式提出，这是当时的规定。其文如下（缺字、改行等从略）：

“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平朝臣义达，奉书朝鲜国礼曹参判公阁下：

本朝，顷时势一变，政权一归皇室，在贵国邻谊固厚，岂不欣然哉。近差别纸，具陈颠末，不赘于兹。不佞响奉敕朝京都，朝廷褒

^① 带刀是一种身分。——译者

旧勋加爵进官左近卫少将，更命交邻职，永传不朽，又赐证明印记。要之，两国交际益厚，诚信永远罔渝，眷虑所在感佩曷极。今般差别使书翰，押新印以表朝廷诚意，贵国亦宜领可。旧来受图书事，其原由全出厚谊所存，则有不可容易改者。虽然，即是系朝廷特命，宜有以私害公之理耶。不佞情实至此，贵朝幸垂体谅，所深望也。

“明治元年戊辰十一月三日”(原文)

嗣于12月，对州藩重臣樋口铁四郎为大差使，偕同副使菟田多记携带如下的王政复古通知书渡海前往朝鲜。

“我邦皇祖述绵，一系相承，总揽大政，二千有余岁矣。中世以降，兵马之权，举委任将家，外国交际并管之。至将军家康开府于江户，亦历十余世，升平之久，不能无流弊，事与时乖戾。爰我皇上登基，更张纲纪，亲裁万机，而贵国之于我交谊已久矣，宜笃愚款，以归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乃差使价，以寻旧制，惟希照亮。

“明治元年戊辰十二月四日”(原文)

训导安俊卿、别差李旻文阅过这些书契的抄件后，对体例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大吃一惊，并且十分怀疑。他们指责的各点可以概括以下四条。

(1) 开头的发信人署名完全改了，按理应该是“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

(2) 上款写作礼曹参判公，为什么把“三百年来大人”的称呼改了？

(3) 文中屡见“皇”“勅”等字样。按“皇”是“天下之主，率土共尊之称”，朝鲜从未尊日本为皇，受日本的卑视。“勅”是“天子的诏书”，有资格使用这个字样的，只有朝鲜的“上国”大清帝国皇帝一人。

(4) 不用朝鲜颁发的图书而盖上了新印，并说明其理由

为“宜有以私害公之理耶”，把当初朝鲜出于恩宠而颁发的图书说成是“私”，最为使人莫解，真令人“张口结舌”，是重大的侮辱。

因此训导们说，两国的约定是“三百年来金石不刊之文”，“百神共证不渝之盟”，一字一言也不能违背体例，何况这种充满不敬字句的书契，绝对不能奉呈朝廷云云，严厉拒绝接受，并拒绝给樋口等人以使节待遇。

樋口们虽百般说明，但对方坚持不允，反复辩解一直继续到1869年(明治二年)11月。同月，安训导竟然通知说，不合体例的文书，即便在此逗留10年，也不会接受，不要抱万一的奢望，赶快回妥当地点去吧。但在樋口看来，这是有关对州藩存亡的问题，仍欲继续交涉。

于是，朝鲜方面在翌年1870年(明治三年)3月，寄来东莱府使的亲笔信说：“贵国(对州)明知敝邦不能接受而轻率出此一举，其意殊难谅解。倘贵国欲修千百年如一日的旧交，使用妥当文字并非困难。计不出此，实属可叹”，暗中怀疑日本故意难为朝鲜而包藏祸心。

朝鲜当局责难“皇”“敕”字样，是因为日本使用这种字样“必有臣隶我国(朝鲜)的阴谋，所以一开头就加小心，不能许可”(安训导对倭馆司的私谈)，又因为“称皇于本朝(日本)，首先对清朝有所忌讳，再者有履霜之虞，恐他日终于取臣礼也”(明治二年六月大岛友之允的建议)。由于过去的八户顺叔的事件和幕府强行修“好”等已使朝鲜对日本抱有戒心，此次又看到这样的字样，其戒心就越发增强了。更因为尽管指责文书不合体例，而日本却坚持不改，也就越发加深了疑心。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文字上的细节。朝鲜当局所希望的，是同三百年来受恩于它的宗氏和幕府的交往，而不是拒绝使用它所颁

发的图书的平等自由的交往。当时朝鲜的经济很落后，连我国江户时代都赶不上，国民处于两班贵族的独裁之下，受着农奴的待遇，甚至还存在着奴隶制度，工商业很不发达。两班贵族依靠剥削农奴，过着堕落的生活，正如 1865 年（日本庆应二年，朝鲜高宗三年）国王上清廷书中所说：“朝鲜系海边一弱小附庸国家，人民贫穷，几乎没有交易品。既不出产贵金属和宝石，粮谷和布匹也出产不多，不能满足国内需要，如果允许这些物品流出海外，国内必将立即疲弊，这个小国无疑将陷入极端危机之中”^①，它的极端排斥资本主义的交往，同我国的德川幕府完全一样。尤其当时的执政大院君在击退法国舰队后说：“近来大有武官出头之势，与前不同，每每动武”（明治三年六月十三日训导和对州藩使的谈话，《日本外交文书》三），表现出趾高气扬地热衷于排外主义。

另一方面，日本革新了数百年来和朝鲜所处的同一状况，并与朝鲜竭力排斥的欧美签订条约，吸取了它们的文明，开始与它们走向同一方向。因此，朝鲜便以杀法国人、烧毁舍门将军号船、禁止洋货的同一理由，开始排斥日本。1873 年（明治六年），在东莱府使发给倭馆官员的命令书——它成了日本政府讨论征韩的直接起因——中说：“彼（日本）虽受制于人而不耻，变形易俗，不可算作日本之人，不许其来往我国，所乘船只，若非日本旧标，也不许入我境”。这可以说最坦率地表明了朝鲜的立场。朝鲜是施与恩惠才允许对马人来航朝的，“马州人与我和卖，本是一定不易之法，则他岛人之交易，又我国之决不许者也”，这是朝鲜对日的国策。

促使朝鲜决心排斥日本的，还有另一件事。如前所述，1868 年闰 4 月，要求解放的朝鲜民众之一，朴根基听说维新日本与西洋各国往来，认为日本是自由国家，便想依靠日本取得信仰自由，来到

^①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U. S. A.), China, No. 35, inclosure V, Mr. Low to Mr. Fish (June 20, 1871)。

釜山附近而被逮捕。这一事件，可能大大加剧了朝鲜政府对新日本的排斥。

另外一些事情，也加深了日本和洋夷通谋的嫌疑。1870年（明治三年）5月，发生了德国驻日公使乘军舰停泊在釜山的倭馆前被朝鲜赶走的事件。我国外务少丞马渡俊迈和对州的朝鲜通译等也一同搭乘这艘军舰（《李大王朝史》，庚午五月四日，〈日本外交文书〉三）。因此，朝鲜认为日本明知朝鲜排斥洋人而“勾引洋船擅自驶来停泊，情节极为痛恨，难保其必无后日之虑”（《李大王朝史》，〈日本外交文书〉三，也载有朝鲜小通事的同样谈话）。

在草梁，双方谈判一开始就陷于停顿时，甚至在这以前，日本政府就以桂小五郎（后来改名为木户孝允）为核心策谋征韩计划。木户的日记中明治元年（1868年）12月14日条说：“明晨，岩仓公出发，垂问前途之事，因以数事进言，其中最大事件有二。一、迅速确定天下之方向，遣使朝鲜，质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鸣罪声讨，并希大张神州之威。果如此，天下陋习将倏忽一变，远定目的于海外，百艺机器随之进展，而各窥内部，排人之短，责人之非，各不自省之恶弊将为之一洗。国生必当大增，自不待言”。

当时尚未发生朝鲜政府的“无礼”，还没有可鸣之罪。但木户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当初幕府苦于无法处理尊王攘夷派时，智者胜海舟曾提出“攘夷必先兴国”的口号，主张征韩，并以此说服木户，木户亦颇表示共鸣。现在夸耀东北战功的各藩军队中都充满对新政府的不满分子，政府本身也因失信于农商平民大众而动摇不安。新政府的中心人物木户抱有这种思想，应该说是当然的。

木户曾与统筹新政府军务的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计议征韩的具体方策。在其日记明治二年一月一日条内写道：“卒晨与太村益次郎商讨征韩的风志。然而，所谓征者并非滥征，欲推宇内之条理也”。这个“宇内之条理”指什么呢？木户还在他寄给大村的

信里明白地这样写道：“天下各藩诸侯皆有勃勃功名之念，诸藩除论赏外别无异议，况且比起藩幕之时，骄气自然更见增长，依仗藩力任意要挟朝廷，所谓名义名分多半是空喊，丝毫看不出有明察宇内大势、维护皇国于万世的态度，唯利是图之风日甚，寻人之非，妒人之能（中略），首先是太政官迄今尚未确立重要之财政目的……日本与太政官皆有因财政而一同垮台之虞……大致说来，若不以减上益下为原则，将永难确立，这就很难使天下之风习为之一变，因而情况愈加迫切。军务方面大致已有定局，前时箱馆之役既已平定，海陆两军于朝廷已稍具端倪，希望专以朝廷之力（即不用诸藩之力），主要以兵力开辟韩地釜山。当然，此举不可能有物产金银之利，甚至或有所损失，但皇国之大方向因此确立，亿万人之眼目将为之一变，海陆军各种技术将有实际进展。如欲兴皇国于他日，维持万世，除此以外，别无他策。或谓虾夷之地尚不能开拓而经略其他，此乃知其一而不知其十之说，（中略）韩地之事乃皇国建立国体之处，推广今日宇内之条理故也。愚意如为东海生辉，应从此地始。倘一旦动起干戈，不必急于求成，大致规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后，要好自确立今后策略，竭尽全力，不倦经营，不出两、三年，天地必将为之一变，如行之有效，万世不拔之皇基将愈益巩固矣”。木户于二月朔日，也曾把同样意图讲给了三条、岩仓（《木户孝允文书》三）。

后来木户在 1873 年反对征韩论时说，他过去提倡征韩论完全是“为了平衡朝廷同诸侯的兵力”的“策略”，“一时假托朝鲜之事，重新编征亲兵，欲一试武力。盖其意专在压倒内奸”（《木户孝允文书》五、八）。这种说法虽然与前面所引的文章略有不同，但其根本是相同的。

当然，征韩论也有另外的理由。那就是在沙俄和欧美侵入朝鲜以前，日本企图抢先占领。外务省方面完全根据这方面的理由

提出征韩论。前面所引 1868 年 5 月小松带刀的话就是这样。1870 年 7 月柳原外务大丞说：“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然而“俄法英美欲占彼地，昭然若揭”，因此“实非皇国因循之日”。这番话清楚地表达了外务省的见解（容后述。《日本外交文书》二，六、七项）。

正当此时，中央接到朝鲜拒收国书的报告，于是征韩论有了名目，便越发嚣张起来。同时，明明知道朝鲜责难“皇”“敕”等字样只是文字上的误会，反而认为这是“我方可乘之机”，很多人主张对朝鲜应该“比照幕府时的交往贬低二、三等”，“作为属国”来对待（宫本外务权大丞《朝鲜论》，《日本外交文书》二）。

1869 年 5 月，大岛友之允从朝鲜回来，屡次访问木户，报告朝鲜国情紊乱，建议征韩。木户也再三主张政府采纳征韩论。他认为必须征韩的理由是，封建势力当时还很强大，无法打倒，各藩割据，政府既无兵力，亦无财力。然而这个理由本身也正好说明，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兵征韩。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始终抱着征韩或其他外征的念头。不过，政府内的主张者有所不同而已。

当时，萨摩的西乡隆盛好象也并不赞成征韩。西乡的得意弟子横山安武在 1870 年 7 月列举时弊十条，以自杀规谏政府时，曾强烈反对征韩说：“主张征韩论者毕竟是由于慨叹皇国衰微所致，然而出兵应有名义，岂可不慎。朝鲜之事今姑置之，必须明察我邦形势，张维新之德化，德化既张，朝鲜岂能对我非礼。今反侮彼为小国，妄兴无名之师，万一有所蹉跌，天下亿兆将云何”。西乡为他作碑文，以赏其志。朝廷也赐给横山祭奠费，这是因为考虑到横山背后有西乡等一派反对新政府的缘故。

然而，不久，西乡变成征韩的主要角色，而木户却认为时期过早而激烈反对了。原因当在下章内详述。总之，我国对朝政策远

在所谓朝鲜的无礼等问题出现以前就有了用武力强行侵略的企图。所谓日朝交涉不过是武装侵略的准备工作而已。

政府采纳了木户的建议，决定向清朝和朝鲜派遣使节，于1869年12月3日，敕命木户为使节（10月前后已经内定，见木户的信）。他的使命是同清朝签订条约，试图以此制造日本和清朝同等，而朝鲜是低于日本的国家的论据。但是，当时木户脚下的山口藩围绕旧骑兵队的解散问题，牵扯上农民的不满，发生了大骚乱，加上日本全国局势极为不稳，因而木户终于不能成行，此事就作罢了。（后来由柳原外务少辅和伊达全权使节代替木户缔结了最初的日清友好通商条约，已如前述。）

日本政府为了准备今后的对朝政策，1869年12月，命久留米藩士佐田白茅偕同大和的人森山茂前往朝鲜，授与十三条调查工作。其中(1)(2)(3)条是关于已往的彼此交往形式，(4)朝鲜对清朝的独立程度，(5)派遣“皇使”时有无开入军舰的港口，(6)朝鲜响往俄国的传说是否属实，(7)朝鲜的军备，(8)朝鲜内政是否紊乱，(9)有无贸易物资，物价及货币的好坏，(10)岁遣船存废的利弊，(11)对州对朝鲜交往的经费，(12)能否到草梁以外的内地旅行，(13)竹岛和松岛成为朝鲜附属的原因。以上1、2、3、10、11各条表明想要更改过去的交往关系。但是，除了第九条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其他各条都与政治企图、军事企图有关。甚至连调查有无良港，也不是从通商观点而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佐田白茅是久留米藩出身的攘夷论者，维新后该藩成了保守派根据地。他从来就是热烈的征韩论者，因而得到木户的赏识。现在，他被选为使节，而使节中没有一个具备现代头脑的学者，也是很自然的。这与调查库页岛情况时选派丸山作乐——（他在1871年企图举兵征韩，阴谋颠覆政府而遭到失败）——的情况完全一样。

佐田和森山偕同旧幕臣曾经从事外国贸易的外务省小

录① 斋藤荣和佐田的同乡医师广津弘信，于 1870 年 1 月，到达对州的严原，调查过去的交往关系，2 月 9 日，从该地出发，22 日抵达草梁，调查后，于 3 月间回到对州。

佐田从对州直接向中央政府提出征韩论的建议。大意是朝鲜不接受国书是侮辱皇国，应当兴师问罪。朝鲜肯定不会谢罪，那时便马上派遣大军从江华，庆尚，江原，咸镜四方进攻，不出五旬就可擒住朝鲜国王。请政府如果出兵，便一并讨伐，从而吕宋、台湾可垂手而得。尤其是朝鲜，是列国覬覦之地，非取不可。所需经费，以停止开垦库页岛的费用充当。只要攻下朝鲜，便可富强，因为该国是个金窖，米麦产量甚多。方今皇国实患兵多而不患其少，诸方之兵不满足于东北战争，好战思乱，若转内乱为外征，真是一举两得云云。佐田等人的见解不过如此，可见他们的报告书十分荒谬了。

森山和斋藤也分别在 4 月提出对朝方策，森山的论点是：宗氏对朝鲜几乎等于执臣礼，因而必需增加该藩封地以振作士气，如壬辰之役那样，使之服兵役。同时，日本向朝鲜派遣大使，如果朝鲜对之无礼，立刻兴师一举席卷全朝。必须学习壬辰年太阁秀吉②把国内郁结的士气转移到朝鲜的治国良策。“方今邦内士气，凜乎以煊，确乎以逸，岂无内患之念哉”，征讨的经费可以“通知同盟各国，拍卖库页全岛”，以开发库页岛之费用于朝鲜。他和后来的西乡隆盛等人的朝鲜使节派遣论的说法，非常相似。

斋藤的意见是，对州藩要改变它对朝鲜执臣礼的错误，然后以宗氏为副使，向朝鲜派遣大使“以和为主，以兵权示国威，践序秩”，对方如果仍不顺从，可凭“万国公法”的权利进行讨伐。所需费用“以非常节约筹措”。最稳健的斋藤并没有说要放弃库页岛，也没

① 官名。——译者

② 即丰臣秀吉。——译者

有说朝鲜是金窖，更没有说转移内乱等等，而是主张根据“万国公法”，这一点值得注意。不过，授与侵略权利的“万国公法”当然是不存在的。

外务省接到这三个人的报告书和建议后，拟定了对朝政策三条，向太政官请示。其内容是：“有人主张借口朝鲜不接受国书的无礼，掀起战端。但我国尚未派遣敕使，彼此的交往原系通过甘心忍受屈辱谬例的对州藩进行，因此不能立即以此成为战争的借口。应该(1)利用对方拒绝国书的机会，暂时断绝交往，等待对州的谬例自然消灭，我国国力一经充实，便断然‘着手’。(2)派遣本户从三位为正使，宗氏为副使，率领军舰两艘前往朝鲜，‘责备对方挟斥我国通知国政一新之罪，并交涉开港开市，签订自由往来的条约’，如果朝鲜仍不听从，就断然征讨。(3)先与清政府订约，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云云。

既然不改变彼此的交往原则，公文格式也就不能不依照旧原则。因此，要想责难朝鲜借口违反条约而拒绝与日本交往为非礼，就必须首先改变交往的原则和条约。既然一方面照旧进行岁遣船的贸易，还有单凭宗氏文引的交通，那末另一方面也就无法以釜山官吏为对手而责备朝鲜为“无礼”。外务省能够注意到这点，毕竟还称得上是“维新”的政府。然而这个意见书的主要之点，既是签订“开港开市自由往来的条约”，那末为达到这个目的，不得已时，究竟是动用佩里向日本示威的那种程度的武力，还是以征韩为主，这一点并不明确。因此毋宁说，这个意见书是为了征韩或把朝鲜当作低一等的国家来对待而研究其手段和对策的。

政府采纳前述第三条意见，开始同中国交涉订约事宜。外务省认为西洋各国既然垂涎朝鲜，在中国天津事件波及朝鲜以前，有向中国派遣皇使的必要，作为准备工作，请求先向中国派遣外务官

吏。前面说过，柳原外务权大丞也单独谈到天津事件，认为英、美、法、俄有意侵略朝鲜，建议在这些国家着手经略朝鲜以前，日本“应该迅速先发制人，派遣皇使，待庙议决定之后，必须议定出兵一次，倘能宽猛恩威并施，就能不至引起大战而使其服从”。

根据这项建议，政府于9月首次派遣外务少丞吉冈弘毅、森山和广津这三个外务官赴朝。

天津事件发生时，大久保曾竭力向英、美、法、俄献媚，前面已经叙述。

半年后，即1871年3月，美国为了要求朝鲜对烧毁舍门将军号事件认罪并签订通商条约而向江华派遣舰队时，驻日美国公使曾向我外交当局建议说：“美朝之间也许发生战争，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就可了解朝鲜的军备和国内的情况，这些‘对贵国政府说来，都是必须知晓的事情’，因而建议日本官吏搭乘美国军舰”，政府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同时外务省还同美国公使详细谈论了美国派遣舰队的目的和我国同朝鲜交涉停顿的情形，经过太政官的批准，训令当时驻在朝鲜的吉冈等人说：“在皇朝与朝鲜缔结友好条约以前，一旦有事，皇朝的立场是有援美之义而无援朝之理”，又说：“美国是公开的友邦，它对朝鲜的责难是有道理的，它的目的与我国的目的相同”。日本政府自鸣得意地充当美国侵略朝鲜的爪牙。

吉田等人于1870年10月携带外务卿致朝鲜礼曹参判书和外务大丞致东莱、釜山两使书，从东京出发了。两书以日本文为正文，附以汉译，避开皇、敕等字样，通知王政复古，并希值此万国自由交往之时，敦笃日韩多年的邻谊。

这种做法同1868年派大修参判使本质上一样。只是把对象改变一下，目的地仍旧是釜山。其实派吉冈等人的目的，并不是根据7月外务省的方针和柳原大丞的建议为派遣大使进行准备工作，而是根据8月间对州草梁代官浦瀨最助来到外务省报告说，

如果是政府对政府的交涉，朝鲜也许会接受国书才这样作的。外务省虽然认识到必须首先改变彼此交往的原则，但并不彻底，也没能洞察朝鲜拒绝国书的根本理由，却根据浦瀨的不可靠的报告，轻率地派遣了吉冈等人。以前派佐田等人赴朝时，一心想要征韩，并没有让他调查朝鲜的国情和拒绝接受国书的理由，同时佐田等人也没有洞察这些的见识，一味豪言壮语，因而落得这种结果。

森山等人于10月末借浦瀨从严原出发，因海路航行困难，闰10月中在朝鲜沿岸驶来驶去，11月3日才抵达草梁。朝鲜的训导们最初称病，后来坚持旧例，除宗氏的使者外概不接见。这从训导的立场来说，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在这以前，浦瀨从东京回草梁与训导交谈时，曾说如长此不能解决，宗氏只好撒手不管，“果然如此，则国使将渡海莅京谈判，届时不可无护卫军”。他反映了中央的征韩论，无意中泄露了兵力等等的话。因此，朝鲜态度立刻强硬起来，东莱、釜山两使竟作好出兵准备，哪里还谈得上接待使节。翌年，1871年3月末，吉冈才得以同训导会面，这还是出于训导个人的好意，甚至拒绝把会见的实情报告给东莱府使。这时，我国国内外务大丞丸山作乐等反动士族，因阴谋举兵讨韩和颠覆政府而被逮捕。

吉冈等人抵韩后，痛感必须取消宗氏一家职务，曾屡次向外务省建议，1871年2月命令广津弘信回国，向外务省报告情况并要求罢免宗氏（广津于4月23日回到草梁。5月又来严原，担任外务省与吉冈等人之间的联络）。在这以前，即1870年10月，宗氏主动地对日韩修好谈判的失败，引咎申请辞职。这是因为宗氏在贸易上对朝鲜负有债务，近年来又无利可图，认为莫如辞去受人责难的“世袭专职”，还可以请求政府替他偿债，并希望政府能为他另想出个收入之道。

宗氏所谓的“公贸易”，其实对人民毫无关系，政府本来没有替

他偿债的义务。但是，政府认为这和继承幕府和各藩的藩债一样，也必须替他清偿。因此，政府若是无力替宗氏偿债，也就无法罢免宗氏的“世袭专职”，因而吉冈等人的建议也就无用。

1871年7月实行废藩置县，因而宗氏的“世袭专职”在对内方面就自然消灭了。政府于7月29日任命前严原藩知事宗重正为外务大丞，并派他赴朝通知我废藩置县和罢免宗氏世袭专职的事情。但此事也迟迟未能实现，于是森山等得不耐烦便于10月回国，促请政府确立方针。其实，即便宗氏的赴韩实现，也不过姑且解决国内部分矛盾，解决朝鲜的问题，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宗重正个人的安置。所以，广津于9月8日、9日、23日和10月3日前后数次从严原请求政府指示说：“废藩置县和罢免宗氏世袭专职之事，在公开通知朝鲜以前，若被对方察觉了将怎么办，岁遣船自然会废除，但没有宗氏文引的船，朝鲜不许入港，即便敷衍一时，日后对方自然会发觉，那时我方将无言可对，又该怎么办”。

广津遇到的困难，决非派宗大丞到釜山来和当地小官谈判所能解决的。何况连宗的赴韩也迟迟不能实现，所以广津说：“弘信在此困难重重，近来精神疲劳，几至昏晕，完全迷失方向，不知如何奉闻，唯茫然耳”。他的苦闷是理所当然的。

出使的人，也没有明确的方针。中央既无方针，出使者当然也不会有方针。森山于10月回京，请求政府把罢免宗氏世袭专职以及宗氏被任命为外务大丞的事情通知给朝鲜，并由宗氏致书东莱府使，要求他今后接待日本的外务省官吏。

这时政府已经决定派岩仓大使一行前往欧美。在他们出发以前，对于朝鲜问题，也急待定出一个明确方针。木户孝允的日记的1871年(明治四年)11月7日条内写道：“上朝，关于着手戊辰以来的对韩方策(即预料引起征韩的大使派遣论)终将实现。近来有人谈及美国云云(指美朝间的交涉)，山形狂介(即山县有朋)等与此

论有关。因此今日应讨论前途大势，征求朝臣意见，决定是否同朝鲜交往。至于对美关系，鉴于世界局势，必须谋求建立益愈亲密的交往”。同9日条内写道：“4时访西乡(隆盛)，不在，即至岩卿(岩仓具视)处，与条公(三条太政大臣)、西乡、大隈、板垣等人会晤。讨论着手朝鲜问题的程序。5时散会”。至于究竟安排了什么样的“着手”朝鲜问题的“程序”不得而知，但据推测，当时岩仓、木户、大久保等“大使派”与留守西乡、板垣等意见不和；当时正是大使派和留守派之间立有一个信约，即在大使旅外期间，留守政府只作废藩置县的善后工作，决不着手其他新的措施(后述)，所以对朝鲜的“戊辰以来的方策”，也可能只按照木户的草案决定一个大纲，至于如何实行，需要等待大使回国以后再决定。

第三节 朝鲜“侮日”的真相

政府似乎决定在岩仓大使等旅外期间，对朝鲜也不采取新的措施，因而对先前决定派大使赴朝一节，也迟迟不实行，只是采纳森山的建议，按照他的希望，分别由政府写好通告废藩置县和罢免宗氏世袭专职的公函，以及宗外务大丞要求东莱府使接见外务省官吏的书信，于12月命令森山和旧对州藩士族相良正树(外务省十等官)、浦濑最助(十一等官)及广津弘信携往朝鲜。

这样的信函朝鲜不会接受，政府本来早就知道。因为在这以前，1871年2月，对州藩知事宗重正致书东莱府使，通知我国政体改变，要求务请接见吉冈等人时，朝鲜方面一直拖到7月末也不受理。9月，东莱府使和釜山金使及任译训导、别差等朝鲜对日事务官吏全体成员答复说：违背“三百年来坚如金石”的条约，故意挑起争端，岂非存心凌侮邻国”。这与其说是答复，勿宁说是抗议。因此，森山赴任时曾就以下四条取得政府批准：(1)如朝鲜不受理我

国国书，便撤退旅居朝鲜的对州士族和人民，(2)和好也罢，决裂也罢，两国贸易是私事中的私事，允许商民自办，(3)改变图书，结果也就自然要废除岁遣船，因此使节应自带食粮(这是因为估计我方改变旧例时，对方当然会取消朝市供菜)，(4)海上难民的处理办法。这也就是说，想执行前年外务省提出的三策中的第一策，森山的使命是调整旧关系而不是修好。

森山等人第一次搭乘轮船渡海。过去是从对州的严原特意改乘日本帆船赴朝的，那是因为朝鲜认为轮船是洋夷风习而表示厌恶。这次却断然改变旧例，这里也可以看出废藩置县以后的日本政府的气焰。森山等人因为搭乘轮船，没有象上次那样遇风漂流一月之久，1872年1月14日从对州出发，不到一天工夫就安抵草梁。“火轮船”的入港使对方大为震惊，不出所料，朝鲜果然撤消了朝市。但火轮船开走后，又恢复了朝市供菜。

森山等人到任后即与吉冈协议，把1868年以来即驻在朝鲜的对州的樋口大差使等人遣送归国，并确定以后的方针，把日本已与中国签订条约一事通知朝鲜，专以刺探“朝鲜的真意在于和好还是决裂”为目的，至于来往船只仍沿用旧时的勘合印信。

3月20日，相良会见别差，递交前述契约草案和相良的口述私函。别差虽然姑且接受了，但说是否正式受理，须待东莱府使的指示。29日，别差又来草梁馆说，文书的受理须请示中央的指令，尚需等待30天。吉冈等人识破这是对方的拖延之计，预料如对方再提出需要请示清廷，就不知要拖延多久了。于是决定撤退，并就撤退后如何处理草梁馆的办法等，请示外务省，5月4日得到批准。

朝鲜方面的答复逾期仍未到来，到5月25日，安训导才来草梁馆说：“契约之事，不经国中彻底讨论，碍难决定”。吉冈问其期限，则说：“需时几年几月，不能预料”，果然施出拖延政策。这时吉

冈要求直接会见东莱府使，以便约定答复的大致期限，并要求训导带领前往，得到了他的允诺。于是第二天(26日)，相良正树、草梁馆司深见六郎和浦濑最助三人，走出草梁前往东莱府。这却造成重大问题。因为这样一来，便遭到了朝鲜的责难，说日本违反倭馆的规则而“擅出倭馆”。当时，训导仿佛没有与日本官员同行。因为在吉冈等人向中央提出的报告书和他们回京后的复命书以及反驳东莱府使指责“擅出倭馆”的文件里面，都没有提到和朝鲜官吏同行^①。

最初训导既已允许日本官员入府，看来东莱府使也许有意接见。令人吃惊的是，旧对州代官海津茂太郎等人阻碍了这次会见。当相良等人来府以后，朝鲜的小通事崔在守夜间访问海津，问东莱府使可否接见日本使节(此事虽很离奇，但除海津等人的口供以外，别无史料可查，只好根据它)。海津答复说，最好不接见。后来两者往来频繁，有妨害使节行动的迹象。因此，东莱府使骤然改变态度，拒绝接见相良等人，照例指责违背“三百年来坚如金石约定”，并说本应恭候我政府(朝鲜)的回答，然竟敢犯禁擅自出馆，犯越禁界，骚扰上府，是何道理云云，大肆责难。吉冈等人立即提出反驳书，但对方根本未予受理。

6月，吉冈、森山、广津等人全体从草梁撤退，广津留在严原，吉冈等人回京向外务省复命。草梁只留下馆司深见六郎一人。“擅出倭馆”是朝鲜严禁的事情。一旦发生这种事情，连府使也要受到监督不周的处分，供菜当然要停止的。海津等人明知这种情况却

^① 即使朝鲜方面已经允许日本官员入府，而事后又规着脸狡辩说没有允许，决不能连眼前同行人也一并否定吧。如果有朝鲜训导同行，这正好是反驳说日本方面违反规则不合理的有利事实，如果训导本来同行，而又责备日方擅出倭馆，那末日方应该满可加以反驳，吉冈的反驳书不会不记载此事，而竟没有记载。吉冈的反驳书曾提到在入府途中屡次遭到村民的扣留。如训导同行，决不会发生这种麻烦。可见，训导并未同行，而是日本方面犯了“擅出倭馆”的罪过。

故意让使节犯了错误。

这里有个原因。对朝贸易并非现代的自由贸易，而是对州侯及一些寄生的特权商人所垄断的贸易，是出于朝鲜的恩惠才得到准许的贸易。所以，代表宗氏的官吏和特权商人深恐他们的垄断权被废除了，早在1869年末佐田白茅等人赴韩时，就有对州的藩士想要狙击佐田。而且旅朝的对州人经常向对方商人和官吏说，政府的“寻求友谊”之说不过出于三、五个人的功名心，目前日本国家多事，不可能“大肆经略”朝鲜，一切只好依照旧例（5年7月13日广津弘信向外务省提出的报告书）。他们就这样一味“阿谀对方，贪图一时之利”。另一方面，朝鲜的训导和通事们，也从对州贸易上获得贿赂和其他巨利，更不愿意废止原来的贸易。（所以彼此往返的船只文引，在废藩置县以后本应作废，但训导们决不过问，故作不知）。这样，旧对州官吏和商人同朝鲜官员的利害是一致的，结果就导致了海津等人的做法。

留在严原的广津于同年7月，向外务省强烈主张如不撤退宗氏的官员和商人，断言“不能断绝内奸之根”，留在草梁的深见也向广津报告倭馆情况说，近来所受对方欺侮益甚，情形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内部有人勾结对方，制造事件，“代官所^①的奸细，令人殊堪悬念”（《伊藤博文秘书类纂》、《朝鲜事情》）。

此时，1872年末，国内才把草梁馆改由外务省管辖，海上难民移交长崎县管理，开始调查宗氏所谓“公贸易”的负债清理事宜。这些事情本来政府在开始对朝交涉时就应该首先办理，至迟也应该在废藩置县后，派森山回草梁时加以处理。可是，直到这时才迟迟初步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8月10日，副岛外务卿概括以往的交涉经过，为了解决悬案，请求太政官派“高一级的官员”，得到批准。于是，决定派遣外务大丞花房义质、上述森山茂、广津弘信及

① 即宗氏代表官员的办事处。——译者

海军省七等官远山秀行。任务是清理宗氏负债及草梁馆员，而不是修好，勘合印信依照旧章。

这时西乡隆盛等人的留守内阁已经认定，必须征韩或远征台湾，政府任命西乡的心腹部下池上四郎和土佐藩的武市能吉为外务省官员，8月8日派往中国牛庄及满洲方面视察，同时又想派陆军中校北村重赖，大尉别晋助进入朝鲜。（我还没有看到北村等确实进入朝鲜的确凿史料）。

花房率领“春日”、“有功”两艘军舰，装载铜及清偿宗氏债务的其他物资出发，9月15日抵达草梁。同月23日前大致完成整理草梁馆员及其他任务。“有功号”军舰当天就返回严原，花房搭乘的春日号军舰测量近海，明确“浅海浦的海湾既深又广，可停泊数十艘巨舰”后返航。森山留在严原，花房一人于11月6日回京复命。为了这样一点点任务，竟派两艘军舰，又测量了釜山近海，其意图是很明显的。朝鲜方面在火轮船停泊期间，取消朝市和供菜，并拒绝举行清偿宗氏负债的交涉，军舰开走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于是废除了过去日韩关系中对日本不利之点，草梁馆司决定“一如俄国人在库页岛或前此来泊对州时一样，不顾一切抗议，一扫馆内上下旧弊，补修屋宇，移建房屋，扩展空地。除飞船（彼此往来的通信船）外，其他大中小船（贸易船）不带执照（即宗氏文引）而自由往返”。朝鲜如果对此提出抗议，决定告以径向本国外务省交涉，不予理睬。这就是说日本把它遭受欧美列强的压迫，反过来加到朝鲜身上来了。

1873年2月，广津弘信再度受命前去朝鲜任职，在严原与森山办理交待后，4月1日来到草梁。其间曾发生过海上难民移交问题的小纠纷。

另一方面，外务卿副岛种臣同俄国公使进行割让库页岛的谈判。接着前往中国，表面上是为了中日条约批准书的换文，实际上

是刺探中国对台湾和朝鲜的关心程度，以便准备向台湾出兵或征服朝鲜。这时征台也好，征韩也好，只等待庙议决定了。这个机会由于朝鲜当局加强管理“走私商人”即加强管理走私贸易而终于到来。

对朝贸易的情况是，花房赴朝后，废除了岁遣船，对没有执照的所谓走私贸易认为“其实就是公开的通商贸易”而予以鼓励。（这种理论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因为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以前的“公贸易”，其实就是一种封建领主的私贸易。）这样一来，无执照或是用“辛未（明治4年）10月”所发执照“双方交易毫无障碍”地进行起来。到了1873年，这种贸易越发兴盛了（同年5月森山的报告书）。当时长崎县想对这种贸易课税，但因外务省反对，太政官决定进出口一律暂时免税，于是“官民全都大搞起走私贸易”了。

1873年4月前后，所谓“执照”这种封建的束缚，事实上已不存在。东京、大阪的商人早就开始进入朝鲜。广津到任后，立即报告外务省说：“鉴于目前没有日朝交易的物资，东京及大阪的商人来朝也没有买卖可做。他们回国后可能因此作些无聊的宣传”。因此，请求“禁止他们来朝”。

但是，在这个报告还没有到达外务省，4月末，东京三井组的三名办事员，冒称严原的三木屋商店的办事员来到釜山。这时朝鲜方面突然开始加强管理走私商人。既然还没有签定新条约，是否允许“走私商人”，完全在于朝鲜的训导和通事随便掌握，日本对这种取缔无权提出抗议。日方只能说废藩置县后，日本已经没有对州人和东京人之分了，这样来对付他们，的确是个有趣的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对朝鲜方面显然是讲不通的，如果对方提出执照问题，也将无法答对。

进入5月后，朝鲜更加加紧取缔走私贸易。同月2日，东莱府使在海岸上布置了一万名荷枪士兵，水兵往来于倭馆前面的海

上。因此贸易几乎断绝了。不过，朝市供菜虽然不充足但还没断绝。朝鲜方面所以突然加紧取缔，正如广津屡次报告给外务省那样，是因为三井办事员进入朝鲜的缘故。训导们听说三井是日本的大商巨贾，“得悉三井的人运到大宗货物，因而想出一条计策，即停止走私贸易，使日本商馆的商人陷入困境，然后让上面提到过的崔在守(小通事)一手包办，收买这些物资”。此外，受大资本压迫的对州的普通商人和朝鲜官员互相勾结，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再有，还可能因为走私贸易闹得也太公开了，训导们深恐被东莱府使察知，才着手取缔。

同时，朝鲜方面发觉日本怀有征韩野心，军事上开始显示有所准备。根据广津于4月24日向外务省提出的报告说：“据严原商人报告，韩商常说，日本早晚必派兵舰前来，故朝鲜方面亦专为此事进行准备。综合各种情况，朝鲜发觉我方将派兵舰来，多少有练兵迹象，但其唯一用意只是向馆内显示彼等亦有充分准备而已”。

征韩论在日本已酝酿很久，通过流言和浦瀨的失言，早已传入朝鲜当局，而朝鲜警惕日本是从幕府末期开始的，他们看到日本火轮船开到朝鲜和东京大商人进入朝鲜，便越发提高了警惕。在这以前，朝鲜已经知道中日订约事，并且也知道“洋夷利诱倭人”，倭人对清廷“已非臣服之国”(《李大王朝史》壬申三月四日条)。至于朝鲜察觉日本征韩野心这点，无疑同希望依照旧例交往的严原商人有关。

因此，4月15日还有朝鲜军队在倭馆附近演习，5月13日，举行多多浦金使、釜山金使和东莱府使联合的海陆军大演习。当天午后，各府使搭乘载重量三、四百石的主船三只及约百只小船——与我国(日本)船相比，是极其粗制滥造的船——在倭馆前的海面集合，府使搭乘的船上左右两舷站着约三十名妓女，奏乐舞蹈，时而放几声步枪，自鸣得意。然后在倭馆附近登陆，“文武士卒

共三、四百人，夫役三千、妇女约二、三百人”，另有许多妓女，大摆酒宴，五点钟时，士兵分列东西，“东边的旗帜往西，西边的往东，来回交叉跑五六回，这时发射步枪两响，然后渐渐沉寂下来”。“这大概就是这一天的所谓演习了”。入夜，岸上和海上燃起篝火，以张声势。据广津批评说，“连我国文政、天保年间武装窳劣时期的犬猎都比不上，三分之一是妇女、娼妓，以练兵为名，其实是极尽奢侈之能事，而下级士兵、夫役连肚子都吃不饱，装卸船货，践踏田地，怨声载道。显然是亡国之兆，实属可怜之至”。纵令东莱府使如何腐败，眼见日本开来轮船，还载妓游船，以为这是夸示武力，这点很值得怀疑。可能这并不是为了什么军事示威。

上述情况一直继续到5月末，东莱府使命令草梁馆守将和小通事严加取缔走私商人，并将其命令书张贴在门前，写道：“近来彼我相持，一言以蔽之，我则仍依三百年约定，而彼欲变不易之法，是何居心？事若违例，行之本国，亦所难强，何况行于邻国，岂能任意行之乎。彼虽受制于人而不耻，变形易俗，此则不可谓日本之人，不能许其来往我境，所乘船只若非日本旧式，也不许入我港。马州人与我交易，本是一定不易之法，他岛人之交易，我国决不许可。潜货冒犯，乃两国所共禁。近见彼人所为，可谓无法之国，而且不以此为羞。我国则法令自在，行之于我境内。留馆商人，欲行条约中事，皆当听施，如欲行法外之事，则永无可成之日。虽欲偷卖一物，此路终不开。我守经奉法，彼亦想无他说，须以此意，洞谕彼中头领，使不至妄错生事。”

癸酉五月三日”

广津把这个命令书的抄件附在他5月31日的报告书里，寄给了外务省。广津在报告中说：“文中有无理之言，青年官员十分愤慨，当即加以说谕，今后如公然进入馆内作无礼举动，反可为日后谈判造成开端，故我方却昂然不予理睬，大家非常镇静。唯盼早日

决定庙议，同人隐忍之情，诸希谅解”云云。

广津的报告几时到达外务省的不详，但各书都载外务卿代理上野景范据此报告太政官，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对策是6月12日，这显然失于过早。我不知道这是根据什么。各书所载森山于5月前往朝鲜时得到上述命令书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西乡隆盛于7月21日写给西乡从道的信里谈到准备出兵台湾的事，但是关于朝鲜却只字未提。西乡在同月29日写给板垣的信里方才提到朝鲜：“朝鲜一事，副岛氏已经回来，是否有所决定？倘仍无决定……”。如果7月21日以前已有征韩之议，那末他写给从道的信里一定会有涉及这事的字句。

我想问题的发生当在7月末，首先在西乡和板垣之间有所计议，7月26日，副岛从中国回来，他在内阁会议上报告清政府言明不干预朝鲜内政外交以后，征韩论才正式提到内阁会议的议程上。

当时的留守政府漠视同岩仓大使等人所作的诺言，接连不断地做一些新的大事。对外，北有库页岛问题，南有出兵台湾计划，此番又得到上述东莱府使的命令书，终于讨论起如何实现明治政府成立以来的征韩论。关于库页岛问题，西乡等人曾经认为“俄国派军加强防备，屡有暴行，故应在讨伐朝鲜以前发兵保护”，但并没有这样做，而采取了把库页让给沙俄的方针。同时还停止了已经完全准备好的台湾出兵，把注意力开始完全集中在朝鲜上。不过，西乡在9月2日写给黑田清隆的信里说：“倘在吾兄管辖区内（指库页岛）生起事端，当然无暇顾及朝鲜，我打算把兵力转用在库页岛上”，仿佛西乡比朝鲜更重视库页岛问题。然而《大西乡全集》的编者对此解释说，“由于预料到一定会有人说政府对强国俄罗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而责备弱国朝鲜，岂有此理，西乡隆盛看到这点才故意这样说的”，这可能是正确的推测。所以西乡在9月11日写给黑田的第二封信里对库页岛问题说道：“如果连朝鲜那里都垮

了的话，那就一切全垮了”。还有，黑田这时虽然主张对库页岛采取强硬态度，其实这只是反对征韩派的一种姿态，如前所述，首先主张放弃库页岛的不是别人，正是黑田。

征韩是明治政府很久以来的悬案。正如西乡隆盛寄给三条太政大臣的信中所说的：“朝鲜一事，在国政革新之初就已着手，迄今已五、六年矣。然而，最初并非寻求亲睦，想必方略已定”。这就是说，明治政府根本不是对朝鲜寻求和平的友好，而是抱着军事和政治野心。恰巧在1873年，明治六年七月，朝鲜方面使用了可以曲解为“骄夸侮慢”的词句，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便抓住了“过去隐忍等待的”这一天（西乡致三条书，1873年8月3日）。

所有记述征韩论的书籍，都异口同声地说，朝鲜再三排日侮日，尤其竟至撤晨市停供菜来折磨倭馆的日本人，西乡等人为了保护侨民和正当权益、维持国家体面才决意征韩。然而这完全是歪曲事实，企图使侵略合理化。撤市停供，只在火轮船入港期间，短期间确实有过，但并没有长期继续下去。不仅如此，1872年森山回京时，在提交外务省的报告书中曾说，朝鲜方面向馆内送薪炭，尽管日本方面拒绝，但仍按旧例，不断供给，以致无计可施（《日本外交文书》，六）。朝鲜这样做，是因为它根本不愿意同日本作战，也不愿意接受新的自由平等的交往，想要由此表示信守“三百年金石定约”的是朝鲜，而破坏的是日本。因此，日本虽然拒绝，朝鲜方面还是继续供应。日本方面既然希望开辟新的现代式的交往，不是当作恩惠而是有权利的交往，那末朝鲜拒绝过去的恩惠待遇——朝市供菜，也是当然的。所以在晨市供菜的问题上，日朝双方都没有什么不合理处。

其次，各书把朝鲜政府处死同日本人通奸的妇女一事，算作排日行为之一，但史料没有举出。即使真有这种事，从倭馆规章来说，在朝鲜方面也是极其当然之事，应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排日

侮日的举动，因为在江户时代，这种通奸罪多得很。

还有，所谓朝鲜方面阻塞商路，对日本海上难民见死不救等等，这不是歪曲就是捏造。翻看《日本外交文书》，便会立刻明白真相。

东莱府使的命令书里说：“日本虽受制于人而不耻”云云，固然可以说是“侮日”，但如果比起朝鲜人称西洋人为“犬羊之夷狄”，对日本还是多少有些好意的。朝鲜统治者的自尊自大和保守顽固的愚蠢，固然可怜可笑，但别国人也无权为此而愤慨。维新前的日本固不待言，即当时政府内部也还有以左大臣岛津久光为首的保守派愤慨地说日本“醉心于西洋，易风变俗”，“受制于人”。直到1876年，还有熊本的“神风连”^①因愤慨日本受制于夷狄而掀起了叛乱。朝鲜的封建统治者也和岛津及神风连一样，问题非常简单明白。朝鲜是个十分落后的国家，尤其当时执政的大院君一伙人，是激烈的排外主义者。他们不愿意同西洋人一样穿西服、坐洋轮船，按朝鲜说法是“违背了三百年金石的约定”，甚至抱着征服野心的日本人进行不同以前方式的交往。他们所希望的，是李氏朝鲜开国以来恩赐给日本的那种旧式交往。到了1873年，恰巧是日本统治者——西乡、板垣等人感到有必要在台湾、库页岛或朝鲜试试他们的锋芒的一年。

接到上述命令书后，参议板垣退助立刻主张把它当作出兵朝鲜的理由。但是，就连西乡也认为，根据间釜山一个小吏的交涉就马上出兵，“纵令从公法上说也有讨伐的理由，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天下人并不知晓”，不如表面上暂派使节，“责备朝鲜其菲薄邻交，并要求纠正以往的非礼，敦笃未来的国交”。这样，它“必然采取轻蔑举动，还一定要杀害使节”，那时再派征讨大军不迟。可见派遣使节无非是制造征韩借口的手段。总之，一心要挑起战争

^① 神风连又称敬神党，是明治九年在熊本组成的政治团体。——译者

侵略领土的是西乡等人。西乡在8月17日写给板垣的信里也说，如果派他担任这个使节，他一定会挑起战争。挑拨对方打仗，是西乡最得意的战略。当初在1867年末，江户的萨藩邸内窝藏大批浪人，向庄内藩等幕府方面挑衅，终于掀起讨伐幕府的战争，破坏了山内容堂等公武合体派的计策，就是西乡策划的。

征韩论是明治元年以来天皇政府最重要的国策。这个国策刚要实行时，它的首倡者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从国外回来，认为派西乡前往朝鲜，——其实是日韩开战，为期尚早，一致反对，主张首先着手内治。可是第二年，以大久保为中心，却侵略起台湾了。

为什么明治六年时发生了这种对立呢？为什么征韩论到了这一年才成了把政府分为两派的大问题呢？西乡等人的征韩论和木户等人最初是提倡的征韩论有什么区别呢？现在我们要撇开对朝鲜的关系，来看看日本国内的问题。

第三章 关于征韩的争论

——士族军国主义和官僚军国主义——

第一节 征韩论的意义

政府的征韩论，当时对人民完全保密。到1873年（明治六年）10月，围绕着立刻发动征韩还是等待时机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另一派是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这一争执演成一大政变——天皇制官僚独裁的确立，享有一代盛名的西乡参议等征韩派连袂退出政府，近卫军也陷于一派混乱。于是社会也为之大哗。但是，直到这时为止，人民还是不知道征韩论是怎么回事。日本与朝鲜的交涉经过

也全然没有发表过，只是到了最近“《日本外交文书》”出版了，才大致明确了它的内容。

所谓朝鲜的“排日行为”也不是由我国政府向人民公布的，而是1872年（明治五年）2月旅居横滨的外侨煽动征韩热潮时，百姓才初次听到（史料后述）。1873年2月，由于实行征兵令，民间有流传说寅年出生的男子将被征去征伐朝鲜，政府办的《东京日日新闻》报导说：“寅年出生的男子因而大为惊慌，父母十分担扰，即使与此无关的人，无知的老百姓，一般说来，无不垂头丧气”。同时，该报又说：“所谓与朝鲜不和，完全是无稽之谈”。记者不知道征韩论的实情也好，知道故意不谈也好，总之对人民一切保密。

这时已经到了西乡和板垣等人计划出兵朝鲜（第一步是派遣使节）的8月时，甚至即将向海外用兵时，连新成立的陆海军当局都几乎没有参加过征韩的任何会议。虽然西乡是元帅，是近卫都督，身为最高武官，但他的近卫军是1871年从萨、长、土三藩征集来的士族兵，是旧式的军队。1873年征兵令实施后，建立了新军，指挥权归陆军卿山县有朋掌握，而西乡关于征韩从未同山县商议过。山县于8月从东京出发，在巡视镇台的中途抵达大阪时，接到陆军省官员津田出的来信，这时才知道征韩的内阁会议，但是他还认为“不致发生意外”。到10月19日，即内阁会议通过征韩后，山县才在箱馆接到陆军大辅西乡从道的公函，对事态的意外严重感到吃惊（《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

内阁会议隐约传到民间，仿佛在10月前后，同月10日的《新闻杂志》上有士族饭岛投的一篇征韩论的文章，《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的编者给它加的标题是“征韩论初露头角”。当时，这的确可以说是初露头角。前一个月，《东京日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香港汉字新闻的译稿，说日本有征韩之意，但对当时的内阁会议，一字未提。

征韩论就是这样，在新的陆海军当局都几乎没有参加讨论之下，仅仅在参议之间，其中包括赞成、反对两派参议极少数心腹在内进行了争论。因此，关于1873年的征韩派的主张，很少确实的记录，这也是当然的。虽然也有一些谈话记录、见闻录，如烟台专太郎的《征韩论真相》、黑龙会编的《西南记传》以及有关征韩论的其他名著等等，但这些书都是随便编造，提出自圆其说的主张，这些谈话和见闻录根本缺乏史料价值。因而根据这些谈话和见闻录所写的有关对韩交涉经过，都是有意无意地不符合事实。关于这样秘密进行争论，连一篇记录都没留下这一事实本身，正是解答征韩论真相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1873年之前的征韩论有两个目的。一、以抢先沙俄侵略朝鲜为借口，日本出兵占领，进而把它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二、把当时的内乱危机转移为外征。

根据前文所述的事实，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外务省方面的征韩论从第一点着眼，初期的木户孝允、佐田白茅等人则从第二点着眼，从本章以前的叙述已很清楚。

那末1873年(明治六年)的西乡等人的朝鲜政策，在这一点上究竟做了哪些计划呢？此点通常引证的是西乡因征韩论失败下野后于1874年(明治七年)正月对庄内士族酒井玄蕃的一段谈话。我们虽然不相信西乡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象败将言勇似地到处谈论他当年的主张，但不妨姑且看一看他的谈话。

向朝鲜派遣使节，等待朝鲜对使节施加暴行，然后宣布征韩理由，这是已经内定的步骤，但这时黑田清隆提出了库页岛问题，因此，西乡认为“国情既然如此，毕竟不会平安无事，定会同俄国发生战争。一旦决定开战，就不得不策划军略，目前宜保护北海道，在那里与俄国对峙，这样就更需要征伐朝鲜，把势力从霍谢德扩张到尼古拉耶夫一带，由我方深入彼地一步，以保卫此地”。

当时恰巧在土耳其发生英俄冲突，有英俄即将开战的传说。

“听说欧洲方面有人计划把北海道作为各国杂居之地，关于此事最近可能有照会。总之，英国的海军是举世无敌的，所以不妨把北海道暂时租给英法，欧洲方面也认为俄国觊觎北海道对世界局势影响甚大，因而上述意旨必能得到支持”。

“情形既如上述，如果日本能这样起来奋斗，土耳其也必将起来奋斗，这样英国必将在波兰发动它预定的军事行动。如果同英国好好计议举事，我想俄国是不足惧的。我积极主张这点，于是岩仓也难以说出害怕战争，只说那样做步骤的先后就不合了云云”。

在对俄政策上有人主张在北海道的札幌设置镇台。如果那样，西乡就出任札幌本营长官，篠原国干任库页岛分营长官。与俄国开战，纵令政府投降，“我自己也决不投降云云”。

平时在经济问题上仿佛是英雄豪杰的人，一谈到战争流血的事，便畏缩不前。“本来朝鲜之事，除只两、三人外，从未谈论过，但后来军队中人逐渐听到，遂造成今日的情况”（《大西乡全集》二所收“酒井玄蕃笔记”）。

这个所谓西乡谈话的前半段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援引，并且说，西乡实际上是以沙俄为敌，是为防俄而征韩的。但是，如果这段谈话果真可信，那末我们必须提出，西乡是为了对抗俄国而“同英国好好计议”，是为了取得英法的援助而不惜把北海道暂时租给英法的。因为这段话的对俄政策是和对英政策分不开的。这样看来，西乡的所谓保护国权，该是极其卖国的主张。他为了对抗俄国在南库页岛扩张势力而主张把北海道租给英法，使日本充当英国对俄的看家犬，这真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

根据《佐佐木高行日记》，板垣想用分年偿还外债的办法来筹备军费。可见板垣的主张也是为了防止莫须有的沙俄的领土侵略而使日本难免变成英法的经济上的奴隶的。

但据《征韩论的真相》、《大隈伯昔日谭》等载，副岛外务卿同驻日俄国公使布策过从甚密，关于征韩也曾取得他的谅解。当时，副岛同布策接近这点，从1872年热烈欢迎俄国皇太子，或从他曾谈判想把库页岛转让给俄国可以推测出来。假如说征韩的决意，是取得了俄国的谅解，那末所谓为了防备俄国而征韩云云，简直是可笑的谰言了。所谓防备俄国，究竟是在何处和怎样防备呢？既然已经交涉要把库页岛让给俄国，可见征韩派根本没有什么对俄防卫计划。

所谓征韩论取得布策谅解一事，并不能加以否定。在大久保利通反对即立征韩的意见书第七条里写道：“虽然说由于俄国或中国一、二朝臣的话或默许，便不会干预朝鲜之事”，这就是足以说明此间情况的资料。纵观当时东亚或世界的形势，沙俄把主力放在中央亚细亚和土耳其方面，对满洲和朝鲜虽然也有野心，但并不象外务省大肆宣传的那样。因此，对库页岛方面的压迫干脆让步，而远在外国采取对峙的战略，简直是毫无意义。

综上所述，说西乡等人的征韩论是防卫俄国侵略的战略，完全是牵强附会的捏造。这种说法可能是在签订日英同盟（1902年）、日俄战争前后捏造出来的。

代表1873年征韩论的对外政策方面的人物，是副岛种臣。关于征韩论，他没有向人民作过任何交代，但当他于1873年前往中国时，对英美公使曾在某种程度上谈到日本的朝鲜政策，取得了谅解。不仅如此，副岛的征韩论大部分根据顾问美国人李仙得的方略，这是一般的定论。据说李仙得的论调是：“日本应该攻取朝鲜，以制辽东，攻取台湾以制中国，如此便围绕中国成一半圆形，可以抵制俄国压迫东洋之势”（渡边几治郎《日清日露战争史话》前引《征韩论的真相》）。我不知道他提出这种主张的年代，但是李仙得在1874—1875年（明治七一八年）曾提出两项建议：“日本或者开

发北海道全岛，然后攻取朝鲜，或者让朝鲜强盛起来，使其国力能够自卫”(堀真琴《论美国人李仙得建议书》，《国家学会杂志》五一之五)。

渡边氏所引的李仙得的建议和上述这个文件大不相同。副岛采取了李仙得的两条路线中的第一条。副岛通过李仙得对于一切对外政策与美国公使德朗取得联系，尤其是关于出兵台湾，外务省完全处于李的指挥之下，已如前述。1874年大久保政府出兵台湾也是根据李的策略，这在外国人方面已成众所周知的事，而对人民却没有任何交代，反而被外国人批评：“日本政府策划征讨台湾的大事，而对人民不作任何布告，政府不知政府为何物”(明治七年四月廿五日木户孝允致伊藤博文书)。由此可见，在对朝鲜政策上，说我国外务省与英、美，特别和美国之间有充分联系，进而取得美国谅解的说法，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当时英、美方面煽动日本征韩也是明显的事实。1872年(明治五年)3月间，横滨的《先驱报》报导朝鲜对日本人的“无理残暴的对待”，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3月2日《东京日日新闻》)。同年7月，英国人布拉克的《日新真事志》刊载了一封伪造的朝鲜国致我国政府的国书，里面写道：“我朝鲜虽是小国，但敢致函贵国说西洋夷狄乃野兽也。(中略)吾人深望贵国联合同盟诸夷向我国派遣海陆大军。为使贵国及其友邦的攻击方便起见，吾人将以釜山为战场，清扫以待。(中略)日本一定要来侵略朝鲜，不然朝鲜只有侵略日本了^①”。

木户孝允当时说：“外国恶徒始终为了私利而一再唆使外征，其目的不外乎贪图推销武器”。综合上述各项事实，木户的这些话，不可能不是为了反对征韩而编造的(明治六年十一月廿三日致青木周弼书)。这种煽动不仅是英美商人企图推销武器，英美两国政

^① Black: Young Japan Vol. II, pp. 380.

府也唆使日本侵略朝鲜,并且加以援助。

虽然是1873年征韩论争后的史料,英国公使巴夏礼于1874年9月旅行函馆时写给他的友人说:“这里是能够监视对岸俄国行动的唯一地点。我盼望朝鲜不会有朝一日落到俄国的手里。函馆的开埠拯救了蝦夷,如果朝鲜人不愚蠢透顶,他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开埠通商就是救国”(1874年9月15日致罗伯逊书)。为了不使朝鲜落到俄国手里,英国希望日本向朝鲜扩张。

1874年,当大久保为了处理台湾事件前往中国时,清廷的英人顾问和英国驻华公使馆员们作为公使的意见向大久保说:“中国政府实在可怜,此番务必和好了事,今后可经略朝鲜,这样,英国将首先援助,这对日本说来是上策”,又说:“日本经略朝鲜有利,如果日本有此举,欧洲没有异论,我英国将给予帮助”云云(《大久保利通日记》,明治七年十月廿二日,十三日)。

1875年日本侵略朝鲜江华炮台时,《邮便报知新闻》登载一篇消息,大意说:“驻日英国公使鼓励了日本对朝鲜的好战欲望”。日英两国当局曾立即予以正式否认,但英国鼓励日本侵略朝鲜却是事实。当然,英国也并不希望日本完全征服朝鲜,英美所希望的是李仙得的第二点建议,即朝鲜的开埠通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希望日本采取积极手段;而副岛等人却把这看做是对征韩的援助了。《大隈伯昔日谭》怀疑副岛的征韩论是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外国公使团的操纵。是否能肯定这样说,不得而知,但大隈所说的“李仙得的划策、德朗的阴谋”同征韩论有关,这是不能否认的。

把征韩论作为一个对外政策来看,顾名思义,就是征服朝鲜,即梦想征服大陆的第一步。这种政策,并不是在我国国内使我国国力即民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充实起来,作为东亚的先进国家,启发朝鲜、中国等落后国家,协力对抗沙皇俄国和英法美对领土和经济的侵略,而是恰恰相反,如前文所述,我国国内不去抵抗英、美、

法、俄的压迫，想要侵略朝鲜和大陆上的满洲取得补偿，并且把人民对外平等的要求转变为掠夺新领土的战争。这个计划，企图在英美的谅解和鼓励之下大力执行，这是明治以来天皇政府各派的一贯的对朝政策，西乡的谈话也是这样提的（即便不是西乡的真话，至少捏造这个谈话的人是这样想的），同时从副岛、大久保同英美公使的关系也可以看得出来。

岩仓、大久保和木户也并非在原则上反对征韩。侵略朝鲜是在岩仓等人出国前的一贯策划。他们在1873年反对西乡、板垣的征韩论后不久，在1875年就发动了江华岛事件。他们认为西乡的朝鲜政策从国内和国际情形看来为期尚早，计划草率，他们主张不要一举占领朝鲜，而是逐渐在朝鲜培植势力。这一点，将在下章叙述。

两派的主要争论之点不在于征韩论的对外方面，而是在于它的对内方面。1873年征韩论突然大肆叫嚣起来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国内关系，并不是由于朝鲜的“排日”激化起来。正因为征韩论主要是国内问题，所以它在国外并不十分保密，而在国内却是个严守的秘密。木户孝允的1869—1890年间的征韩论，目的专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武力，削弱各藩的势力，这点前面已经叙述。1872年7月，他在美国的旅次，看到了报纸登载朝鲜驱逐日本使节、撕毁国书的造谣报导而神驰祖国时，在日记里写道，应该向朝鲜派遣使节，首先要慰抚有礼，“倘若对方无礼，则必须有所准备”，“试观今日我日本的形势，一旦对外发生事端，将大大促进国内的进步”。这就是首先向朝鲜派遣使节，然后挑拨朝鲜，造成侵略借口的策略，而这种策略同一年底的西乡的主张完全一致。

但是，怎样促进“国内的进步”，加强什么样的中央政府，在这一点上，西乡、板垣等人和木户、大久保等人形成了激烈的对立，虽然他们都是为此而主张征韩的。

第二节 西乡、板垣派的立场

(1) 西乡隆盛

木户孝允企图把国内的对立扭转为外征，借此机会培养中央政府的兵力，以推行自己的国内政策。西乡等人也和木户一样，在1872—1873年间，企图把士族在国内思乱的心情移到对外方面，给士族开辟一条生路，同时在国内断然实行他们自己的政策。

在1868年内乱时，西乡刚刚接收江户城，还在东征大总督府参谋总长的任上，便返回故乡，不到中央来。他这种举动的理由，虽然有种种推测，西乡本人也曾表露过因为他同萨藩藩主岛津久光的关系而不能留在中央的心情，但是总的说来，是因为他对内乱刚一结束就开始的官僚政治心怀不满。回到故乡后，他在1869年12月写给友人桂四郎的信里说：“暂时派到中央去的军队，完全是为了替我纠正官吏的骄奢”。从萨摩藩派到中央作为政府亲兵的军队，原来是西乡监视中央官僚的军队。

翌年，1870年7月，西乡的得意门生横山安武举出十条时弊，以自杀规谏政府时，首先提到：“旧幕府之恶弊，暗移于新政，昨非者今是”，又说：“自辅相大臣起，侈靡骄奢，上则暗诱朝廷，下则不察饥饿，此其一也。大小官员，外张虚饰，内事名利，此其二也。”以下八条完全是批判官僚政治的腐败和非难征韩论之不当的。这样的想法是西乡及萨摩士族一般的心境。

那末西乡等人想怎样纠正这种腐败呢？除了实行民主主义，使全体国民抑制政府的专制以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可是，西乡根本没有想到这点，他是想用士族的“武政”来代替官僚。他的萨藩藩制改革就是他的理想制度的一副缩图。他利用“版籍奉还”后中央政府颁发的“藩治职制”来打破士族内部的门阀，不顾藩

主岛津久光及其亲近门阀的反对，剥夺了领主对门阀士族私领地的统治权，把藩主个人的财产同藩的财产区别开来，不管以前的藩主的直辖地，还是新没收的私领地，每个乡都一律安置重新选拔的专任庄头，以各乡乡士的人数为比例，组成了大小“常备军队”，命庄头统辖，司法和行政一概归军队掌管，把乡村办公处改称为军务处，完全是士族独裁的军国化。

他想把这种办法施行于全国。1873年，陆军少将鸟尾小弥太根据自己的见解想在全国实行这类办法而向西乡征询意见，据说西乡也表示了同意（《明治政史》引用鸟尾著《国势因果论》）。

西乡反对官僚政治，是从封建士族立场出发的。1869年5月，他在信里说：“在生死存亡之时，象私有物一样将一些人召集来，平乱以后，则弃之不顾，这不仅有关道义……”云云，这充分表现了动员士族掀起戊辰内乱的肇事人和身任东征军总参谋的西乡本人的立场和心事。

仰慕西乡并对新政府心怀不满的士族都拥戴西乡为领袖了。1870到1871年，长州的大乐源太郎等人掀起反政府的暴动，后来逃到日田，想以久留米和柳川的藩士为依靠力量，在九州一带掀起大骚动，政府派遣巡察使四条隆讲少将前往镇抚，同时命令九州、西国各藩出兵时，萨藩却出兵很晚，反有支援暴动的趋势。因此木户等人对西乡深为怀疑。这时西乡身在中央政府为官，但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改组”政府。西乡与大乐等人是否真有联系姑且不论，但是因为愤懑之徒都把希望寄托在西乡身上，所以木户等人才对西乡产生了疑惑。由于这一件事以及横山的死谏，当西乡在鹿儿岛时，就谣传他将率兵晋京，清洗政府（《明治圣上和臣高行》）。西乡也多少抱有这种念头，这从上面他写给桂四郎的信中也可以推察出来。反动士族的阴谋，不拘大小，都利用西乡的名义。1871年12月，西乡自己写道：“每有坏事，都牵连到我的名

字，真令人不痛快”（致桂四郎的信）。

但是明治“维新”在不断前进，政府不得不放弃士族第一的立场，尽管各藩藩主和士族心怀不满，为了“皇国人民的平等”不得不缩小封建贵族的特权，振兴工商业，使生产得到自由，因此必须提出“文明开化”这个口号。不言而喻，为了做到文明开化，官僚和豪商的奢侈和腐败的政治，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这些事情就绝对不会发生。同时为了发展工业，政府大官也无需对三井、小野、岛田以及五代才助、岩崎弥太郎、山城屋和助这些新旧资本家，利用税款给以莫大的保护，因而也就不会发生1871年西乡骂井上馨是“三井的店伙”这类事（后述）。但是，明治政府就是搞这类事情的专制官僚政府。正因为这样，才激起反动士族的不满，而且它又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这种不满。

于是，便企图同士族谋求妥协，把西乡拉入中央政府，利用他的力量来压制士族，实行废藩置县。1870年末，以岩仓具视为勅使，由木户、大久保等人随行，政府首脑全班人马来到山口和鹿儿岛，敦促两藩的藩主晋京，天皇还参拜了毛利^①和岛津^②两家的神社^③。那时岩仓、大久保、山县有朋等人热心恳请西乡出马，西乡也终于答应了（他是想实行自己的政策，后述）。然后又拉出土佐的板垣退助，1871年2月一同晋京，同时由萨、长、土三藩向中央政府派出“亲兵”。

这样就取得了政府的一时安定，乘机实行了废藩置县。直到这时为止，西乡和士族都没有异议，而且表示赞成。西乡在萨摩的政策也是把藩侯排斥在政权之外的。表示反对的是以岛津久光为首的旧诸侯。在废藩置县后，久光甚至希望当鹿儿岛县知事（明治

① 即长州藩藩主。——译者

② 即萨摩藩藩主。——译者

③ 即祖庙。——译者

五年二月十五日西乡致大久保书，参照松平庆永《久光公密事稿》，《大久保文书》四）。

对西乡等人来说，最成为问题的倒是废藩置县以后，也就是迟早要搞的士族处理问题。甚至大久保也说：“鹿儿岛县之事，士族众多，无与伦比（为其他各藩的两倍，按全人口计算，每五人有一士族），这种情形，当然要遵照九月前后朝廷颁布的意旨来处理，此事真使人为难”（明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岩仓书）。可见西乡对此怎么能不关心呢。西乡在废藩后马上对如何保护旧萨藩士族的生活，拟定了周密的计划。从这时起到下野为止，西乡写给桂四郎等萨藩人士的书信，几乎全是关于士族生活保障的。

当时西乡对如何使藩的债权不被中央接收而留在士族手里也曾作过安排（明治四年九月二日致桂四郎书）。此外，旧萨藩领内诸岛出产的砂糖，很久以来归该藩专卖，废藩后，仍然没有停止鹿儿岛县——实质上就是萨藩的专卖。桂四郎等人想废除专卖，改由士族商行垄断砂糖的买卖，他主张“作为士族的贸易，组织一个商行，由商行一手贩卖，以其利益救济士族。”对此，西乡曾指示说，向各地贩卖砂糖，“无疑，其利益必为大藏省所占”，而人们还认为是官家专卖，必须注意，不要使利益被大藏省得去（1871年12月11日）。这与当时官僚们正在极力设法充实中央财政和保护商业资本相比，充分表现出专为地方士族生活着想的西乡的形象了。

1871年，西乡参加内阁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替岩仓、大久保等天皇制官僚充当挡箭牌。他是为了改组政府，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他在萨摩实行的那一套。他离开故乡时，曾对士族们作了某种诺言。1871年6月25日，根据西乡提议实行内阁改组之后——改组原案设参议一名，执掌全权，西乡推举木户充任参议，但木户不肯担任，乃由西乡、木户两人同任参议——西乡写信向萨摩的桂四郎报告经过，他在信中说：“此时如不妥协，就得按在故乡与

队中人的约定决裂，因此实在不能脱身”。同时西乡认为这次改组是：“此次俗吏们大失所望，如落汤之鸡”，并且说：“因为没有充分进行选择，不胜遗憾”。这封信的抄件广泛流传在士族之间，西乡对此感到非常为难。据推测，对西乡改革政府抱有莫大期望的士族，在这封信上可能感到他们的期望没有落空。

“西乡对现在的政治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进步派说以西乡为首的谨严派愚蠢，谨严派也说进步派的坏话”（《佐佐木高行日记》），西乡和木户分别把大隈和板垣拉来作参议，使之站在自己方面，在这种对立之下，一直到1871年末岩仓大使等人出使欧美，木户、大久保、伊藤等全体首脑官僚则出国视察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留守政府变成了西乡、板垣、大隈的三头政治。岩仓和大久保等人及其留守部队长大隈参议和井上大藏大辅等人深恐西乡派在首脑部出国期间进行任何“改革”，使节团和留守内阁间交换了亘古未闻的十一条信约。

第六条 国内事务在大使回国前尽量不作新的更改，不得已时，必须照会派出的大使。

第七条 各部长官出缺不补，由参议分别担任，不变更其规模

和目的。

第九条 不论简任、荐任、委任，一律不增加官吏。

第十条 不增聘外国人。

这就是说，留守政府不得独自作任何事情，人事方面，也完全不得过问。在忙于春耕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信约，可见政府内部的对立已达顶点。

西乡在别宴会上向井上馨举杯说：“三井的店伙，来干一杯”（《佐佐木高行日记》）。井上致书大久保恳求说：“自感力微，难以代理，幸赖上野（景范）（澁泽（荣一））之助，必当尽力为之。如乘遇难之船，难保无虞，为此苦心焦虑。出发前，务

请与西乡先生洽谈，俾使今后彼此好生疏通”。（10月18日，《大久保利通文书》四，并参照《大隈重信关系文书》第一，大隈致木户书，明治四年十月九日。）

这样的留守内阁是不会搞好的。西乡丝毫也不信任大隈和井上，他在1872年5月写给桂四郎的信里也说：“大隈等人的奸诈是难以形容的，井上现不在京（当时出差大阪），回京后必定站在反对立场，”云云，同时大隈也怀疑西乡暗中勾结旧藩的士族（明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西乡的信）。

在这样暗斗的背景下，根据大隈、大久保的方针实行了各种疾风暴雨般的资产阶级的改革。即把各种封建身分划分为华族、士族、平民，加以整顿；规定人民的职业和迁移的自由；地稅的改订；准备实行田地自由买卖；1872年着手处理士族的禄制；同一时期还要制定征兵令等等，从这些基本的重大问题一直到剪裁、肉食的细微问题。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必然过程。纵令大西乡有声望，以士族为中心的改革也是无法推行的。例如，西乡尽力使士族成立商行实行垄断的三岛砂糖，也在1873年3月，不得不允许各地商人自由往返产地进行买卖了。

1872年2月，开始对士族的正面攻击，即开始计划取消家禄，吉田清成为此出国募集外债。同时废除付给士族、卒族（卒族即次子、三子、退休者等的俸禄，还废除了各藩的救济津贴（《秩禄处分参考书》）。士族渐渐动摇起来。1872年5月至7月，为了稳定士族的动摇，请出天皇来巡视反动士族的根据地——西国九州。西乡报告大久保说：因此“西国人心大为归附”，尤其鹿儿岛的“情形良好”。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稳定。拜谒天皇，并不能医治士族的饥饿，也不能抑制他们的不平。当天皇来到鹿儿岛时，岛津久光上奏说，皇国终于变成共和政治，大有成为洋夷属国之势，表示对政府的强烈忿慨。西乡属下的近卫兵也变成了“炸弹”，随时可能爆

炸，西乡代替山县有朋亲自就任近卫都督，才勉强防止了“爆炸”。

在这种情势下，1872年11月公布了征兵令。布告文直接痛骂士族是“号称武士、佩带双刀、厚颜坐食、甚至杀人官亦不问罪的人”，大声疾呼四民平等和自由人权。当然，这里说的四民平等自由，不过是蛊惑宣传而已，但可看出人民对自由平等的要求和斗争已经高涨，不这样说，人民就不答应了。在这种形势下，士族特权的美梦是继续不下去了。由于征兵令的实施，所谓士族的“常职”被剥夺了，作为享受家禄和其他封建特权的最后唯一口实已经不复存在，士族的愤慨达到了极点。西乡的心腹桐野利秋痛骂熊本的镇台谷干城说，山县有朋招集一些庄稼汉能搞出什么名堂？当时的兵部大丞曾我祐准晚年回忆时说：“反对征兵制的，不是农商平民而是士族。他们反对征兵令，是由于他们狂妄自大和不学无术而提出除士族外没有能够打仗的种族的愚蠢论点。”人民虽然也反对征兵，但在某一时期，士族的反对很猛烈。那种狂妄的愚蠢论点是由于留恋封建等级制而产生的（谷干城《隈山貽谋录》，《曾我祐准翁自叙传》）。

士族的台柱子——西乡隆盛的最大苦恼就在于此。他作为政府的负责人，不得不参与征兵令的制定工作，由于山县等人的说服，他也感到有必要制定征兵令。实际上也是如此，让士族来当兵是不能组成统一的军队的^①。

但是西乡知道，征兵令公布后，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戊辰战争时的部下和对废藩置县有功的近卫军不久就会被淘汰。事到如今，他对他所爱的和景慕他的士族将怎样处理呢？怎样替他们开

^① 近卫军就是一个好例子。近卫军里“领过三百石俸禄的上士和领过两个人粮饷的小兵”都混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身分对立观念非常强烈。同是萨藩出身的，城市出身的就轻视城外出身的，说他们是乡下佬，因而城外出身的忍受不了而陆续逃出兵营。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利用士族是组织不成近代军队的。组织士族兵，财政担负不了，其他方面就更不必谈了（前引《隈山貽谋录》，《大西乡全集》二，西乡致黑田清隆的信）。

辟一条生路呢？眼看他们就要变成“炸弹”，随时有爆炸的可能。他不能坐视他们爆炸，使有功的人变成罪人，必须设法找出一条发泄不满情绪的出路。

环视周围，大隈、井上以及他们背后的大久保等政府主流的官僚政治，都是铜臭冲天。号称“文明开化”，人心却日日颓废下去。“此地局势，西风日盛，但只在皮毛，未入其髓，口唱文明，实是懒惰，令人不胜慨叹，世风日下，今后究竟如何，实难预卜。”（明治六年九月，西乡致寺田平之助书，《大西乡全集》二）。

该是断然实行武政的时候了！现在西乡发现外征是替士族寻求生路和实行士族军事独裁的唯一出路。恰好发生台湾番族的暴行。萨摩的士族、近卫士官已经在沙上私语，不等朝命，就要前去讨伐了。西乡劝阻他们要等待副岛从中国回来作好外交准备。接着便发生朝鲜的“侮日事件”。台湾事小，不如侵略朝鲜。那样便可取得日本受欧美压迫的补偿。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或三雕四雕了。这就是“把希冀内乱之心转而向外，兴国的远图！”

1873年，西乡之所以拼命主张征韩，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因此，征韩是刻不容缓的了，无论如何必须在明治六年里实行。不是时机尚早，恰恰相反，如果迟迟不行，必然发生内乱。关于这一点，他曾屡次在写给三条太政官的信里加以申述（三条也害怕发生内乱，在8月17日和10月15日两次阁议上向西乡屈服，赞成征韩）。同时也正因为这样，西乡就认为无需再同山县有朋、胜海舟等新陆海军首脑部去商议征韩的事情了。其弟西乡从道内心也反对他的主张。胜海舟海军卿曾声言军备不足，如果政府命他作战，他就辞职（10月11日三条致岩仓书）。西乡对这些丝毫不加考虑。因为在西乡看来，并不完全需要那些新军队，他想利用的是“友邦”和一般士族。

西乡主张征韩的根本目的既如上述，当然他必须在岩仓等人

回国以前着手实现。因为岩仓等人一回国，西乡的士族路线必定遭到破坏，这是十分明显的。

在岩仓、大久保、木户等人出国期间，西乡和板垣在政府内大肆扩张势力。岩仓等人出国后一年，1872年末，发生了山城屋事件。长州士族出身的山城屋和助与同乡的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勾结，挪用陆军省的一笔巨款，在巴黎大肆挥霍，有人怀疑他的钱的来源，于是事件暴露了。山城屋仓促回国，在陆军省内剖腹自杀，企图平息此事。但司法卿江藤新平追究山县，山县竟不得不在1873年4月暂时辞职。大隈、井上等人曾极力挽留。西乡虽然也略微表示挽留，但其实是恐怕因山县的辞职而引起军备紊乱。

山县辞职的次日，追究山县的江藤新平、后藤象次郎、大木乔任被任命为参议，接着实行官制改革，称为“制度润饰”，参议的权限加强并扩大了。岩仓出使时的一张信约，变成了烂纸。

大隈对此一味敷衍，但井上和澁泽却非常不平。正当这时，江藤新平(司法卿)要求增加法院开设费预算，而井上等大藏省当局除山县等要求的陆海军费外一概不批准。于是，江藤和井上发生激烈冲突。结果，井上等人于5月7日辞职。江藤还追究井上在处理尾去泽铜矿时的贪污案件(但不久江藤在征韩论上失败被赶出政府，尾去泽案件便无人过问了)。

江藤还对木户的部下、京都府参事榎村正直等人，追究他们唯恐因设置司法省直辖的法院而侵夺地方官的司法权而进行反抗的事件。虽然不能肯定江藤的背后有西乡撑腰，但是江藤就任参议却是由于西乡等人的破例提升。江藤同井上的斗争，其实就是西乡派对大久保、木户、大隈的斗争。

既然这样，当然可以预料，大久保、木户等人回国后，对留守政府一定要全面反对的。因此，西乡打算在岩仓还未回国，敌人尚未聚齐以前，极力迫使三条确定政府方针(后述)。

1873年的征韩论的彻头彻尾的中心人物是西乡。板垣、副岛、后藤、江藤等人，不过是从各自的角度支援了西乡的意见，或则是组成一个反对大久保——木户派集团来进行共同斗争。

(2) 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及其他

板垣在内政上跟西乡几乎完全相反。板垣在1870年5月至11月这段期间与后藤象次郎等人实行的土佐藩政的改革，是“以人民平等之理为主”，解除士族的文武常职，废除禄制，代之以禄券，官员、士兵一律从一般人民中录取，华、士、卒、平民的称呼只是用以区别族类，而不代表任何身分特权和差别，大体上实现了人权平等。同时，土佐藩还建议把这种办法施行于全国。关于土佐的特产——纸张的销售，也改为“解除官家的垄断，使商民自由买卖”，这点典型地表现出板垣和西乡之间的不同。同时，在各地兴办学校，对女子教育也表示关心，男女学校都以洋学为必修课程，聘用英国人，开设西式医院等等，板垣领导的改革比政府前进一步，与西乡走的方向正相反。

土佐的纸张、樟脑、木材、木鱼等农林产物和水产物的商品生产，在当时已相当发达，具备先进的基础。为了输出这些商品，同长崎的外商发生接触，岩崎弥太郎等也借此渐渐壮大起来。酒商的后代坂本龙马等人尽管还保存封建残余，却已经模糊地有了议会政治思想。这种思潮也构成了板垣的改革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因为板垣在1868年内乱时期身为东山道军和会津征讨军的参谋，始终身临战场，处处关怀人心的向背，深切感到自主自由的人民才是最大的依靠力量(前述)。

1870年传说西乡谋反时，板垣曾计划讨伐西乡，掀起一场战争来促进国内的进步，同时还想把岩仓、大久保等反动保守势力逐出政府。当然，这并不完全是出于近代的民主主义意识，而是夹杂

着封建的对立意识。

单就土佐藩实行的录取平民入伍这点来说，和歌山藩早在1869年12月就作为“轮班兵”制度而大规模地实行了，它的前提也是“士农工商同权，平等对待”，但是和歌山的改革，整个说来，不如板垣的政策那样有系统（《南纪德川史》，第十一册，渡边几治郎《陆奥宗光》）。

板垣在1871年跟西乡同时参加政府，并且支持西乡。但他并不是为了实现西乡的计划，而是为了导致由各藩大参事等组成的议会政治（《佐佐木高行日记》）。他所谓的大参事并不限于士族，但大参事议会当然还不能是现代议会。要使他的这种主张发展成为现代的民选议会论，还需要板垣本人退出官僚政府，和片冈健吉等人从英国留学回来。据说制定征兵令时，板垣还曾主张应该效仿瑞士的民兵制度（《大隈伯昔日谭》）。

因此，即便在征韩论争辩方酣时，岩仓在写给大久保的信中还提到：“板垣的主张，在朝鲜事件方面虽与西乡一致，但在预料将来的政体上，却是和你（大久保）一致的”（10月9日）。《国宪编纂起源》的著者说，板垣赞成征韩论，因而把“议会论贬到次要地位”了，又说：“一反平素的主张，变成压制主义，令人觉得奇怪”，但板垣并不是变了节。尽管板垣对未来政体的主张与大久保相同，但这只是说板垣的主张比西乡等人的半封建武政更接近大久保的主张，至于他的本心，正如大隈所推测那样，是想要利用外征来开辟废除官僚专制的道路。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才同最右翼的西乡结成联盟。

这是由于板垣还没有摆脱封建军国主义，才造成这种不可救药的混乱。为了反对官僚制度，有时也可以同士族主义结成统一战线，但自己的议会政治的原则如果因此而糟蹋了，这种妥协就不是妥协了。关于这一点，板垣也没有明确认识到。他还置身于官僚专制政府之内，同人民——立宪论的真正基础——没有组织上

的联系,脱离了他们,因此,他不能克服士族军国主义而造成了这种混乱。

他在征韩论上也是摇摆不定的。争论时,他同岩仓也经常来往。根据桐野利秋的谈话,板垣中途态度软化,西乡曾责难他,这恐怕是事实。再者,板垣在征韩论引起政变而导致内阁分裂以后,仍然为安抚土佐出身的近卫军的动摇而努力,这点同西乡派率领近卫军回本藩是恰恰相反的(明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木户孝允日记》,田中光显《土佐人》报告)。

后藤象次郎虽没有板垣那样彻底,总之是他的同路人。

副岛种臣的情况,前面已经叙述。

江藤新平这个人,有人称赞他是个打破藩阀的急先锋,赞成征韩论。相反的,也有人非难他,说他是趁火打劫之徒。究竟真相如何呢?

江藤于1834年(天保五年)生于佐贺藩的一个下级武士“短枪手级”的家庭里。也和普通下级武士的情况一样,他家生活也十分贫寒,母亲一面开办私塾,一面搓捻纸绳补助生计。少年时代的江藤新平,出外是藩的卒伍,回家以切烟丝为副业,以求糊口。有时竟至绝粮断炊,但他却昂然壮语说:“食不得饱,智慧乃生”(《江藤南白》,以下引文完全根据此书)。

的确,他是个下级武士,受封建的恩惠不厚,因而受的束缚也不大。常常食不得饱的青年江藤新平,见识却是高人一等。1856年(安政三年,一说文久二年,当在开港以前),他的一篇“图海策”,是一部反对排外主义攘夷论的杰作。他没有把幕府诸侯放在眼里,彻底批判攘夷论说,如果提倡攘夷论,满足于原有的物资,不去搞海外通商航海,国内必将更加衰弱,人民不能养育子女,堕胎溺婴必将愈益盛行。迫使父母造成溺婴的惨事,是当政者的罪过。即使进行攘夷的战争,无能的幕府诸侯决无战胜外国人之理。纵使

战胜,也使百姓苦于劳役,田野荒芜,结果全国濒于饥饿。当此世界交通发达之时,唯一良策,只有振兴海外通商和航海,训练海军。他在题为“招北”的另外一章中还谈论说,开发虾夷地方以防俄国南下,乃是当务之急。

江藤在1868年(明治元年)初,任镇将府(天皇政权的江户军政机关)的判事,执掌江户的市政时,也曾主张强行减低地租和房租,废除买办商、代理商等封建垄断,或者主张赶紧把消费城市江户变为使用“蒸汽机”的生产城市。他还说,即便平定了奥羽诸藩之后,如果关八州^①的人民不支持政府,必有内乱之兆。他的这些卓越见识,正是来自他跟人民一起经常食不得饱而产生的智慧。

但是,当江藤飞黄腾达,当上中央官僚、吃饱肚子以后,便同整个维新政府一起渐渐脱离了人民。1869年,江藤和副岛在佐贺藩实行改革时,纲领第一条就提出“打破门阀位阶的谬论”,但他认为“武士礼敬大夫^②甚厚,诸人^③礼敬武士则甚轻,故欲减低大夫的尊严,增加武士的威权,使大夫对待武士与武士对待诸人相同”。由此可见,所谓打破门阀,不过是想使江藤这类下级武士与上级武士平等,而对一般平民则要求比从前更加屈从于士族,为士族要求权威!这是惊人的倒退。

1869年12月,江藤任太政官中弁^④,致力于整备官僚政府的机构。这时他是岩仓的参谋之一,也得到大久保、木户等人的赏识。1870年10月,大久保向岩仓提出的官制改革方案,就是江藤起草的。1871年2月,他兼任制度调查专员,与津田真道、神田孝平、副岛种臣等研究西洋和中国法制的专家为伍,秉承岩仓、大久保、木户等首脑部的意旨,致力于官制的制定(参照《明治圣上和臣

① 即箱根以东的相模、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译者

② 即官僚。——译者

③ 即平民。——译者

④ 官名,监察使之类的官职。——译者

高行》、《木户孝允日记》明治四年七月十九日)。

后来又升任文部大辅、左院副议长等职，并任岩仓、大久保等人的直系法制局长官，一直到1871年末岩仓等人出使欧美为止。

进入左院后，江藤就勾结议长后藤象次郎，投入留守政府的首脑部的阵营，即从昨天的大使派阵营转入反对派阵营，任司法卿，又升到士族的最高职位——参议（除非旧公卿或大名不能当大臣）。他历任中弁、制度调查专员、副议长和司法卿，一贯在官僚政府内担任法制的制定工作。人们根据他在1870年以“不妨误译，只要速译”为口号，抄袭法兰西民法，或根据1872年玛利亚鲁士号事件时他写的艺妓娼妓解放令等的词句，认为他是个急进论者。然而这是非常错误的。

看看反面事实，就可以知道，他是基督教信仰自由的激烈反对者。他并不反对信仰，而是反对信仰自由。他在1871年3月提给岩仓的对外政策意见书里说，将来的世界强国可能是美、俄、德三国。他的根据是：英国的军事权属于议会，所以英国将来必弱。与此相反，美、俄、德三国军权“在上”，所以必强。1871年，他就任掌管法制的高官以后，还不知道美国是共和国中的共和国，美国的议会势力最强，实在令人吃惊。不拘怎样，江藤既然认为议会政治必将亡国，那就恐怕没有人敢说他是“急进主义”了吧。

江藤在1873年10月下野。第二年他在板垣、后藤等前参议拟定的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上签了名，但这并不是他本来的思想。他不听板垣等人的劝制，回到佐贺，依靠反动士族掀起叛乱，以致终于失败。他在叛变的檄文中开头就说：“国权如能行使，民权才能完整”。这里所谓的国权，指的是政府的权力，这和他做官时热衷于整备官制、扩大和加强司法部的一系列行动完全一致，而同确保自由自主的民权后国权才能完整的民选议院论，完全是背道而驰。《国宪编纂起源》里说江藤反对制定宪法，恐怕不能说是

记错了。

司法卿江藤据说热衷于设立法院、加强和扩大司法部和“法律的严密”，他追究过山城屋事件的山县有朋及井上馨、榎村正直等长州派要人，为打破藩阀和争取严明公正的司法权独立而努力奋斗。哪怕是依仗藩阀的大官，只要他们一有不法行为就毫不留情地进行追究，他的这种勇气是值得佩服的。他虽然有志要打破藩阀专制，实现司法权的独立，但是藩阀专制其实就是官僚专制的一种表现，如果不打破官僚专制而谈打破藩阀，那只不过是江藤、佐贺来代替长州藩阀而已。要真想打破藩阀，除非依靠人民大众，否则是不可能的。不论怎样扩大司法部，给以多么大的权限，司法权的独立也是办不到的。司法权的独立要以人民摆脱封建的官僚专制，即立法权的独立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司法的独立。江藤本人的悲惨下场，就是一个例证。他在佐贺掀起叛乱，受到梟首之刑，而这种刑罚在他制定的法律中已经废除。当然，因为他当初彻底追究大久保的直系部下井上馨，这里肯定有大久保对他怀有报私仇的感情。然而，江藤的立法和司法事业如果依靠人民的力量、和人民一起实行了的话，那末就是大久保也不可能在全国人民监视之下敢于做出这种不法的暴虐举动。

江藤不是把立法权交给国民议会，而是专门加强官僚内部分工的司法部，也就是一心企图扩张他自己的地盘。1872—1873年，当人民要求土地革命、废除征兵制而被迫在各地纷纷掀起暴动的时候，据说江藤司法卿还因法院忙于逮捕、审讯人民而自鸣得意（《佐佐木高行日记》）。后世史家如果说他企图代替长州藩阀，凭自己精通的司法事业与西乡、板垣等人勾结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恐怕也不容否认。

江藤也有一个侵略中国的主张，这就是前述1871年3月的意见书。如前所述，他认为今后美俄德三国必将强大，所以他说：“一

且俄国向我提出难题，皇国将何以应付？”因此，现在就应该与这三国结好，以美防俄、以俄防美。他少壮时期主张赶紧开发北方的理想和气概，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和桥本庄内的日俄同盟论完全相似。又说：“皇国方今之忧在于封建论和邪教门”——身为中央的官僚，封建论当然要反对——应该加以禁止镇压，暂且同清廷表面和好，一面准备武力，一面以传教为名派僧侣到中国去进行军事间谍活动。一俟内外准备停当，等到清政府的“无礼”，“便与俄国通谋合力，或让俄国中立，由我方单独一举征服中国”。要是和俄国同盟，便由两国瓜分中国，如由我方独自征服就不一定分给俄国，这是江藤的空想。他所以赞成征韩论，可能就是因为他想借此开辟一条侵略中国的道路。

第三节 大久保、木户派的立场

岩仓、木户、大久保等人正是根据木户在1872年前提出征韩论的同一理由，西乡越是迫不及待，就越发反对1873年西乡的征韩论。

木户的主张，表面上有矛盾，但决不是不能解决的。他回国前的征韩论是，虽然不提西乡，但企图把西乡也包括在内的诸藩士的势力转移海外，借以统一和加强官僚中央政权，进而在它的独裁下统一内政。木户等前一年想清除士族代表西乡，现在相反的，西乡却为清除木户等人、实行士族武政，并在士族掌握主动权之下进行外征，木户等人焉能不加反对。外征的领导权操在士族手里和操在中央官僚手里有重大的区别。如果在士族领导下取得胜利，士族的气势将不可当，官僚派势必要总退却，因此他们能不反对吗？

木户、大久保、大隈等人彼此之间也不断发生对立和争执。废藩置县前，大久保为了削弱盘踞在大藏省内挥舞独裁权力的大隈

及其手下“旧幕人”澁泽等的力量，曾不断地进行斗争。木户和大久保之间的不睦也是人所周知的。木户说：“壬戌、癸亥（1862—1863年）以来受萨人的愚弄”，他继续对藩阀抱着反感。二人在出国期间也是不睦的，甚至回国时不愿同乘一条轮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结成一个势力，反对士族的武政，也反对国民的议会政治，一味试图在他们的官僚独裁之下，用他们优厚的保护政策来扶植财阀，引进和发展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经过为时一年半的欧美考察，木户、大久保等人越发坚定了他们的绝对官僚主义的信心。他们在海外时不断反对祖国的“轻率进步”，认为即便象法国那样进行剧烈改革的国家，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进行改革的。他们深深赞许法国的“政府权威”的强大。佐佐木高行等人出国前也没有反对开化论者的信心，但出国一看，认为西洋也决非开化论者所说的那样自由民权的国家，因而坚定了保守主义的信心。

每个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才能来学习。用官僚的眼光观察欧美，只能看到政府的强大，而不去想政府为什么强大。当时法兰西正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大久保说：“大总统梯也尔这个人坚决实行压制，可谓豪杰”，表示“非常佩服”，对普鲁士的俾斯麦，当然也“心向往之”（致西德次郎、大山岩、西乡隆盛等的信）。大久保尽管在英国听说自由优于专制，却说：“英、美、法等国的开化，高我数层（日本无论如何模仿也），望尘莫及”，表示放弃向这些国家学习，并说：“我认为德、俄两国必有很多东西可为我们的准绳”，“应特别注意这两个国家”，在军事、警察、官僚都很强大的这两个国家中应该特别注意沙俄，他再三委托西德次郎研究俄国的政体（明治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同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信）。

木户孝允也大致一样（参看出国时的日记文件等）。

他们在哪个国家都是最先视察“法院、监狱、学校”，同时也视

察“贸易公司、工厂”，说“无论到什么地方，没有一件地里出产的东西，有的只是煤和铁。生产品都是从外国进口原料，加工后再向外国出口，工厂的兴盛，远远超出过去的传闻，到处黑烟冲天……这就足以了解英国所以富强的原因”。“纵观欧美各处的情况，小规模生产大都利润很少，因此丝织业如不集合力量，不能有大发展”（大久保利通致大山岩的信，木户孝允致榎村正直的信）。大工业远远超过以往的传闻，使他们大吃一惊，因而他们痛感急需引进这种工业，并加以扶植。

他们回国后，看到留守政府把他们的代理人井上驱逐出去，还擅自增加自己一派的参议，并要伺机确立军事独裁，他们当然再也不能容忍了。有人说，大久保、木户等人的不满是因为所有的改革都在他们出国期间进行完毕，他们感到回国后无事可做。这种见解未免过于肤浅。征兵令和地税改革等重要事项，是他们出使以前就已决定的计划。当然，木户和大久保可能稍微心怀不满，认为功劳被大隈夺去了，然而毕竟不是被西乡等人夺去的（明治六年九月十三日，木户致三条的信，《国宪编纂起源》）。木户等人认为征兵令布告中高唱国民自由平等和娼妓解放令等是“轻率的进步”，曾表示激烈反对。

最大的不满在于西乡和与西乡勾结的板垣、江藤等人的权势增大。大久保、木户等人所谓内治派的立场，自然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他们对征韩论是赞成的，但是反对西乡或士族掌握领导权的征韩，所以他们反对在1873年（明治六年）立刻实行。

大久保反对征韩意见书七条，最简洁地表现了大久保派的这种主张。在第三条里说，如果发动外征，则海陆军（即新海陆军）、文教、司法、开拓等事业（大久保等人着手兴办的官僚事业）必将中途而废，因而反对。在第四条和第六条里说，方今的贸易连年入超，对英国的外债为数甚巨，如果发动外征，为了输入武器等等，外

债势必更加增多。另一方面，“国内壮丁受苦于外，服役于内，为父母者忧虑烦恼，无意勤俭经营事业，”产业衰落，不能偿还外债，因而会造成英国干涉内政的开端。因此，现在必须振兴工业，提倡出口。

然而，大久保等人所以反对 1873 年征韩论，急于整顿官僚制度，发展现代产业，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人民反抗天皇制的危机。

在征兵令的布告里，虽然冠冕堂皇地高唱确立国民的自由平等的人权作为征兵令的必要前提，但是丝毫没有兑现。结果征兵制和征集农奴劳动力的赋役，完全没有差别，只是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同时地税改革也丝毫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人民痛苦万分。此外，义务教育制也是从学校的建立起，直到教师的工资等等，完全归人民负担，这也变成一种新的剥削方式。反对这些制度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和破坏骚动在 1872—1873 年间遍及全国，达到日本历史上采取起义方式的人民斗争的最高峰。废藩置县后，单就一万人以上参加的起义来说，有：伊予大州的四万人起义（1871 年 8 月），大分县起义光处刑者就有二万八千人（1872 年 12 月），到了 1873 年，越发激烈起来，3 月在越前大野有一万人以上起义，5 月在美作有数万人蜂起。尤其 6 月，在筑前的嘉麻、穗波两郡爆发了三十万人的大暴动，政府调派邻近各县的和镇台的大军才勉强镇压下去，除首魁六名被判处死刑以外，其余受刑事处分者达六万余人。同一时期，鸟取和赞岐也发生数万人的起义。至于规模较小的，光 1873 年一年至少有三十六起。在这以前，上溯到废藩置县，还有三十八起，地区遍及全国（土屋乔雄《明治初年农民骚扰录》）。

这些暴动事件有的被说成是人民对旧藩主的眷恋，有的被说成是人民对征兵令中的血税字样的误解，这些完全是肤浅之见。

象大久保这样具有卓见的人，尽管对留守政府深怀不满，一回国就认为“全国各处因征兵或因征税而暴动蜂起，这里一定有原因”，他首先希望政府加以镇压（《国宪编纂起源》）。所谓对旧藩主的眷恋，不过是“表面上以惜别为名”的借口，这点在政府的法令中已经指出（《法令全书》、明治四年七月十二日对府县的指令）。就连大久保也不认为这不过是无知小民的骚扰，只要一派军队就可以简单平定的。

当1869年人民起义大大发展时，曾发生横井小楠的暗杀事件和诸藩士的“纷纷谣言”。那时大久保认为“不足挂念”而泰然自若。但是，现在却不禁动摇起来说：“听到最近的民情而肝肠寸断”了。木户也同样“十分忧虑”（《大久保利通文书》三，明治二年春提给岩仓的建议书，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木户的书信）。

1873年情况仍旧没变，反而更加严重了。尤其谣传寅年生人的男子将被征集入伍，前去征讨朝鲜，因而与此有关的人自不待言，就是一般人也大为恐慌，连活也干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大久保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外征。大久保在他反对马上征韩的意见书里开宗明义地说：“边隅顽民容易发生骚扰，不得已而鲜血溅地者不知已有几次，此乃最堪忧虑之事，因此不可骤然发动征韩之役，此其一也”。第二条以下的结论也是这样。如果发动外征，必将课赋重税，借外债或滥发纸币，其负担结果将落在人民身上，“使人民大为不满，终将酿成骚乱，还恐将发生说不尽的祸患”，“民间的怨愤日后必将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必须延缓征韩，振兴国内工业，整备武器军舰（还谈到了国际关系）。

木户的意见也大致相同。他说：“方今万民困苦，新令频传，人民愈益迷惑。去年以来，暴动数次，政府习以为常”，“此时若言方略，莫急于内政之治，若言义务，莫先于保护库页岛人民。然而雷同世论，益使人民困窘，益损国力，决非余所服也”（9月3日日记）。

又说：“真正今后抚民养力以求匹敌文明国家之心甚薄，将来之目的置诸不理，一味想欺侮弱者，今日子弹、火药、船舰、器械皆需从国外购买，所谓出军云云，只能引起内乱而已”，“日本人心动辄避强凌弱，维新之初，虽曾有一策略（指朝廷兵力同诸侯兵力的均衡），但现已非其时”（明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月二十三日致榑崎、青木的信）。

总之，内治派认为在目前这种国情之下，如果发动外征，国内人民说不定会起来革命，所以必须首先赶紧“抚民养力”。

岩仓是大久保、木户的代言人。

第四章 军国主义的确立

第一节 明治六年十月的政变

1873年前的国内局势和征韩论的真相既如上述，西乡派同大久保派根本是不能两立的，一场大政变完全在意料之中。

大久保在1873年5月26日回国，木户在7月23日也回国了。大久保4月间在柏林接到回国命令时，早就预料到留守政府难以对付。他在信里写道：“纵令我一个人回国也没有任何目的，除了默默等待大家回国之外，无事可作。我倒很想去温泉一游”（4月1日致寺岛宗则的信）。

实际回国一看，情况竟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说：“此间光景，实已变得无计可施。鄙人虽回国，犹如蚊背负山，不知所措”，又说：“纵有有为之志，此际与蜘蛛相纠缠，毫无益处，更兼我自有愚见”。所以，当三条要他就任参议时，他推托说有“苦衷”，拒不接受，采取“泰然旁观”的态度。他说：“等待角色到齐，到秋风白云时，将有一个大有可观的场面”。他想在岩仓大使一行回国后，不仅反对征韩

论,而且同西乡派决一胜负。

木户对留守政府也深为不满,回国后一直不到政府去。他正面反对留守政府首脑部的征韩论和征台论,8月向三条大臣提出长篇意见书。三条受了西乡派的牵制,而大隈和大木乔任这两个参议内心虽反对西乡,但却采取观望态度,同大久保感情上对立,不能合作,木户一个人孤掌难鸣,只是在日记和书信中发泄郁愤,至多也不过在团结长州派方面下点功夫,作些准备决战的工作。

在这期间,西乡派的工作节节进展。8月3日,西乡上书三条说:前此以等待副岛回国为词,好歹稳住了积极主张征台的军官,但现在副岛已经回国,抚慰无词。朝鲜一案,最初即非要求和睦,想您定有方略,今天对方傲慢至极,如果再象从前那样因循下去,必受天下人的嘲弄,因此,坚决希望派我为朝鲜使节,云云。他促请三条决定征台或征韩,同时,他认为征台居次,首先主张征韩,征韩的第一步,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派遣大使上。

8月14日,西乡请求板垣在派遣他为使节的问题上给予协助,要求板垣不要不忍得使他在征韩战争前就死去而有所姑息,请他从中斡旋,他表示坚定决心说:死只有早晚之差。西乡、板垣之间往来频繁。板垣很受感动,为西乡奔走。

8月16日夜间,西乡虽然因肥胖症行动困难,但仍抱病访问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三条说,派遣使节一事请等待岩仓大使回国后再行决定。西乡不肯,说不能安心等到那时,现在并非立即发动战争,乃是责难对方不敦友谊,对方必定杀害使节,那时天下人方知朝鲜之罪必须讨伐,事情必须导致这种地步。他说:“把希冀内乱之心转而对外,不仅是兴国的远略,也足以确证旧政府坐失良机、苟且偷安而终失天下”。他坚决要求派他为使节,以防范一般士族和近卫军的叛乱气势,并扭转时局。三条终于屈服,答应在第二天的参议会上决定。西乡再次叮嘱说,如果决定遣韩使节,不可

迟迟等到岩仓大使回国，必须在那以前确定遣使手续，以便使他安心。他预料岩仓等人回来，必将反对。

次日清晨，西乡赶紧向板垣详细叙述他与三条会见的情形，再次要求板垣协助。这一天有三条大臣、西乡、板垣、后藤、江藤、大木等人参加的参议会，终于通过了派遣西乡大使赴韩的议案。三条马上前往箱根行宫请得天皇批准。根据大久保、木户等人的传记载，此时天皇并未马上批准，命令等待岩仓大使回国后经过仔细商讨再上奏。但是，西乡在17日写给板垣的信里说：“承蒙先生（板垣）尽力，现在我心情方感欣快。疾病也顿见痊愈（中略），脚步也觉轻快。估计不致旁生枝节，这实在是生平的快事”。这分明说派遣西乡出使赴韩，已经得到天皇批准，因为任何“旁生枝节”也敌不过天皇。

于是，西乡预定9月20日为启程赴韩的日期，命人取来手枪，选定随员等等，愉快地准备行程。预定做随员的别府晋助患了感冒，西乡还开玩笑说：“是否临到出发前却贪生怕死了”。到此为止，对西乡来说，虽然很悲壮，却是“生平最愉快”的日子。木户参议的长篇反对意见书被驳斥了，开拓次官黑田清隆提出库页岛事件，企图阻止征韩，也被适当地应付过去了。

然而，在西乡写信揶揄别府的第二天，即9月13日，岩仓大使率领伊藤博文全体人员回国了。“秋风白云的时节”，即立春后第二百一十天左右来到了。从这时候起，西乡所谓的“旁生枝节”出现了，而且是很大的枝节。岩仓刚一回国便同三条商议，伊藤、黑田等人遵照岩仓的意旨各方奔走，首先调和本户和大久保的关系，使大久保就任参议，企图推翻留守政府的决议。木户也抛弃私情对此表示赞成。

大久保虽然认为时机将到，但仍不肯轻易出马，9月26日和30日屡次拒绝岩仓要他当参议的请求。三条和岩仓等人百般苦心

焦虑，“力求大久保奉命”就职。大久保就这样逐渐巩固自己的立足点。10月8日，他要求岩仓在第二天10时前用书面（而不是口头）表示一切都按他的方针决定，交到他手里。他得到这个确证以后才答应就任参议。10日，他写信给三条和岩仓，接受就任的请求，并表示决心说：“蒙详细告知确定的目的，完全知悉了。以后（中略）当不揣谫陋，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内治派的阵营布置停当了。

这时，西乡因岩仓回国后始终没有举行阁议，曾再三催促三条大臣开会。但是，三条和岩仓认为大久保就任前举行阁议不利，闪烁其词，设法拖延。预定启程赴韩的日期徒然过去了，西乡渐渐焦虑起来。9月21日，他召集萨派武官开会，企图迅速确定军部的主张，由军部来催促内阁。然而就连西乡的从弟陆军大辅西乡从道都“十分怀疑”，企图策划“违约之策”。大久保的心腹黑田也出席了那次策划会议，他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次日，西乡要求黑田协助促请确定政府方针，可见他完全看错了黑田这个人。

到了10月，阁议仍然没有召开。岩仓派的策士往来频繁，拼命拉拢大久保上台。10月12日的阁议预定期再次延期，西乡终于忍无可忍了。11日，他写信给三条责难他一再拖延阁议，并说：“万一变更遣使之议，乃是轻视敕命，万万不可，倘事到如今有所变更，自己只好一死以谢国友”。他不惜一死迫使政府迅速确定方针。这里所说的“国友”，指的是同乡的士族大众，言外之意，是说我可要动员士族啦，三条又为这句话动摇了。因为谁知道他要搞出什么名堂来。三条写信给岩仓说：“西乡已有决心，军队之动摇，亦系此一举，驾御殊难，他日变乱，不胜悬虑”。

西乡等人为什么任凭岩仓等人摆布而无所作为呢？为什么连一个起码的要求渡韩的示威都没有搞呢？这就是武士站在权力面前优柔寡断的劣根性。

12日发表文告，任命大久保为参议。第二天，为了势力均衡，也任命征韩派的副岛种臣为参议。这样一来，两派的阵营齐备了，决战的阁议定于14日召开。岩仓在13日夜里还邀请板垣和副岛，企图请他们两个人说服西乡，但被西乡看破了。板垣的动摇，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这样，就在两派对立的情况下举行了内阁会议。西乡派方面有板垣、江藤、后藤、副岛，反对派方面有右大臣岩仓、大久保、大隈、大木各参议。木户称病没有出席。三条太政大臣不知何去何从。

阁议的确切内容不得而知。有种种的说法，但全都缺乏史料价值。总之，前章所述的两派的主张，一定在一切论战所应有的夸张和激烈情绪之下掀起了尖锐的争论。库页岛问题首先提出来，岩仓等人主张这个问题要迅速解决，并在这期间整顿内政，充实军备和财政，确定方策和朝廷计划，然后才能图谋朝鲜，并且肯定会攻击了西乡计划中的极其草率之处（10月23日岩仓的上奏文）。

这一天没有决议，次日15日再次开会。西乡没有出席。这也是西乡的某种软弱面。板垣、副岛两人坚决主张按西乡的预定计划行事，大久保激烈反对。大久保的反对要点已如前述。他除了论到政府会因外征濒于危机，还谈到下述各点：他说日朝之争只会使俄国收渔翁之利，虽然副岛说他同俄国公使布策已有谅解，然而指望这种谅解是非常错误的。国内尚且不能废除不平等条约，哪里有暇外征。纵令占领朝鲜全部领土，如果它的人民四处蜂起，数年内将疲于治理，其费用整个朝鲜也不足补偿。至于向朝鲜派遣使节，等对方杀害后对它进行讨伐，这种作法本身等于承认现在没有重大理由，必须放弃一切内政而讨伐朝鲜。不顾国情擅自发动事变是万万不可的。他的舌锋非常尖锐。这种堂堂的议论，恐怕任何人也无法从正面加以反驳。

双方争执不下，暂时休会。这时，三条和岩仓协商后，终于作出决定说：“问题重大，实与西乡进退有关，不得已按西乡计划行事”。这是因为西乡背后的军队和士族起了作用。于是，大久保表面上决心辞职，17日前往三条官邸，提出辞呈。木户，大隈，大木等人也都一起提出辞呈。不过，他们并非真正就此罢休，而是暗中策划反击。

17日是上奏内阁会议结果，请求批准的日子。可是，岩仓写信给三条说：“反复思虑，果如尊意，则天下大事去矣”，便称病没有出席内阁会议。到会的只剩下征韩派了。西乡声色俱厉地要求三条迅速上奏。三条说，必须等待岩仓诸人进宫，要求给予一天的考虑，西乡等人允许了。这一天是多么重大的一天！那天，三条整日烦闷懊恼，18日拂晓，突然发病，不能进宫上奏，三条也向天皇提出了辞呈。

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黑田清隆等人认为这是大好机会，便奔走于岩仓、大久保、木户之间，要求他们奋起，企图推翻前议。

大久保发挥了他所特有的谋略，19日，他说：“事到如今，虽再无挽救之法，但唯有一个秘策”。他把这个秘策传授给了黑田。黑田马上跑到宫内少辅吉井友实那里照计行事。第二天，即20日，天皇亲临三条家中探病。然后又幸临岩仓邸宅，命他代理太政大臣。这是多么高明的秘策呀！岩仓、大久保等人互相勉励，更进一步施展了这个“秘策”。岩仓对宫内卿德大寺实则也有所委托。然而，在这一瞬间决定永远的重大日子里，西乡派却无所事事，22日，西乡、板垣、副岛、江藤来到岩仓邸宅，要求岩仓迅速上奏阁议决定的事项。岩仓说，我和三条不同，我有我个人的见解，坚决不接受他们的要求。江藤说，代任者只能忠实地实行原任者的主张，但法律论在这时候是行不通的。就西乡派来说，如果他们坚信征韩是为国家着想的唯一的、最高的、不可缺少的措施，那么为什么不

在8日的阁议决定后马上向人民公布,促使人民的决心,要求人民协助呢?即使动用军队一事不说,而只是派遣使节,这有什么可以保密的呢?他们如果这样做了,岩仓、大久保的“秘策”可以粉碎,江藤的法律论也不至于当作无谓的理论根本不予理睬。由于西乡派的阶级本性,他们这样做不来。大久保等人当然也不能诉诸于人民,但他们的“秘策”却有指使天皇一手,而西乡派连这一点也不能。

23日,岩仓上奏反对阁议决定事项的个人意见,得到了批准。西乡马上提出辞呈,次日,板垣、后藤、江藤、副岛也都请求辞职了。

第二节 官僚独裁政权的确立

大久保达到了目的。他最初尽量让西乡言所欲言,使事态发展到进退维谷的地步,实际上是使征韩派和征韩论同归于尽,在政府内失去立足之地。政变后,他在寄给税所写的信里写道:“事已至此,较量结果,不是完全失败,就是完全胜利,不是使他们放弃主张,就是我们放弃主张,二者必居其一。这种局面早在预料之中,所以千思万虑,肝胆欲碎,不敢轻率进退,然而迫不得已的机会终于到来。正如刚刚当上舞台监督,一幕未终,舞台就已经塌了”。所以,大久保在政变后再建政府时,表现出惊人的活跃。

大久保在10月24日已经同岩仓、大隈、伊藤等着手铨衡阁员人选,主张参议兼卿(即行政各部长官),得到了赞成。这件事是大久保从1870年10月官制改革方案以来的宿愿。政府首脑的实权因此得到增强。这样就不是把参议当作对实际行政生疏的政论家,而是使他成为官僚制度下有效率的名副其实的长官。这个提案第二天马上就实现了。西乡、板垣等人的辞职迫不及待地被天

皇照准了。不过，西乡的陆军大将职衔不准辞掉，并且命令他们大家在京候旨，而大久保等人的辞呈退了回来。大隈就任参议兼大藏卿，大木乔任就任参议兼司法卿，伊藤博文、寺岛宗则、胜安房三人新任参议，分别兼任工部卿、外务卿、海军卿。

大久保立即着手设立他准备已久的内务省，10月27日，吉田清成已经向大久保提出内务省的官制草案。数日后，11月10日，内务省成立，参议大久保自己兼任内务卿。

另一方面，10月23日，随着西乡提出辞呈，萨摩出身的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篠原国干等多数军官也都一起提出辞呈，西乡和桐野没有等待照准就突然离开东京。从这时起，三条、岩仓等人最担心的萨派武官和近卫兵的动摇日益激烈，虽有萨摩出身的野津镇雄少将等人极力慰抚，根本无济于事。

10月25日，天皇打算召见篠原国干以下十三名近卫军官进宫，亲自晓谕效忠，但是他们没有进宫。29日，天皇再次召见篠原等一百四十余名将士。可是篠原等多数军官称病不进宫。这时不得已在第二天照准了军官们的辞职。板垣曾极力慰抚土佐出身的军官，但除山地大治等少数人以外，将近四十人辞了职。这样一来，近卫军几乎快要垮了。无怪乎木户孝允说：“大凡军官插嘴过问政治，乃是其国之耻，其人之耻。如此则政府不成其为政府，军官不成其为军官，令人不胜慨叹”。又说：“在这种情形下，即便如何企求文明，也办不到。当时的情况完全是一种野蛮状态，令人慨叹不已”（致田中光显及森寺常德的信）。

不过，木户、大久保等人一开始就胸有成竹，因为他们正在根据征兵制建立新军。山县有朋负责用新军来重建近卫军，11月中旬，已经完成预定的编制，可谓神速了。

中央政府和军队的重建，完全告成。然而主张内治为当务之急的大久保政府，其第一个施政方针，并不是确立人民的自主自由

和民主主义的方向，以求休养民力和奠定国家独立自主的根基。1874年1月公布的内务省官制中规定“管理国家安宁、保护人民的事务”，以警保局和劝业局为骨干，总管现在的内务、农林、商工、邮电等各部的事务。

在创设警察制度方面，作为大久保的亲信大肆活跃的大警视川路利良说：“束缚就是保护”。为了束缚保护的目地，大久保早在1873年10月19日为推翻征韩论而奔走时就发布新闻条例，压制批评政治，1875年又加以修改，重新发布谗谤禁令，开始了比封建时代还严厉的言论压制，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文字狱。

另一方面，劝业局和伊藤的工部、大隈的大藏省以及黑田清隆的北海道开拓使等机关，大力发展所谓殖产兴业，在建立官营工厂和开发农业等方面投入巨资。不久后，这些工厂几乎等于毫无代价地卖给勾结政客的商人了。其中最使世人吃惊的，是1881年北海道国有财产的处理事件。要把一个国家投资一千四百万日圆巨款的企业，仅仅以三十万日圆出让给萨摩出身的勾结政客的商人五代才助，而且三十年分期偿还，不取利息。这件事由于人民强烈反对，终于没有实现，但一般都是这样情形。

1874年以后，保护三菱公司给以数百万日圆巨额公款，说是为了“谋求发展我国海运事业”。不错，由于这种保护，从日本近海和上海航线上排除了外国轮船，但是，三菱在海运方面的垄断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了我国航海业的健全发展？以及由于这种垄断而不合理地提高运费，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了我国工业的发展？这是万人皆知的事。所谓殖产兴业，结果不外乎培植了官商财阀。关于井上馨经营的先收公司（后来的三井物产），就连井上的前辈木户孝允都说：“日本人瘦，而先收公司独肥，弟所不喜者也”（明治七年九月十五日致杉孙七郎等的信）。

另一方面，与这种殖产兴业政策相关联，在华族和士族家禄的

偿还问题上,还更进一步打击了士族派。

家禄的偿还问题,从1872年2月以来,大藏省就在进行准备。这时募集外债已经成功,取得了偿还基金,同时士族派的参议完全退出政府,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于是大久保政府赶紧在1873年11月着手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想对家禄实行课税。

然而,政府内部被称为最进步派的木户孝允对此激烈反对。他说:“今日各部中丢失二百余万元的巨款,人民尚且不知(想系指山城屋事件或三谷三九郎事件等而言),而对贫民的各项课税之甚严,弟等于情不忍也”(11月30日,致伊藤博文的信)——这段话不是他反对地租的严酷,而是他反对对士族家禄课税的书信中的一节。

木户自命为人民的保护者,从1873年9月起直到他下野前后,他的日记和书信里不断出现“政府事事虐待人民”,“人民不堪司法的压制”等等的话。然而,他所说的人民,主要指的是士族,他把农民、经营工商业的一般国民叫作“无知的小民”和“顽民”。在这些地方,他与西乡之间没有本质差别。西乡读了福泽谕吉的著作后也说,他“顿开茅塞”了。下野后,在萨摩的赏典学校里也聘用外国教师。然而,当时所谓文明、进步,是要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彻底清除封建的压制和剥削,确立国民的自由民权,把土地交给劳动农民,使人民自由兴办企业。假如不这样,而仅仅引进欧洲的官制和机构,那就不过是装饰文明的外形而已,或者可以说是用文明手段实行封建专制,因而是比封建时代更残酷、更巧妙的专制。

尽管木户激烈反对,但如果不偿还坐食国家岁收三分之一以上的寄生者的封建特权的家禄,官僚政府的财政也就难以确立,而且进一步去剥削人民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于是1873年12月正式公布课家禄税,同时,允许家禄不满百石者“奉还”家禄,对奉还者发给现款或公债作为产业资金。由此开始,1876年(明治九年)8

月公布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令，华族和士族的家禄，终于全部强制改为公债，而这种公债通过自由买卖转化成了现代资本。在这期间，中下级士族的公债大抵被商人赚去了。政府在1876年8月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果断态度，是因为这时根据征兵令建立的新常备兵制已经确立，从上一年的2月起，已经能使“壮兵”即士族的志愿兵复员，在军备上也有了自信。

政府就这样脱离人民的各个阶层，遭到人民的反对，因而后来政府内部的对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木户孝允把西乡、板垣等人逐出政府以后，不久便与大久保反目，1874年4月下野。政府可能因为失去西乡，感到对反动士族的威权遭到削弱，便邀来最大的保守顽固派岛津久光做内阁顾问，后来又任命他做左大臣，但却发生久光弹劾大久保的事件。1874年末，板垣的民选议院运动有了迅速发展，政府更加动摇，终于在1875年(明治八年)初，大久保、木户、板垣等人在大阪会面，举行所谓大阪会议，结果成立了三者联合政府，暂时得到妥协。但是，不久又继续闹起纠纷，板垣又与岛津久光同时辞职。在这些过程中，以大久保为中心的所谓萨长藩阀的“有司专制”——天皇制的官僚专制，却日渐加强起来。1878年(明治十一年)大久保在纪尾井坂被暗杀后，伊藤博文成了他的接班人。当时始终袒护大久保的天皇侍补佐佐木高行曾说：“在岛田一郎等人暗杀大久保的斩奸状中说，今日的日本政治，上不出于圣旨，下不听从人民公论，仅由数名显要官吏臆断擅专，这完全是事实”(《明治圣上和臣高行》)。

征韩论的分裂，西乡、板垣的败退，正是为这种官僚独裁的确立铺平了道路。至此，官僚才在他们自己建设的新军队和新警察保护之下，把自己搞成绝对主义的官僚了。

第三节 征韩派——士族军国主义的去向

官僚政府战胜了士族的征韩论，确立了绝对主义的官僚独裁。另一方面，征韩派也进一步分化，各自回到他们本来的立场上。

板垣退助等人开始搞起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背景和社会基础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人民反对“有司专制”和争取土地革命。征韩论争达到最高潮的1873年，也正是人民起义达到顶峰的一年。民众的这个反封建斗争，使得改良主义的反政府派——板垣等人走上了自由民权运动。

关于这个运动，不得不留待将来再谈。不过，我要在这里指出，这个运动中在对外政策方面仍然有征韩论的一股暗流。不过，这并不是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民众的要求，而是领导这个运动的板垣等人作为民主主义者不够彻底的反映。

真正的征韩论者西乡等人，连形式上都没有参加这个自由民权运动，这也是他们立场的必然结果。西乡以下的桐野、篠原等西乡派文武官僚六百余人陆续回到萨摩，创办私立学校作为他们朋党的统一机关，开设附属的炮队学校，还在首邑和各乡镇设置一百三十多所分校，召集幼年或少年，加以训练并教给武技。当时称为幼年学校、专门学校或赏典学校的，是依靠西乡等各士族的赏典禄^①来创设的学校。这些学校俨然形成一个大兵团、私立的士官学校，或议事所。

他们就这样以萨摩、大隅和日向的一部分地区（即旧萨摩藩领地）为根据地，私自拥有武器和军队，禄制也依旧不改，完全不听中央政府的命令。尽管他们主观上声称这是为了准备在国家危急时行动起来，但明治十年西南战争时，我国并没有外来的危机，国内

^① 明治维新时，授与有功的公卿、诸侯、士族的家禄以外的俸禄。——译者

也没有濒临破裂，所以西乡等人没有正正堂堂地提出一个为天下国家而起兵的正当理由。他们只是含糊地说有事要质问政府，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的举兵才使国家陷于危机。萨摩的西乡和他的一伙恰恰和中国辛亥革命后各地的军阀政权是一样的。

演变成西南战争的愤懑不平的士族的一系列叛乱，与其说是征韩论的影响，毋宁说是征韩论的必然结果，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游移的。1873年10月，征韩速行论虽然一度在政府最高会议上失败了，但征韩征台的议论反而在士族中传播开了。

1873年11月间，据木户观察是“一般人对征韩论谈论得很热烈，已经蔓延到此地，事态十分严重(中略)，各报也论述不平，虽然性质有天壤之别，但对征韩及其他不平者是莫大的鼓舞，恐怕非陷入一场大乱不可了”(木户致井上馨的信)。

1874年1月14日，征韩论者高知县士族武市熊吉等九人认为：“征韩之事，庙议已决，独岩仓右大臣等有异议，因而变更庙议”。因此，非除掉岩仓不能达到国家的目的。他们在赤坂的岔路口袭击岩仓使岩仓受了伤。

在同一时期，佐贺县士族也有所策划，中岛鼎藏、朝仓尚武等人在佐贺纠合同党，征集武器、金、谷，在旧藩校弘道馆设立“征韩先锋请愿事务所”，企图迫使政府实行征韩。他们一度请求萨摩的西乡领导，西乡不允——想来，他可能认为时机不到——于是便想邀请乡党的前辈江藤新平。原来，江藤的行动是前后矛盾的。他虽然是个有才干有手腕的人，但可以说，因急于追求地位，结果丧失了理性。下野后，暂时住在东京，同板垣等人的爱国公党运动也曾有过联系，但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愿。因此，他一听到中岛等人的期望时，也就不听板垣再三劝阻，还是在正月回乡，当了征韩党的首领，并且联合岛义勇等人的忧国党——反对政府文明开化政策的封建主义最右翼。他还企图联系萨摩的西乡、长州的前原一诚

以及附近各县的士族，没等联系上，就在2月1日掀起了暴动，18日驱逐县令，占据了县署。近乡士族接着也来参加，达四、五千人，2月18日占据了佐贺城。

江藤叛乱的消息传到政府后，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似乎反而认为消灭士族派的良机已到。他说：“要当机立断，采取转祸为福的措施”（致木户孝允的信）。他强烈要求授给自己兵马和司法的全权，前去镇压。他在福冈设立大本营，以大阪的镇台兵为主力开始讨伐。3月1日，就大致平定了叛乱。江藤于2月23日离开阵地，逃往鹿儿岛，投靠西乡，西乡没有收容他，又逃到土佐，希望投靠林有造等人，但也没有达到目的。3月29日在土佐东面的甲浦束手就擒了。

另一方面，政府于2月23日推东伏见宫义彰亲王为征讨总督，以山县有朋为参军，领兵西下。亲王于3月14日来到佐贺。于是大久保认为军事及对叛乱者的处罚等问题，全都属于亲王的权限以内，并把自己的全权移交给了亲王。大久保假借亲王名义，担任审判江藤等人工作，硬把江藤和岛义勇判处当时我国法律已经废除的封建时代的极刑——梟首。

江藤的叛乱和大久保的审判，究竟哪一方面更反动，这是很难立刻断定的问题。当时立法和司法都由政府随意操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然而，外国人指摘我国审判制度太野蛮，以此为口实，不肯撤销治外法权，使我无法辩驳，不能恢复主权。

总之，佐贺之乱很快就平定了，并没有象“当此九州人心动摆之时，此举究竟影响如何，殊难逆料”所说的那样值得担心（大久保利通致三条实美的信），1874年得到了暂时的平静。当然，这一年的平静也是因为另有侵略台湾之举，人民的注意力转到国外的缘故。

1874年总算平静地过去了，1875年也因为朝鲜江华岛事件，

日朝关系紧张起来。士族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外去了。1876年(明治九年)日本成功地把不平等的修交条约强加给朝鲜,没有发生战争。另一方面,同年3月,政府下令废除士族带刀,8月又终于废除了家禄,士族阶级因此骤然受到冲击,相继爆发了10月的熊本敬神党之乱、秋月之乱、荻(长州的城邑)的前原一诚之乱。敬神党暴动的直接动机是对废刀令的不服,秋月党是因日朝条约没有把朝鲜划归我国属国的直接不满。前原等人还以江华岛事变为良机高唱征韩论。三浦说:“偏激之徒见机实行血盟,或刺血签名以誓师;虽假征韩为名,但其血盟或刺血签名的意旨何在,殊属可疑”。这是以征韩为名,全面反对地税改革、库页岛和千岛的交换、士族处分等而掀起的暴动(三浦芳介致木户孝允的信,《松菊木户公传》)。

在这种总的形势下,1877年2月,发生了最后的、但也是最大的士族叛乱——西南战争。由于这一战争,原来的征韩党全都受到了处分。

当然,并没有因此放弃了征韩论或大陆侵略论。它们在同内治政策密不可分的关联下,一直存在了很久。1877年(明治十年)创立的玄洋社,以及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1月由玄洋社创立的黑龙会,在种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西乡等人的征韩论的直接继承人。在他们孕育下,还陆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团体和党派。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的纲领也多少有些变化。例如,黑龙会的纲领甚至还标榜出立宪主义来。既然不满官僚政治,到了1900年,也只好标榜立宪主义了。但是,黑龙会的本来目的,是西乡式的武政级现代化。尤其从它的名称可以看出,它的目的就是要把侵略矛头推进到黑龙江畔。

西乡的征韩论就这样活了下来,而且成了大久保政府所推行的、比西乡更会盘算的新军国主义的一支别动队。

第四节 新军国主义

西乡等人及其承继者们攻击官僚政府外交上软弱，在对欧美关系上的确应当受到这种责难。正因为这样，它才对朝鲜和中国大陆方面强行侵略而决没有放手。

因为在征韩论发生争论时，大久保主张迅速解决库页岛问题，他在1873年10月28日便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失败了，对不起前任各参议”，因而他要求“库页联合审判及边界谈判之事，不得违背前议”。经过几次内阁会议之后，决定派遣一贯主张放弃库页岛的黑田清隆所推举的榎本武扬为使节前往俄国，同年3月，在谈判要领的第二款和第三款时，指令榎本以千岛交换库页岛（《日本外交文书》七）。榎本于1875年5月在俄国首都签署了交换条约。

同时，政府也讨论了朝鲜和台湾问题。1874年1月，岩仓被征韩派士族袭击以后，愈加感到有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便以大久保、大隈为中心，进行了有关中国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调查，并邀请美国人李仙得商议征台的方策。

2月初，大久保等人提出一份“台湾蛮地处分要略”，大意是：“台湾蛮地”可以看做是清国政权达不到的无主土地，“对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进行报复，乃是政府的义务”，“讨蕃的公理，也可以由此得出根据”。如果清政府认为琉球是中国的属地，对这种议论可勿深入，如果提出蛮地^①是清廷领出的议论，“可以一面拖延时日，一面以完成当前紧急任务而不失和的策略”与之交涉。可见，虽说台湾是无主之地，但也无占领的决心。

这种不彻底的战争目的，恰恰说明主张内治是当务之急的大久保突然计划外征的根本动机。这完全是由于萨摩出身的大久保

^① 指台湾。——译者

为了慰抚西乡派及一般的征韩党，转移自由民权的舆论而定下的策略。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承认的定论，我也没有异议。当然，这不仅不能转变国内局面，同时虽然当前还不能把占领台湾作为目标，但当前可以确保琉球，等到有朝一日，“清廷萎靡”，“清廷显然没有余力袭击我国，我则有恃无恐”，梦想趁着这种情况，迈出“在亚洲大变动中奠定霸业方略”的第一步（柳原前光书信，〈大久保文书〉五）。

木户痛斥一面主张内治为急务而又突然计划外征的作法。他严斥陆军大辅西乡从道的极不负责的说法：“征讨费有五十万元就足够了，如果超过，愿意引咎切腹”，他说：“这样重大事件，竟以死为誓，言者野蛮，听者亦野蛮，非堂堂政府所为。孝允不能以西乡之死谢苍生”，又驳斥说：“大凡战争，首先应考虑本国人民之利害得失”，结果辞掉了参议职务（致榎村正直的信，9月17日）。

2月6日，决定派遣台湾远征军，后因佐贺之乱而延期。4月，西乡从道中将任征台事务都督，以美国人李仙得和卡赛尔为顾问，租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轮船，率兵三千六百名在长崎待发。

然而，这时一向热心援助日本政府侵略中国台湾的美国公使德朗归国了，后任的平安刚刚到任，不了解情况，便于4月18日宣布保守中立，拒绝李仙得等人担任顾问和租借轮船。英国也接着同样宣布中立。

大久保等人因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连运兵的船只都没有充分准备，因而此时火速命令西乡都督中止征台，但西乡不听政府命令，已经擅自率领大部队出发了。于是，大久保不得已火速派公使柳原前光前往中国，说明此举对中国毫无敌意，求其谅解。当时木户派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登载一首讽刺歌：“夕阳下，远眺琼浦（长崎湾），不听君命，帆船已出。听，人民在哭，人民问，都城内名将有无？”

远征军从6月1日起开始进攻牡丹社，转瞬间迫使投降。但这并不足以自豪。从前，李仙得曾以一小队兵就迫令这个牡丹社降伏了，而这时则派去三千大军，未免小题大作。

另一方面，柳原同中国进行的交涉毫无进展，甚至发生中日间开战的危机。为了收拾残局，大久保亲自出马了。1873年以后，大久保的活动是值得惊叹的。据我看来，他可以算是日本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的封建的或者资产阶级的政治家。

大久保于9月10日抵达天津，经过数次谈判，几乎濒于决裂，后来经驻华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才勉强打开僵局。清廷承认日本的征讨“台湾”是“义举”，不是赔偿战费，但付五十万两银子，作为抚恤遇难的琉球人遗族以及接收日本在当地的设施的代价，日本则立即撤兵，10月结束了谈判。虽然日本的出兵被认为是“义举”，但说“蛮地”是“无主之地”的日本主张被否认了，确认它是中国领土，同时也可以说清政府承认了琉球是日本的领土。

征讨费花了约七百七十一万元，其中包括因征讨而购买轮船的代价四百一十万元。而这些轮船后来全部借给三菱公司，非但不收租金，而且还搭上了修理费。政府由于这次征伐，痛感要达到侵略海外的目的，必须拥有大批轮船。因此，把经济上的目的放在第二位，只是计划迅速创办大轮船公司。这就等于创办预备海军。

大久保于11月回到东京。西乡隆盛派的报纸攻击征台失败，自不待言。就连岩仓具视本人也对这次战争，内心感到羞愧，他假托局外人责难说：“对清廷的关系既然知之不详，而竟茫然上奏，说交涉程序和规划已经完备，军队已抵国境，临到行将开往台湾，英美两国公使提出异议，又想骤然停止出师，上则陷圣断于轻率，下则毁损国威，内则引起物议纷纭，外则招致他国诽讥，可谓有失体统矣”。

征台后一年，即1875年，终于开始正式侵入朝鲜。我们先看

看当时的国际环境。

巴夏礼的传记、英国人布拉克的《年轻的日本》、前英国公使馆员芒泽在1879年(明治十二年)著的《萨摩的叛乱》、美国人格里菲斯的《皇国》等等,凡是我能看到的当时旅日外国人的日本评论,都简单地认为征韩论是为了转移士族的不满情绪,唯有芒泽除了这个论点外还说日本想抢先俄国占领朝鲜。大概这就是外国的一般看法。因此,看不出征韩论对他们的东洋政策及对日政策发生任何影响,倒是他们的政策影响了征韩论。

从日本政府方面来说,是打算利用欧美各国的矛盾,而欧美各国也各有打算,明知日本有征韩之意,而暗中援助,企图借此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上述的副岛与德朗或布策的关系,大久保逗留中国期间,驻清英国公使再三劝他侵占朝鲜等事实,都足以说明这种情况。如果目的只在于朝鲜的开口通商,即便日本率先使用强制手段,这也是英、美、俄等所希望的,不至于发生象始终参划征台的李仙得所说的“征台时,平安在长崎恫吓大隈,威妥玛在北京威胁大久保”那种事情(《国家学会杂志》第五十一卷五号,堀真琴《关于美国人李仙得的建议书》)。

征韩论对它的对方国家——朝鲜和中国起了什么影响呢?日本的征韩论自从幕府末期以来就流传到了中国和朝鲜。清朝的恭亲王和朝鲜的大院君都对日本深怀警惕。1873年前对韩交涉之所以没有进展,其理由之一,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日本有征韩野心。1873年的征韩论是否直接对中国和朝鲜发生特别影响,没有确切史料可以肯定。但是,由于副岛前往中国时曾经提到朝鲜问题,又兼横滨的外国人经过上海、香港把西乡的征韩论传到了中国,因而清政府和朝鲜对日本愈益提高警惕,这是很可能的。

尽管如此,对清朝和朝鲜,以及对欧美发生巨大影响的,还是对台湾的侵略。外国人认为由于台湾事件,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

告，说这里有个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裕的帝国”，外国人看到这个广告，因而更加促进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在阿礼国的传记里就是这样叙述的，他是侵略中国的祖师、英国的驻日和驻华的公使。（The English man in China, Vol. I. p. 256）。

由于台湾事件，当时驻华英国公使威妥玛强逼中国说：“中国如果不忠实履行各项条约，外国人将不能对中国抱更大的同情”，这就造成清廷深深依靠英国的机会（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fficult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Regard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Blue Book, 1874, 11.6. 威妥玛致英国外相的报告）。

征台对很久以来警戒我征韩的朝鲜说来，是一个直接的示威。在这以前，朝鲜在大院君的连年暴政下，国内骚然，韩廷居然有人公开弹劾政府的弊政。国王高宗乘机与王妃闵氏一族计议，在1873年11月罢免大院君，开始亲政，多少缓和了排外主义，罢免去东莱府使郑显德，对草梁倭馆也多少有所尊重。朝鲜的这种变化，由草梁馆的奥义制报告了我国政府。我政府于1874年5月派外务省官员森山茂前去探查情况。

在这期间，因主张征韩而发生的佐贺之乱传到朝鲜。6月，中国把日本出兵台湾之事通知朝鲜说：“日本尚留五千军队于长崎，欲在台湾撤兵后立即征讨朝鲜。朝鲜与法美两国，前隙未解，法美必以武力援助日本。朝鲜敌不过三国，如中国能使朝鲜与法美两国订约通商，则日本便势孤不敢动兵，朝鲜也得以保全”。

朝鲜“半信半疑，满朝动摇”。当即复启清廷，吁请“晓谕”日、法、美三国，勿妄动干戈。大臣李裕元、朴珪寿等人上奏国王，言交往阻隔之弊，皆因大院君妄信训导安俊卿等之言，并论及不可因书契违背体例而阻隔邦交。因此，国王惩罚了前庆尚道观察使和郑显德、安俊卿等人。一方面，朝鲜政府秘密致书森山，通知有接待

日本外务省官员之意(《李大王朝史》)。

森山即刻报告到外务省,政府于8月20日欲派旧对州藩主宗重正为外务省官员前往朝鲜,没有实现。9月3日,森山初次与新任训导玄昔运会见,责备朝鲜前年以来不接受日本国书,玄昔运对这个责难略表承服,于是有了开始交往的征兆,森山于10月回京述职。

1875年2月,政府派森山为理事官,广津弘信为副理事官,携外务卿和外务大丞的书契前往釜山。这时外务省给森山的指示是:“不论朝鲜自称独立国家或承认是清朝属国,如果它愿意以我太政大臣与该国王、我外务卿与该礼曹参判为对手,修复旧好,即可同意”。可见,本来就没有打算对等交往的意思(菊地谦《近代朝鲜史》)。

森山抵釜山后,立即进东莱府要求呈递书契。朝鲜中央政府接到府使黄正渊的紧急报告后,本想决定接受,但府使又向中央报告说,森山等人于宴席间穿着西服,书契亦与已往体例大异,请求中央再予指示。当时大院君虽已隐退,但他在朝鲜政府中的势力仍然很强,而且由于传说我国将要征韩,所以态度更加强硬。朝鲜中央政府举棋不定,只对府使下了一道含糊其词的命令,命他取其可取,舍其应舍(《李大王朝史》)。这样一来,又发生了1873年前的同样纷争。广津于4月归国,建议在朝鲜排外派尚未再次猖狂以前,“当即派军舰一、二艘,在对州与彼国间往返巡逻,忽隐忽现,测量海路,使其莫测我方用意所在,而朝廷则时时表示督查我理事官迁延情况,以使我有逼迫彼方之辞”。

根据这一建议,5月末,日本军舰“云扬”开入釜山,“第二丁卯”舰亦继续开来,大举示威。9月,“云扬”测量朝鲜西海岸,驶抵江华海面,20日,溯航汉江停泊永宗城附近。据日本方面声称,突然“遭到朝鲜炮台的炮击”。然而,这“对海军当局说来,正是预定

计划实现了，不足为怪”(《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既然日本军舰擅自深入别国领土，任意挑衅，那么朝鲜方面对此加以炮击，本是当然的事。日本政府打算抓住这个机会，一举达到多年以来的目的。据木户的日记明治八年十二月七日载：“朝鲜江华事件之所以爆发，亦是几年来的困难局面被抑制到今天的结果。然而左大臣(岛津久光)却建议，要今日之政府一变而从事外征朝鲜云云，则军队及士族显然对此皆有附会之势。果如此，恐将悔之不及，政府对朝鲜若无一定目的，难保不四分五裂。故余请舍此一身，以当其责，肩负困难。然十有八九不能如愿以偿”云云。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事件的由来和政府内部的情形。那么，木户、大久保等人究竟对朝鲜抱着什么样的“一定目的”呢？

《大久保利通文书》的编者把大久保向岩仓提出的“朝鲜意见书”这一文件说成是他在1873年(明治六年)10月征韩论争时提出的。这是编者的错误，我们可以断定，它是1875年10月江华事件时的意见书(考证从略)。

据这一文件载，大久保说，关于派遣使节赴韩进行谈判，必须确定“诱导朝鲜开化或使朝鲜屈服于我，予以吞并”中以哪个为目的。岛津左大臣和士族军队主张征服和吞并。与此相反，大久保等人则如上述意见书中所说：“命令聘用的法国人布阿索纳德研究公法，详细进行调查，以及研究通知各国公使的手续”等等，认为不能不顾虑到国际关系，况且他们去年主张的加紧整顿内治的根本情况，今年并未好转，因而决定尽量避免战争的方针。不过，这并不等于“诱导朝鲜开化”，只是推迟了武力侵略。

于是，派参议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派当时在野的井上馨为副大臣，前往江华交涉江华“暴行”的赔偿和签订新通商条约的事宜，并将此事通知外国公使。这样，暂且以和平为主，但对使节们则预先指示说，如果谈判决裂，“告以我国政府将另有办法，

表示坚决态度,迅速回国”。一方面命令政府的法律顾问布阿索纳德研究国际公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并且加紧朝鲜征讨司令官及师团长以下远征军的编制,准备发给司令官的任命草案和诏命草案。陆军卿山县有朋亲自率领大军前往马关待机。归根结底,侵略的目的并没有放弃,只是办法比西乡等人更合理,更有计划。

西乡称作“三井的店伙”的井上馨被派为副全权大臣,三井从1873年前后已经打进朝鲜,特别是全权大臣的使命与1873年西乡派遣使节的目的略有不同,还有签订通商条约条款,由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这是我国资本主义在逐渐发达的反映,但强行侵略朝鲜的根本推动力,并不在于经济,而是在于政治和军事。这一点按事件的全部过程看来是很明显的。

黑田全权大臣一行于1876年(明治九年)2月10日在江华登陆,经过数日谈判后,于27日,双方全权代表签订了日韩修好通商条约。这次谈判的经过和朝鲜政府对这次交涉的内部情形,这里从略。总之,派去的军舰起了作用,同时清廷的李鸿章也劝朝鲜议和,所以国王压服了大院君一派的主战论。

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国家,与日本国保有平等之权”。这一条使日本的征韩派大为不满,但是政府方面则是想为了首先明确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以便造成将来日本使朝鲜“属于我国”的前提条件。第十条规定,日本对朝鲜享有治外法权,而这种治外法权正是当时我国要求欧美诸国废除的东西。日本方面提出的方案中本来还规定了最惠国条款,但朝鲜方面主张因为日韩有悠久的友好关系,所以才特别只同日本签订这项条约,同其他国家绝对不签订这类条约,因而没有规定最惠国条款的必要。因为这也是实际情况,所以日本全权代表也暂时表示同意。接着,又于8月签订贸易章程,根据它的附件,数年内,进出口都不征关税。这样,也有了对自己有利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还垄断了对朝鲜的贸易。

于是,中日两国围绕朝鲜争夺霸权的纠纷开始萌芽了。六年后,1882年7月,借着所谓“壬午之变”的机会,中日两国军队一齐进驻朝鲜,形成了对峙局面。

此后日本侵略朝鲜的经过,这里不能叙述。那种侵略总之一直延续到1911年吞并朝鲜为止。

这种一贯的侵略政策,势必加强军部的势力。早在1879年,军部就提出了“统帅权独立”的问题,并且得到实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十用于军事费用。单是这一件事,就使军部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压力和控制力。西乡等人的征韩论和封建士族的军阀被打倒后不到十年工夫,新的天皇制军阀和军国主义便强有力地在日本成长起来了。

第二篇 甲午战争和 日俄战争的性质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第一章 甲午战争的本质

第一节 谁是主角

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石川旭山和幸德秋水，在1907年曾这样写道：“甲午战争还不能说是由于资本家的觉醒而爆发的。不能说它是由于资本家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日本社会主义史》，《明治文化全集》社会篇所收）。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计划、准备和发动甲午战争的主体，不论在表面上或在实质上，都是绝对主义的天皇制。资产阶级在这个战争中被动员起来，也尝到了不少胜利果实的美汁，但它并不是战争的主角。

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处在依靠天皇制的扶植进行产业革命的阶段，资产阶级还没有能够支配国民经济。现代大企业，除了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以外，矿山、铁路、海运以及纺纱业还刚刚开始，而且铁路、海运方面的企业，还接受了天皇政府所给与的军事警察的任务，因而在大力保护下被培植起来。甲午战争前，海运业实际上还没有摆脱官民合办的性质。矿业也被那些受到政府大力保护的政商——三井、住友、古河和稍后的三菱等企业垄断了。就连纺纱业也不是从民间许多大小产业资本中自发成长、通过自由竞争发展成为大企业的。一开始就是由享有特权的政商在政府的保护下

开办为大企业的，并且压垮了其它企业，因此反而阻碍了自发的工业资本的发展。与此相反，当时最大和最重要的生丝生产，却没有超出小规模工场手工业方式的规模，手缫丝占产量的一半。国民百分之七十还是农业人口，农业中半封建寄生地主制正在迅速发展。国家财政大部分依靠土地税收，其次靠间接消费税来维持。所谓土地税收，主要是国家通过地主的封建佃租剥削从佃农手里间接夺取的税收，以及国家以半封建权力为后盾，从自耕农手里直接夺取的税收，而间接消费税也是大部分由劳动农民负担的。这两种税收总额，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约占国家经常岁入百分之七十一弱，占租税收入百分之八十七。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国家财政下培育起来的。这些事实表明，在甲午战争以前还不是天皇制依赖资产阶级，而是相反，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在依靠天皇制。

因此，大商业资产阶级从天皇制成立初期起就在政治上同官僚密切结合，从而成为“政商”；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分别从国家手中捞到莫大的保护，同时，他们力求把整个国家的经济财政政策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但是，他们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给天皇制以重大影响。1890年成立了帝国议会，但是，资产阶级在贵族院是不消说了，即使在众议院也还没有支配力量。1900年修改的选举法施行以前，三百名议员名额中，城市议员还不到二十名。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得不对议会的地主性质进行攻击说：“帝国议会也是地主议会，地方议会也是地主议会”（田口卯吉），或者说：“土地的所有者就是权利的所有者”（《国民之友》）。然而，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势力大小，不能单凭城市议员人数的多少来判断。尽管议会本身极其无权和受到限制，但它毕竟是日本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虽然是从农村选区选出的议员本身主要是地主的代表，但也往往同时是商业资本家，甚至也代表制丝业、酿造业等其他工场手工业的资本家。还有，

大多数议员都参加政党组织。当时人人都知道，两大政党之一的改进党的大隈重信领导的首脑部，在议会成立前就同三菱等其他大政商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本身也往往是从商业资本家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政商。当时另外一个拥有议员人数最多的自由党，是个主要依靠地主从而经常保持多数的政党，而它的首脑部虽然不象改进党那样厉害，但也和三井等其他大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1892年末，国权主义的报纸《日本》著文，攻击地税轻减案在议会中轻易不能通过时说：“看来议会是农民和商民的生存竞争的舞台”。事实上也是这样，地主的封建势力同资产阶级的现代势力在议会和政党中形成互相对抗的局面。总之，当时的资产阶级批评家说，议会完全是地主的议会，但对此也必须说，尽管地主势力在议会中占优势，而资产阶级的势力也已经达到能够与之抗衡的地步。同时，对于一部分现代学者认为当时的议会已处在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的意见，则必须说资产阶级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日本的政党，就是所谓在野的官僚——职业政治家（真正的专制官僚出身者）一面使地主的封建势力同资产阶级现代势力对抗，一面从中进行撮合把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而由他们站在上面加以操纵的组织。为了追求权势和利益，他们不惜同官僚政府、军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同任何人进行交易。

资产阶级当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仅止于此，它还不能在冒国家命运危险的大战争中扮演主角。如后文所述，日俄战争时，资产阶级公开主张为了确保满洲和朝鲜作为他们的市场而同俄国开战，军部和官僚政府也在开战前曾同资产阶级的代表反复进行协商，开战以后立即强调这场战争如何是一场争夺市场的战争。但是甲午战争时，却没有这种情况。这一点显然表明，资产阶级在这两次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那末究竟是什么情况使天皇制掀起甲午战争的呢？一个有力的说法是，资产阶级虽然在这次战争中不是主角，但年轻的日本工业资本主义从 1890 年经济危机以来就急待确保朝鲜市场，这也是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但据我对史实的分析，却不能这么说。

朝鲜市场对当时日本工业资本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甲午战争前对朝鲜的贸易，进出口都不到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百分之二。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个零星贸易出口货物种类时，可以发现，这里面几乎没有日本工业资本的制品。如果由于 1890 年的经济危机以后，纺织联合会曾大力向中国出口，因此便联想到对朝鲜也出口了棉业资本的相当量的制品，那就大错特错了。据统计，向朝鲜出口的棉制品在那个十分微少的对朝出口总额里仅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而且除了英国制品的转口之外，国产品不过是一些棉法兰绒、毛巾等家庭手工业产品，充其量也不过是工场手工业的产品，没有现代机器工业的产品。纺织资本对这个现在十分贫弱而且将来也缺乏发展余地的朝鲜市场，不论在当时还是在那以后，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那是因为纺织资本跳过朝鲜，把全部力量倾注到具有无限发展前途的中国市场上去了。当时在中国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除了纺织资本以外，还没有另外一种工业资本，急待在远东开辟市场。当甲午战争迫近的时候，纺织资本家十分恐慌和悲观，以至御用的评论家们不得不安慰和鼓励他们说：“只要打胜了仗，一切都好了”。从这些事实来看，要说因为工业资本迫切需要确保朝鲜作为输出市场而酿成了战争是说不通的。

对日本经济来说，朝鲜不是作为输出市场，而是作为稻米和大豆的输入地——粮食的来源地，而具有重大意义。这点在这以前很少有人注意。1876 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后，日本商人和政府大力推行的是采购稻米和大豆。从朝鲜进口的廉价粮食，成为这个号称“丰收之国”的日本资本主义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尽管听起来很矛盾。1889年秋季,日本的米荒,接着1890年初夏的小麦荒,引起1890年的经济危机,发生了广泛的米骚动。这个因粮食不足而引起的不安,靠进口朝鲜大米才得到解决。甲午战争前,1888年至1893年的五年期间,日本每年平均出口日本大米约六十九万石。但是另一方面每年平均要进口大米五十六万石(《米谷要览》)。出口高价的日本太米,截至1890年为止,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是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泉源,也是对地主保证高米价的一个手段。但是必须进口廉价的外国大米来供给贫苦人民食用,才有这种可能。进口廉价外国大米,也是为资本家维持低工资的一根支柱。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达,进口外国大米的需要也逐步提高。从1893年起,进口超过了出口。进口大米的来源主要是朝鲜和暹罗,尤其是朝鲜大米对日本商人来说是利润最高而且是最可靠的商品。因为暹罗大米的进口操在外国商人手里,而距离较近的朝鲜大米可以由日本商人直接进入产地,在小农困难时贷以资金,到秋季则用收获的大米来抵偿。这完全是典型的大高利贷商业资本对农民的盘剥。

对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来说,朝鲜是上述那样重要的粮食来源地。而该国政府为了对抗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压迫,依附清廷,并取得清廷的支持,便于1889年秋,在咸镜道和平安道突然禁止了粮食出口(即所谓防谷令)。尽管这种禁令实际上并不妨碍日本在朝鲜购买米谷,但早晚可能禁止出口。这件事对日本来说,是个十分不安的病根。日本政府马上威吓朝鲜政府,要它在第二年春季解除防谷令,并对它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由于朝鲜不肯轻易屈服于日本方面的这种不正当的要求,1893年5月,日本政府便暗示要用武力来解决。另一方面,驻朝鲜的日本公使不顾外交上的一切礼节,威胁朝鲜国王,终于迫使他付出拾叁万日圆的“赔款”。当时,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言人、逐渐具有实力的田口卯

吉在《东京经济杂志》上说：如果朝鲜迟迟不解除防谷令，就断然同它开战，届时清廷必然出来援助朝鲜，那就把“战争扩展到天津去”（1893年5月）。及至同年10月，朝鲜再度发布防谷令时，他又主张：日韩关系已经无法挽救，应该发动战争，以消除多年的郁结，清政府如果援助敌人，就攻击它。

如上所述，确保朝鲜作为日本稳固的粮食来源地这一要求，是非常强烈的，不过，当然不能说这就是引起甲午战争的决定性原因。总的来说，想从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要求来说明甲午战争，是把甲午战争前的一些事件同甲午战争割裂开来，单独来考虑甲午战争的想法，几乎无视了下列事实，即日本的统治者从1884年在朝鲜发生中日冲突（这个冲突用天津条约敷衍过去了）以后，就对早晚必将发生的中日战争有所准备和计划了；在这以前，1879年参谋本部的独立，也是由于预想到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发生远东争霸的大战；更往上溯，天皇制成立以来，日本一贯对弱小邻邦推行的侵略政策，也同甲午战争有着直接联系，甲午战争不过是这个侵略政策的一个决算。1884年中日两国围绕着朝鲜的战争危机，当然不能用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矛盾来说明，因为那时还不存在这种矛盾。

那么，天皇制为什么掀起1894—1895年的战争呢？天皇制所固有的侵略主义，又有什么样的客观条件呢？

第二节 客观条件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天皇制——反动的半封建的官僚和大土地私有者取得胜利，为了排除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的歧视（不平等条约）进行初期斗争，使日本采取了掠夺邻近弱小民族的斗争形式，这就开辟了走向现代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道路。”

(《1932年提纲》)。这是理解甲午战争的钥匙。

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将转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前夕，日本的经济发达程度仅仅是，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刚刚实现，孤立分散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开始分化，致使旧领主——农奴制不能原样存在下去，小商品生产有了发展，工场手工业多少有些萌芽。广泛的农民起义和市民的破坏骚动，虽然常常使封建权力瘫痪，但还没有来得及成长为一个现代的阶级，来把这些因素组织成为夺取政权的全国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被欧美列强不容分说地拖进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凭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国家的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不仅是旧封建制的危机，也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的危机。人民为摆脱这个危机而进行的努力，经历了几次内乱，打倒了幕藩封建制度，实现了明治维新。但是，这并没有马上使日本的半殖民地地位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在首都东京的大马路上疾驰的双马马车，坐着的都是外国人，日本人如果一不小心撞在马车上，车内的外国人便大吼而过，日本人即便受伤或是被车轧死，警察也只当没看见，只好自认倒霉(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这种情况是现代的民族觉悟(所谓的民族精神)正在蓬勃发展的日本人不能容忍的。那末怎样才能作到国家的完全独立呢？必须实现真正全民的“富国强兵”，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军事上，培养出足以对抗列强的全民的实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人民从封建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完成土地革命。在这样的基础上，促使现代的生产力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确立全体人民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权力以代替封建的隶属和不平等关系，在民主的国家之下，把人民的力量团结起来。人民全独立了，国家才能独立。1870年前后，“稍具见识的人都这样说”《佐佐木高行日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系统地论证了这一点。

然而，日本的现实却不是农民的土地革命取得胜利，而是封建

的寄生地主制和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胜利，不是民主主义而是天皇及其官僚的绝对主义取得了统治。这个天皇制虽然已经不能死抓住旧的封建制度，但也不能把它和日本从本质上加以现代化。它只好一方面维持封建制度，一方面不断培育与封建制度相矛盾的资产阶级的各种因素。这样，本质上属于封建的、而又是半资产阶级的天皇制的性质，既使人民中最反动的士族攻击它的资产阶级的一面，又使得革命的农民和被赶到自由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去的小资本家同声愤慨。因此，在天皇制下，非但不能团结足以实现对外独立平等的民族力量，反而相继发生了士族的叛乱、农民和市民的暴动，进而飞跃地发展成为自由民权革命运动，使得天皇制从各方面不断受到人民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制和官僚们为了对抗内部的人民和外部的列强，只好加强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这样一来，为了争取人民的繁荣和独立而提出的全民的富国强兵这一口号，实际上由压制人民的天皇制的“富国强兵”给顶替了。因此，天皇制的日本在维新后很久，还不能排除不平等条约，各个方面都屈服于强大的欧美。它只好在侵略弱小邻国上来寻求它屈服于欧美的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补偿。

当德川幕府被迫同美国和俄国签订友好条约——完善的通商条约的第一步时，攘夷主义的领导者吉田松阴说，我与两国的友好关系既已确定，就不能由我方首先违背信义，今后应当“征服易取的朝鲜和满洲”，在“贸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可以在“土地上”取偿于朝鲜和满洲，如果认为他在这里说的“贸易”这个词代表资本主义欧美在经济上、政治上及其他一切方面对日本的压力，而“土地”这个词不仅意味着封建的领土，而且包括资本（不拘商业资本或产业资本）可以追求利润的领域的意思，那么 1855 年吉田松阴的这个既屈服又侵略的政策，可以说原封不动地成了 1868 年以后由他的徒子或徒孙所领导的天皇制权力的最高国策。这个国策表现为

征韩论、吞并琉球、侵略中国的台湾、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及后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商业上的蛮横侵略,对朝鲜及其背后的中国的不断扩张的斗争。而这些表现的总决算就是甲午战争。

作为甲午战争的一般基础的历史条件,已如上述。但是,这次战争和它以前的军事冒险之所以能够发动,还有它特殊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因素。天皇制本质上是一种以半封建生产关系为固有基础的半封建权力,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长起来,旧的各种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蜕化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但没有被资产阶级的各种生产关系完全代替,仍旧保持着封建的本质。因此,天皇制是一种以这样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天皇制不能不坚决维护它固有的基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同时又不能不适应资产阶级的各种生产关系。处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世界中,为了保全天皇制的独立存在,单就装备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来说,毫无疑问,就需要不断培植资本主义的产业,也就是说培植包含其固有的种种矛盾在内的资产阶级的各种生产关系。在天皇制度下,一方面封建的生产关系由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时刻在削弱(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在天皇制下开始全面发展,决不意味着封建制的加强,而是它在资产阶级各种生产关系下不断被削弱和蜕化);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因为封建的生产关系被顽固地保存下来而难以得到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农民遭受着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尽管单位面积的产量多少有些提高,但是劳动的生产率几乎没有上升。因此,常常发生大歉收,这时生产力甚至直接遭到破坏。在剥削农民的这种基础上,为了装备天皇制的军事警察而肩负建设大工业这一中心任务的特权政商的大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自发的工业资本却因此而难以取得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全民的富强,即使用以维持和加强天皇

制的所谓“富国强兵”的富国，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办到的。因此，天皇制不得不到处寻找土地、米、金银及其他一切“物产”和“富源”，即后面所说的明治天皇所谓的“收纳”之源。为了获得这种“收纳”之源，最诱人的手段就是侵略他国。在客观上，这意味着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攫取殖民地。征韩论后的侵略政策的经济条件就在于此。天皇制之所以掀起甲午战争，其主要的经济条件也在于此。然而，对富源的这种情不自禁的渴望，由于1890年前后的日本资本主义的显著发展而变得更为复杂。例如，确保朝鲜大米的要求，既是天皇制的军事的和政治的要求，也是原始积累的要求。这种要求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同发展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激化起来，并且工业资本本身也有这种要求。总之，甲午战争的经济条件同以前的军事冒险的根据，不能完全同样看待。天皇制在这次战争中之所以胜利，不外乎日本有了工业资本的发展，它担负得起比清政府在质量上更加优越的现代的军备和战费。否则，1894年的战争最多也不过是1884年中日两军在朝鲜的对峙局面的重演，马关条约也只能是天津条约的翻版。同时，使战争成为可能的力量，反过来也起着发动战争因素的作用。所以，把战争的条件单单从确保朝鲜市场的要求来看，并把它当作决定性的因素，是不符合事实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因素，是促使天皇制发动甲午战争的、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矛盾的一环，这点是不容忽视的。

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均衡和发展步调的不一致，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如上所述，这种矛盾在天皇制片面地培植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中，更加急剧地早熟了。这种情况以及农民受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双层剥削，工人受着因封建制度而更加残酷的资产阶级的剥削，使得国内市场变得非常狭窄。日本处在不平等条约下，也是使国内市场越来越窄的因素。治外法权是外国商人用来迫使日本商人和制造业者接受无理要求的武器，没有关税自主

权就等于后进的资本主义日本被夺去了抵抗外国商品自由蚕食日本市场的防御武器之一。早在 1890 年,日本的纺织资本就已在国内市场上没有出路;同年的国内棉纱生产总额约三千六百万斤,而进口棉纱达三千二百万斤。不难想象,这些进口的棉纱怎样在市场上压迫国货了。因此大企业萌芽不久的日本资本主义,就在这 1890 年陷入第一次经济危机中了。这次危机固然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但是前一年的大米和当年的小麦大歉收,即资本主义生产以外的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890 年与其说是首次经济危机的年份,毋宁说是天皇制度下的日本经济种种矛盾爆发的年份。随着大歉收,经济危机也提前到来,这就使得整个矛盾愈益加剧起来。

结果到处发生抢米的骚动,佐渡的相川町最激烈,甚至出动两个中队的军队前去镇压。东京、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饥民也充满不稳的情绪。从这一年起,“贫民问题”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佃户和农民的问题威胁着官僚政府。农商务省顾问麦耶特的名著《日本农民的疲弊及其救治之策》一书,单从它的目录看来,就可以知道是专为这些问题而写的。1891 年 4 月,政府系的《东京日日新闻》在举例说明妇女参加劳动人数日益增多以后,写道:“要知我国人口多于土地,已经进入社会生存竞争的最困难地步”,“因此,一位经济学家愁眉苦脸地说:当前必须扩充殖民厅或制定限制人口的法律等等,以期救急,不然社会党共产党之类,难保不接踵而起”。政府的反对党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在第二年的《自由党报》上登载了一篇论文“殖民论”,大声疾呼,日本的人口不久即将过剩,方今之计不仅增加殖民是当务之急,日本为了同世界富强各国进行竞争,还必须取得海权与商权,为此也大有殖民的必要(《板垣退助全集》上)。由在朝和在野的名士、官僚、资产者列名的“殖民协会”、“东邦协会”等等相继成立,有的主张在秘鲁开发银矿,有的主

张振兴南洋贸易,其中有的是骗人的,有的是认真的,总之,出现了各种各样向海外扩张的热潮,盛极一时。这些主张,不可能分清哪些是属于工业资本性质的,哪些是属于原始积累性质的,可以说是种种因素混为一体,形成寻求海外“富源”的一种模糊的要求。只有纺织资本有非常明确的打算,他们在中国强行开辟推销市场,进行倾销。政府通过正金银行和日本邮船公司极力给予援助。

为了消除 1890 年以来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日本经济矛盾的深刻化而提出向海外扩张的要求,形成了 1894 年推动天皇制进行侵略战争的经济上的主要因素。这时,工业资本对市场的要求并不限于朝鲜这个具体目标。它是作为一般要求被包含在总的因素之内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因工业资本的形成而更加加剧的、天皇制本身想攫取领土和富源(这点客观上在这个阶段中主要具有原始积累的意义,部分地也可以说是为了取得商品市场)的要求。

下面一段话可以直接说明甲午战争的性质。这次战争的结果,日本从中国夺得辽东半岛,但由于三国干涉又马上归还了中国。这时,明治天皇对他最亲信的宫廷顾问佐佐木高行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考虑了占领盛京省半岛的问题。据说该地情况,利益很少,远不足以供应行政和国防的开支,不从本国贴补,什么事情也办不了。(中略)前些日子在谈笑中问及伊藤(博文),他说不必急于夺取半岛,通过这次战争,已经了解了那里的地理人情,不久,将从朝鲜或其他地方会有再战的机会,那时再行夺取可也。”(《明治圣上和臣高行》)。这段话中的用词也好,想法也好,充分表现了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真面目。可见,甲午战争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下成长起来,因而激起领土欲和获利欲才发动起来的。

第三节 开战的时机和战果

那末这次战争为什么不在 1890 年发生,譬如,也不在 1893 年的 1 月或防谷令赔偿损失问题谈判迟迟不得进展的 5 月开始(尽管当时曾以战争威胁朝鲜),而是在 1894 年夏天才爆发的呢?这只能说因为这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时机已经成熟。清廷出兵镇压东学党之乱的通知,给了日本向朝鲜派遣大军的一个绝好机会。当然这也是促使战机成熟的一个事实。日本远在清廷准备出兵以前就作好出兵朝鲜的一切准备,并不是因为接到清朝出兵通知后,为了对抗才想出兵的。不管有无东学党之乱,日本是一定要在 1894 年找寻某种借口发动侵朝战争的。因为经济上推动战争的力量很强大,不仅作战准备已经完成,更如下文所述,天皇制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也迫不及待地要进行战争,而且已经作好作战准备。

1890 年天皇制矛盾的爆发和社会不安的激化,在当年召开的议会中也有所反映,引起众议院和政府的激烈冲突。这个冲突在 1892 年末到第二年 3 月的第四届议会上达到最高潮。自由党和改进党结成反政府共同战线的“民党”,从第一届议会以来,提出“休养民力、节约政费”的口号,一直在攻击政府。这种攻势决不象部分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资产阶级议会围绕国家权利对地主的政府进行的革命的议会斗争。所谓“休养民力”,就是以民众的要求为垫脚石企图达到为地主的利益而减轻土地税。所谓“节约政费”的口号虽然包含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廉价政府”的要求,以及通过扩大议会的预算审议权来使官僚政府事实上隶属于议会之下的民主革命的要求,但议会的领导人物并没有贯彻这些要求的热诚,只是打着民众要求的幌子威胁政府,企图在政府中分享几把椅子。

因此，从第一届议会以来，这些人很容易就被官僚政府收买了。尽管如此，因为议会外面叫嚷着逐年加剧的显著的社会不安，政党还能通过反映这种不安而使政府陷入窘境。

在临近第四届议会以前，政府以伊藤博文为首相，组成除松方正义外、“全体元勋出马”的内阁，下定悲壮的决心，要同议会进行“明治政府末路的一战”（山县有朋）。事实上，民党也认为这届议会是把所有的元勋一举打倒的良机，对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大加修改，并一步也不让。同时，议员方面也没有出现第一届议会那样的被收买的变节分子。最惊人的是，当议会同政府的冲突达到最高潮时，民党不是把政府的错误诉诸民众，而是诉之于天皇，请求天皇给与裁断。政府当然也向天皇控诉议会的不是。结果，胜负定了，天皇的判决诏书当然拥护政府而痛击议会。于是，议会向官僚政府无条件地投降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当时议会之所以强大，是只以议会外的民众的动摇为背景的，但正是这个民众的动摇的激化，却使议会变得无能为力了。各政党同政府斗争时，不仅害怕动员民众，甚至象自由党那样的政党，竟然公开宣布该党的自由主义与社会党的自由主义不同，党章规定议员不能受选民的控制，不但同广泛的革命民众绝了缘，甚至同它的选民小地主阶层也断绝了关系。改进党也只是没有这种公开的声明和规定这样的党章，根本不想动员民众。在政治的自由方面（例如修改集会结社法的要求），也完全同政府一样，主张禁止民众享有“社会党”所主张的那种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哪里会有这样不能动员议会外的民众、害怕民众、与民众断绝关系的革命议会斗争？！）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自杀行为，把同政府的斗争向政府的主人天皇去控诉，请求天皇解决。

由于政党害怕民众，政府才在这次“末路的一战”中大获全胜。但是，连民党都感到害怕的民众的动向，对官僚政府来说，它的威

胁更大。躲避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掀起一个对外问题。前任农商大臣、现任内务大臣的品川弥二郎看到半封建小生产者的没落和民心的动摇而痛感天皇政府的不稳。他在1891年第二届议会上提出信用合作社法案，主张如果不及时地定出救济中产以下的小营业者的方策，国家的基础将陷于危险。但是，政府解散了第二届议会，这位品川内相干涉了那次大选，这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尽管如此，仍然败于民党，他引咎辞职了。1892年6月，他以山县有朋为幕后总司令，与海军军阀巨头西乡从道合作，组织“国民协会”，以“改良内政”为名帮助政府，呼吁拥护国权，彻底修改条约，把社会的不稳引向对外问题上，利用国民的完全独立的要求，并把这种要求导向天皇主义的国权扩张和侵略战争。在这以前，与退役将军谷干城、三浦梧楼等人联合的国权主义者陆羯南等人，在1889年2月创办报纸《日本》，大力宣传国权主义，在舆论界方面获得势力，逐渐成长为有势力的报纸。它发表评论说：“远东问题的实际解决，对内可消灭私党的卑念，对外可消灭外侨的骄心，那时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然实现”，从而社会不安和政治不安越来越严重的1891年，即“明治二十四年，实在是我国着手解决远东问题的时代。”这种论调决不是偶然的（《我远东问题的起因》，1894年1月，《日本》）。

“对外强硬”运动在第四届议会后突然激化了。民党的联合被一道诏书打得一败涂地。自由党的主流逐渐被伊藤内阁拉过去。只有改进党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分派，作为一个强硬的在野党保留下来。但是，他们连要求天皇制实行最小限度的民主改革都再也不太热心了，却突然提出“对外强硬”彻底修改条约和恢复国权的口号，并且热烈主张：在这些口号实现以前，“坚决执行现行条约”。第四届议会时颁发的诏书也煽动“兼六合而掩八紘”的日本建国的使命。于是，成为议会最左翼的改进党与最右翼的国民协会联合

起来，响应诏书，激烈反对政府的条约修改方案，用尽一切手段宣传对外强硬政策。1893年“即明治二十六年的天地，是对外软硬两派相争的天地”（前引《我远东问题的起因》）。神鞭知常、安部并盘根等最强硬的国权主义者与公认的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大井宪太郎等人创立了大日本协会（10月），成了议会内外对外强硬派的推动力。在“休养民力”、“节约政费”的问题上最害怕动员民众的这帮人，为了“对外强硬”却利用报纸杂志和演说会等等，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发出呼吁。

自由主义者所以参加这个运动，有它必然的根据。如前所述，不平等条约已明确地被认为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付重大枷锁，这一点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受屈辱的反抗情绪。因此，综观修改条约运动的历史，在最初的岩仓大使时期，是出于一种模糊的国民自尊心的要求，1880年代末期井上外相时期是着重于废除治外法权（这也主要是国民自尊心的问题），其次大隈外相时期是对最惠国条款和税权的关心提高了，这里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1892年以后的条约问题，是强烈要求税权和法权一并彻底修改。对待法权，也不仅是从国民自尊心的角度，而是从经济角度也热烈地提出要求了，税权则不仅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也是求得人民主权完全独立的不可缺少的一环。国民觉悟的这种提高，也是促使自由主义者主张对外强硬的客观因素。

这时，他们企图反对屈服于欧美的政府，保卫国权的完全独立，并通过这个运动来打倒官僚政府。不过，他们把对外强硬的运动同国内的民主运动完全割裂开来，这就意味着把民众的民主革命的要求转移到对外问题上去。结果，只能驱使民众去实行山县、品川、谷、三浦等人所操纵的反民主的国权运动和诏书里所说的“兼六合而掩八紘”的八紘一宇的侵略主义了。尽管对外强硬是一个反政府的运动，政府被攻击为对外软弱，然而对外强硬的最大理

论家陆羯南却保证说：“所谓政府只意味着内阁，并不包括陆海军在内”（《我远东问题的起因》）。陆海军中强硬派的陆军首脑，却同被集中攻击为奉行“软弱外交”的陆奥宗光外相在幕后紧密合作。

在革命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对外强硬的主张是与国内改革密切结合着，隐藏在国内改革的背后。革命的自由党解散后，在旧自由党党员反对井上外相的条约修改方案的运动中，对外强硬的主张也是结合减轻地说、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要求，作为第三种要求进行斗争的。正因为如此，它既不是攘夷主义，也不是侵略主义，而是旨在完成国民独立的运动。

然而，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天皇的国权主义代替了民众所要求的真正的国民主义。使民众为了“对外强硬”而激昂起来，正是最理想地完成了天皇制发动中日战争的政治准备，但也是一个政治危机的顶点，走错一步，就足以使天皇制分崩离析。这样说虽然似乎有些矛盾，但是这个运动已经不仅仅是某个党派的国粹主义者或议会的在野党的运动了。由于它已经吸收了广大的民众，也许有朝一日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天皇政府不得不镇压它自己放火引起的这个运动的理由，就在于此。同时，它对战争已经不能踌躇不前了。

1893年12月，政府解散了第五届议会，同时下令解散大日本协会。对此，驻伦敦的青木公使写信十分称赞陆奥外相说：“此后惟希断然下定决心，努力挽回和维持天皇的大权，不胜切盼”（1894年2月9日）。陆奥在回信里说：“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作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但是，又不能无故掀起战争，唯一的目的是只有修改条约”（3月27日发，清泽渊《外交史》、《现代日本文明史》三）。所谓不能“无故掀起战争”这句话，正好说明他正在如何寻找战争的外交借口。（作战方面的准备，这时已经完全做好。）在不到三个月以后的6月5日，日本下了动员令，

设立了大本营。这是清廷把出兵朝鲜通知给日本以前的事情。

甲午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由于完成国民独立的斗争同对天皇制的民主斗争被割裂开来，结果它被天皇制的国权主义巧妙地给偷换了。象甲午战争这种彻头彻尾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竟受到内村鉴三这类人民中最爱和平主义的人的支持，受到当时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江兆民这类人的支持，而且还仿佛被称作正义的人民战争，而没有发生日俄战争当时的那种反战、厌战的斗争，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国民主义已经被国权主义给偷换了。

甲午战争以日本的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开始，以日本的彻底胜利而结束。战争一开始，对天皇政府的一切攻击就马上停止了。在“征讨和惩治清廷”的“举国一致”的大合唱声中，政府危机和社会不安都暂时消除了。战争的结果，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地位被推翻了，朝鲜被承认“独立”了。这意味清廷承认日本代替它登上朝鲜宗主国的地位。日本还从中国割取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夺取了库平银二亿两，折合日圆约三亿日圆的巨大赔款。这笔赔款抵偿日本的战费二亿二千五百万日圆还有余。根据日中和约，以及附带的通商条约，日本不仅强迫中国签订了和欧美各国一样的不平等条约，还取得任何国家从未取得的特权——日本可向中国市场自由出口商品，并从中国自由进口原料资源的许多特权，以及使日本工业资本侵入商埠商港的特权。

这样，天皇制发动的甲午战争，似乎收到超出预料以外的成果。既取得对远东各国人民的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也取得了金钱和领土，还取得了不仅是商品市场而且还有资本市场。众所周知，辽东半岛因为三国干涉马上就放弃了，作为补偿，日本取得了四千五百万日圆。

日本资本主义从这次战争起，有了划时代的飞跃发展。那么，

驱使天皇制发动战争的各种矛盾，是否因此而完全解决了呢？不是的。那些矛盾却以新的规模、新的形式，加上新的因素进一步发展起来，十年后，迫使天皇制不得不掀起规模更大的、带有新的性质的日俄战争了。三国干涉和明治天皇对三国干涉所说的上述的话，以及向国民提出的卧薪尝胆的口号等等已经暗示了这次战争。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确立 和农业的变化

第一节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战争和它的辉煌战果使日本资本主义有了飞跃的发展。

九个月的临时军事预算是二亿五千万日圆，相当于当时经常岁入两倍以上。这笔巨款是靠税收和发行以税收为担保的公债，以及向日本银行借款的方式筹集的，实质上是由劳动人民负担的。开战后不久，8月18日，渡边藏相为发行第一次军事公债，召集各大银行行长“训话”，要求“各银行和它有往来的资本家和富翁商议”，协助政府。11月发行第二次公债时，他又断言“为使当局达到全局目的的责任完全在于一般人民，特别在于资本家和富翁肩上”，但实际上一切负担全都落在普通人民身上。“资本家和富翁”非但没有负担，反而由于政府支出战费、购买军需品而赚得大笔财富。例如，银行对缴足股本的利润率（公积金和纯益的合计），开战前一年即1893年是百分之四十七，1894年是百分之五十，1895年是百分之五十一，1896年达到百分之六十三。陆军的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在军需罐头中掺杂石块、贪图暴利的故事，是很有名的。甲午战争时任第一旅团长的乃木少将，因为痛恨在罐头内掺杂石块，据说，在他任台湾总督时，曾反对大仓组在台湾设立支

店(《大仓根津康采恩读本》)。虽然据大仓及其他资本家的代言人说,掺杂石块并非事实,但大仓及其他大资本家所取得的暴利,可以说等于把石块当牛肉而骗来的。另一方面,民众遭受的掠夺,“不亚于德川时代的征收军费”,有些小农甚至被迫出卖田地,也得购买军事公债(高桥是清《自传》)。

由于从战争中攫取了暴利,并刺激了生产,同时又获得了战争赔款的大笔资金、广大领土和市场、以及用“卧薪尝胆”的口号,牺牲民众利益,一次又一次地扩充军备等等条件,政府和大政商领导下的现代产业开始建立起来了。1894年,首次施行了商法。根据这个商法规定,该年成立的公司总数为二千八百四十四家,缴足股本总额是二亿四千五百万日圆。截至日俄战争开始时的1904年,公司数为八千八百九十五家,增加三·一四倍,缴足股金为九亿二千一百万日圆,增加三·八倍^①。

这些公司从营业种类看来,“商业”公司的数目和资本都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发展的速度也很快。这里所说的“商业”,包括“银行”及其他金融业,而它们的数目和资本额(特别是资本额)又在“商业”公司的总数和总资本额中占压倒的比重。1894年的银行资本为一亿零一百万日圆以上,达工业公司资本四千四百五十九万日圆的约二·三倍。到1903年,银行资本为三亿七千四百六十九万日圆,达工业资本一亿七千一百六十九万日圆的二·一倍强。

就商业资本,特别是银行资本在公司总资本的增加过程中占很大比重这点来看,似乎甲午战争前的倾向在战后仍然继续着,但是它的内容与战前的情况显著不同。就是说,银行资本虽然仍具

^① 根据内阁统计局《企业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第一章的数字。然而,关于这种简单事项的数字,各方面的统计都多少有些不同,到底哪个正确,无法知道。总之,关于日本经济的统计,连一个精确的都没有,这是顺便谈谈的。象最近出版的总理府统计厅第一次《日本国统计年鉴》,就有多得无数的错字,并附着勘误表,然而还存在着勘误表上没有列出的很多错字,这类错字,简直是统计表的致命伤。

有战前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性质，但同时又表现出走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倾向。这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即银行数以 1901 年的二千三百五十九家为顶点，以后逐年减少；另一方面，银行的支行有了显著增加。这就是说，资本的集中已经开始了。同时，银行对产业公司逐渐具有控制力，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工业资本的资本额虽然没有银行资本多，但它的发展最迅速，这从上述的公司数和资本金的数字上也可以看出。尤其是工业资本的精华——工厂工业的发展最显著。1893 年每天平均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总数是三千零一十九家，其中使用原动力的工厂是六百七十五家。到 1903 年，工厂总数增加到八千二百七十四家，其中三千七百四十一家使用原动力。纺纱的发展最快。1893 年实际锭数是三十八万二千锭，到 1903 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万锭，资本从一千一百二十七万日圆增加到三千四百四十六万日圆。

就连纺纱业这种零星家庭工业量最强的工业，也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机器纺纱超过了手工纺纱。各种工业的生产量都有飞跃的发展，其中以棉纱的产量为最。在造船和机器制造业方面，民营的三菱和住友等其他公司也从甲午战争后逐渐成长起来。在这方面，划时代的事件，是 1901 年国营八幡制铁所投入了生产。

煤虽然勉强够用，但缺乏铁，这是现代工业的重大弱点。尤其对军国主义的天皇制来说，军火生产不能独立，是致命的缺陷。因此，政府从甲午战争前就每年向议会提出创办国营制铁所的预算，但每次都被否决了。到了甲午战争中的第八届议会，才由议会积极要求政府尽速设立制铁所。1896 年 3 月，公布编制，以创业费一千九百二十万日圆的巨款建立了八幡制铁所。使用的矿砂，原定用国产矿砂，后来乘甲午战争的胜利，于 1899 年 4 月，政府与中国大冶铁矿订立每年购买矿砂五万吨的合同，期限是十五年。大冶铁矿原是德国技师发现的，德国对该矿的势力很大。因此，日

本政府订立上述合同时，曾和德国势力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当时，德国对清廷提供利率四厘的四百万圆借款，企图垄断大冶的权利。日本政府为了对抗德国，于1903年11月（日俄战争前夕），通过兴业银行强行借给中国三百万日圆借款（年利六厘，期限三十年），并订立合同，规定在上述期间“大冶铁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列强，也不得出卖矿石”，“日本方面也不得购买别处的矿砂”。“但是，我国的借款比德国的借款数额既少，利率又高，所以交涉非常困难。结果，由于强调同文同种、日中亲善的根本大义，才取得成功”（《世外井上公传》五）。不消说，在这个“同文同种、日中亲善的根本大义”之外，还有一个“根本”，那就是二十万陆军和拥有二十六万吨军舰的海军起了作用。以这种办法建成的八幡制铁所，创业第一年就生产出国内钢铁总产量百分之五十三的钢铁，钢材占百分之八十二，后来，它一直在日本制铁业界首屈一指。

铁路的营业英里数，从1893年的二千零三十九英里延长到1903年的四千四百九十四英里，即延长到二倍以上。海运方面，从1893年的一十一万吨轮船增加到1903年的六十五万六千多吨，即增加了将近六倍。这不仅与出口贸易的跃进分不开，同时也是政府为加强战时运输船队，从1896年根据“航海奖励法”加以大力维护的结果。

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很显著。1893年出口总额约九千万日圆，1903年增加到三亿一千五百万日圆。大宗出口的，虽然仍是生丝，但它的比重逐年减少，棉纱渐渐占重要地位。甲午战争后，棉纱每年的产量，将近百分之三十出口。棉纱和棉制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是：1897年百分之十点二，1902年百分之十点五，日俄战争胜利的1905年增加到百分之十九点五。这些棉纱和棉制品几乎完全出口到中国和朝鲜。1897年，棉布棉纱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二，而在对朝鲜的出口总额中占

百分之四十一，1902年，前者是百分之四十一·七，后者是百分之三十七·八。因此，棉纺织业占据了“我国对外国工商业战争中的中坚和主要”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工商业战争的主要战场，当然指的是东亚大陆（三瓶孝子《日本棉业发达史》所引《明治二十九年工学会临时大会记事》）。

1897年10月，日本实行了金本位制，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上显示了自己发展的指标之一。是靠从中国取得赔款而有了黄金准备的。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知道，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日本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各个部门中，特别是在轻工业方面建立起来了。

第二节 农业的变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农村和农业也逐渐加深了影响。从1870年起至日俄战争前后为止，农户总数的绝对户数有了细微的减少，因而农业人口对总人口的比率很快地减低了。1873年农民总户数是五百六十四万户，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六九，1891年减为五百四十八万九千户，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二，1903年减为五百三十五万九千户，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零七（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六大城市（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神户）人口的增加，非常显著，1886年是一百九十四万一千人，1903年增加了两倍多，达四百零九万四千人（《明治大正国势总览》）。

非农业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引起对农产物需要量的激增，这就促进了农产物的商品化。从地税改革以后，农产物的商品化部分，不由地年年增加。远在甲午战争前的1888年，根据政府的调查，象大阪府这个拥有大城市的行政区，全部农

产物中尚有百分之五十运出府外，如果把卖给大阪市的农产物也算在内，商品化的比率当然要比这个输出率更高了（土屋乔雄《明治前期经济史研究》一）。

农业方面的情况由于地区差别很大，不能以大阪的例子来推论全国。但根据同一调查书中所举的几个县的产米额、向县外运出或由县外运入的数字来看，当时农产物的商品化部分在近畿地方和西南地方可能达百分之四十，东北地方可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下。地主出售的佃米，以及小农忍饥出售自用大米也对稻米的商品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有一定的限度，除非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稻米的商品化是不会超过一定程度的。很久以后的1930年，商品化的稻米，全国平均也不过占总产量百分之五十上下。所以，决不能单凭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断言，日俄战争前，商品化就已经有了迅速的进展。但是，当时寄生的地主制度还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着，农村的现金支出处在急剧增长的时期，因此可以想象，稻米的商品化可能也相当进展了。与这种情形互为因果，水稻的播种面积和单位产量都有较为缓慢的增加。

每五年平均水稻播种面积、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表

年 度	播种面积	指 数	总 产 量	指 数	单位面积产量
1878—1882	2,548 千町 ^①	100.0	29,812 千石	100.0	1,169 石
1883—1887	2,677	102.7	33,785	113.3	1,291
1888—1892	2,736	107.4	38,860	130.4	1,420
1893—1897	2,775	108.9	37,673	126.4	1,358
1898—1902	2,836	111.3	42,479	142.5	1,497

（备考）根据农林省累年统计表。引自渡边信一《日本农村人口论》。

随着生产的扩大，锄和犁等农具的改良，特别是犁的普及，以及中耕除草器“太一车”的发明（1891年，这种除草器的绰号叫作

① 一町=99.18 公亩。——译者

气死日工,当时发挥了划时代的效率),肥料的使用量增加了,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从满洲进口廉价的豆饼,压倒了鱼肥,当时化学肥料也渐渐普及,虽然数量不多,1900年进口硫酸,开始使用。此外,在政府大力奖励下,实行公共秧田和直线插秧等,技术也有了或多或少的改良(山野武夫《农村史》)。

旱田作物由于日本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来往,起了激烈变化。长期以来的技术作物,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几乎全都减少了。首先是棉花。数以万计的零散农户种植的国产棉花,因为质量不匀、价格昂贵和难以大量收购,不适于用作大机器工业的原料,也不能和国外棉花竞争,并因为棉花手工业的废除,它的生产也减少了。尤其是1896年,棉花进口税在纺织资本的压力下取消以后,棉花很快就不种了。大麻由于马尼拉麻的进口,叶蓝由于印度蓝的进口,都从二十世纪初趋向减少了。此外,菜籽、砂糖、大豆等,凡是同外国农产物或工业品发生竞争的东西,不是不种了,就是少种了。粮谷方面,如农家自用的谷子、稗子等的种植也稍稍减少了。另一方面,城市近郊的蔬菜和各地的马铃薯、甘薯的种植,却激增了。新的技术作物——制造啤酒用的大麦和除虫菊的种植,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渐渐发展起来。苹果、桔子、桃等果实的栽培,作为商品生产,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些是在日俄战争后才正式成长起来的。参看我妻东策《农村产业机构史》)。

这时,发展最猛的是养蚕业。桑园面积若以甲午战争前五年平均为一百,则日俄战争前五年平均为一百二十六点九,此后更加上升。当然,蚕茧的产量也随着增加了,但和蚕园面积和蚕茧产量的规律性增加相比,养蚕农户数目的增加却是不规律的,而且增加速度也稍缓慢。

随着这些情况,手工缫丝、特别是小规模家庭工业确实逐年减少了。神山茂夫根据这些现象说,养蚕业的发展就是“出现养蚕专

年 度	桑园面积指数	蚕茧产量指数	养蚕农户指数
1889年	100	100	100
1900年	173	232	132
1909年	198	305	133

(备考)引自神山茂夫《日本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达》。

业农家、促进所有养蚕农家的分化”的过程。可以想象,从1900年起,这种过程慢慢地开始了。

农产物商品化的发展,商业性农业的逐渐成长和旧有家庭手工业的消亡,大大地破坏了农民的自给自足经济,说明农民和农业深入而又广泛地被卷入了资本主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民的个人生计也引起了很大变化。从甲午战争到明治三十年代,除普通粮食谷类以外,肥料、煤油、盐、烟草、酱油、酒等日常用品,不仅几乎都要花钱购买(中略),其价格也非常昂贵,绝非米谷的价格上涨所能相比。此外,子女的教育及其他社会交往亦需要很多费用。现在如果仍按日本古来的农业方法,专种水稻势难维持生计,所以一般都无暇顾及将来的后果,只顾搞现款收入较多的行当了”(1911年,斋藤万吉《实地经济农业指针》)。这里所谓“现款收入较多的行当”,指的是商业性农业,代替原来家庭工业的新的季节性零工和其他工资劳动,妇女到纺织工厂和缫丝工厂去做工,或新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各地方不同的各种所谓“农家副业”。这样,贫农、小农就逐渐走上半无产阶级化的道路,中农上层变成小商品生产者了。

前面引文中说,米价的上涨赶不上农民购买物品价格的上涨,这点从下列表格看来并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一般物价确实上升了,而米价的涨落则因年成和季节的不同大有出入。因为农民出售的价格,经常被人压价,比市场价格低得多,所以小农可能痛切地感到米价和一般物价的剪刀差的打击。但对地主来说,情况并

不是这样(寄生地主与耕种田地的农民不同,他们不会因为肥料和其他的涨价而受到打击,相反地,他们会因米价的上涨而获利)。

一般物价与米价的指数比较(1894—1903年)

年 度	一般物价	米 价	年 度	一般物价	米 价
1894	100	100	1899	136	113.5
1895	107	100.8	1900	145	140.2
1896	115	108.4	1901	139	143.9
1897	128	133.9	1902	140	163.9
1898	135	166.8	1903	148	150.2

(备考)一般物价指数根据日本银行调查的东京批发物价指数。米价指数根据东京正米市场一石平均行市算出。

其中,农民自己耕种水田的劳动“工资”,可以断定有一些增加(这个工资是在自耕时,从收入中减去种籽、肥料、捐税、杂费等费用,除以自己的劳动日数而得出的;若是佃农,便从收入中减去佃租、种籽、肥料、杂费等费用,除以自己的劳动日数)(斋藤万吉《日本农业的经济变迁》)。

耕种水田时自己劳动的“工资”

地 域	1890年	1899年	1903年	
关西① 17村平均	自耕地	33钱	50钱	66钱
	佃耕地	14	26	40
东北② 15村平均	自耕地	20	30	34
	佃耕地	14	22	29

上表的工资上升率比同期内的一般物价上升率或东京市各种手艺人的工资的上升率都高,因此这个材料是否可靠,不无疑问。尽管这样,自耕农“工资”向来比同一地区的普通农村工资较高却

① 关西是大阪、京都地方的总称。——译者

② 东北是福岛、宫城、岩手、青森、秋田、山形六县的总称。——译者

是事实，如果联想到米价上涨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那么上层自耕农（中农）的劳动收益有某些上升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尽管农民生活在质的方面与以前一样，仍然极其贫困，但在这个贫困的范围内，在量的方面“多少有了一些提高”（渡边信一前引书）。这一点在前面的引文中的“子女的教育及其他社会交往”的费用增加上也反映出来，从小学的就学儿童来看，甲午战争前的 1892 年，他们只占全体入学儿童百分之五十五，而到日俄战争前的 1902 年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二了。

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这样渗透到农村和农业之中，但农业的半封建结构还远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化。农产物的商品化并不等于农业生产马上就发展成为商品生产。尽管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农民阶层分化的情况下，小农和贫农有半无产阶级化的倾向，中农上层因为技术作物和养蚕的发展而有变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倾向，但是这不过是局部的萌芽状态；这种分化由于寄生的地主制度和天皇制权力的压迫不断受到阻碍。

虽然自耕农本身的劳动“工资”有了某些增加，但远远赶不上用作不断扩充军备的财源而日益加重的间接消费税和地方税的迅速增长。即便他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一些提高，但与当时的一般财富的增长相比，可以说，农民的生活愈益相对地贫困化了，这两点毫无矛盾，事实上自耕的小农仍然面临着丧失土地、沦为贫佃农的危险。据《农商务省汇报》第十三期《土地所有权移动状况》（数字从略）来看，拥有不满一町的少量耕地所有者逐渐沦为无土地者，相反地，拥有三町以上的人，特别是拥有五町以上的地主则逐渐增加了。两者之间拥有二町上下土地的所有者阶层比较稳定。然而，这个阶层的变动虽然没有在数字上表现出来，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稳定的。在上述资本主义渗入农村的动荡时期，善于适应新发展的人，都变成了富农或寄生地主，其余

的人都贫困了。这种变化动摇了农村，因此“保护农民”成了这个时期的政治上的重大问题。

对佃农来说，水稻的增产并没能改善他们的半农奴地位。由于农民斗争的结果，佃租率有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佃租的绝对量却增大了(渡边信一，前引书)。

大米的商品化导致了米商对质量、重量、包装等的检查。1898年滋贺县和山口县的米商公会对收购的稻米施行检查，可以说是正式米谷检查的开端。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了地主对于佃米的检查，实际上是由替地主服务的组织——郡和村的农会担任这项检查工作。从1900年前后起，开始了这种米谷检查。后来由于地主活动的结果，实行了由县强制检查的办法。1901年大分县经办的检查是这种检查的开始。这对佃农来说，是地主加给他们的新增加的剥削，对自耕小农来说是商业资本所对他们进一步的残酷掠夺(奥谷松治《近代日本农政史论》)。

由于旧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崩溃，现在不论多么小的农业，没有现款就无法经营。但这种资金在农村里是不容易得到的。1896年成立劝业银行和府县农工银行，据说目的是以不动产为抵押贷放长期低利资金，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营的改善。然而，中央的劝业银行自不必说，连府县农工银行也并没有成为小农的金融机关。这是因为贷款要以土地为抵押，而小农的小块土地大都已抵押出去，即便没有抵押出去，他们的信用也是微不足道的。日本的农业本来受到寄生地主制的压力，根本不能成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所以尽管对土地可以贷款，但资本不能流入农业(近藤康男《日本农业经济论》)。

这些银行在农村里变成大地主的金融机关，地主借到低利长期的大笔资金后，把它投入农业以外的企业，或以高利转贷给小农民，从中牟利。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银行发行银行债券，农村的资

金越发被吸收去了。1900年施行产业合作社法，信用合作社作为小农的金融机关出现了。信用合作社也和上述情况一样，把农村中的零星资金也吸收过来，通过购买债券和股票的形式，促使农村的资金逃避到农业以外的方面去了。总之，不动产银行也好，信用合作社也好，它们不过是城市资本和同它勾结的大地主对小农进行剥削的一个新的机构而已。因此，小农的金融，绝大部分依靠高利贷——地主、肥料商人、米商或专业的高利贷者。

从产业合作社法施行以后，各种的购买合作社和贩卖合作社纷纷在各地出现。虽然时而成立，时而解散，但数量逐渐有所增加。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合作社的成立是为了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只能对逐渐发展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上层中农有利，对小农即贫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同时，这些合作社的发展每每遭到农村中的商人兼地主的阻碍，或者变成他们控制下的机构。“农会法”也与产业合作社法同时施行了。农会规定，只限于拥有法定地价四百日圆以上的土地（平均约合120公亩余）的所有者可以入会。这显然是地主和上层中农的机构，国家和乡村都对它给以补助金和其他保护，使它与各种产业合作社联合起来进行“农业改良”。这种“农业改良”也就象上述的米谷检查那样的东西。

产业合作社法和农会法，特别是前者，在草拟这些方案的官僚们的心里，主观上是为了保护小农，这个提案在议会中引起了大辩论。不赞成的人指责说，这是一种否定经营自由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案，而提案者政府方面则认为只有依靠这些法案才能防止农民的社会主义化（辻诚《日本产业合作社史讲》）。然而，这些法案实际所起或能起的作用却与劝业银行和农工银行一样，是为了防止半封建的农业被资本主义拿跑或摧毁，援助地主阶级使之易于适应资本主义，用来捍卫天皇制的固有基础——寄生地主制，同时援助资本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特别是大地主越来越富有，加深了他们的寄生性。同时，他们购买股票，有的人发展成为大商人和工业资本家，还有的地主身分成了次要的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大地主了）。所谓“地方财阀”，大都指这类人。从这类人中间特别发展起来的，有冈山县仓敷的大原家，信州的片仓家，名古屋的伊藤家（即松板屋）等等。另一方面，也有象甲州的若尾这类大资本为了多收佃租而购买土地，成了在外大地主。这种人加上原来的地主迁到城市，致使甲午战争后在外地主逐渐增多了（前引《土地所有权移动状况》）。1901年日本全国拥有五十万日圆以上的资本家，据报载（9月23日的《时事》）有四百四十一人。其中八十八人（百分之二十）的身分属于“农业”、“林业”或“大地主”。此外，还有旧诸侯华族六十三名（百分之十四点二），他们也是大地主。还有“贷款业”、“造酒业”，也大都是大地主，因而“富翁”的过半数，是大地主或者是身兼大地主的人。资本家就这样同地主紧密结合起来了。身兼超大地主和超资本家的富翁，那就是天皇家。从这一点来说，他也是他的臣下的“富翁”们的理想的代表人物。

第三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第一节 垄断资本的早产和对大陆的野心

资本主义的渗入农村和大小地主富翁的逐渐壮大，意味着资本从农民身上不断吮吸财富以积累新资本，使农民变为负债的奴隶，从而使相对的过剩人口不断停留在农村里面。这样，即使地主有可能从那些连一小块土地都要争夺的佃农民身上剥夺更高的地租，又使资本家有可能获得足够用的被迫忍受超低额工资的劳动力。因为资本家能够用低工资役使工人，所以即使各种工业发展

了，资本家也不肯相应地增雇工人，这就不能消除农村里相对的人口过剩现象。这种循环，看来对寄生地主制和资本主义仿佛都有利。但是，这里面却暗藏着尖锐的矛盾，它对地主和资本家以及驾乎两者之上的天皇制都将进行残酷的报复。

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十分缓慢。这点明显地反映在前节所引有关资本主义和农业发展的各种数字上。因此，日本的农业甚至连因资本主义发展而激增的粮食需要都不能满足。1890年前，尽管是忍饥出口，稻米的出口还是超过了进口。从甲午战争前夕起，转为入超，1900年前后，已经入超一百四十万石了。从日俄战争开始前的1903年起，入超陡增，达到五百六十万石，入口大米不得不超过国产稻米总额的百分之十。

于是号召增产国内粮食是当务之急。前述各种措施就是响应这个号召，但是丝毫没有收效。1900年制定“耕地整理法”，奖励土地改良。但是，零星的耕地分散得归好多人所有，即便大地主的土地也是分散成无数的地段，而每一块土地的利弊情况又都千差万别，所以，彼此交换土地、分并和整理，即使如何发动天皇政府的强权，只要不否定地主制，就难以办到。因此，这项法律施行十年以后能够整理的土地只有四万二千六百町步，还不到同年全部耕地的百分之零点八，水田的百分之一一点六。

第二，双重的剥削每每破坏农业生产力。品川内相在1891年的议会上抱怨说：“不是大风就是海啸，这个国家真是天灾最多的国家”。第一章谈到的1889—1890年大荒年后，1900年又是荒年，接着1902年东北地方又发生霜害及东北、关东、中国^①的大风水灾，造成超过德川时代末期的大歉收。东北地方出现了数十万贫民和大批饿死者。自诩铁路发达迅速和行政机构特别完备的日本，却出现了饥饿者的矛盾，其实，一部分原因正是这个铁路和官

^① 指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等县。——译者

僚机构造成的。1905年，东北地方又发生比三年前更大的荒歉。因日俄战争而农村受到破坏，也是重大直接原因之一。土地荒芜，国内市场急剧缩小，引起并促进了经济危机的深刻化。甲午战争后首次的1897—1898年经济危机和1903年的萧条，也都受了上述荒年的影响。

第三个矛盾现象是：大企业必然要破坏家庭工业和小企业，同时还必须要保存家庭工业和小企业。例如伊予花布^①的生产，1900年前后作为“农家副业”很兴盛，“使佃农也有了施肥的余力，对农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常常因为佃农反抗地主的的关系，有时副业与本业有颠末倒置之虞”，寄生地主制受到了威胁。因而致使县和村的当局决定：“应该慎重的是，必须坚持作为副业来奖励它发展”。伊予花布的生产终于没有超出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范围，这不仅是由于上述地主阶级的有意识的抵制，也由于地主制已经制造出大批的过于低廉的农村劳动力，所以与其投入大笔固定资本实行机器工业化，还不如利用手工业形式目前对资本有利。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冈山县的花草席和麦辫的生产，在甲午战争时已经要变成工厂工业，但结果倒退为家庭手工业了。除上述两个例子以外，在前引渡边信一的书里还有另外的几个同样事例。

寄生地主制阻碍现代工厂工业发展的最大事例，是缫丝业。缫丝业整个来说，是日本最大的工业之一。从富冈缫丝厂的建厂就可以看出，政府早就奖励了缫丝业的工厂工业化。然而，手工缫丝势力大，直到甲午战争后，机器缫丝才超过手工缫丝。后来三井、片仓等财阀通过在各处新建或收买，扩充了缫丝厂，出现了三百口至四百口锅的制丝大工厂。就全国平均来说，一个工厂的锅数，日俄战争前，最高是五十九口锅，每口锅的产量是四十八斤，规模还

^① 爱媛县松山市附近出产的一种织花棉布。——译者

很小，生产率很低。同时，虽说是“机器缫丝”，但工序的基本部分仍旧不是机器而是手工。就一般倾向来说，机器缫丝在发展，不过也常常受到挫折。原因是：(1)使用高价机器比使用低廉的农村过剩劳动力成本要高；(2)原料蚕茧要依靠数十万农户的零星生产，质量不一致；(3)收购机器生产所需的大量原料蚕茧比较困难。因此，甲午战争前 1893 年占缫丝业总锅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机器锅，战后减到百分之七十以下。日俄战争时，减到不足百分之六十（森喜一《日本工业构成史》所引柳川升《缫丝业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地位》）。三井财阀等的超级大资本虽然接收了政府出售的富冈缫丝所，开始经营大规模的缫丝厂，但在 1902 年“认为缫丝业是可以用小资本经营的企业，不屑与小资本竞争”而逐渐从缫丝业撒手了（9 月 6 日《报知新闻》）。这是因为三井认为象缫丝这种企业不如让那些与农村有直接联系的地方资本家去经营，让他们封建而残酷地使用农民劳动力，自己则通过贷款或经办出口从中剥削一层利润较好。“缫丝大王”片仓的事业，从 1900 年前后起有了显著发展。地主出身的片仓，利用他在缫丝方面赚得的资金购置了内地、北海道、台湾、朝鲜的土地和山林（《日本康采恩全书》十七）。他所以能够成了缫丝大王，看来是由于他轻易也丢不掉地主意识。

早在幕府时代末期，各地已经出现工场手工业的丝织业，也是由于寄生地主制的阻碍而未能机械化。同样，棉纱的生产虽然作为高度的大企业发展起来了，但是棉纺织业一般都难以超出零星的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不仅上述伊予花布如此。纺织联合会于 1905 年反对政府制定纺织品消费税时指出，如果一经征收此税，将有“三十三万家织户和实数八十万的工人”都将丧失生计，原料棉纱的需要将为之断绝，纺纱业者必将陷于困难。纺纱业的大资本只有建立在半封建式地剥削中小或零星棉织业的基础上才能够存

在下去。政府在面临日俄战争时，急需普遍发展现代的大规模工业，曾加以提倡，但却不得不承认：“我国纺织工业，大体上尚未摆脱手工操作的家庭工业的范围，这是因为人口过剩、工资低廉的缘故，这种状态不应突然加以扭转”（1904年清浦农商务相在大日本织物协会总会上的讲话，《伯爵清浦奎吾传》）。

保存零星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并利用它来进行封建性剥削，固然使大资本获得了一定的超额利润，但是，就整个资本主义来说，这里就隐藏着相应缩小它的发展范围，并削弱它的基础的矛盾。

第四，日本的垄断金融资本是在前面三条所述的那种薄弱的基础上过早地萌芽的。大资本是靠国家从农民身上掠夺得的税款和对军事警察装备的需要培植起来的。它靠寄生地主和高利贷所剥削的封建佃租，增加了资本的积累，通过劝业银行和农工银行以及产业合作社吸收农村的零碎资金，并进一步剥削本来就已经剥削农村相对过剩人口的中小零星工业，它本身还直接掠夺工资极低的工人，这些全部剥削都受到绝对主义权力的大力保护。早在1900年，它就从初期的政商的垄断阶级，原封不动地走上形成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阶段。私营铁路方面的日本铁道或山阳铁道、九州铁道等的三菱资本，海运方面的日本邮船、东洋轮船、大阪商船和轮船制造方面的三菱（在长崎和神户）、石川岛、川崎等的绝对垄断，根据国家军事上的需要，受到特别保护而排除了其他企业的竞争。机器工具制造根本就是需要大资本的企业，因此，从开始发展时起，就被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垄断了。采煤矿业方面的三井和三菱、金属矿山方面的住友和古河以及晚些时候的三菱等，也在日俄战争前控制了日本最好的煤矿和矿山，为它在战后垄断打下了完整的基础。

在大企业中有比较自由竞争的纺织业方面，也是以三井和其

他特权政商投资的大阪、天满、钟渊、尼崎等为首的几个公司在同业中占据了压倒的优势。1899年，纺织公司多达七十八家，但从第二年起，公司数目开始减少，1904年减为四十三家，日俄战争后的1912年减为三十二家，其间纺织资本和生产锭数的总额有了显著的增加，从1899年的三千三百万日圆、一百一十七万锭增加到1904年的三千四百七十万日圆、一百三十万锭，1912年又增加到六千六百万日圆、二百二十一万锭，大约达到1899年的两倍。由此可见资本集中的程度。

如前所述，在日本资本主义中，银行资本（开始是半封建高利贷资本的转化形态）走在其他工业资本前头，这就是说，一开始就加强了工业对银行的依赖。在银行方面，1901年末，六大都市加入银行公会的银行一百七十余家之中，第一、十五、三井、三菱、安田、鸿池、住友和正金等八家银行的存款总额占有所有加入银行公会的银行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一，按当时的经济杂志的说法，全国存款总额约五亿日圆之中，大半或三分之二集中在十几家银行手中，其他二千余家银行的存款只占三分之一上下（大家金之助《资本积累和经济恐慌》）。大银行通过经济危机加强了对工业的控制。在前引大家的书中可以看到，1897—1898年和1900—1901年经济危机时的这种实例。如果同大银行闹对立，大工业资本也要碰壁。例如1897年钟纺^①和中央棉纱纺织同业会所属二十六家公司发生争执时，三井银行拒绝对这二十六家公司及其有关个人给以贴现和贷款，严格催取到期的贷款，致使二十六家公司陷入窘境。这场争执最后经日本银行总裁岩崎弥之助调停，在对钟纺有利的条件下解决了（《报知新闻》）。这也是大工业资本与大银行资本加强联合，压制其他同业的一个情况。

这样由封建高利贷起家的三井和安田，除了银行和其他金融

^① 即钟渊纺织公司，是三井的资本。——译者

业以外,还经营工厂、矿山、铁路、海运等企业,或控制这些企业的股份。三菱和住友虽然最初并没有经营金融业,但在甲午战争前后也有了自己的银行,到日俄战争前夕,它们已经在金融界和主要工业的一切部门中形成了发挥威力的垄断体系——四大财阀。古河、大仓、浅野、澁泽、鸿池等财阀也紧跟着成长起来。这些都是特权政商,所以也越发受到天皇制权力的保护。这种保护有的是采用已往的各种补助金形式,在铁路、海运、造船、糖业等特殊部门受到政府的直接保护。但是,一般则是通过日本银行、劝业银行、正金银行及其他政府控制的特殊银行贷款的操纵,或者通过政府用品的买卖或者通过其他“奖励产业”的各种政策来实行。这些保护,与其说是国家给与特定人物的,毋宁说简直是大资本家阶级对国家的一种强迫勒索。甲午战争后,各方面责难“金权政治”,就是指这一点说的。

第五是经常性的资金缺乏。人民受地主、资本家及天皇制国家的残酷剥削。剥削来的资金集中在少数垄断大资本家手里,或是变成军舰、大炮及其他庞大的军备,脱离社会生产,因而要扩充生产,就经常感到资金不够,政府苦于财政困难,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从中国夺取了三亿六千万多日圆的赔款,但其中二亿二千万日圆用于扩充军备,八千多万日圆用于偿还甲午战争时的公债和其他善后费,直接用于非军事方面的只有拨归天皇财产的二千万日圆和拨归救灾准备金及教育基金的各一千万日圆,充作新领土台湾经营费的一千二百万日圆(事实上也是殖民地军事费)。

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起,到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止,这八年中间,除了1901年末和1902年以外,每年国家预算支出百分之四十四到百分之五十一是陆海军省的经费。这项庞大的军事开支,肥了大资本家的腰包,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拖延生产资本的积累。八幡制铁所生产的铁,用来作生产资料,完成经济循环,或用

来制造军用品，脱离生产而消失，这对资本积累有很大差别。此外，日本的生产机构所具有的军事的、半封建的性质，使日本的外贸在甲午战争前已经从出超转为入超。这种趋势在战后愈益加剧，造成连年巨额入超，这也促使资金缺乏越发加剧。在利息方面，甲午战前也年年降低，东京市内的放款利息落到七厘二，但战后几乎每年都保持在一分一上下。

工业资产阶级为了解决这种资金缺乏的情况，常常反对扩充军备。甚至象濹泽荣一那样的政商银行家和官僚中同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的井上馨，有时也不得不对扩军表示消极。由于资金缺乏，资产阶级对向台湾投资也表示怀疑。例如象田口卯吉这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也不断攻击政府在台湾白白浪费金钱（事实上天皇制的台湾经营，大部分是军事上的浪费）（全集第五、第六卷载有他的数篇论文）。这个时期放弃台湾的主张很热烈，甚至有人主张以一亿元卖给法国（《后藤新平》二）。日本为了确保对朝鲜的政治优越地位，曾不惜进行战争，但当井上馨为了“改革”朝鲜（其实是使朝鲜完全变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并以朝鲜作为进攻大陆的基地）出任公使的期间（1895年），要求借给朝鲜五百万日圆贷款时，实际上只拿出了三百万日圆。

资产阶级和政府殷切希望吸收外国资金作为弥补工业资金不足和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但是，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金本位制，而日本实际上是银本位，对引进外国资本有很大的阻碍。政府认为日本早晚必须采用国际通货的金本位制，乃于1893年设立了“货币制度调查会”进行研究。甲午战后，因为从中国攫取了巨额赔款，拿它来备置黄金准备，才于1897年10月实行了金本位制。但是，“金融界的巨头”濹泽荣一（第一银行）和正金银行行长原六郎，以及依靠同银本位的中国进行交易的纺织联合会、大仓喜八郎或理论家田口卯吉等人，总的说来，工业资产阶级都一致反

对。就连一向在政府与金融界间起联系作用的井上馨，最初也是不赞成的。因为从工业资本的立场说来，这时采取金本位制对出口贸易非常不利。然而，政府之所以毅然实行了金本位制，主要是为了“便于在海外发行公债”（田口卯吉），也就是说，为了迅速开辟引进外国资金的道路。澁泽荣一后来回想当时说：反对金本位制，完全是出于“短见”，日俄战争时“日本如果不是采用金本位制，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一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比澁泽更有先见之明，只是为了引进扩军资金，即便暂时牺牲工业资本的利益，也必须实行金本位制（《青洲回顾录》上，《原六郎翁传》中）。

金本位制完全实行后的 1899 年，政府马上募集到约一亿日圆的外债。1901 年秋，桂小五郎内阁曾想在美国募集外债，但是那次失败了。

最后是痛感国内市场狭窄。以上第一到第五的现象起着互为因果的作用，因而国内市场与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相比，显得仍然非常狭窄。获得海外市场的要求就不得不加强了。发展出口贸易，对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和资本主义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出口商品中的对美出口的生丝，限于国内生产条件，发展速度很慢。只有向中国和朝鲜市场出口棉制品和杂货，是唯一的希望。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商品得以充斥中国市场，同时也使日本资本主义的命运绝对依靠中国市场了。对中国的出口从 1899 年以来，占日本出口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占生丝类以外的出口贸易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对华贸易的发展速度很快，1896 年进出口总额为三千五百万日圆，五年后的 1901 年增到二倍，即七千万日圆，1902 年达到八千五百万日圆。其中出口的增加速度更快，从 1896 年的一千四百万日圆增加到 1901 年的四千三百万日圆，计增加到三倍多。在这期间，日本的贸易总额几乎没变。对华出口的货物，大半是棉

纱，“只要十七万包到二十万包棉纱的出口稍一不振，就使国内纺织业发生极大困难”（榎本奇策《输出棉织物》1903年）。对华出口的棉纱中，百分之四十以上运往胶州湾以北和中国东北。中小企业生产的棉纱的出口，根据日俄战前三年的平均数，百分之六十九以上也运往朝鲜和华北。

中国不仅是日本的出口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原料资源地。只要回想一下当时的大冶铁砂、东北的大豆和豆饼对日本具有的意义，就不难理解了。

对日本的统治者来说，亚洲大陆的重大经济意义，资产阶级及和它有密切关系的官僚自不必说——这恐怕不需要举例了，就连山县有朋这类官僚军阀中最封建的一派的巨头也逐渐认识到了。山县在1890年以首相身分出席第一届议会时，为了“维持主权线和利益线”——具体说来就是侵略朝鲜，曾要求扩充军备。当时他所说的“利益线”虽然意味着确保主权线（国境）所需要的战略上和政治上的范围，但他还没有意识到经济上的意义。可是，他在1901年却写了一篇《东亚同盟论》，竭力主张与欧洲的一个强国结盟，以保卫“东洋的和平”——瓜分中国，“以期发展日本的贸易，振兴工业，恢复经济”。

现在除了天皇制传统的侵略大陆的野心以外，对刚刚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来说，确保大陆的市场和原料，也具有了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所有的统治者都在注视大陆。可是，大陆的情况已经与甲午战争以前有所不同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远东的竞争激烈化了，不仅是商业的自由竞争，为了资本的输出，垄断矿山和铁路的权利，划分“势力范围”，租借领土等等，进行着生死的斗争。日本向大陆的冒险扩张，正如三国干涉所标志的那样，加深了日本同列强的对立，特别是加深了同俄国的对立。

第二节 世界和日本

——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的统治者为了争夺对朝鲜的霸权，同清国作战而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对日本的统治者来说，朝鲜问题并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因为日本同远比清国强大的沙皇俄国形成了直接对立。这种对立早在中日开战前，俄国对日本的干涉中就隐藏着，战后的三国干涉是它的公然的强硬表现。明治天皇等人虽然说什么辽东“利益”很少，取之无益，这是对三国干涉不服气的说法，但却预想有朝一日会在朝鲜或其他地方有爆发战争的机会，因而期待下一次战争，并为了准备这场战争，把不折不扣的“卧薪尝胆”之痛强加在人民身上。

日本借口保护朝鲜的独立和现代化，把清廷势力逐出朝鲜。但战争外交的当事人陆奥宗光本人，却在《蹇蹇录》中公开谈到朝鲜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日本也没有真正要改革的意思。1894年10月，井上内相自报奋勇降格为公使，前去进行“朝鲜的改革”，但这只是因为如果不作出一点改革的成就，就显得侵略主义太露骨，面子上不好看了（9月24日伊藤博文致井上馨的信）。井上到了朝鲜后，首先就把朝鲜王族大院君赶下了台。大院君是在三个月以前，为了驱逐王妃闵氏一派的事大党的势力，由日本政府和公使强扶上台的，而公使一换，马上又被逼下了台，于是闵氏的势力又立刻增大，巩固的亲日政权根本建立不起来。作为“改革”的财源，井上要求政府对朝鲜提供五百万日圆借款；但只得到三百万日圆。这笔款项并不是用来搞朝鲜现代化的，而是为了把朝鲜建成日本进攻大陆的基地的“借款”，朝鲜政府不愿接受，经井上强迫才接受的。这种作法“改革”当然办不到，井上任职一年就放弃“改革”回

日本去了。他的后任是退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他在1895年10月8日指使日本警察和国权主义的打手闯入王宫，在寝室中逮捕闵妃，把她杀了，使大院君重掌政权。施展这样的暴虐手段，当然不能使国王替日本当傀儡。这种野蛮行径引起了以俄国为首的列强的强烈抗议，反日派的朝鲜贵族乘势与俄国公使韦贝合谋，于1896年2月，把国王软禁在俄国公使馆内，从那里发出诏书，罢免亲日内阁，煽动民众蜂起，暗杀了数名大臣。从这时起，朝鲜宫廷和政府中的日本势力便衰落下去了。

在经济和商业方面，日本几乎完全垄断了甲午战后的朝鲜市场，但在政治方面却不能对俄国树立起优越地位。井上馨早在1895年5月(任朝鲜公使时)就对本国政府建议说：“总之，在远东单独行事和筹划国家利益是件难事，徒劳无效，密议与俄国联合如何？”(《世外井上公传》四)。1896年2月后，日本政府的慎重派以井上和伊藤博文为首，热心策划举行“日俄协商”，企图通过外交谈判使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地位。根据同年5月，日俄两国公使在汉城签订的协定和同年9月在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礼的山县有朋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的协定，暂时达到妥协。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在朝鲜并没有得到任何新东西，却失去了垄断地位，而俄国反使日本承认它在朝鲜驻扎与日本同数军队的权利和架设电报设备的权利，对朝鲜内政和财政上的“援助”必须由两国共同承担。此后，俄国对朝鲜的政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影响愈益增加了。

这时，朝鲜也出现了民族运动的新高潮。在留美学生和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集团的领导下，成立了“独立协会”，其机关报是《独立新闻》，这是第一个朝鲜文报纸；它既反对日本，也反对俄国。朝鲜国王被软禁一年后能从俄国公使馆回到王宫，就是由于独立协会的民族运动的压力(林光彻《朝鲜历史读本》)。面临这种局势，日俄两国于1898年重新签订协定，约定两国均不直

接干涉朝鲜内政,干涉时要彼此取得谅解,俄国不妨碍日本在朝鲜发展经济的自由。但是,此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仍然继续受到俄国的压制。

日本为什么不能与俄国抗衡呢?这是因为天皇制日本侵入朝鲜,并没有现代的目标,只是在政治上不择手段地一味追求在朝鲜建立日本的统治权,究竟同朝鲜的哪一阶层联盟,也没有定见,昨天援助的一派,今天就抛弃了,在利用最反动的贵族间的朋党对立当中,只能暴露自己的野心,从而得不到朝鲜任何阶层和派别的暂时信任,反倒招致他们的不信任和憎恶,使他们越来越倒向俄国。

日本“改革朝鲜”的经济内容,只是根据军事警察的需要架设电报线,和为了日本更顺利地掠夺朝鲜进行“币制整理”——这是强迫朝鲜实行过于脱离它的经济水平需要的金本位制,并为了以第一银行为代表的日本高利贷资本在朝鲜国家财政中开辟一条寄生性的道路。日本政府也好,人民也好,都没有对朝鲜投下生产资本。汉城至仁川间的铁路,是在日俄战争前由日本资本建设的唯一生产事业。这是帝国主义进行掠夺的工具,但是它的建设并不单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包含着军事目的。

京仁铁路的铺设权和京釜铁路铺设权都是日本政府于 1894 年由朝鲜夺到手的。但是由于资本不足,未及开工,权利就已丧失。1896 年 4 月,美国人莫尔斯从朝鲜政府手里取得了京仁线的铺设权,同时法国资本家企图取得京釜线的铺设权。日本资本家闻悉,惊慌起来。由竹内纲(自由党干事)、大三轮长兵卫(银行资本家)、澁泽荣一(第一银行)、益田孝(三井)、中野武营(股票交易所长)、井上角五郎(北海道煤矿轮船公司经理)等大政商为发起人,后来又有岩崎、三井、安田、大仓等财阀参加,总之网罗了日本的第一流资本家,再加上政府给与巨额补助金和利益保障,好不容

易才从莫尔斯手中把已经开工的京仁线的权利收买过来，1901年10月完成了铺设工作。政府加以维护，是迫于参谋本部的要求。至于比京仁线长达好几倍的京釜线，则迟迟不能着手，因为日本根本就没有余资在朝鲜铺设这样的铁路。战争紧迫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政府突然拨出补助金（根据紧急敕令拨出），方才开工。在日俄开战后的1904年10月，全线开始通车（《竹内纲自传》，《世外井上公传》）。

姑且不说日本侵入朝鲜在经济方面不是劳动群众的幸福（任何民主的资本主义都是一天也不能为劳动群众谋幸福的），甚至也不想开发朝鲜资源作为日本资本的市场，而且根本不去培养朝鲜民族资本的萌芽，只有掠夺式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在那里横行，因此，朝鲜的民众自不待言，就连地主、商人、贵族也都仇恨日本。沙皇俄国虽然也不是朝鲜的亲密友人，但因朝鲜人对日本抱有强烈反感，宁愿更加依赖这个不象日本那样露骨地推行强盗政策的俄国。假使日本当局对扶植朝鲜的独立和现代经济抱有坚定的目标，就会通过援助独立协会或和它近似的现代势力，取得朝鲜进步势力的支持。这样日本会取得利益，也能够对抗俄国，但这对天皇制的日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正确理解日俄战争时，除了资产阶级的因素以外，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天皇制的这种干法促进了战争。

日本不仅加深了它在朝鲜同俄国和朝鲜人民的对立，而且在整个远东范围内，自愿地投入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复杂对立的漩涡中。日俄战争当时，冈仓天心大喊：“欧洲的光荣，就是亚洲的屈辱”，“亚洲是一个整体”。他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统一亚洲，即征服亚洲，但是，使亚洲愈益分裂、愈益陷入屈辱的深渊的却是，自己一面屈服于欧洲，一面侵略邻国来求得补偿的日的天皇制和帝国主义。

甲午战争暴露出一个事实，即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已经腐朽得不能抵抗些微的压力，因而给了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东亚的一个信号。清廷为支付对日赔款，募集外债。这给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各国除了让他们在东亚占领土地和殖民地以外，又从新开了一扇通过夺取铁道利权和政治贷款方式来统治弱小国民、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大门。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和其他一些条约，取得了轻易向中国输出工业资本的特权。但是，日本资本主义无力运用这些条约，结果这种特权却等于替那些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其他列强，特别是替英国开辟了输出资本的道路。沙皇俄国肆无忌惮地从满洲北部向南入侵。俄国一面与山县大使签订关于朝鲜的协约，一面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密约，为对抗日英而结成中俄军事同盟，并取得了在满洲的铁道铺设权。1898年取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道及其他铁道的铺设权和采矿权。法国、德国、英国都争先恐后地从中国夺取了租借权和不割让协定。美国当时忙于吞并非律宾，吞并成功后，也露出它对“直接毗连菲律宾的中国市场”的欲望。美国的远东政策迟了一步，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就是要求给后来的人也分得一份。

在小小的朝鲜国里，如前所述，除了日本以外，还有俄国、法国、美国在竞相争夺朝鲜的铁路和矿山等权利。

日本当然不能坐视这种情况。前面已经指出，日本还没有具备一个够格的帝国主义应有的实力，因此它更急于在列强把远东瓜分完毕以前尽量多分得一杯羹。1899年1月，英国的倍列斯福特卿在日本作了一次演说，旨在使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提倡日、英、美、德四国同盟。当时，连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并且已经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幸德秋水也批评这是实际上瓜分中国的同盟。他说：“根据马关条约开辟的中国市场，究竟对日本有多大利益？我国领事不是十分茫然苦于无聊吗？不是徒使外国商人高兴吗？东

华纺织厂始终没有结果，京仁铁道也缺乏资金，本国的台湾铁道尚且无力着手铺设。这个缺乏资本、工商业萎靡不振的日本，有什么必要参加四国同盟？”。但是在两个月之后，当意大利向中国要求租借三门湾时，他却说：“它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是值得赞叹的”，又说：“当此瓜分中国之势迅速进展的时候，沉默一天岂不就落后一天，我们特别要促请当局注意”。同时他还主张：“在英俄角逐之中，我日本之向背，立即决定其雌雄。日本为何不抓住这个良机呢？”，他惟恐日本在列强瓜分中国时落后于列强而万分焦虑（《倍列斯福特卿的四国同盟论》，《意大利的要求》，自由评论社刊《幸德秋水评论和随想》）。

至于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羡慕和焦躁，更是可想而知的了。例如加藤高明（他最初是三菱公司的职员，娶岩崎的女儿为妻，后来当了外交官）在出任驻英公使的1898年，对第二次日俄协定表示愤慨，向外务省提出一份质问书说：“现在英、俄、德、法各国均从中国取得了所期望的割让，远东事件^①已告一段落。我帝国政府拥有东亚无比的势力，此时是否应该默默无为？或者象发给本使的电报中所说，5月取得赔款后，是否准备采取一大飞跃的积极方针呢？”。加藤在这以后不久，因对政府的“软弱”感到失望便辞去公使职位，经过朝鲜和中国旅游后归国。回国后，他不主张主权主义者之流的“对华空论”，而竭力主张日本在中国取得和扩大“贸易、工业、矿业、铁路等”的经济利权。他在1900年10月出任第四届伊藤内阁外务大臣，一直主张不辞一战的对俄强硬政策和日英同盟论（《加藤高明》上）。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田口卯吉在1898年发表的《对外国是》论中说：“我所期望于国家的，不是扩张版图，而是增加财富，不是在大陆上开辟土地，而是使贸易集中于我国”。他提倡反封建的、帝国主义以前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市场开

^① 指1896—1898年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竞争。

辟论。在军备方面，他反对扩充陆军，要求“必须依靠海军制服敌人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我国海军封锁海参崴，时时向市内投掷炸弹”，“要使日本帝国的各港经常保持安全，使亚洲大陆的商业时时有危险之虞”。他的好战心理，可以说达到了疯狂地步。

日本的天皇制和资产阶级认为，尽管经济实力不足，但如果估计到下述几个因素，帝国主义的野心是可以达到的。这些因素是：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虽然不象加藤高明说的那样是“无比强大”，但是独占鳌头，同时距离欧美列强较远，邻近各国弱小，地理上占有优越地位，并且列强在本国和亚洲都严重对立，互相牵制。第二任台湾总督（日俄战时的首相）桂太郎在1896年7月向政府提出一份很长的意见书说：“中国一旦发生事变，列强必将竞相割据它的土地，以达多年来的宿愿。此时，欲乘风云而扩张国势，必须预作准备，即割据华南福建一带归我所有是也”。同时，他预料会有人认为这样强行侵入大陆与列强接壤后必将引起纠纷（已有辽东半岛的先例）而加反对，他为了反驳，继续写道：“即使与列强接壤，而列强只是扩张版图和开拓殖民地而已。其本国的主力远在欧洲，而且列强彼此嫉妒反目，伺机倾轧，形成一日不能苟安之势，十分清楚，绝对不能将其主力扩展到隔绝的异域（中略）。利用台湾的地利在华南扶植我国势力不仅不是难事，亦地势所使然者”（《公爵桂太郎传》乾）。这不仅是台湾官僚军人的好大喜功，也是山县、伊藤等人一致考虑的天皇制的最高国策，帝国议会也是这样督促政府的。这种政策的第一个收获，就是1898年日本从清政府取得不把福建省割让给他国的诺言。两年后的1900年，日本甚至试图占领这个地方。

1900年初春，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斗争。这就是义和团起义。这个斗争一开始就是针对欧美各国的，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必须要参加镇压。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这是

一个良机，积极地参加了俄、英、法、德、美、奥、意的帝国主义联军。日本提议派陆军，最初列强不欢迎，只是未加反对。但当列强情势一恶化，它们也就只好承认可以向中国迅速动员大军的唯一国家——日本派遣大部队了。参加镇压义和团战斗的兵员：日本二万二千，俄国八千，其他各国共计三万二千名。他们于8月14日占领了北京。英国和德国的大军（各一万二千名）是在这以后到达北京的，因此日本军队在这次战争中充当了联军的主力，并且意外地在列强面前得以来了一次示威。甲午战争以后，英国估计日本可以是它在远东对抗俄国的守卫人，这次见到日本的军力，它更加相信利用日本的价值了。这是不是日本天皇制的荣誉，我不知道，但是作为北京占领军主力的天皇制军队，在帝国主义联军犯下的亘古未闻的无耻行径中，即在残杀市民、奸污妇女、掠夺和破坏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也充当了极不光荣的主力（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的史的研究》，东亚经济调查局出版《中国近代农民经济史研究》）。

当北京战事方酣，各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华北的时候，山县首相和桂陆相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及儿玉台湾总督等人，计划乘机占领台湾对岸的福建，一举达成宿愿。在这以前，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曾视察福建，在厦门设立本愿寺^①的传教所，收买厦门市士绅等，进行了占领福建的其他准备工作。等到义和团事件刚一扩大，桂陆相和山本权兵卫海相认为时机已到，经山县首相和天皇的批准后，首先拟定占领厦门炮台的计划，并通知了儿玉总督和停泊在厦门的军舰“和泉”号的舰长。

8月15日，山本海相打电报命令“和泉”号舰长，“如果厦门地方形势不稳或有其他可乘之机，应借口保护帝国侨民，派若干兵员登陆”，切勿失机。24日，接到报告说，本愿寺传教所“被暴徒烧

^① 日本真宗佛教总寺院。——译者

毀”，陆战队马上登陆了。儿玉总督也立刻从台湾派出一旅军队前往厦门，并派后藤新平长官首途前往。28日，后藤与“和泉”号舰长及厦门领事商议，决定了占领厦门炮台和电报局的详细步骤。这时两个中队的先遣部队已经乘船抵达港外，其他部队也将离开台湾。

这时儿玉总督接到东京政府的一份电报。“我国政府认为现在不是占领炮台的时机！”于是，一切都完了。（《后藤新平传》二）。儿玉大为愤怒，痛骂政府，山县内阁也因此而引咎辞职了。这个计划所以突然中途停顿下来，据后藤新平的传记载，是因为伊藤博文得知山县内阁这个暴举之后大为震惊，从大矶赶到东京加以制止的。但是根据当时的报纸《日本》的报导说，一碰到英国领事的抗议，态度就马上软化了。如果说，伊藤制止了山县是事实，那末就是因为北京已经陷落，列强有了注意华南的余暇。他认为占领厦门的时机已失，害怕英国反对，也就是说趁火打劫没有成功。

冲昏头脑的军阀和其他国权主义者都从这次失败中得到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日本既没有单独参加帝国主义竞争的實力，又不能模糊地单靠利用列强的对立来钻空子，必须同某一国家结成联盟。这点，井上馨等人五年前在朝鲜就体会到了。山县有朋的那一篇主张日本和“欧洲的一国”结成同盟的“东洋同盟论”，就是在这以后的1901年4月写的。他的门徒——傲慢的军阀桂太郎在1901年6月第一次组阁时，规定国政的最高方针是：“独力担当远东大局，实属困难，必须相机与欧洲某一国缔结某种协定”。因此，采取伊藤、井上等人很久以来主张的日俄协调，还是采取山县、加藤高明所热烈建议的日英同盟，成了官僚军阀意见对立的焦点。关于这一点，根本没有容许议会置喙。

日英同盟论是提前导致日俄战争的路线，日俄协调论是鉴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暂时隐忍自重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没有原则性的对立，不能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立场同封建主义立场、好

战的立场同和平的立场那样的对立。这从伊藤内阁任用加藤高明为外相、任凭他实行强烈的排俄亲英政策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伊藤和井上、山县和加藤，他们在如何使日本便于侵入朝鲜、满洲这一目的上是一致的。日英同盟反对论所担心的是，恐怕由于结成这个同盟，“可能不幸地被迫放弃面向满洲最有前途的工商业的利益”（1901年8月28日，井上馨致都筑馨六驻俄公使的信）。然而，事实上俄国在义和团事件以后，把大军驻扎在满洲，很快就使整个满洲变成俄国的半殖民地，日本如果也想打入满洲，那末日俄协调就没有意义了，因此，1902年2月，缔结了日英同盟。自从三国干涉以来，日本的统治者决心要走日俄战争的路线，可以说这时已经确定了。尽管如此，日本还没有同俄国正面冲突的信心。1901年3月的元老会议，虽然对俄国侵入满洲感到威胁，但作出决议：鉴于我国武力不足，暂时应隐忍自重，“这时我方的行动只好限于英、法、德同意的范围内”，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要列强承认日本也在“浙江、福建占一地位”（《伊藤博文札记》）。

天皇制和资产阶级虽然痛感自己这样软弱无能，但已经不能再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了。正因为它们本来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比欧美列强软弱，所以才被迫走上了军事冒险的道路。假使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强大，并且一样现代化了，那末在朝鲜的俄国反日势力就不见得如此发展。从贸易方面来看，尽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很激烈，俄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侵入满洲和朝鲜，而向这些地方输出的日本商品却仍然年年激增。1904年前后，并不存在必须诉诸战争来加以清除的任何障碍。不过，从日本同德国关于大冶铁矿的竞争和同其他国家在朝鲜的铁路利权的它竞争中可以看出，日本在经济实力方面实在不能对抗列强，因此它想利用军事力量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日本经济之所以必须绝对依靠大陆，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向

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一般固有的矛盾，正如前节所述，还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在利用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及其固有的基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上，一面具有根深蒂固的军事性质，过早地发展到垄断资本萌芽的地步，另一方面，使得整个经济结构停留在非常落后的贫弱阶段，因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就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激烈了。因此，如果从天皇制和资产阶级地主的立场来解决这个矛盾，就不得不以军事冒险作为主要手段。因此，经济结构的矛盾就愈益激化，这就更加剧了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和领土野心，起了一种相乘的作用。这样，在天皇制的一个冒险之后，必然产生另一个需要进行新冒险的新的对手，即一次战争产生另一次战争。这就是使日俄战争变成不可避免的日本方面的情况。

要弄清战争在1904年爆发的因素，就必须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和俄国的动态以及英国和美国的态等等国际情况。我在这里不准备作这样的分析。但是使日本能够决心开始和进行这场战争的，当然是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日俄战争实质上是英国同俄国的战争，这在当时已经十分明显了（《列强纷争的真相》，1904年4月《周刊平民新闻》，《幸德秋水选集》三）。

日俄战争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它的客观条件和主角也大不相同了。尽管两国都是帝制，但1904年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不是1894年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他们丝毫也不再掩盖垄断市场和垄断利权的帝国主义目的。这在前述的统治阶层的意见中是很明显的。开战当时，清浦农商务大臣说：“这次战端，不仅由于政治上的必要而开战，主要目的也在于向中朝两国大大发展我国工商业”，“世上往往认为日俄的局势是两个帝国主义的冲突，这就是日俄通商政策在中国和朝鲜冲突的意思”，他自己就承认这是帝国主义的战争。阪谷大藏次官^①说：“这次战争是出

^① 即财政部次长。——译者

于保全中国和保持朝鲜独立的目的是，精神不外乎使我工商业处于平等地位”，他仿佛在阐明“保全中国”和“朝鲜独立”的真意，不反对门户开放，但马上又说：“日本人要坚决肩负开发朝鲜和中国满洲的责任，这是很清楚的道理”，暴露出帝国主义垄断的意图。根据这样的战争目的，资产阶级已不仅被天皇制动员起来，而是积极推动战争。这点从上面的叙述看来也是清楚的。前面提到的田口卯吉于1904年11月在东京和大阪组织新闻杂志记者大会，竭力制造开战舆论，说：“满洲问题不解决，就谈不到工商业的发展”。儿玉参谋总长在决心开战前也邀请澁泽荣一：“如果实业家说开战”，马上就可以打，“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打，战争就无法进行”。他探询实业家的决心，并号召实业家协助。澁泽当然响应他的号召，同邮船公司经理及其他大资产者一起，为了整备战争经济体制进行多方活动。幸德秋水目睹政府在战前和大资产阶级进行的这些频繁接触，综观满洲的市场意义，揭发了金融垄断资本家所扮演的角色说：“实际上掌握宣战和媾和关键的，不就是一种放款业者吗？不就是号称银行家的放款业者吗？”，（《伯爵清浦奎吾传》上，《青渊回顾录》上，《田口卯吉全集》五，《幸德秋水选集》三）。

这种公开的帝国主义战争不象十年前那样，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伪装成为人民战争了。日本人民并不是白白度过这十年历史的。在过去，“劳动组合”、“佃农组合”、“社会党”、“社会主义”这些东西，虽然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是现实的东西，但在日本还认为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仅仅这种可能性已经使统治阶级发抖了，现在它们却作为日本的现实开始萌芽了。掀起了片山潜、幸德秋水、堺利彦等领导的伟大的反战和平运动，使人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激发了基督教徒内村鉴三，产生了诗人与谢野晶子的古今杰作《君莫死》。日本的近代历史，一方面是充满屈辱的历史，我偏重地写了这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人民

也用他们的血和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现在和将来都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光荣历史。其中也包括上述这些人。

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究竟应该从哪一年算起？是参加帝国主义列强联军镇压义和团事件的1900年？还是发动日俄战争的1904—1905年？可能有两种意见。其实，这两种意见没有多大出入，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确定一个国家恰在哪一年进入帝国主义，只能说从哪一段时期起进入帝国主义，也就是说有一个相当的幅度。不过，我认为1900年是划时代的一年。理由是这一年日本积极参加了上述国际帝国主义战争，在国内改革了选举法，伊藤博文创立了政友会。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和绝对主义天皇制订立了同盟，这个同盟是与制定治安警察法——镇压工人和农民斗争的法律相适应的（这个法律在形式上继承了旧的集会结社法和旧刑法中关于工农业妨害罪的规定，但实质上是针对同这些前期法规在本质上不同的、已经发展起来的日本的阶级关系）。这也就是说，这里集中地表现了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在1900年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同时在经济方面，财阀的垄断组织在这一年的前后建立起来了，尽管严格说来，还不能说这是日本已经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标志，只能说它向这个阶段迈进了一步。日本已经明确地追随国际帝国主义，而且它本身也表现出帝国主义的行径，因此我是采取1900年的说法的。但是，这个帝国主义按照惯用的用法，还是通常加引号的“帝国主义”，非正规的帝国主义。就是说，国家权力既没有转到垄断资产阶级手里，向北京派兵的主力也还不是垄断的资产阶级。同时，寄生地主制还没有完全失去独立性而从属于垄断资本主义。这些事实在日本是从未有过的。在日本，一向是天皇制的军人和官僚们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中枢。

我之所以突然从日本人民的光荣历史转回来谈屈辱的历史，并且还提出一些烦琐的议论，是为了想在这篇论文末尾介绍如下

的事实,即从1900年这一年起,已经出现了站在人民立场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卓越的批判,这个批判仿佛恰恰预见到今天的日本似的。一年前,这个人曾错误地要求日本不要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中落后,他就是幸德秋水。秋水在这一年的11月17日在《万朝报》上写了如下的论文:

“在英国的大选中,所谓的帝国主义胜利了。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也是所谓的帝国主义胜利了。因此人人都说,帝国主义是世界的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我国人民也不能不以此为主义和目的。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帝国主义似乎“就是以武力或者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来扩张版图。欧美列强彼此间的经济竞争激烈不堪,竞相开辟新领土,过剩的生产产品迫切需要市场,所以大力推行扩张领土的政策”(中略)。“欧美的帝国主义是由于国力的扩张,至少是由于资本的扩张,这种行为的是非和结果的利害,姑且不论,总之必须有这种扩张才能谈得上帝国主义。而我们日本,外交无能,财政困难,资本家和经济市场现在都极为萎靡困顿,因而不论怎样炫耀陆海军备、主张帝国主义,而这种主义既不属于人民,也不属于资本家,仅仅是军人的帝国主义,仅仅是纸老虎的、绣花枕头的帝国主义。现在举国醉心于这种纸老虎和绣花枕头,为国家的前途着想,岂非不胜寒心。”

我现在要替秋水加上一句,即这个主义不仅是纸老虎的、军人的帝国主义,而且其实还是从属于强大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幸德秋水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在发表这篇文章的五个月以后的著作《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书中,更为详尽和尖锐了。这里摘录其中一节。

“有人说‘贸易跟随着国旗’,然而历史表明,跟随着国旗的是毁灭(中略),我相信,将来美国万一发生国家生存的危机,其危机决不在于领土的狭窄,而是在于漫无止境的领土扩张;不是在于对

外势力的不张，而是在于社会内部的腐败堕落；不是在于市场的短少，而是在于财富分配的不均，在于自由和平等的灭亡，在于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

“欧美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借口资本过多和生产过剩，而日本的经济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欧美各国如果建设大帝国，无疑必将走向腐败和毁灭，不过，尚有若干年间夸耀其国旗的虚荣。至于我国日本，如果建设帝国，岂能维持一日！岂能因拥有大量军队和军舰而妄自称为帝国主义！我日本帝国主义，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中略）国力日尽，民命日促。如果这样滔滔不知所止，不过数年，我相信，这个东洋君子国的二千五百年历史只会变成一场黄粱梦了。”

第三篇 对伟大社会主义 革命的武装干涉

——日本帝国主义毁灭的预兆——

序章 米骚动和入侵西伯利亚

1918年(大正七年)8月2日晚,日本帝国政府发出“告示”,宣布帝国政府“接受美利坚合众国的提议”,为了救援在西伯利亚被德奥俘虏军折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将迅速整备军旅,首先派往海参崴”,并宣布帝国政府在出兵中“将经常尊重该国的领土完整,同时声明不干涉内政的既定方针,达到目的后,便迅速撤兵,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不侵害其主权。”

当天,第十二师团接到动员令。8月3日,天皇嘉仁批准了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的编制。

就在这同一天,富山县中新川郡西水桥镇的渔民的妻女约三百名,团结起来,去找市内的老财,诉说生活困苦,要求他们考虑减低粮价。这件事马上传遍全县各地,到处发生群众动荡不安。

8月8日,第十二师团的第一梯团从门司和宇品两港出发,前往海参崴。第二天,天皇亲自任命陆军大将大谷喜久藏为派遣军司令官。

11日,派遣军先遣部队很快在目的地登陆。从师团动员到今天的八天之间,隔着日本海与海参崴遥遥相对的富山县沿海一带,以渔津镇为首,滑川、东水桥和西水桥、生地、泊、四方等其他各村镇的渔民妇女,自发地掀起暴动,数十人或数百人结成一伙,闯入

米店或村镇公所，跟警察发生多次冲突。

“越中地方妇女暴动”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国。从9日到11日之间，在京都、名古屋、大阪及其他各地，群众纷纷暴动；近畿、山阳、东海各地方的大小城市，也都开始动荡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12日，海参崴派遣军司令官大谷大将，在好多的将军和高官高呼万岁声中，抱着必胜的信心从东京车站起身登上征途。18日在海参崴登陆，当即开始了对日本军及英、美、法、捷克联军的总指挥。

这位远征大将军的出征，若在正常情况下，一定会是容光焕发，威风凛凛，群众欢呼万岁之声响亮得达到大海对岸的敌阵。

然而，1918年8月12日至18日这一星期期间，正是六千万饥饿的群众喊叫“要米！减低米价！”的声泪俱下的哀号，压倒了嗜血成性的帝国主义者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好战叫嚣声。

大谷司令官沿途经过的各地——名古屋、京都、大阪、冈山、吴、宇部等车站上，等待着他的不是挥舞着太阳旗的忠良臣民，而是为了粮米而掀起暴动的群众的呐喊。对军国主义者来说，确是很不妙的大杀风景的出征气氛。但是他们中间能有几个人会预料到将来必定要有一个比这更不妙的下场呢？

就连有名的帝国主义军事评论家，也不得不这样写道：“西伯利亚出兵是我国国防史上黑暗的一页。驻兵四年有余，消耗了九亿元战费，军司令官更换三次，动员了好几个师团，其间战争目的变更三次。且不说领土问题，即便在势力圈方面、经济方面、道义方面都几乎一无所得。忠勇的官兵在西伯利亚的原野上同所谓‘过激派’^①作战，由于兵力不足和战略失误，发生了庙街惨杀事件、田中大队和石川大队全部被歼等惨剧。对外则使各国怀疑我国有野心，对内则增加人民的不满和疑惑，终于一无所获而撤兵了，

^① 指苏联布尔什维克。——译者

真是一件可悲的事件”(伊藤正德《国防史》，1941年)。

不是“终于一无所获”，而是给国民带来史无前例的耻辱。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可憎最可耻的战争，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谁计划、准备和执行的呢？日本是不是仅仅由于“接受美利坚合众国的提议”而出兵的呢？日本的武装干涉者们除了企图扼杀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列强共同目的之外，还抱有什么自己的目的呢？日本军队失败的原因何在？是否由于将军的无能这一偶然因素呢？庙街事件的真相如何？最初一批出征军的出发与米骚动完全在同时，最后一批部队的撤回又与普通选举法、治安维持法的公布在同时，这仅仅是出于偶然吗？关于这些问题，要想通过掌握有关事实的确切资料来具体加以解答，那是颇为困难的。

这是因为日本的统治者们一向不愿意让人民知道真实情况，而关于西伯利亚出兵事件和米骚动又特别隐蔽它的资料，并歪曲事实。

例如，出兵的最初借口是“救援捷克军”，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日本就几乎找不到记录真实情况的文献。我想把这些事实尽量揭露出来，加以正确的叙述。我国有一些进步学者，偏爱理论，轻视仔细调查事实。但是，仔细调查西伯利亚出兵事件，譬如对解答下列理论问题，将会提供真实的基础。

有没有所谓的双重的帝国主义呢？

日本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党，究竟和绝对主义势力有什么不同，不同到什么程度？

绝对主义天皇制的独特性是什么？

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更进一步吸取这一不幸事件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教训，把我所能知道的一切事实写在下面。

第一章 武装干涉的主角

第一节 外务省和参谋本部

我国过去的几乎全部文献，都把出兵西伯利亚写成最初是因外国的要求而成为问题的。

就连强调西伯利亚出兵“不是真正的国防战”的前述伊藤正德以及清泽冽的《外交史》，（《现代日本文明史》三）（它是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对军部一派的“强硬外交”的抗议书），也都把西伯利亚出兵说成是由于外部的促使。军国主义者的文献，虽然强调这次出兵，日本具有自卫的目的，但不说这次出兵一开始就是日本主动计划的。例如，关于这一问题写得最详细的文献之一，大津淳一郎的《大日本宪政史》卷八就是这样。又如出兵当时的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的一个长篇的传记——《后藤新平》（鹤见祐辅编，共四卷）一书的正文，与书中所搜集的资料相反，也把日本的出兵写得仿佛是由于协约国的要求。

这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正确。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向全体交战国提议不赔款、不割地的和平建议。12月1日，法国总理克雷孟梭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私人秘书赫斯上校会谈，主张日本应该在对德战争中代替俄国，希望日本出兵西伯利亚。

赫斯反对这个提议，他不相信日本能恢复一道新的对德东部战线^①。

^① Seymour, Charles: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Vol. III, p. 389. Boston, 1928.

堪特罗维奇著，掘江邑一译《中国争霸战和太平洋》上卷。堪特罗维奇的这部著作是最可凭信的书籍之一。但是，不知是误译还是错字，年代和日期往往错误，也有一些意思含糊的地方。

第二天，在巴黎协约国会议上，联军最高司令官福煦元帅建议，为了援救南俄罗斯的反革命派和罗马尼亚，要求日美联军占领海参崴—莫斯科之间的铁路。但是，日本委员借口困难，激烈反对，据说这个提案撤消了^①。

12月14日，驻东京的英国大使根据本国政府的特别训令，访问外务省，开始谈判出兵问题^②。谈判内容，大概和1918年1月1日日本驻伦敦大使珍田舍巳从英国外交部次长罗伯特·赛西尔那里收到的提案一样。

那就是：为了防止“敌国”——表面上是德、奥，其实是苏俄——在西伯利亚获得军需品，派遣以日本军为主、并有英美小部队参加的远征军^③。

根据美国驻日公使茂利斯的说法，在这年12月14日以前，日本政府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西伯利亚出兵问题。美国国务卿兰辛的12月17日的日记，仿佛证明了这种说法。他写道：“日本大使说他的政府认为向西伯利亚派遣军队是不明智的，这一点和我们（美国）的意见是一致的。”^④

但是，三个星期后的1918年，1月17日，情况就完全变了。这天，美国大使茂利斯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日本政府在必要情况下，有单独占领海参崴、管理中东铁路和阿穆尔铁路的意图。”^⑤

①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八卷十七篇六章。鹤见祐辅《后藤新平》III第三章。这两部书关于西伯利亚出兵的外交经过都写得很详细。两部书的记载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过《后藤新平》中包含很多原始史料，这点比《大日本宪政史》强得多。它除了根据后藤家的文献部分以外，还载明根据外务省的《关于西伯利亚问题帝国与联盟列强间交涉经过大要》。《大日本宪政史》大概也根据这个资料。我因为无法看到外务省的记录，所以只好根据其他史料，批判地使用了上述两书。这两本书关于外交交涉的记载当然不是毫无隐蔽的。

② 劳合·乔治著，内山贤次译《世界大战回忆录》，卷八载有英国在1917年12月建议日本进行武装干涉的事。关于日期和建议的内容，没有记载，但也提到了英国的干涉意图，大致如本文所述。

③④⑤ Girswold, A.W.: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根据这些史料，公然提议进行武装干涉的，是英、法两国，特别是英国，而日本仿佛完全是处于被动。

然而，这不过是日本的外交策略而已。英国外交次官赛西尔于1918年1月8日写给他的上司白尔福外相说：“日本人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意图，但当别人提议要作某件事情时，他们却大发雷霆。如果他们不是十分冥顽不灵，为了保卫我们军需品的储备，由一支实质上是日本军，但为装饰门面，由少数英国军和法国军参加的军队在海参崴登陆，这种方案无疑应该是恰当的。”^①

日本政府固然没有轻易说出自己的真正意图，但它并没有盲从英、法。日本政府是在贯彻它最擅长的“默默实干”主义。

十月革命一爆发，哈尔滨的领事团就倡议由各国干涉革命，以“维持秩序”。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唆使中国政府向东北北部派兵，12月，便与反革命分子俄罗斯人霍尔瓦特（前中东铁路长官）的军队联合起来，解除了革命的中东铁路守备队的武装。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名义上由中国接管了。

当时中国政府由于巨额的西原借款，在财政方面受着日本的束缚。又因这年5月被日本强加的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军可以进驻东北北部。这些事实就意味着东北南部的日本军随时可以向北部进击。因此，美国国务卿兰辛竟于12月29日训令驻华

States, New York, 1939。根据此书引用的文献。本书的日译本有金钢石社出版的柴田贤一译《美国远东国际政策史》。日译本常常漏译了原书的重要脚注。本文所引的兰辛日记就是原书的脚注，这在日译本里是没有的。正文的翻译也由于忽视事实，误译的地方很多，这就大大贬损了原书的特点——“正确的事实”的价值。

其次关于④，根据前引堪特罗维奇的著作译本，载有：“1917年11月中旬，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列强，日本有意以独自行动和相当赔款为条件进行干涉”。这是原书或日译本的错误，应该是1918年1月中旬。不这样，就与其他事实矛盾。日译本的这一部分，常常把“12月”误译作“11月”。

① 前引Griswold的书中所引Dugdale: Arthur James Balfour, New York, 1937。

公使警告中国政府，北京政府军不要与俄军发生武装冲突。英国公使也唯恐中国军队趁此机会产生收复失地的欲望。最初唆使中国出兵，不久又认为有些过火，发出警告。列强终于1月初旬迫使中国军队从东北北部撤退了。围绕着干涉俄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日本军队和协约国间已在东北北部开始了最初的暗斗（前引堪特罗维奇和格里斯沃得的书）。

日本军部在革命前就在外贝加尔地方布置了周密的谍报网。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就已作好“为了护侨”派遣军队的准备，11月14日，布尔什维克发表停战的那一天，在满洲里马上对布尔什维克宣战的哥萨克的谢苗诺夫上尉，很快就同关东总督府取得了联系^①。作为满洲观战武官驻在俄国战线上的荒木贞夫中校和黒木亲庆上尉由于参谋本部的特别命令转回西伯利亚、北满，1918年1月以后，指挥了谢苗诺夫军。

海参崴方面也有了周密的准备。

日本政府和军部对英法的出兵提议，虽然感到不愉快，但他们不是用文件，而是用军舰答复了这一提议。1917年12月30日，早有一艘日本军舰（舰名不详）驶入海参崴。驻海参崴的日本总领事通知滨海省地方自治会议长和海参崴市长，这次派遣军舰完全是为了护侨，“帝国政府完全无意干涉俄国政体”^②。1918年1月

^①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中卷。本书的记述很多地方是所谓志士的豪言壮语和夸张，时间上前后颠倒也很多，不能一概相信。但关于上述事件中的人名、地名和日期都有确凿记述，并且也和事件的发展一致，尚可相信。关于谢苗诺夫军的建立和行动，可以参看 Ross, E. A.: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1933。著者 Ross 在十月革命时亲自视察俄国的实地情况，后来对苏维埃的成立和发展也作过仔细研究。他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在序文中说，本书的目的是要记述俄国的“赤裸裸的真实”，因而相当正确地记述了现象。他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② "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Published by the Special Delegation of the Far East Republic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1922。本书是远东共和国（本文第四章第二节有说明）的代表在华盛顿

12日,日本政府公开声明,为了“保护侨民”派遣“石见”号和“朝日”号两艘军舰开往海参崴^①。香港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马上也把军舰派往海参崴去了。

1月18日,海参崴市长对日本舰队提出侵犯俄国领土主权的抗议,但是日本置之不理^②。

这样,在行动方面,日本比世界任何国家都领先干涉了俄国。不仅就远东来说是如此,即便就整个俄国来说,英国海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是1918年2月下旬,这比日本舰队开进海参崴晚四十多天。不仅在军事行动上,而且在外交交涉上,日本的武装干涉主义者也没有落后。

据当时的邮电大臣田健治郎在1918年4月24日的日记条中载,伊东巳代治(枢密顾问官、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委员,阁外最有力的政府协助者)告诉田健治郎在那两天前使外相本野一郎辞职的理由说:“如你所知,我是主张对俄国出兵的,但出兵属于国家大事,必须有个正当的名义。一是帝国的自卫,二是协约国的共同作战。若为自卫而出兵,就必须有远东迫于危险的事实,如为共同作战而出兵,必须有英、法、美等的联合要求。而本野外相在这两个事实都未具体化时,便仓率与英、法、美试谈出兵问题,也不顾美国暗中表示反对……”。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在协约国提议以前,显然就已有了独自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意图,并且进行了外交准备。

本野一郎自从进入外交界,几乎一直担任对俄国的工作或与俄国有关的工作。尤其在他担任寺内内阁的外相以前,从1906年

会议上控诉日军不法活动的文件。日本军舰早在1917年12月30日就开进海参崴这一事实,在 Schuman, Frederic: “American Policy Toward Russia since 1917” 中也是引用“New York Times”的报导而记载的。

① 《元帅上原勇作传》,《元帅寺内伯爵传》。

② 前引罗斯的书。

到1916年，任驻俄国公使，在莫斯科整整驻了十年，被公认为当时最卓越的俄国通。从1907年第一次日俄协定(瓜分满洲和蒙古的秘密协定)起，到1916年第四次协定(扩大第一次协定的宗旨，缔结旨在瓜分中国的、事实上的对美军事同盟)为止，所有对俄关系的工作，无一不是由本野经手的。通过这些工作，他认识到，日本在远东逐渐对沙皇俄国占据优势地位。当沙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缺乏军火时，本野也曾为使日本供给军火而大力进行斡旋。

最有兴趣的是，二月革命后，日本政府仍然继续供给临时政府武器弹药。为了便于偿付价款，甚至还承受巨额的俄国财政部证券，以示援助^①。对天皇主义者来说，尽管是颠覆别人的帝制，是最可怕的革命，但只要有个资产阶级政权，也就可以忍受下去了。同时，本野等人可能认为俄国作为日本的竞争对手，已经不足惧了。

这时十月革命爆发了。偌大的俄罗斯帝国变得四分五裂，它已经不再是日本的第一个假想敌国了^②。现在正是把远东西伯利亚从欧俄割裂开，作为日本领土或势力范围的绝好机会。这样一来，满洲和蒙古就不是同俄国分享，而是全部落在日本的势力之下。从本野独具的机灵的和顽固的性格来看，不难想象，他是热衷于这个计划的。

据《东亚先觉志士纪传》载，据说本野在“俄国革命后，马上主张迅速向西伯利亚出兵，在贝加尔湖以东建立一个缓冲国，并同原参谋总长共同策划实行这个主张”。这个“据说”可能是真

^① 《元帅寺内伯爵传》。日本政府承受的俄国财政部证券为：大正五年十月发行的一千五百五十万日元，大正五年二月发行、六年二月转期的五千万日元，大正六年九月发行的一亿零五百万日元(其中七千万日元是大正五年九月发行的，这时转期)，此外未记明发行年月的五千一百六十六万七千日元，共计二亿二千二百一十六万七千日元。二月革命后1917年9月以前的，占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

^② 本野和日本军部、官僚、资产阶级都认为布尔什维克无论如何没有能力掌握政权，这从本书后面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另外，本野认为日本这时应该“直接地、牢固地立足于西伯利亚”的意见书等等，这类资料将在后面叙述。

实的。

上原勇作代表的参谋本部,是最热心的、最顽固的武装干涉主义者。事实的发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后述),也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他们究竟从何时开始策划武装干涉,没有正确的资料可查。不过,一贯专门策划进攻俄国的参谋本部,假如真是在外国提议后才考虑干涉的君子,那末他们就不会在进行武装干涉不到一年的1919年已经明摆着要失败的时候,还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坚持继续干涉。

帮助参谋本部和本野外相积极策划武装干涉的,是内相后藤新平。他从前以台湾民政长官闻名,曾任第一任南满洲铁道公司总裁。他和本野一样,是同沙皇俄国争夺满洲的、日本最初和最大的殖民政治家,彻头彻尾的谋略家。

后藤在二月革命后不久的1917年夏天,就大正7年(1918年)度的预算案写了一份长篇意见书,其中提到:“鉴于俄国最近的局势及欧洲战后的经过,或许需要我陆军采取行动,也未可知”,因而主张建立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制度,确立正式的战时财政。这里所谓的“陆军的行动”,当然还不是预想干涉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预想俄军溃败后如何对抗德军入侵俄国。但是,这时他已经考虑到日本不久会向西伯利亚出兵了。

在十月革命后的12月下旬,后藤在他的备忘录里说,俄国土崩瓦解,德军有东侵之虞,针对这种情况,为了“镇守东亚的使命”和“帝国的自卫”,应该赶紧出兵西伯利亚。又说,“根据与盟国的协议,如果由帝国派遣必要的警备军管理从海参崴到俄国首都莫斯科的铁路线,就是说以战时警察军的名义出动,而不以征服为目的”(联合国警察军的先驱者!),凭借“警察军的出动”来完全掌管阿穆尔铁路和海参崴,因此“势必要在哈尔滨、伊尔库茨克、或贝加尔湖以东各地驻扎我国警备军队”。同时,据说北京政府为了镇压

北满的革命军,已派遣了军队(这是1917年12月末以前的事。从这句话可以推测这个备忘录是1917年内写的),“帝国政府应该代替中国亲自救护最近陷于无政府状态的哈尔滨”。值得注意的是,后藤在这里提的干涉战略的安排,实际上同日本的干涉完全符合。这不能看做是偶然的符合,使人不得不想到他和参谋本部有一定的联系。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家罗斯,这时在俄国旅行后来到日本。当他同后藤会面时,据前引罗斯的书载,后藤曾对他透露了武装干涉计划(关于后藤的史料,除另行注明者外,皆根据鹤见祐辅的《后藤新平》)。

总之,日本没有等到协约国的提议,就已经独自策划对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干涉了,其中心人物就是上原参谋总长,本野外相和后藤内相。

第二节 西伯利亚缓冲国的幻想

这些干涉主义者究竟想凭武装干涉要得到些什么呢?尾崎行雄说:“西伯利亚出兵的表面借口是救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但其真正目的,不消说,是要乘西伯利亚无边的沃野陷于无防御状态搞些什么名堂。不论表面上如何掩饰,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其真正目的是不容隐蔽的。”^①三浦观树将军说:“西伯利亚出兵是因为幕后的军人,即参谋本部心想乘机出兵,尽量夺取满洲的土地。”^②

这两种说法都是真的。1918年4月12日,本野外相向内阁提出意见书,以及本野辞职后由内相转任外相的后藤,根据本野意见进一步整理而发挥的日期不明(大概是1918年6月)的意见书,

^① 尾崎行雄《自传》全集第一卷。

^② 《观树将军回忆录》。

对武装干涉的目的有更详细的叙述。他们主张出兵的理由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

1) “帝国自卫的需要”，更正确些说，就是要扼杀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他们说，现在俄罗斯“四分五裂”，这时“德国势力”即将掌握全俄，“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的关系极为密切”，“尤其是西伯利亚的德奥俘虏在德国参谋本部领导之下，与布尔什维克相呼应而进行活动”，德国对西伯利亚的“无限富源”垂涎欲滴，而“布尔什维克派的势力日趋扩张”，必须及早“防范”德奥及布尔什维克的势力。

反革命派的俄国人大肆宣传：在东部战线被俄军俘虏的德、奥官兵，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在俄国各地被布尔什维克重新武装起来，正在对联军进行抵抗。驻在伊尔库茨克的各国领事向全世界散播了这个谣言。于是，英国的遣俄使节团特意前往该地进行调查是否属实，结果，4月26日，公布这是毫无根据的造谣^①。大岛陆相在3月的日本议会上也作证说：所谓德奥俘虏已经编成两个军团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根本连两个大队也编不起来（史料见后）。

这就是说，西伯利亚被德军占领的危险根本不存在，同时日本政府和军部至迟在1918年3月是明确知道这一点的（或者说当然知道）。尽管这样，还故意这样说，其实是为了寻找借口镇压布尔什维克，而不是镇压德奥军队。所谓德国对西伯利亚的富源垂涎三尺，其实正是暴露他们自己的心情。

2) “在国际舞台上确立地位的需要”，即为了将来在帝国主义世界中占一席之地，日本应该为“抵抗德国”而向西伯利亚出兵，

^① 引自前引Ross和Schuman的书。还有Coates, W.P., “Arm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8—1922”中也有详细的叙述。此书不是根据俄国方面的资料，而是完全根据英、美、法的公文和半官方的记录及当时的报纸和干涉参加者的札记等写成的客观叙述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事实。

“帝国必须在实际行动上表示为了正义与协约国一起奋斗到底”。

3) 确保对和会的发言权,特别是对“处分俄国问题”的发言权。帝国主义者不相信苏维埃俄国的力量;他们主观地认为社会主义政权马上就会垮台,在和会上一定会提出瓜分俄罗斯的议题。因此,日本必须现在“直接而牢固地立足在该国领土之上”,不然,召开和会时,“徒以口舌力争”,也得不到充分的份额,所以应赶快出兵。

4) “抵抗美国在西伯利亚活动的对策”。“美国拥有大量资本,它将在俄国亚洲部分进行相当经济活动,从大势来看,在所难免”,必须现在就采取对抗措施。为此,应该出兵西伯利亚,“把西伯利亚的铁路管理权及其他关于民政的实权掌握过来”“特别是想到帝国国民,由于资力、知识、性格的原因,不能在同一条件下同欧美人进行培植经济势力的竞争时,为了对抗美国在西伯利亚的活动,必须以我所擅长的武力活动来弥补我国人民的短处”,这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多么宝贵的自白!列宁说过,“日俄两国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广大的土地和掠夺异民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①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自己便清楚地证明了列宁的话是正确的。)

5) “振作帝国民心的需要”。“近来我国人心懈弛,实令人不胜寒心”,因此“有必要断然出兵西伯利亚,以便使人心振奋起来”。这点是决定出兵的直接因素,具有重大意义,后面还要谈到。

6) “对华政策的需要”。这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消除德国搅乱中国的基地”。这里所说的“德国”,其实指的是布尔什维克。然而,这并不是说,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鼓舞。前面已经提到,帝国主义者这时还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俄国能够生存下去,

^① 列宁这段话,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4页。——译者

与其说是唯恐对中国发生影响，毋宁说是为了乘机把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永远防止出现瓜分满洲和蒙古的竞争者。但是当武装干涉的失败已经明显的1919年春，日本的武装干涉者认为必须防止俄国革命对中国的革命影响一事，就益发坚定了干涉的决心。其二是“对战后列强将在中国展开的竞争进行准备”。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必将涌向中国，这是可以预想到的。为此，必须现在就“打好中日政治、军事、经济合作的巩固基础”。这时如果“使欧美列强怀疑这是帝国乘其无暇顾及远东而为自己的利益行事的话，却不无遗下后患之虞”。因此最好把“中日合作”作为协约国的共同事业——“对德抗争”的一部分，这就必须出兵西伯利亚。

可是，在这样的目的和理由下出兵以后，怎样处理西伯利亚呢？把西伯利亚永久作为日本领土，当着外国的面前，这是行不通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帝国兵力援助之下，纠合西伯利亚的俄国反德分子，组织一个巩固的政治团体，与布尔什维克的政府——有理由推断是德国的傀儡——完全脱离关系而独立。这样做“既可以在俄国领土上直接而现实地确立帝国的实力”，又可以取得瓜分俄国的发言权，奠定对抗美国的基础，实现“中日共同防卫”，同时还当然会使人心振作起来。另一方面，这也是“尊重俄国领土的完整”，也是“关于俄国内政，不偏袒任何党派”，因而可以“消除俄国国民的反感”，也可以预防“在联军的要求下不得不把军队派往遥远的欧俄的危险”。

上述这些议论只有完全从这样前提出发，才能算作是头脑清晰的议论。即不仅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德国的傀儡，而且布尔什维克不是俄罗斯人的政党，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地方，是在德国占领下的地方，不是俄国的领土。然而，这个前提在客观上当然是不成立的，而后藤、本野明知道这个前提站不住脚，却偏要这么说，可见这些帝国主义政治家是多么的厚颜无耻。

在实际出兵时，上原参谋总长的日记^①里这样写道：“对大谷说：所谓‘斯洛伐克’军只是表面。‘真意在于根据我国在东亚的地位，鉴于利害关系，要以我国兵力恢复东部西伯利亚的秩序，对此保持比其他国家更合适的利害关系，掌握更有力的发言权’（正文发给外务省石井）。这就是出兵的大方针。”

总之，当事人自白的西伯利亚出兵的最初真意是：打倒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从而支配西伯利亚的资源，确立对抗美国的基础，加强对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确保瓜分俄国的份额，完全控制满洲和蒙古，在中国确立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绝对优越地位。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防卫朝鲜”或“防止过激思想”。这些问题是在出兵后将近一年的时候，世界大战已经签订了和平条约，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再也不能继续说“西伯利亚的德国人”的鬼话，并且深深体会到布尔什维克比帝国主义更强大以后才意识到的。

武装干涉者的这种意图，在1918年3月已经在报纸杂志上揭露出来。例如《太阳》杂志的大正七年四月号，是西伯利亚出兵问题的专号，上面登载着一篇“某将军”的出兵论，主张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缓冲国”，接管中东和阿穆尔两条铁路，使俄军从滨海省撤走，为了这三个最起码的目的，必须出兵。这显然是上原等人做的宣传工作。这个杂志还登载工学博士井上匡四郎的一篇介绍西伯利亚的金矿及其他丰富资源的文章，暗示这些资源可得攫取过来。寺内首相本来对出兵的态度是慎重的，但他在3月8日接见美国

^① 这段日记的日期，据引用的《元帅上原勇作传》载，是“大正八年九月十一日”，但那时不会对远征军司令官或“外务省的石井（菊次郎）”作这样的指示。大正八年九月，大谷已不是司令官，换为大井大将。外务省的石井，可能就是石井菊次郎，但大正八年九月，他在伊香保赋闲。因而这里说的文件一定是石井出任驻美大使时的事情。再从其他种种情况看来，这个日记必定是大正七年出兵当时的，《上原传记》的引证，可能是错误的。

政治杂志《展望》的记者时^①，曾问，如果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缓冲国”，美英将怎样想？暗示了日本的意图。

日本不仅在报纸和杂志上公开讨论干涉的意图，如前所述，已经在北满和海参崴开始干涉了，因此，日本的野心早被苏维埃政府和人民及全世界识破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遣俄使节团团长布鲁斯·罗卡特，美国的驻俄大使弗兰西斯，美国红十字派遣团团长罗宾斯，都在3月初先后向本国报告说，日本人“对俄国的犯罪”如何激怒了俄国政府和“各个阶层的人民”，甚至激怒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并极力主张，为了把苏维埃拉到盟国这方面来，英美政府必须对苏维埃保证坚决防止日本在西伯利亚进行的干涉（前引 Coates, Schuman, Ross 的书。尤其是 Ross 的书更详细）。

然而武装干涉者完全不顾俄国人民和世界的舆论，积极进行它的计划。对谢苗诺夫，不仅给予军火援助，并借口“教给武器使用方法”，还“借给”了人员^②。3月25日，本野外相和驻日中国公使章宗祥交换了目的在于从远东驱逐“敌国”势力，中日两国“联合”的公文。在5月16日和19日，分别签订陆军和海军的“中日联合防敌军事协定”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从“地位和利害平等的观点”出发，为了对“敌人”——字面上的德国，骨子里的苏维埃俄国——“防御”（其实是侵略）远东，日本军和中国军将“联合”起来，在北满作战，并也在“中国国境外”“联合”出兵，为了进行联合作战，“互派官员，担任将来的联系”，并在中国国内“联合”构筑各种军事工事和“共同”使用等等（协定全文载于《后藤新平》III，1832—1836页）。

这个中日“协定”，已经实现了本野等人的西伯利亚出兵目的

① 参看前引《大日本宪政史》，《后藤新平》，《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第三。

② 1918年7月，伊东巳代治给后藤新平的札记。在《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中，关于谢苗诺夫军的行动过程有详细的记载。

的第六项之二^①。这个协定在条文上是中日两国处于平等地位，实质上是把中国军摆在占压倒优势的日本军控制之下。它意味在中国领土上，用中国人民的钱，替日本军队修建旨在压制中国和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基地。因此，当中国的爱国学生和商人获悉这个协定正在签订的时候，马上在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长沙等大城市举行大会，掀起了反对卖国协定的猛烈运动。留日学生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因而日本文部省镇压了留日的中国学生。段祺瑞领导的中国政府也在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当时日本一再给予的“西原借款”的“经济援助”的压力或收买之下屈服了，利用秘密外交来遮掩人民的耳目，镇压爱国人士，终于签订了这个出卖主权的协定。

研究近代史遇到这个协定时，使我不禁联想到现在的吉田首相利用他所爱好的秘密外交，据说在同杜勒斯特使协商“日美共同防御协定”之类的东西。

第二章 “双重外交”？

第一节 种种的反对

对十月革命后马上企图占领西伯利亚的日本军部和帝国主义者来说，英、法在1918年提出希望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要求，真是求之不得，正中下怀。然而马上答应这个要求，唯恐有失日本的自主性，因此他们表现出一副并不十分愿意的面孔。日、英、法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想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

^① 本野和后藤的意见书，是在就这个协定进行谈判时和签订后写的。但是，通过西伯利亚出兵来确立日本对中国的控制权这个意图，毫无疑问是在写这个意见书很久以前，即在他们最初考虑干涉时就有的。

这以外，却各自有不同的利害关系，既互相利用又互相牵制。

英国的意图，据 1918 年 1 月 19 日提交日本政府的备忘录^①载，是“援助罗马尼亚食粮，为了防止粮食落到布尔什维克俄国和德国手里，支持南俄乌克兰的反革命派，同时在近东的阿尔明尼亚和格鲁吉亚建立可靠的‘自治’国，阻止向西方运出堆集在海参崴的木材和其他物质”。这与福煦在 1917 年 12 月巴黎会议上的提案大体上是一致的。当时法国希望的是首先利用日本军队重新建立东部战线，和保护法国金融资本对俄国的巨额投资的利权。至于英国则是，只要日本在东部西伯利亚活动就于愿已足，而法国却希望日本军尽量向西挺进。

但是对日本来说，根本不打算用它最宝贵的军队替外国服务。大战初期，协约国曾要求日本向欧洲派三个军团。日本对此拒绝说：“为了不具备国防本质的目的，派遣帝国军队远征，与它组织的根本原则不相容。”^②现在正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想出兵东部西伯利亚，在日本军部和政府看来，不要说为了英法利益替已经崩溃的沙皇军队充当替身，即便向贝加尔湖以西进兵，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日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响应英、法的提议而出兵的名目而已。日本希望这样一个形式：（1）远征军的活动范围限于东部西伯利亚，不再往西进；（2）日本单独出兵，确保行动自由，不是联合干涉。在确保这两个条件之下^③，应联军的要求而出兵。因此，日本与协约

① 在《上原勇作元帅传》中引用的上原的日记 1 月 19 日条载有“1 月 19 日，英国在南俄及东部西伯利亚活动及意向的备忘录”，是根据上原自己的记忆写的。有的部分，文意晦涩。我是按照正文那样解释的。这个解释可以根据劳合·乔治的《大战回忆录》核对。

② 伊藤正德《加藤高明》下卷。日本后来应协约国的再三要求，曾向地中海派遣过几只军舰，那是附有协约国承认在和平会议上把赤道以北的旧德国领有的各岛划归日本，以及其他极为有利的交换条件的。

③ 日本的这两个条件在日本和英、法两国交涉时常常提出来。不仅第二节所举的 1918 年 1 月 17 日日本政府的备忘录是这样，即在 2 月的巴黎会议上，日本也曾要

国（大体上由英国代表）之间关于出兵的交涉，并没有轻易达成协议。

德苏间的签订和约（3月3日），越发使英、法觉得有迅速进行对苏干涉的必要，也坚定了它们的最后决心。英、法、意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3月6日，英国政府代表三国向驻伦敦的日本珍田大使提议，“为了防止德国势力的东进”，协约国准备管理西伯利亚铁路，委托日本负责执行。英、法根本没有向远东出兵的余力，所以日本提出的单独行动的希望，这时也被接受了。不过，关于活动范围的问题，后来又经过几次交涉，6月下旬，英、法似乎暗中承认日本可以把活动限于东部西伯利亚^①。这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大致镇压了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它的威信和势力确确实实日渐提高和充实了。因此，英法大概认为不能再为日本的活动范围问题而使武装干涉拖延了。

日本和英、法的交涉虽然告一段落，但还不能马上发动正式的武装干涉。这是因为美国还在坚决反对。美国一开始就反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这一点，第二节里已经隐约提到。英国是在1918年3月6日向日本提出武装干涉问题的，第二天，美国政府马上通知日本驻美大使说，如果在西伯利亚进行武装干涉，当然由日本担任最适宜。不过，现在进行武装干涉对协约国是否有利，“颇是疑问”。美国政府对英、法两国的通知则是以更明确、更强硬的措词，表示反对日本出兵。

求过，日本准备向西伯利亚派遣六个半师团的兵力，但是这个干涉活动必须没有其他国家参加，作为日本单独的事业。（堪特罗维奇，前引House上校的Intimate Papers，劳合·乔治《大战回忆录》。）

^① 这次交涉的经过载于前引《大日本宪政史》和《后藤新平》。这两本书与受到武装干涉的俄国人所写的《在中国制霸战和太平洋》以及由最后虽然也参加了武装干涉但与日本尖锐对立的美国的立场所写的前引休曼和格里斯沃得的书一对照，就可以完全了解这次外交的主要经过。这里限于篇幅，只好省略了。

日本政府急忙于3月19日答复美国说：“这次干涉根本不是出于帝国政府的希望和提议，”辩解后又说：“不过，今后一旦敌人在西伯利亚的活动愈益发展，帝国国本的安全遭到威胁时，当然就不能不采取自卫手段了，届时希望美国政府给予友好的支持”，暗示日本有出兵之意。同时，日本政府讯问英国：现在美国的态度固然如此，一旦发动武装干涉后，美国是否能够仍然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呢？可见无论怎样卤莽的军部和帝国主义者，没有美国的同意，对进行干涉就不得不表示踌躇。这是因为什么呢？

当时在远东唯一有实力对抗日本的，就是美国。美国和日本的对立，从日俄战争后，特别是从1907年以后，逐年尖锐化了。斗争的最大原因是在中国，特别是在满洲和华北进行的帝国主义竞争。还因为美国对待日本移民的无理歧视和排斥，刺激了日美间的感情，不断传出日美战争的谣言。当时，美国还没有具备足以横渡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充分的武装力量，因而通过1908年11月的高平—卢特协定到1917年11月的石井—蓝辛协定的一系列协定，在纸面上对日本表示让步，实际上却抱着很深的敌意。美国反对日本向西伯利亚出兵，也就是这种敌意的表现。美国对干涉俄国革命这件事本身，是非常赞成的。事实上，美国海军已经在北方的摩尔曼斯克与英国海军联合起来进行武装干涉。但是，如果在远东进行干涉，就不得不以日本为主力，干涉一旦成功，可以预料，日本一定把西伯利亚永久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所以，美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赞成。

本野和后藤企图以武力来弥补日本在经济力量上对美国的显著劣势。威尔逊和赫斯也完全知道，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就是出于这一目的，所以反对。日本当然也还没有信心，现在就和美国开战。尤其是西伯利亚出兵，很可能成为长期的和大规模的战争。那时，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很显然，日本是无法进行战争的，又完全

没有希望从英、法方面取得经济援助，可以依靠的，只有美国。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取得美国的同意。

对西伯利亚出兵的问题，寺内首相等人是慎重的，尤其象山县有朋那样的军国主义的鼻祖，也不敢冒然赞成，这就是因为怕美国反对。山县在3月15日寄给寺内的信里说：“仅以德祸东渐之势正在猖獗为理由，我方便马上出兵，未免为时过早。俄国既未求我援助，若派兵强入其境，纵然出自善意，亦属武装干涉。不仅名分不正，而且招致英国、特别是美国的猜忌。不但得不到它们的后援，前途亦会产生许多祸患。因此，在确定帝国的对俄政策时，必须首先明确英、法、美的对俄政策。”，“令人遗憾的是，军需品的补充和军费的筹措，必须仰仗他国援助。如果不明确这些国家的意图，冒然决定我方态度，他日必将陷入不堪设想的绝境。这也是我在对俄政策上始终注意英、美意图的缘故”（《公爵山县有朋传》下）。

寺内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压制本野外相的急进论时，说没有攫取俄国领土的野心，但是他又说：“为了俄国的复兴，如有必要，必须马上出兵”^①。此外，前边已经提过，他向《展望》记者暗示，如果英、美支持，他有意在西伯利亚制造一个“缓冲国”。

所谓反对出兵的主张，也都是象山县、寺内那样对出兵主张要慎重，在军人、官僚、政党、资产阶级、地主中间，没有一个真正反对出兵的人。尾崎行雄在自传里说，他曾召集“学者、实业家和其他议论国事的人”，对他们提出反对出兵的主张。但这些人也全都认为“这时出兵西伯利亚，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事实上，尾崎行雄

^① 载于《后藤新平》III的后藤备忘录。这里所谓的“俄国的复兴”，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复辟。

寺内在1918年1月第四十届议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说：“观察俄国最近的形势，内乱不幸渐渐波及远东俄领……维持远东和平的责任，落在帝国的肩上。如果战祸（指革命）蔓延，扰乱远东和平，殃及帝国时，将主动采取适当措施，毫不踌躇。”

本人也煽动出兵；这在当时的杂志上也有所记载^①。他在1918年1月第四十届议会上，代表宪政会作了外交质询的演说，攻击了政府对十月革命的干涉不够彻底。宪政会的加藤高明、政友会的原敬和国民党的犬养毅，这三个政党的党魁，虽然在一般内政问题上彼此尖锐对立，但唯独对西伯利亚出兵则是一致的。他们反对政府的“自主的”出兵论，迫使政府把出兵限于同协约国协调的范围内。所有的文献都是这样记载的。然而，这并不等于他们反对出兵。也并不是象传说那样，他们对“自主的出兵”始终反对的（后述）。

总之，所谓的各种反对派都在观望美国的动静，主要是要大举行动。这正如元老西园寺写给山县的信（5月23日）中所说：“美国如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我国当然不能落后，而且应该主动地担负起全部责任（《公爵山县有朋传》下）。西园寺的信里还说：“对天下宣布的出兵理由，也必须是后世人所能首肯的，当前，为了试探人心，应限于声援协约国，以观望欧洲的变化”，“总之，有必要进一步振刷民心”。这就是说，在取得美国的同意和鼓动起国内人民的战意以前，要慎重行事。

只有在人民中间才有真正的反对出兵论。《大阪朝日新闻》的3月3日社论说^②：“近来日本出兵的问题不断从中国和欧洲传来。

^① 《太阳》大正七年四月号，“形形色色的政客”责难尾崎行雄说：“尾崎行雄之流，借口局势严重，为了鼓吹成立举国一致的内阁，到处宣传出兵。”

他在第四十届议会上的质询中说，日本应该表明，原则上接受协约国的要求，不仅派遣舰队，如果有具体办法，即便向欧洲派遣陆军，也在所不惜。他还说：日本应该代替联军而单独警卫远东，使欧美舰队撤出海参崴及远东近海。同时攻击政府说：“对俄国的态度是，既不援助主战派（反革命派），也不阻止违背盟约而单独媾和的人（布尔什维克）”，还责难政府对俄国亡命贵族的态度过于冷淡。这些意见当然不是主张马上发动武装干涉，但不言而喻，他的意图当然是指向这方面的。

^② 引自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二。此书大量引用了《大阪朝日新闻》的报导和论文。这些报导和论文都认为武装干涉只是军阀的阴谋，从上面引文也可以看到，期望政友和宪政两党带头反对战争。这种见解当然很肤浅。但是，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具有政治嗅觉的人民，已经在反对西伯利亚出兵了。

人民感到这种奇怪的秘密外交,在没有人民的支持下,正在把我国推向不测的深渊,因而非常不安。如果军阀根据人民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日德开战时发起了爱国运动,就认为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反对战争,那就如同部分欧美人错误地认为我国人民是嗜血成性的好战民族一样,完全不了解我国的国民性和国民思想。这次演成问题的日本的新行动,究竟有什么国民基础呢?一般人民不知道政府究竟要干什么,只是在新的国家危机面前战栗而已。(中略)

人民的知识和思想已经超出空洞的国权主义的庸俗论。有远见的人看破了军阀的肤浅权术而在冷笑。军阀之流正在叫喊德国东进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如果说存在,也是在罗曼诺夫家族统治俄国的沙俄时代就存在的,现在的俄国革命反而把它推迟了。(中略)我们不能不为军阀的鲁莽而吃惊。(中略)

总之,这样重大的事情,军阀要独断独行,人民对此能默许吗?政友、宪政两党应该发动一次人民运动来加以反对,人民应该阻止军阀这样专制来误国”。

当时有名的新闻记者浅田江村的一篇论文《为什么出兵》(载于前引的《太阳》杂志,1918年3月16日稿),也是反对出兵的代表名作。他说,德国在西部战线上集中全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还有什么余力把手伸到这个与它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辽阔的西伯利亚旷野来呢?”又说:“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暴虐、与德国俘虏的合作,排日运动等等令人不安的报导,即便有几分真实,也要大打折扣。西伯利亚的德军俘虏数目,一度被夸张得很多,但是根据军事当局在前几天的议会上的坦白,西伯利亚的东部和西部总共也不过十六万人。在这次坦白的先后,还夸大传说德国俘虏编成了两个军团。哪里有两个军团,根据大岛陆相的坦白,连编成两个大队,都很困难。其实他们都没有武器。所谓的西伯利亚的混乱,其

程度可想而知，只要听其自然，纷乱的事故将会更加减少”。“甚至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爱国者，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间谍，冷酷地呼吁要兴师惩罚。对这些愚论，为了保护可怜的俄国革命的幼苗，我们竭力反对当前的西伯利亚出兵论”。

还有《东洋经济新报》也始终反对出兵。这个杂志被片山潜评为当时“日本唯一具有独立见解的有影响的杂志”。他在1919年写的论文“日本和苏维埃俄国”，也从这个杂志上引用了很多论点（关于这篇论文，参照第三章第二节）。该杂志在武装干涉十月革命的叫嚣出现后，马上着重指出，作为干涉借口的所谓德国势力东进，是荒谬之谈，要想援助反革命派来镇压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的（大正七年三月五日号，十五日号社论）。又在七月二十五日号上登载了“应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社论，这是呼吁承认苏联的最早的要求。该杂志的这种主张尽管遭到警察当局的不断压迫和威胁，却一直坚持不屈，在出兵后的8月15日社论上还分析了政府的出兵宣言，毫无忌憚地批判说，这是干涉他国内政。

后来，一有机会就主张撤兵。《东洋经济新报》关于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也发表了日本统治阶级任何言论都没有的进步意见，对普选运动也大力支持。这个杂志想是代表当时小资产阶级进步民主阶层的意见，得到了部分工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当然，这个杂志也并不是积极支持革命的，但它说：“深望我国人民知道，目前俄国的混乱，是从经济上发生的国内阶级斗争”。它的立场是，用武力镇压“工农苏维埃”是日本经济不堪胜任的，不如迅速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复兴的俄国建立经济联系。

工人的先进分子积极支持俄国革命，认为“俄国革命带来了生存的光明”而感奋。友爱会的机关杂志《产业与劳动》1918年10月号也说，工人由于这次革命而认识到“人民大众的威力”。至于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不仅以俄国革命为自豪，而且为了积

极捍卫革命,有的横渡大海到西伯利亚去了。这在市川正一的《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中着重地记载着(后述)。在1918年8月的米骚动中,使民众崛起的有力因素之一,就是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如原敬所说,“人民不知不觉地受到外国革命空气的感染”(《原敬日记》大正七年十一月三日)。

只有在这样的人民中间,才有真正彻底的反对武装干涉的主张。

第二节 出兵

虽然在国内遇到工人、劳动人民、民主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资本家在内的全民反对和元老及政党方面的机会主义,在国外遇到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出兵,以及和英法两国在出兵目的和行动范围上发生意见分歧,但是武装干涉者们还是执行了他们的计划。同中国互换了“共同防敌”的照会后,4月5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与英国军队一同在“护侨”的名义下,在海参崴登陆了。司令官加藤宽治少将访问海参崴市长说:“由于市内陷于无政府状态,犯罪事件层出不穷”,我军被迫登陆。该市市长和全体俄国人对此全都提出抗议。8日,西伯利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海参崴下达如下的通告。^①

“西伯利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日军借口微小事件在海参崴登陆,决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对此提出抗议。这种微小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西伯利亚的工农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西伯利亚任何地区的企图,都将组织猛烈抵抗。保护外侨是地方苏维埃的

^① 登陆的日期根据前引的《上原勇作传》年谱。加藤访问市长等等的记述,根据前引的 Coates 的书。所谓“西伯利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知是什么机关,原文是“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Siberia”。

事。日本的武装干涉对维持地方秩序，决不会有任何贡献。即便在最成功的场合，也将是多余的和无益的。西伯利亚的工农，为了防止反革命进行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可耻勾当，将不辞一切努力。现在宣告全西伯利亚处于戒严状态。革命干部要组织起来，防卫帝国主义的侵入。”

甚至所有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也都抗议日军的登陆。日本原想为日后更大的侵略建立一个桥头堡，但也撒下了失败的种籽。这次登陆是谁策划的，不得而知。不久，4月22日，本野外相由于坚决主张出兵而被迫辞职。但是，本野的后任也和本野一样，是坚决主张出兵的后藤新平。由此可见，这次人事更动，只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5月间，如上所述，终于迫使中国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这期间，对英法的交涉也有了进展。

美国始终反对日本出兵，这就使后藤等人渐渐感到焦躁不安。6月末，决定“关于出兵问题，不必拘泥于尊重美国意图的外交经过，另行树立主动的计划，勇往直前”。6月28日夜间，在海参崴由日、英联军与白俄及捷克斯洛伐克军联合行动，以压倒的兵力突然解除该地苏军的武装，推翻了地方当局，完全占领海参崴市和港口，建立了反革命政权。

后藤等人期望海参崴的骚乱闹大起来，同时谢苗诺夫军在当时连战连败，开始逃往北满，企图利用这个混乱局势，发动“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马上“把警察部队派往外贝加尔东部”。恰好当时沙俄时代的驻日俄国大使克鲁宾斯基前来要求“维持秩序”，他们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借此可以使他们的侵略计划合法化。这时就连狂热的干涉主义者伊东已代治对后藤的计划也大吃一惊。他竭力劝告后藤要慎重行事。到了7月1日和2日，后藤对伊东的劝告“情绪十分激动，认为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不应再躊躇了。”

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可能是看到谢苗诺夫军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增强而迫不及待地要发动干涉，也可能是因为德国在西部战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一时显出优势而焦急了。但是，这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必须考虑的是国内的政治形势。

当时由于米价的直线上涨，人心日益动摇，社会不安发展到可怕的程度，预兆着8月的大暴动。早在5月24日的地方长官会议上，寺内首相就警告说，民众生活困苦^①，“资产者和劳动者的悬殊太大”，因而有产生“不合国体的思想、人心思乱”的危险。6、7月间，这种形势迅速发展起来，各地频频发生劳资纠纷。在大阪和京都，象监狱的看守和法警这类有权势的爪牙也动摇了，下级官吏、警察等，迫切需要普遍提薪^②。7月3日，东京一次增加了警官二百一十九名，警察二千三百八十名，一下子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警察人员。这样大规模的增员是空前绝后的^③。大阪方面也强烈要求增强警察力量^④。由此可见群众动摇的深刻程度了。

这种形势推动了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因为寺内的脑袋尖得象美国福神比利肯，人们就给寺内内阁起个绰号，叫“非立宪内阁”（因比利肯和非立宪发音接近），报纸和杂志对这个非立宪内阁的攻击非常激烈。政友会本来是忠于寺内的执政党，但鉴于这种形势，便在第四十届议会（到1918年3月）期间转化为在野党了。议会闭会后，各党打倒寺内内阁的活动日趋活跃。寺内打算借口有脑病，辞职不干。后藤新平等人表面极力反对他辞职，实际上是在策划以后藤为首相，延长官僚内阁的寿命。因此，在海外寻衅，制造事端是最有效的办法。利用出兵促使民心振奋起来，就是

① 《元帅寺内伯爵传》。

② 吉川光贞《所谓米骚动事件的研究》。

③ 《后藤新平》III。这次警察人员的增加是后藤担任内相时鉴于“社会阶级间正在产生不安的祸根”而决定的。

④ 吉川光贞《所谓米骚动事件的研究》。

把米骚动前夕群众动荡不安的情绪引向海外，同时延长官僚军阀独裁政府的寿命。出兵的必要性急剧增大，现在已经无暇等待美国的同意了。

当日本和英国决心断然出兵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也预料到，即便美国不参加，日本也早晚必定发动武装干涉。于是，他认为既然干涉不可避免，与其使日本为所欲为，不如美国也参加，以便牵制日本。这样可以使“弊害减少”，也可“消除日本干涉带来的许多不良后果”（赫斯上校）。威尔逊以此作为对自己的良心和民众的辩解。既然决定干涉，要寻找合理的借口多得很。威尔逊等人想出来的借口是，为了救援捷克斯洛伐克军而出兵西伯利亚。

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地方的斯拉夫人，当时受奥地利帝国主义的统治。大战开始后，应召参加奥军，被配备在东部战线上。但是他们不愿意为了压制他们的奥地利帝国主义者毫无理由地同俄国人作战，因此连续不断地大批投降，或是跑来当俘虏。二月革命后，捷克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马萨利克博士与临时政府交涉，把这些捷克俘虏武装起来，编成一个军团，使之参加东部战线，与俄军一起对德、奥军队作战。但是，这个军团一败涂地，逃回俄国，进入了各地的收容所。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同德、奥单独媾和，引起捷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不满。1918年3月26日，他们经同苏维埃政府交涉后，双方协定：把五万捷克斯洛伐克俘虏用西伯利亚铁路运往海参崴，再搭协约国船只前往法国，参加联军的西部战线。这些俘虏约定，在西伯利亚运输途中，除了每百人携带步枪十支和机枪一挺用作自卫外，不得携带其他武器。4月4日，第一批支队已经到达海参崴，以后陆续运来，5月末，有一万二千名捷克军来到海参崴，他们到达后发现，在海参崴，协约国政府约定的船只一只也没有，后来也一直没有派来。但这里有日、英两国的军舰和陆战队，

用最新式的武器把捷克人武装起来了。

5月26日，在车里雅宾斯克车站，由东往西去的德国俘虏列车遇上由西往东的捷克人的列车。这时，这两个敌方发生了一次小冲突，苏维埃当局镇压下去了。这对早就隐藏武器、阴谋反苏的捷克军来说，是个意外的机会。他们扬言：“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合谋虐待捷克人，要进行抵抗”，马上占领车里雅宾斯克车站，并用电报联系各地捷克军。他们在一星期内占领了平兹、鄂木斯克、诺沃尼古拉也夫斯克等车站及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全部重要据点，然后占领所有西伯利亚的重要城镇。

本来是某个车站上发生的偶然事件，现在却向全世界宣传说，整个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俘虏经常迫害捷克人，而且这种迫害现已达到极点。捷克军的这次背信的叛乱，完全是经过法国人审慎领导和组织的，这在美国的诺顿教授所著《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罗斯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里都有确凿证据，布鲁斯罗·卡特也是这样说的。

这样，他们在6月29日和日、英两军联合起来，占领了海参崴。现在从俄国欧洲部分的东部起一直到日本海岸的整个铁路线上的全部重地，都被增加到十二万人的捷克军队占领了。7月12日，海参崴的捷克人突然开始向西进攻。两星期以后，在纽约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发出如下的正式声明：

“捷克军究竟留在俄国或离开俄国，捷克人自己不能决定，这需要全体盟军来决定。（中略）捷克人不愿意被卷入俄国内乱之中，但是他们认为留在俄国远比被运到法国更有利于协约国的大义”。

（以上关于捷克人的记述，全部根据 Ross 和 Schuman 及 Coates 的著作。）

这就是在“西伯利亚被德国人和布尔什维克虐待的捷克军”的真相。他们从来也没有遭到德、奥俘虏军和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值

得重视的危害。这一点，美国的西伯利亚武装干涉军司令格雷布斯上将也在他的文章《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冒险》中断言如此。捷克人利用并背叛苏维埃的好意，组成反革命的中心。这一切都是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所深知的。但是，援救被压迫民族这一题目，深受美国小市民的欢迎。威尔逊总统利用这一点，制造了武装干涉的借口。

7月8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石井大使会谈，主张日、美两国向海参崴派遣同等数目（各七千名）的陆军，去援救捷克军。“但是，这并不等于干涉西伯利亚”，在达到援救捷克军的目的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侵害俄国主权，马上撤兵”，他提议与日本发表一个日美共同宣言。

紧接着，7月12日，驻日本英国大使通知说，英国将为了“恢复海参崴的秩序”、“保护物资”和“援救捷克军”而出兵。上原和后藤等人渴望已久的机会，由于意外事件而突然到来了。美国要出兵了！马上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日本的态度，7月15日举行元老会议，16和17两日召开外交调查会，当日下午发出对美答复。其要点如下：

(1) 关于由日本供给捷克军武器，帝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意见一致，不胜欣慰。该批武器已经装运完毕。

(2) 帝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提议的“派兵海参崴之事，欣然同意”。

(3) 美国国务卿希望这次派遣的兵力要“日美同数”（各两个团）。“然而对日本所使用的兵员如果加以限制，就足以使日本人民误解为列强怀疑日本的野心而予以掣肘”，帝国政府“不得不忧虑这将对微妙的国民感情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而且，“日美及其他协约国在这一目的下使用的兵力，应该根据需要，随时决定。”帝国政府暂时并无多派兵力之意，但认为不宜预先加以限制。”这

就是说,对限制日本兵力,明确表示反对。

(4) 据帝国政府获得的情报,“德、奥势力对西伯利亚的压迫,只能预料今后必将愈益加甚,结果各协约国,特别是日本帝国由于地理关系,对其重要利益不能不感到严重威胁。因此,根据因前述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方针而发生的形势,也可能向西伯利亚出兵”(《后藤新平》III,第三章十一节)。

根据原敬和犬养毅(国民党总裁)及加藤高明(宪政会总裁)等人的传记,原敬和犬养毅在外交调查会上推翻了政府的“自主的出兵论”,而使会议通过了“协调出兵”。“自主的出兵论”是表面上响应美国提议,实际上按照日本独自的目的,“自主地”向必要地区派遣必要兵力的计划;而“协调出兵”则是限于在协调协约国要求的范围内的出兵。无论外交调查会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什么意见,但它的结论决不是“协调”论,而是可以归结为自主的出兵,这从上述对美答复中看得很清楚。在上述答复中,日本关于兵员数目和行动范围,都强调由日本完全自由决定。不仅如此,外交调查会对美国提议就出兵发表共同宣言所作的决定是“日美两国立场不同,派兵的地点、形式亦不一致,因此各自单独发表适当宣言为宜”。日本政府答复美国的公文中也根本没有提到共同宣言(前引《后藤新平》)。这就是说,日本贯彻了完全自主出兵的立场。

据原敬的日记载,原敬在外交调查会上,一讨论到出兵问题,他就主张出兵须要慎重。他在7月16、17两日的调查会上主张:“没有重大理由而出兵,会不知不觉地酿成大事,对国家非常不利”,所以“此番出兵,应该只限于美国提议的救援捷克军,将来真正有必要时,再考虑向自卫上必要的地点出兵”。平田东助首先赞成原敬的意见,其他委员也倾向这个意见。但是,寺内首相“反复提议,即便为了救援捷克军,也有必要出兵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因此,在决定答复美国大体同意出兵海参崴时,也附带提到这一点。

至于文中所谈的自卫，以及帝国认为自己可在必要的地点独自决定出兵等等字样，全部删除了。”

这是原敬在会上竭力奋斗的结果。原敬从答复美国的政府原案中删去了“自卫”的字样和日本独自决定向必要地点出兵等刺眼的词句。但是，他不仅同意出兵海参崴，也同意寺内所主张的“有必要出兵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这就是说，事实上同意向西伯利亚派遣数目不限的大军。正因为如此，政府答复美国的复文，才写成上述那样。原敬与寺内、后藤等人之间的争执，在于侵略的程序、时期和外交上的准备，对于是否侵入西伯利亚，是否干涉十月革命的问题，他们之间是没有分歧的。

据原敬的日记载，犬养毅主张“比政府还要激烈的大量出兵论”。加藤高明对寺内内阁坚持了在野党的立场，拒绝担任外交调查会委员。他认为“应该仔细考虑”出兵问题，对原敬在外交调查委员会上的奋斗深表敬意。他在7月18日发表的谈话中说，我一向认为设立外交调查会没有意义，但唯有这一次的外交调查会是有意义的。他之所以反对出兵，只不过是野党的立场反对政府，强调出兵必须慎重，他和原敬并没多大的差别。同时，他对原敬的赞扬，是为了打倒寺内内阁、联合政友会打个招呼。

把加藤高明和原敬看作是对天皇制(特别是对军部)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那就错了。看一下原敬的日记就可以知道，他是如何阿谀山县有朋的。同时，原敬对“民主主义”是最顽固的反对者。这一看他的日记，也很明显。这是贯串着他的全部政策的根本立场。大家都知道，他对军部大臣武官制和参谋本部的横暴，是有所批判的。然而，这无非是认为“如果迫于人民的要求，然后才采取措施，为国家着想是堪虑的”(《原敬日记》，大正八年七月八日)，作为一个对民众的动向十分敏感的绝对主义政治家，想对民众采取主动的一种策略。

尽人皆知，加藤高明是三菱财阀的政治代表，但这并不等于他是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首领。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他是天皇制的最大支柱。财阀的垄断资本是天皇制培养起来的，它确立以后仍旧得到天皇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保护，以天皇制为靠山。尾崎行雄曾代表加藤所领导的宪政会，在第四十届议会上攻击政府对俄国反革命派的援助不够，也没有打击布尔什维克，已如前述。另外，加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曾担任外务大臣，事实上居于首相地位。他硬使日本参加大战，也是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二十一条”的第五号规定，中国军队和财政要受日本监督，警察也要置于日本控制之下，中国军队的军火供应和军火生产都由日本垄断等等，任何侵略主义者也未曾想到的这类露骨侵略的要求，竟列出七条之多。就连山县有朋那样的军国主义者，也大吃一惊，认为这些要求对方不会接受，而加以反对。结果，这些要求被迫撤回了。由于侵略过火而尝到失败经验的加藤，现在对于打倒了他的内阁而成立的寺内内阁的冒险政策，即便主张慎重行事，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与天皇制在本质上有不同的资产阶级反对派。

既然加藤高明和原敬的阶级立场同政府和军部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那末认为主张自主的出兵是绝对主义的帝国主义，而主张与协约国协调的出兵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见解，也就没有意义了。若说绝对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山县有朋，但他是主张出兵慎重论的人，已如前述。后藤新平在绝对主义官僚中是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的人物，但他却是最强硬的自主出兵论者。由此可见，这两种主张之间并没有阶级的和本质上的不同。不过，这时在统治势力间关于出兵的方法、时期、范围等发生了对立，这是日俄战争时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未曾有的，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容漠视的。这里歪曲地反映了人民根本反对出兵的要求。原敬和加藤

高明是因为觉察到难以把人民拖入这场战争，所以才要求政府慎重从事的^①。

日本根据前述对美复文的宗旨，于7月19日，不是把关于出兵的日美共同宣言，而是把日本独自的出兵宣言草案送交给了美国。这个草案中说：“首先出兵海参崴”，“根据形势”再向西伯利亚方面增派军队。美国对17日的日本的回答和这个宣言草案，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最后让步，提议把兵力限为美国七千，日本一万二千，英、法共五千八百（合计二万四千八百人，日本出兵占半数），这样就“可以满足捷克方面的希望”，现在只出这些兵力，“今后需要派兵时，再作为新问题，从新计议”，甚至说：“如果日本硬要派更多的军队，美国便退出这个共同派兵之举，与此脱离关系”。日本深恐美国退出，乃于8月1日下午召开外交调查会议，当夜答复美国说，“虽然预料有必要向海参崴以外的地方出兵，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也有必要增援”，但关于兵力和地区，约定同意美国的提议。

8月2日傍晚，政府发表公报，宣布出兵。所以这样迅速发表，是唯恐美国对日本的回答再提出异议，因而打破外交上的一切惯例和外交礼节，与其说是抢在美国之前，毋宁说是对美国进行了一次奇袭。这时正是早已担心的米骚动的大浪已经开始翻滚的时候。日本的统治者们哪里还能同美国拖拖拉拉地进行交涉呢！

日本立即向海参崴派遣第十二师团（一万二千名），8月16日，这个师团还没有全部抵达时，又把驻在南满的第七师团调到满洲里。美国对此责难日本的失信，说日本言行不一。但是，日本却驳斥说，这是根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行动，第三国不得过问。第七师团深入苏联领土后，又于8月下旬，把第三师团派到

^① 我在《历史学研究》上发表这篇论文时，只是强调了“协调出兵”和“自主出兵”之间没有根本对立，并说这不过是战术上的推测不同，而关于统治势力之间发生分歧的意义，只字未提，这是不充分的、片面的。

外贝加尔方面。10月，驻在朝鲜的第十九师团的一部也进入乌苏里南部。从宣布出兵以来三个月，已经有三个师团^①以上的日本兵奔驰于外贝加尔以东的西伯利亚了。

日本在8月1日对美国的提案表示同意，完全是口是心非^②。虽然这是帝国主义者干的勾当，但是我作为一个日本人，现在连把它作为事实写出来都觉得很难为情。这种干法加深了日美的对立。这时已经孕育了日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一败涂地的一个因素。

第三章 不可避免的失败

第一节 军事和政治的矛盾

企图依靠高喊对外战争的“举国一致”口号来苟延残喘的“非立宪内阁”^③，由于米骚动垮台了。政友会的原敬组织了后任内阁。这个新内阁，除了陆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以外，全是由政友会的成员组成的，因而被称为日本最初的真正政党内阁。非政党成

^① 兵力的准确数字我还不知道。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学研究》上时，我写道：马上派遣了七万三千名兵。这是根据《后藤新平》写的。所谓在西伯利亚有七万三千名兵，是派兵最多的一个时期的数字，1918年内是否已经有了这么多，不敢肯定。

^② 美国在8月4日发表出兵宣言。大意是：美国的出兵目的是救援捷克军和保护海参崴的军需品。毫无损害俄国领土主权的意图。美国的“唯一目的是，当俄国人为了恢复对自己的事业、领土和命运的统治权而努力的时候，美国将给予俄国人所愿意接受的援助。”

美国帝国主义把掠夺俄国人民的军需品、杀害俄国人民的士兵、占领俄国人民的铁路，都说成是对俄国人的“援助”。它还说：“合众国政府一有机会，将通过各种方法，为满足西伯利亚人民的迫切需要，传播有益的报导并对稳健的教育事业给以援助。”宣传捷克人遭受布尔什维克的虐待，就是它所说的“有益的报导”，把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人民连同村庄一并杀光烧光，就是它所说的“稳健的教育”。总之，凡是帝国主义，不论它是否象日本那样穷兵黩武，都是口是心非的。

^③ 即寺内内阁。——译者

员的三个大臣，特别是陆海军大臣，却是权力的中枢，总理对他们根本无可奈何。单从这一点也只能说这个“政党内阁”仍然是处于日本绝对主义范围内的内阁。事实上，原敬内阁并没有奉行与寺内军阀内阁在本质上有任何不同的政策。不仅如此，它还竟然实行了连寺内都没有实行的大规模扩军。一个内阁是否实行大扩军，是日俄战争后鉴别这个内阁是否多少具有进步性的最好试金石。《东洋经济新报》曾要求新内阁撤回西伯利亚的派遣军（9月15日），但新内阁却置若罔闻。

出兵后三个月，“在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村镇都有了日本军。从海参崴到赤塔的各个车站，不论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论中东铁路，都挂上了日本国旗。从满洲和蒙古通往西伯利亚的一切道路都被日本军占据了。可以说，日本用军队和商人把西伯利亚摆满了。

商人租用所有的房屋，收购所有的必需品。这并不是因为日本需要，而是为了在联军开始行动时，把必需品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美、英、法军的司令部如果向海参崴以外的任何地方派遣一个少尉或中尉，日本随后就派去一个上尉。前者要是派上尉，日本就派少校，前者要是派少校，日本就派中校。毫无疑问，日本的目的是要在盟军协议时确保上级权。在这期间，日本占领了所有的商队道路，封锁了所有港口。任何商队和铁路以及任何河海船只，没有日军的保障，就不能通行”^①。

从地理上看，与日本出兵的名义“救援捷克军”显然毫无任何关系的黑龙江江口的庙街也被日军占领了。满洲里附近变成了替日本军作爪牙的谢苗诺夫及其部下的非正规军（毋宁说是土匪）的根据地，他们跟随日本军进击到赤塔。日军的另外一个爪牙——哥萨克头目卡尔梅科夫，以绥芬河附近为根据地，跟随日本军深入

^① 前引 Ross 的书以及该书引用的 Ackerman: "Trailing the Bolshevik".

到乌苏里地方。前中东铁路长官霍尔瓦特也率领一队反革命军驻在哈尔滨，与日本军部和元老山县有朋等人取得联系，建立了自己的“政府”。

凡是日本军队所到的地方，一定有各种各样的“俄军”和“俄国人”——谢苗诺夫、卡尔梅科夫以及其他类似的反革命匪帮尾随在后，对居民和公私财产恣意加以凌辱和掠夺。此外，日本军还纠合中国土匪，派往西伯利亚各地。日本军就这样暗中破坏治安，而表面上却以维持治安的“保护者”自居。但是，日军也干了许多不亚于谢苗诺夫的匪盗行为。例如，据1918年9月24日滨海省伊曼地区维间斯克县冈达钦村的村民委员会的报告，在伊曼车站附近守备乌苏里铁道的一座铁桥的日本兵，抢夺一切值钱的资财和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居民如果出来阻拦，马上枪毙。鸡蛋、面包、糖、茶、火柴、小刀等等，无所不抢。他们抢夺这些东西，并非迫于需要，只是为了开心^①。

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部除了作战以外，还设了一个“政务部”，积极策划建立傀儡政府。占领军一进入村镇，立刻调查面积、人口、耕地乃至家畜、家禽的数目。但是，建立傀儡政权并不象军事行动那样顺利。最初山县有朋和后藤新平等人企图支持霍尔瓦特，让他来当西伯利亚东部的统治者，命令杉山茂丸和夏龟秋夫等人进行这项工作，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且计划给与霍尔瓦特一亿日圆借款。但是寺内首相等人唯恐英、美反对，没有同意，于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后藤新平》III）。

武装干涉开始后，白俄方面分散在各地的反革命的各个“政府”和各个集团的代表协议，于9月5日，在鄂木斯克挂起“全俄临时政府”的旗帜。这个“政府”由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和人民党

^① 前引“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还有关于谢苗诺夫和日本军的暴行，容当后述。

及其他无党无派者组成，受到亡命海外的克伦斯基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军全面支持这个政府，准备在它的旗帜下向俄国欧洲部分进攻。英、法、意三国打算供给这个政府武器，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反革命军队。美国与此相反，不是输送军需品而是输送经济建设材料和专家，企图开发西伯利亚的经济。这样说，是满好听的，但骨子里是因为美国对重建对德东部战线或替英、法两国火中取栗不感兴趣，企图以开发西伯利亚的经济为名，把西伯利亚的富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早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美国就曾为取得乌拉尔矿山利权，进行过交涉。日本企图抛开其他国家，制造一个完全由日本一手操纵的政府。然而，可怜得很，它能够利用的，只有谢苗诺夫之类的党徒。

11月11日，世界大战停战了。一直认为布尔什维克在阻碍他们回国的捷克人，渐渐明白了真相，对协约国和反革命派的不满开始高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11月18日，反革命派的极右分子、沙皇专制主义者的俄国将校，认为“全俄临时政府”不重视他们，并对这个“政府”的“红色的”倾向心怀不满，掀起叛乱，推翻了“全俄临时政府”，在鄂木斯克市建立了沙皇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独裁政权。

高尔察克政权是一个赤裸裸的反革命军事独裁政权。他们对工农任何微不足道的要求，都用武力加以镇压。高尔察克的后台是英国将军诺克斯。英国虽然表面上在本国极力装做是“民主主义”的，但在西伯利亚却用全力拥护这个可怕的独裁者，企图使他向欧洲进攻。当时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即便作为单纯的借口，也无法再说什么重建“对德东部战线”了。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采取一致步调。美国政府因为自称是民主主义的旗手，按理说，为了装饰门面，也不能支持高尔察克政权。但是，因为另外没有适当的傀儡，最后也就追随英、法，给鄂木斯克政权输送武器和军需品。

不管这些国家的本国政府意图如何,当地的各国士兵,尤其是美国士兵,对高尔察克抱有反感,美军司令官格雷布斯甚至把本国运来援助高尔察克的武器暂时扣在海参崴不放^①。捷克军说,我们是“为了各民族的自由和自决而战的”,因而不能支持鄂木斯克的独裁者,以致司令官西洛伏依不得不声明:“停战以来,士兵不愿与俄国人作战,愿意早日归国,与德国人和马扎儿人作战”。但是,他们一时也曾不得不在英、法的压力下,与鄂木斯克政府军一起向西进攻。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与协约国一起支持高尔察克政府,表示准备承认它是独立政府,运给它武器或军需品,为了替它准备支付武器的代价^②,在1919年10月通过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借给它五千万日圆的贷款。这笔贷款的目的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英、美争夺富源,特别是从鄂木斯克政府取得库页岛的油田^③。但是,谢苗诺夫、卡尔梅科夫、霍尔瓦特等人在当地日军的援助下对鄂木斯克政府进行反抗。田中义一陆相在1918年12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提议:鉴于谢苗诺夫反抗鄂木斯克政府,企图独立,而日本对此又不加制止,引起了列强的疑惑,“决定对当地陆军当局给以明确指示,命令制止谢苗诺夫的行动”。“阁僚全体通过”(《原敬日记》)。

但是,谢苗诺夫和当地日军后来也没有改变态度。政府虽然对谢苗诺夫和当地部队的行动感到为难,却没有断然制止。这是

① Pauline Tompkins: "American Russian Relation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49。关于英、法、捷克军的态度,根据前引 Schuman 和 Coates 以及 Ross 的书。以下同,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加注。

② 《东洋经济新报》大正八年(1919年)11月1日号。据该报载,大正八年一月至八月间,日本向俄国亚洲部分的出口额是五千一百二十万日圆,比前一年的总额一千三百万日圆增加了三千八百万日圆。据推测,这部分是出口的军需品。当时政府还准备向高尔察克提供三千万日圆的军需品。

③ 《原敬日记》大正八年五月十八日条载:“内阁会议,加藤海相提出承认鄂木斯克政府后,相机要求库页岛油田的权利……会议通过”,同年七月三十日条载有英、美觊觎乌拉尔富源的情报,这可能是日本也觊觎了。经济问题后述。

因为当地日军的后台是参谋本部，不能抑制。日本的政策方针，乍一看来，往往有几个互相矛盾的方针，后来也是这样。这当然是军部和政府对立的反映，而这种对立还意味着日本的统治阶级，无论哪一个集团，都没有明确的西伯利亚对策，更进一步说，也意味着人民的反战使统治阶层发生分裂。因此，这种对立并不是阶级的对立。就拿“文治派”的首领原敬首相为例，他对援助谢苗诺夫其实也是从不反对的^①。

日本除内部不统一外，对列强也有冲突。同时，日本所操纵的反革命派又极端无能和卑劣，以致不仅西伯利亚的工农，即便资产阶级和地主也视如蛇蝎。因此，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傀儡政权几乎没有希望。日本在军事上抱着坚决侵略的决心，在协约国中也处于最有力的地位。越是这样，日本也就越发在政治上受制于协约国。日本企图以军事力量来弥补它在政治上的无能，这就只能使得日本越发在政治上变得无能。日本所能操纵的反革命党徒属于最低劣的反革命党徒，决不是偶然的。虽然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样露骨的侵略主义者手下充当爪牙的，除了一伙匪徒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这也是当然的。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西伯利亚取得经济利权的努力，和它企图建立傀儡政府的计划一样，并没有轻易取得成功。在这方面，日、美间的对立，一开始就很显著。出兵前的1918年6月26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同石井大使会谈时，已经通知说，美国有意派“经济委员”前往西伯利亚。蓝辛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考虑经济上

^① 《原敬日记》大正七年（1918年）十二月二日条，大正八年三月十九日条内载，谢苗诺夫军反抗鄂木斯克政权“对我国不利”，政府（包括陆相）一致认为必须予以制止，尤其原敬首相在对大谷司令官的训令中加进这样一项：如果谢苗诺夫“不接受我方提议时，我方对他将考虑改变态度”，但同时，也打算使鄂木斯克政府承认“谢苗诺夫过去的功劳”。《原敬日记》五月十八日条载，该日内阁会议决定承认鄂木斯克政权的方针，如前页注^①所载。但另一方面，田中陆相提议，对坚决反对鄂木斯克政府的谢苗诺夫等提供武器，原敬首相以下全体阁员一致通过。

的得失，而是在近乎慈善事业的基础上，供给俄国人民所缺乏的物品，换取西伯利亚的农产物，一方面笼络俄国的民心，一方面防止粮食落到德国人手里”。所谓“德国人”，其实是指欧俄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饿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施舍这个可怕的“慈善”，据蓝辛说，日本和英国都是俄国人所憎恶的，所以“为了事业取得成功，经济委员应由美国一国组织”。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利益决不能让美国垄断，便于7月30日决定，“为了对抗美国等国获取利权，帝国这时必须确立经济活动的基础”，在出兵后的8月18日，公布了“西伯利亚经济援助委员会”的编制，以目贺田种太郎男爵为委员长，任命经济方面的官僚、南满铁路、三井、三菱，大仓等大垄断资本家代表十四人为委员。在第一次委员会上，后藤外相在演说中说：“既然企图重建健全的俄国，帝国考虑其地位关系，认为首先救援西伯利亚，以此作为核心，渐渐波及俄国本部，是最好的政策”。在大资产阶级先生们的面前，官僚也坦率地说出干涉西伯利亚的真正目的（《后藤新平》III）。这个委员会成立时虽然也大吹大擂一番，但实际上只是在哈尔滨帮助创立一个日俄协会学校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原因是当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与日本的希望完全相反，所以这些委员也就丝毫无所作为了。

日、美两国当时争夺的具体对象，是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在这以前，美国在1917年2月革命后，马上承认临时政府，对它给与积极援助，7月，向彼得格勒派遣以史蒂文斯为首的“铁路委员”，接着派遣以艾马逊中校为首的、由三百五十名美国工程师组成的俄国铁路援助团。十月革命后，史蒂文斯和艾马逊一群人主张旧政权授给他们的职务权限仍然有效，声称从华盛顿的旧政府大使领取薪金，继续留在俄国，企图掌握俄国的铁路管理权。

及至8月，日军在西伯利亚登陆，日美两国围绕铁路的激烈斗

争马上开始了。日军在9月3日声明，把西伯利亚的全部铁路和中东铁路置于日军管理之下，并说史蒂文斯和艾马逊不过是技术顾问，他们管理铁路是美国干涉俄国的内政（诚然！），主张霍尔瓦特是中东铁路和乌苏里铁路的合法管理人。美国政府主张，史蒂文斯是俄国政府委任的“俄国人民的代理人”^①。这就等于两个强盗在争辩谁是犯罪较少的强盗。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企图把西伯利亚铁路永远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且决定利用这次干涉的机会，“把南满铁路的经营延长到哈尔滨。不管这段铁路是否属于南满铁路，从我国的政策来看，是必要的，必须相机行事”。原敬首相把这个意图已经告诉给关东长官和南满铁路的正副总裁（1918年5月8日。《原敬日记》）。对此，美国则以美国垄断资本家式的旁若无人的态度公开宣布“满洲铁路的中立”和从阿拉斯加连接西伯利亚铁路的“荒诞计划”（《原敬日记》，大正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样一来，日、美两国的正面冲突便不可避免了。经过几次交涉，于1919年2月达成妥协，结果决定由参加干涉的各国各出一名委员，以反革命派的俄国人为委员长，成立国际管理委员会。另外，在史蒂文斯的领导下，组织一个由各国技术家参加的国际技术团来管理全部铁路。

在这期间，日本军与外交官不同，本着它那一贯的“默默实干”主义，不是用唇舌而是用枪炮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说，西伯利亚的全部铁路，除了东端几个地点由美国军队守备外，日军占领全部铁路线，紧紧把着不放。不仅如此，就连美军守备的地点，也任其不断遭到谢苗诺夫军的攻击^②。这样一来，日本虽然名副其实地粉碎了美国垄断管理铁路的计划，但同时，日本从西伯利亚取得

① 前引 Tompkins 的书。

② 同前注。

经济利益和建立日本所希望的统一的傀儡政权的计划也由它自己弄得不可能了。这是因为日本军和谢苗诺夫军占据铁路并不是为了它的统一经营，而是为了节节割断全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并加以破坏。没有交通运输的建设，当然就不能指望什么经济利益和政治的统一了。

第二节 革命的力量

1918年秋，也就是表面上获得最辉煌军事胜利的时候，参谋本部也已经感到，日本的侵略目的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已经大半落空了。上原参谋总长在1918年11月3日的信中写道：“我方在西伯利亚方面还没有什么象样的设施。（恐怕是害了恐美病。）过去，社会上指望内阁更换后，人心振奋，一切都能顺利进展。但是，目前并没有这种迹象。既然官僚和政友会终归都不堪期待，下一步就要看宪政会怎样了。总之，今后的推移是值得冷静注视的”（《元帅上原勇作传》下）。

“今后的推移”和上原等人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了。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进行的反对以日本为主的一切侵略者的斗争，是没有任何妥协的。随着冬季来到西伯利亚，俄国人民发挥了可怕的力量，日本在军事上也开始败北了。这时日本人民为了打倒本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可耻侵略也作了一些贡献，对民族的名誉多少有所恢复，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如前所述，日本人民对于武装干涉十月革命，根本就没有给以任何支持。开战后，尽管政府百般鼓动，人民也没有积极响应。《东洋经济新报》这样写道：“试看出兵后的人心如何。不是任何地方也看不出战争气氛吗？人民对这次战争还不如对师团机动演习那么关心。我们的同胞究竟为什么在西伯利亚作战，不用说后方

的人民，即便是出征的军队，上自司令官下至士兵，恐怕都不理解”。该报在 1918 年 9 月，再一次要求赶紧撤回远征军（9 月 15 日的该报）。

军司令官对出兵的目的可能有所理解，但是士兵和人民实际上根本不理解。不仅如此，人民中的少数人也清楚地“理解”到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不但积极反对，甚至有人为了保护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而进行斗争。前边已经提到，日本工人的先进分子由于俄国革命而受到很大的激动，“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记住”：

“日本工人当时对俄国革命不仅隔着大海表示同情和共鸣，觉悟了的先进工人和当时进步的革命家甚至越过大海前往西伯利亚，亲身帮助俄国革命，勇敢地对正在进行侵略的日本资产阶级的军队作宣传，呼吁他们不要破坏俄国革命，不要把枪口对着我们的阶级弟兄的国家、工人的苏维埃俄国以及苏维埃俄国的工农。我们的同志，我们尊敬的先进工人，冒着莫大的危险，在西伯利亚，或主动来到俄国的欧洲部分，亲身援助了俄国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斗争。例如，佐藤同志，他就是在西伯利亚为了保卫革命，献身于非常困难的英勇斗争而在西伯利亚牺牲的”（市川正一述《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

这位日本的民族英雄，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牺牲的“佐藤”，名字叫三千夫，1900 年 1 月，生在宫城县登米郡登米町。小学毕业后，进入县立中学，后来中途辍学了，十九岁那年夏天来到海参崴，在木村的火柴工厂当工人，一年后就同他的父亲不通音信了。后来在 1922 年（大正 11 年）春天，从海参崴秘密回到日本。他为什么回来？不详。“可以想象，他的偷渡目的，只有当时的南葛工会里的人们和已故的市川正一知道”（德永直《关于日本人佐藤》，《人民文学》第二卷第十号）。佐藤从东京马上又回到西伯利亚去了。1922 年 11 月，他尽管因患结核病发烧，但为了向后方传递紧

急命令，冒着冰雨，跑了几十里路，完成了任务。但是，由于发高烧，他终于在伯力的游击队医院里去世了，死时只二十一岁又十一个月。

为了纪念他，三宅伊之助（可能是假名）同志等人在西伯利亚将《列宁主义基础》译成日文出版，他在序文中写道：“他是日本工人群众中第一个为俄国革命牺牲的人。知道他的人很少。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死的。他勇敢地渡过沼泽，越过山岭，饮泥水，冒雨雪，化装在各处出没，冒着生命危险在日本军队中间宣传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后来，到1948年，佐藤被移葬在“无名战士之墓”里了。他在苏联以“日本人佐藤”闻名（德永直，同上论文）。①

参谋本部的军官们所忧虑的西伯利亚日侨受了“过激派”的“感染”，大概指的就是“佐藤”这类人。当时，著名的革命家片山潜正在美国，一面从事革命运动，一面不断研究日本的形势，对日本的武装干涉西伯利亚，当然从正面加以反对。不过，当时这究竟对日本人民和士兵产生多大影响，没有史料可查。据推测，他在1919年秋，用英文写的论文“日本和苏维埃俄国”以及1922年他在西伯利亚向日本军呼吁赶快放下武器回国的三篇论文，都收在题为《片山潜呼吁——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前列》的论文集中②。片山对

① 我在《历史学研究》的一五三号（1951年9月号）引用《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记述“佐藤”的时候，关于佐藤的事迹，还一无所知。根据前引德永直的文章才知道上述情况和德永直已经在1950年6月的《人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日本人佐藤》。德永直与佐藤的表妹结婚，打算通过她从佐藤的父亲佐藤唯助那里查明佐藤是否还活着。佐藤唯助在1928年（昭和三年）从东京来的两个自称是“南葛工会的人”收到上述的《列宁主义基础》和佐藤遗下的几册笔记本，这时才知道他唯一的儿子已经死了，因为自己的儿子是当“游击队”死的，所以也没有敢声张。1951年11月27日，按日本习惯是去世三十周年，在故乡登米町的本觉寺，由同学和共产党支部的同志四十人召开佐藤三千夫纪念会。希望能了解详细情况。

② 《片山潜在呼吁》是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在他死后的1935年出版的。本书是二十五开本，共二百二十八页，有别拉·昆的序文，除卷首载有“无产者国际主

日本远征军士兵发的呼吁，是在武装干涉战争的末期，这虽然和我在这里所谈的这个时期不同，但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在转载其中最短的一篇全文。

“日本的老革命家对现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士兵的诚恳的劝告”

各位日本士兵！

你们是否想过，你们在西伯利亚拿着武器究竟是为了拥护谁和反对谁而作战的呢？

你们是否仅仅是你们的剥削者和刽子手——日本军国主义者手中的忠实的工具呢？他们不是经常以此自豪吗？

你们是否仍然相信你们为了反对俄国的工农而斗争，就是为了本国的利益，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同胞和家庭的安全和幸福”呢？

说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是“为了保卫祖国和同胞”的那些说服你们的人，都是在欺骗你们。

日本的士兵弟兄们！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按照正确的思考而行动呢？

难道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革命后试图对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进行过危害吗？当然没有。他们一致斗争的唯一敌人是：地主、资本家、反动的将军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都在同这种剥削者进行斗争。

义者片山潜”外，搜集 1918 年至 1933 年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和平而斗争的论文共二十三篇。本书的全部内容，它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日本人民最宝贵的财富。莫斯科出版的这部书有多少本传入日本不详，恐怕为数不多。我从山边健太郎氏那里看到了这个珍贵的文献。关于本书的全部内容，我想山边氏可能有所介绍。

再者，前面所引的文章，没有日期。与这篇文章一并收录的另外两篇同样呼吁士兵争取回国的文章分别在文后注有“1922 年 7 月 19 日片山潜”和“1922 年 5 月 12 日片山潜”。因而推测前引的文章也可能是在这前后写的。其次，这些文章的原文，就其目的来说，无疑是用日文写的，但是现在流传的这些文章不知是否是原文？作为向日本士兵呼吁的文章来说，未免外国文的气息太重了。

是否日本的工人和贫农——佃户，没有对资本家、地主和军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呢？

你们回到故乡的时候，你们将站在哪一方面呢？当然，你们要站在自己的阶级那一方面，站在你们和你们的家属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一方面——工人和农民那一方面！

然而，日本的士兵弟兄们！在这里，在西伯利亚，你们却站在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军国主义者的一方面了！

你们大家都是为了杀人而到这里来的，即便你们不去积极地杀人，但是你们来到这里以及你们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军队而出现在这里，就等于是扼杀俄国革命的刽子手的帮凶，这将给斗争中的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带来很多困难。

同志们，希望你们理解这一点，然后在反对日本官僚、资本家、地主和军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为了帮助你们的兄弟——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希望你们回家去！

各位日本士兵，你们现在可能听到你们的军官和将军说，不久将送你们回家了。同志们，你们要知道，这个诺言是因为日本的军阀受到已经奋起的日本无产阶级的压力，受到日本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压力。同志们，你们要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诺言而已。

你们必须亲自强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履行这个诺言。你们必须向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表示，你们决心马上从西伯利亚撤退。你们必须把这件事通过组织，即通过士兵委员会向他们表明。同志们，你们必须把自己的要求直接向你们的军官提出，监视他们，注意不要让他们象过去常常搞的那样，制造新的借口，把你们留在西伯利亚。你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委员会，好通过它来监视他们。

打倒军国主义！

打倒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工农兵联盟万岁！
为苏维埃日本而奋斗！

片山潜

由于日本进步人士的奋斗，还由于向俄国现实情况学习，侨居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理解革命意义的越来越多了。《原敬的日记》在1918年11月2日写道：“从东部西伯利亚地方视察回来的参谋本部第三部长星野庄三郎少将来访。报告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其谈话(中略)。该少将深为忧虑，他说，凡是在当地有家属的我国预备役士兵，必须尽可能遣送回国。原因是住在过激派势力强大地区的我方侨民，已经有人受了他们的感染，有向我驻军进行宣传的危险。再者，美国兵的薪金每天两块美元，我国兵不过几分钱，因此非常危险”。

不仅侨居俄国的日本人，就连日本国内人民也正在变为“过激”了。在该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田中陆相提议说，鉴于某些日本人和外国人传播过激主义，有关各部门应该协商取缔办法。但是，这个问题不应该由多数人来讨论决定，应当首先由内务和陆军两部详细协商，拟定草案。同时，参谋本部有人报告，我预备役士兵在西伯利亚有受当地日本侨民感染之虞。关于这些，我曾秘密指示，采取适当措施，并令陆相和内相执行这个方针”(《原敬日记》)。

请看，专制主义者们竟不敢公开和同僚讨论对革命影响的对策，可见社会空气对他们该是多么险恶。原敬首相认为社会主义的传播，“事到如今，已经无可奈何。人民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国外的空气，一旦有人煽动，随时可能暴动”，他和山县有朋都为此担忧(1918年11月3日)。同时，他说：“据我看来，欧洲大战有导致突如其来动乱之虞，今日正是重要的时机，非有特别的决心不可”，他同田中陆相“就内政前途”互相披沥了“坚定的决心”(1919年4

月2日)。当时,被公认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尾崎行雄等人,“正在对工人进行煽惑工作,为了在工人中间树立勤王的宗旨,希望由宫内省赐以资金”,这已取得元老大隈重信和山县有朋的同意。但是,宫内省认为这类事情如果被民间知道反而不好,所以没有拨给资金(1919年2月20日,《原敬日记》)。

资产阶级和地主们无视民众的这种情形,不,正是因为知道和担心这种情形,他们就越发想来一个“举国一致”的示威行动,于是在1918年12月的第四十一届议会上,首先全场一致通过“感谢陆海军官兵士的决议”。

当国内人民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由于西伯利亚的侨胞和从日本赶去的革命家的宣传教育,士兵们——穿军服的贫农和工人,对自己不能理解的战争,当然无法勇敢地战斗了。尽管远征军宪兵司令部在它公布的报告^①中说,从1919年4月至1920年末,“没有过激思想渗入军队中的具体事实”,但不得不承认“由于上级对下级的不恰当的言行或下级缺乏自制力,往往也不无出现过激倾向的人”,又说:“往往忘了皇军出兵的本旨,或是因为身处异地,乘着战地的气氛,不无行动越轨的人”(指掳掠奸淫)。最初出征的第十二师团和第七师团,盗窃军需品的士兵很多,“尤以大正八年七月的凯旋时为甚”。换防的第十四师团,也是正在换防时期,“各地过激派纷纷兴起,到该年年末,我军士气昂扬,各地都有战斗,因而军纪也自然弛缓,违犯纪律的事件层出不穷,宪兵的活动频繁”。既然说士气一昂扬,军纪因而弛缓,那末,所谓的“士气”是什么,以及它与“过激倾向”的系关,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内的民众和远征军的士气既然是这样,军部当然不能使一

^① 军事警察杂志社主干田崎治久编《续日本的宪兵》。还有,据说西伯利亚派遣军反抗上级命令的士兵很多,在当时以军官为对象的杂志《偕行社记事》时常有所记载,但我没有机会查核是否属实。

个部队长期驻在“坏思想的发源地”(石光宪兵司令官的训示)俄国了。大致上占领了全部西伯利亚之后,1918年11月,政府和军部决定把派遣军的预备役和后备役遣送回国。遣送有妻室的士兵回国的措施,无疑是根据上述星野少将的报告。据原敬日记12月19日条载,“现在的五万余人,将减为一半”,然而是否是“现在五万余人”和是否已经减为一半,不能盲目相信。

第二年,即1919年1月,第四十一届议会复会时,政府声称,东西捷克军的联络已经完成,当初出兵的目的已经大致达到。本应急速撤兵,但在捷克军完全撤回前,为了维持治安,暂时仍与联军协力,驻在该地,表示不久就可以撤兵了。

正当政府这样欺骗国内外人民,议会也在自吹自擂地说“陆军大大宣扬帝国威武于海外”的时候,西伯利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态呢?

预期很容易取得胜利而没有充分御寒准备的远征军遭到了零下四十度可怕的严寒的侵袭,每一百人中间出现了二十个冻伤兵(伊藤正德《国防史》)。同时比这个冬季严寒更可怕的是,西伯利亚的全体工人和农民起来发动了游击战。

1919年1月,守卫马萨诺瓦的一个小队全部被歼灭了。2月26日,在阿穆尔省的尤夫塔附近,田中大队三百一十余名士兵和西川炮兵中队被两千名游击队完全歼灭了。在同月28日的安得烈夫卡战役中,大队长堀少校以下大半阵亡了。铁桥和木桥,最多的时候,每天被破坏五十座。激怒得几乎绝望的日本军司令官山田少将在滨海省和阿穆尔省布告说:“凡是落在布尔什维克手中的村落,一律烧毁”(望月小太郎在第四十三届议会上对内田外相的质问)。凡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村庄,都被烧毁了,居民不分男、女一律被杀害了。但是,西伯利亚人民不仅没有因此被吓倒,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反抗。

另一方面，高尔察克军虽然一度攻到伏尔加河附近，但是从1919年5月起，遭到红军的大力反攻，开始全面退却，及至9月，日本政府也清楚地看出，已经没有挽回的希望了。这就越发鼓舞了西伯利亚的人民，游击战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了。

为了应付这种局势，1919年3月，日本增派第十六师团，6月，第十四师团替换第十二师团，同月下旬又增派第五师团。从此以后，出征师团的轮换十分频繁。在整个出兵期间内，共计动员了十一个师团交替轮换。驻扎期间最长的，也不满一年半（其间几乎没有战斗）。这样频繁的轮换，据推测，一则是为了对国内外掩盖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实际兵力（实际上，政府和军部在议会上也是经常隐瞒出征兵力的），二则是为了防止士气的低落和感染“过激思想”。轮换越频繁，也就越发削弱战斗力。

日本军的败北，不仅是由于俄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和日本士兵及人民的反战和厌战的情绪，在日本帝国主义下受苦受难的朝鲜和中国人民的反抗也加速了日本军的败北。

早在1918年10月，驻在朝鲜的第十九师团的一部分兵力，据说是因为海参崴方面“有排日思想的朝鲜人”很多，妨碍军事行动，为了前去镇压而出动了（《大日本宪政史》VIII）。事实上，居住在间岛和乌苏里地方的朝鲜人，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时因为进行反抗而被驱逐的，或是在这以后被驱逐的，他们住在革命的俄国境内，现在亲眼看到革命的俄国以行动显示出它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朋友，因此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也是毫不奇怪的。这样，当日本的驻朝鲜师团不得不分兵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1919年3月1日，有名的朝鲜独立万岁的革命起义^①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用惨绝人寰的办法，花了一年的时间，

^① 朝鲜人民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于1919年3月1日，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在朝鲜全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一般称为“三·一起义”。——译者

才把它镇压下去,但是无数的朝鲜民族英雄退入长白山脉,或者逃到间岛和西伯利亚,越发顽强不屈和刚毅勇敢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

《续日本的宪兵》一书记载着乌苏里南部诺沃基辅斯阔耶的朝鲜人大队,尼科尔斯克的“韩族中央会”以及各地朝鲜民族抗日的许多事实。不用说,他们也分别参加了俄国人的游击部队。

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勇敢的战士中间,以金日成将军为首,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在西伯利亚或满洲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其中还有他们的子孙。这和那位“大韩民国”的年迈的总统,在“三·一起义”^①之后,逃往上海,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效的斗争,投靠美国,主张托管朝鲜,后来又在美国落户,可以说是鲜明的对比(朱可夫编《殖民地体系的危机》中所载夏布西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朝鲜》)。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境内进行得很激烈,这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此外,直接反对日本干涉俄国革命的事实也是很多的。在满洲里,谢苗诺夫军及参加该军的“日本义勇军”——它是由现役及预备役的日军将校指挥的——同中国军队在1919年8月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另外,最初被骗参加谢苗诺夫军的中国人,中途反正的人也不少(《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中)。

此外,《续日本的宪兵》还载有下列事实:在海拉尔及满洲里曾有俄国人、捷克兵、美国兵和中国人组成的国际反日地下组织;间岛地方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阿穆尔省和外贝加尔省边境附近,季福林的一个队伍同布尔什维克暗中联系;庙街的中国炮舰和中国平民的反日援苏活动;绥芬河的中国人的“红色游击队约八百名”的活动等等。当然这些都是被日本宪兵队

^① 同前注。——译者

逮捕或解除武装的例子。没有遭到这种命运的更多的中国人进行了抗日援苏活动，是不难推测的。

最后，日本军与美军或捷克军的对立，也使日本的将军们为之大伤脑筋。美军司令官格雷布斯也承认，他不是忙于同布尔什维克或游击队的战斗，而是忙于监视日军和如何妨碍日军。当田中大队全部被歼的时候，驻在附近的美军分遣队虽然接到田中大队遭到游击队袭击的报告，却根本没有前去救援，也没有去阻挠游击队的集结。从那时起，日、美两国军队间的关系更趋恶化了（前引罗斯的书）。日本的宪兵队除了“搜索过激派的残党”以外，竟然把“调查某国的排日行动”也作为它的主要任务。

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或经济上，日、美两国在一切问题上都发生过冲突。威尔逊总统为了统一他在西伯利亚的反革命政策和反日政策而如何大伤脑筋，以及武装干涉的失败已经明显后转而把重点放在反日上，这些在 Tompkins 的书中有详细的叙述。这两个帝国主义的对立是列宁早就指出过的。1920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地方党会议上分析日、美两国对立的激烈化时说道：“为了使他们对我们的战斗变得困难，我们必须系统地利用帝国主义者们的敌对关系。”^①

既然有这样重重不利的因素，不论日本的将军们多么卓越（其实他们并不是有什么才能的），又怎么会有最后胜利的希望呢？

^① 1918年5月，列宁作为“决定俄国国际形势的第二个对立，”举出日、美的对立，认为它“抑制着帝国主义对俄国的进攻”（前引堪特罗维奇的书）。本文所引1920年列宁的演说根据前引的 Tompkins 的书。

第四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节 庙街事件和占领库页岛

从1919年秋季起，西伯利亚的形势，对以日本军为主的全体武装干涉军来说，越来越不利了。红军逐日强大起来，高尔察克军继续败退。11月15日，红军进入鄂木斯克。捷克军越来越丧失斗志，甚至对协约国心怀不满了。西伯利亚居民的游击战越来越广泛地展开了。而进行武装干涉的各国国内的舆论则强烈地攻击政府继续干涉政策，要求立刻撤兵。在西伯利亚，形势越加恶化，日本军和美军等的对立也越发加深了。日本军和谢苗诺夫匪帮的暴行，使日本军成了全体居民和全体协约国的憎恶对象。

由于高尔察克军最后崩溃的危机到来而惊慌失措的日本，企图再派新的精锐部队(六千人)前去，设法挽回局面。但是，在政府内部，高桥藏相认为如果把这毫无希望的武装干涉继续下去，日本的财政必将不支，主张莫若马上撤兵。这与陆军的大举增援的主张，是一个正面的冲突。经原敬首相在两者中间调停结果，决定首先与美国协商，美国如果同意，再增援大军，暂时先将半个师团的兵力派赴满洲。原敬首相虽然认为日本单独继续干涉，“国内舆论将不堪设想”，“不仅刺激人心，还可能发生重大事件，也难保不涌起过激思想的浪潮”，但他仍不肯放弃西伯利亚而作了如上的决定(《原敬日记》，11月24日)。

美国因为预料武装干涉必将彻底失败，日本也不可能在西伯利亚达到目的，又迫于舆论的攻击，特别是出征士兵的父母激烈要求撤兵(前引 Schuman 的书)，不但不再增援，反而决定撤兵了。1920年1月4日，格雷布斯将军把兵力集结在海参崴，开始准备

撤退。

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也在1919年11月中旬说：“这种代价昂贵的干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只有法国和日本一样，决心把反苏战争进行到底。但是，它的主力远在俄国南部，日本在远东完全陷于孤立了。

捷克军公然背叛高尔察克军。当高尔察克所乘的列车于1920年1月15日开进伊尔库茨克车站时，捷克军协助革命军逮捕了高尔察克。从那时起，捷克军因为迫不及待地要从海参崴回国而火速向东进发。日本军及其爪牙——谢苗诺夫军却以全副力量阻止捷克军东进。日本军和捷克军到处发生冲突。日本军最初声称救援捷克军，现在竟与捷克军为敌了！

在日本，民众要求撤兵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垄断资本家方面也开始改变主意，这已经反映在高桥藏相在内阁发表的撤兵主张中。在第四十二届议会上，在野党宪政会的领袖片冈直温开始攻击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他说，当此各国纷纷撤兵之际，日本有什么必要单独坚持驻兵，替别的国家保护“秩序”呢？但是，高桥也好，片冈也好，他们都不是与民众站在同一立场而公开坚决主张撤兵，所以对军部和政府中主张驻兵的一派人的说服力很小。不过，武装干涉派面临国内外舆论的攻击和俄国人民军事力量的壮大，已经大为动摇了。

结果在1920年1月，政府决定了新方针，由首相、陆相、外相三人列席，授予特使奈良中将发给派遣军司令官大井大将的一道训令。内容是：“选择适当时机，把我国军队撤到海参崴和中东铁路沿线，即中国领土内。尽量避免与布尔什维克冲突，以免日后麻烦。撤退的地点是为了我军在朝鲜和满洲的自卫。如果撤退到这些地点以后，布尔什维克仍然对我加以危害，方可改为讨伐”。此外，还训令奈良中将在归国途中顺便前往北京，协商履行“中日共

同防敌军事协定”事宜。这时田中陆相由于一时不慎，对奈良中将脱口说出：“库页岛也需要派兵”，于是内田外相马上订正说：“那在名义上很困难，虽然可以听任司令官处理，但除了发生不得已的情况，否则是不可以的”（《原敬日记》，1月21日）。

这个训令表明，当时日本已经十分动摇和恐惧布尔什维克，但它还不肯放弃野心，企图在“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名目下确保中东铁路，并且已经具体拟定占领库页岛的计划。

另一方面，政府在1月14日美军宣布撤退时声明说，日本由于地理关系与美国不同，住在西伯利亚的侨胞很多，同时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如果按现在的情况东进时，“不仅破坏东洋的和平，进而我国的存在也将受到很大威胁”，为了“保护侨民”、“维持东洋和平”和“自卫”这三个目的，还要继续驻兵到底。

当初响应美国提议为救援捷克军而出兵的借口既然行不通了，便马上改口又制造新借口。原敬在野时，曾在出兵问题上主张慎重论，说出兵应该限于同美国协调的范围内，但在他掌握政权后，却完全改变了主张。如果他当初的主张是站在同绝对主义本质上不同的立场上，那么决不会是这样的。其实，美军撤退时，正是日本多少可以维持面子的绝好的撤兵机会。这时撤兵只能提高政府对内对外的威信而决不会损伤它的威信。而原敬内阁竟错过了这个良机，反而想顽固地把武装干涉继续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和军阀气味相投的。

后来内田外相在议会上答复片冈直温的质问时，除了大致重复前述的政府声明的内容外，还补充说：“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海参崴和伯力方面朝鲜人很多，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有联系，数年前就对帝国进行种种阴谋”，所以，为了防范他们的阴谋，有在西伯利亚驻兵的必要。3月31日，政府对国内外重新声明了三项所谓日本驻兵的目的：

- (1) 保护侨民;
- (2) 防卫接壤地区即朝鲜和满洲;
- (3) 保障西伯利亚的交通自由。

这里又有了与1月的声明不同之处，这说明日本的统治者为了制造战争借口是如何地信口开河。但可以说，这三项目的却很坦率地表明了武装干涉的理由。第二项等于帝国主义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解放斗争的支柱。至于第三项，人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为什么必须确保外国领土西伯利亚的交通呢？它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破坏西伯利亚交通自由的，不正是日本军吗？

现在日本的统治阶级非但不象最初那样诬蔑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抱着最大的憎恨，决心无论如何把它打倒。同时，他们又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以及支持它的国内民众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人民及国际舆论等有所恐惧，从而在战略上必然摇摆不定。更因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在1920年3月爆发为空前的经济危机），使一部分大资产者也对前途渺茫的军事冒险感到消极了。

在西伯利亚，侵略军在败战之下迎接第二个寒冬，士气越发低落，军纪紊乱。军官们悲观失望，因而对居民施加惨无人道的暴行。例如，1920年1月3日，有个日本军官(Heida Tonaki)无故向一个名叫古谢耶夫的民兵开枪，因为没有击中，反被民兵擒住了。当民兵问他为什么放枪时，他答说：“是为了开心。”同一时期，有一队日军在距离沃洛斯特村一俄里的地方向该村开炮轰击，然后闯入村中，用机枪扫射其第一、第二、第三的三条大街以后，无故搜查所有村民的身体，奸污所有的妇女，抢夺他们的财产，最后把民房和政府（地方自治政府）建筑物全部烧毁。好些无辜的老人和儿童都被他们当作寻乐对象而杀掉了。这样的事实，不下数千起。

在阿穆尔省，苦于异常严寒的日军残暴更甚于其他地方。单就伊凡诺夫卡村来说，就有数百名居民不是被机枪射死，就是被烧死。因此全体居民，不论富人或穷人，也不论哥萨克、农民或市民，都起来反对日军。由于日军的处境极端恶化和军事当局的消极方针，2月末，他们不得不暂时从阿穆尔省撤退了。所谓的庙街事件的整个背景，就是这样（根据前引《远东共和国的报告书》）。

在庙街，由于高尔察克军的完全覆灭而得到鼓舞的游击队，于2月5日占领了奇奴依里阿夫要塞，那里设有日军的无线电报局。然后游击队包围了庙街的日军（石川少校指挥的一个营和宪兵），前后三次要求日军投降和停止武装干涉。

第一次的军使索洛金被日军杀害了。第二次派到日军的军使是两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奥尔洛夫。日军作为答复，挖了奥尔洛夫的眼睛，烧了他的鼻尖和脚尖，用刀砍了他的背，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杀了他。他的尸体，后来被游击队挖出来在外国代表面前检验，向全世界证明了日军的残暴和违反陆战法规。第三次的劝降是2月24日（日本方面的全部文献，只记载这第三次的事情，对前两次的交涉和日军的违法和残暴都隐瞒了）。结果于2月28日，日军以下列条件向游击队投降了：

（1）日军无条件地和彻底执行阿穆尔省日军司令官白水中将（第十四师团长）提出的不干涉俄国内政的声明；

（2）解除庙街的白卫军的武装，把武装交给游击队；

（3）在游击队进入庙街市内占据战略要地以前，上述武装由日军保管；

（4）日军向游击队投降，撤退到双方协议决定的地区。

29日，游击队开入市内。白卫军把步枪三百支、三吋口径大炮四门和炮弹及其他武器交给了游击队。游击队监禁了市内的富豪反革命派，没收了他们的财产。3月11日，据日本文献记载，游

击队要求解除日本驻军的武装,于是日本驻军决心反击,该日深夜(12日拂晓)突然袭击了游击队的司令部。

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后来苏联的使节越飞来到日本与后藤新平洽商日俄恢复邦交时,据越飞说:11日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市内终日欢腾,居民和游击队都喝醉了;日本军乘隙破坏投降协定,发动背信攻击。日本方面对此说法根本没有反驳(《后藤新平》IV)。这次奇袭等于是日军及领事、侨民的自杀。激战一个星期后,石川少校、三宅海军少校和石田领事及其家族全部阵亡,下余的官兵及侨民一百二十二名于18日投降,当了俘虏。

到了春天,游击队料到日军必将从海、陆两面大举前来复仇,5月25日,便从庙街撤退了。那时,他们放火焚烧城市,杀了日本俘虏和十倍于俘虏的俄国反革命富豪。这就是作为“过激派”的残忍凶暴的典型,直到现在还大肆宣传的“庙街惨剧”^①。

在这个事件中,游击队从头至尾只有一个错误,即在撤退时杀死俘虏。但在这以前,日本军有无数的不法和残暴行为,而游击队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指责。而且,革命的俄国人民自己已经处分了这次游击队员们的暴行。同时就连日本帝国主义者,凡是多少有些良心和稍具常识的,例如加藤高明这类人(他曾在1919年11月宪政会大会上演说,主张坚决以武力消灭“过激派”。不过,他也只是认为日本不可单独派遣大军),也曾在贵族院的议会上断言,

^① 本文主要根据俄国方面的文献“Japa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和《后藤新平》第四卷越飞—后藤会谈的记录,并参照了《国防史》、《大日本宪政史》、陆军省新闻班监修《国防大辞典》、《续日本的宪兵》。

日本方面的文献是1920年6月,日军第二次侵入庙街时,从残存的反革命分子那里听来和加以润饰的,因此没有史料的可靠性。与此相反,“Japanese Intervention”是以革命政府对肇事人进行公审时的调查为根据的。这次公审不是为了给外国人看和听的,是为了维持革命纪律,在列强代表面前检验被日军残杀的游击队停战使节的尸体,也不可能是伪造的。再从越飞—后藤会谈来看,日本方面对越飞的主张终于表示屈服,这也足证越飞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庙街事件是“由于日本毫无理由驻军带来的自然事件”（第四十四届议会）。

越飞和后藤举行会谈时，日本方面最初要求俄国对庙街事件给予赔偿。但是，越飞把后藤的主张一一驳倒，并且说，如果日本坚持认为庙街事件是俄国的不法行为，那么日本可以向国际仲裁法庭控告。如果那样，即便是反苏主义者的法国籍法官，也一定会判决俄国胜诉。日本方面认为，如果“组织调查委员进行详细调查”，“不难预测，日本给与俄国的损害更大”，所以撤回了最初的要求。这就是说，日本当局已经供认，基本上，不合法的是日军而不是游击队。

实际上，就连美帝国主义的将军格雷布斯也承认，“令人战栗的残杀事件很多，但是与世界人士所听信的相反，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干的。可以平心静气地断言，在西伯利亚东部，布尔什维克杀了一个人，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就杀了一百个人”^①。这里所说的“西伯利亚东部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惭愧得很，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及其傀儡谢苗诺夫匪帮。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庙街事件是进行更大侵略的最好借口，因此加以最大限度的歪曲，并大肆宣传。

政府最初指示当地驻军把兵力集结在海参崴周围和满洲，但是参谋本部和当地驻军不但不执行这一方针，反而于4月4日突

^① Coates, "Arm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引用的格雷布斯的札记。此外，1922年4月12日，在美国上院的一个委员会上，前西伯利亚的美国派遣军莫洛中校 (Colonel Morrow) 对当时申请入境的谢苗诺夫作证时说，谢苗诺夫军杀害了十万名男女和儿童。这样的大批屠杀是前所未闻的。他还说对美军来说，谢苗诺夫军“是比布尔什维克更可怕的敌人。只是因为另外一个姑隐其名的国家（指日本）从外部干涉，所以美军未能解除谢苗诺夫军的武装”。接着，格雷布斯关于谢苗诺夫军的残暴也作了证 (Ross,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谢苗诺夫的残忍暴虐，使日军也终于忍不下去了，1920年8月，日本从外贝加尔地区撤退后，强迫他下野，命令他隐居旅顺。第二年，即1921年夏，当谢苗诺夫到海参崴时，日军对他也曾加以压制。

然在滨海省一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6月，陆军省也秘密指令当地驻军占领整个阿穆尔省的土地（前引《远东共和国的记录》载有指令的全文）。7月3日，日本声明，在西伯利亚成立足以追究庙街事件责任的政府以前，占领库页岛，作为保障。

占领库页岛具有莫大的价值，因为那里富于石油、煤、森林和渔产，并可作为控制西伯利亚和北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政府和军部为占领此地永远作为日本领土，很久以来就进行策划并窥伺机会，这从前引《原敬日记》来看是很清楚的。该日记1920年6月25日条还明确记载，占领北库页岛后，“以将来作为日本领土的方针”来进行建设^①。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饰其领土野心，声明向库页岛出兵的同时，撤退外贝加尔的驻军，但是为了保护日侨和防御对朝鲜的威胁，仍然继续在海参崴驻兵。

第二节 帝国主义毁灭的预兆

当日本在库页岛及其对岸的阿穆尔省策划新的冒险时，除了日本外，其他协约国的军队，都在1921年6月末以前完全从西伯利亚撤退了。

另一方面，4月6日，在上乌定斯克^②召开外贝加尔省劳动人民代表会议，建立“远东民主共和国”，并得到苏俄政府的承认。这个共和国除外贝加尔省以外，宣布阿穆尔省、滨海省及库页岛都是该国领土，而这些省的自治政府也都希望与远东共和国合并。但是谢苗诺夫军和日军盘据在赤塔，顽固地阻碍着上乌定斯克和赤塔以东的交通，同时日军直接压迫伯力省自治政府，对阿穆尔省也

^① 关于库页岛的占领问题，参照《原敬日记》1920年6月12日、25日、9月10日，1921年5月6日，7月7日各条。

^② 今称乌兰乌德。——译者

尽量施加压力,以阻碍在西伯利亚建立统一政权。

这里无暇详细叙述远东共和国与日本的政治斗争。总之,不管日军怎么玩弄阴谋,它根本没有人民支持,所以不能得逞。参谋本部在日军撤退赤塔一事上虽然顽强反对,但是就连军阀的鼻祖山县有朋在6月也说:“如果不迅速撤兵,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西伯利亚制造缓冲国是无益的”,上原参谋总长也终于不得不答应从外贝加尔撤兵了(《原敬日记》、大正九年六月九日、十二日、二十八日)。

赤塔的障碍物消除后,西伯利亚有了迅速统一的可能。11月9日,远东各省全都统一在“远东共和国”之下,莫都于赤塔。政府中虽然共产党员很多,但它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权。

日本在这期间进行平定阿穆尔省的计划,也占领了库页岛,但是前者在8月突然停止了。理由是红军在波兰战线上打败了武装干涉军,威力大大增强了,同时中国和美国的反日已激化了,这也使得日本的冒险家感到威胁。日本在库页岛把全部矿山都据为己有,驱逐原来的开采权所有人。因此,甚至白俄也都仇恨日本了。同时在这里拥有各种权益的美国资本家的反日斗争,也因此变得十分强烈(前引《远东共和国记录》)。

国内统治阶级的分裂也加深了。在7月的第四十三届议会上,宪政会的望月小太郎口似悬河地攻击了政府。他的演说并不是明确地坚决要求撤兵,尤其对库页岛问题只字未提,但却尖锐地指责了政府和军部武装干涉的失败。在1921年1月的第四十四届议会上,众议员的无党派俱乐部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明确对俄国不干涉的宗旨并建立通商互利的基础”。这个议案被否决了。另外,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在贵族院要求迅速撤兵。但他并没有说从库页岛撤兵,这就暴露了他的反对武装干涉在本质上与山县有

朋没有区别。(加藤曾主张消灭过激派,已如前述。)不过,这些提议表明,统治阶级本身的各个有力派别都公开承认武装干涉失败了,从这一点来说,这些提议是有意义的。

尽管军部和政府在西伯利亚进行最后的挣扎,但是已经非常明显,武装干涉是无法继续下去了。1921年7月,政府向远东共和国提出实现非共产主义等七项要求,声称如果远东共和国接受这些要求,日本就从西伯利亚撤兵,但暗中仍旧在各地支援反革命余党,对远东共和国进行破坏活动。然而这些反革命余孽也都不久开始溃败了,1922年春,都被逼入海参崴,最后被解除了武装。

现在日军在西伯利亚已经没有任何反革命势力可以依靠了,日军本身眼看有被歼灭的危险。于是日本军部就不得不认真考虑撤兵问题了。第一个原因是红军和俄国人民的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第二是诸如上述片山潜、佐藤三千夫的活动等:侨居西伯利亚的日侨的反战活动,和与此相呼应的日本国内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力量,要求政府立即撤兵^①;第三是朝鲜和满洲人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活动逐渐增强;第四是欧美工人阶级也要求日本撤兵^②;第五是,如前所述,日本国内的资产阶级一派对武装干涉的反对日益加强;第六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③的对日攻势加强,日本已经不能象在大战中和在大战刚开

① ② 1922年的五一劳动节时,日本工人提出了“承认工农俄国”的口号。

两个星期以后,英国的工会把英国对俄不干涉委员会的小册子寄给日本工会总同盟,通告说,日军如不赶快撤退,将与全世界工人团体联合起来抵制日货。

总同盟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立即从西伯利亚撤兵”和“立即开始对俄通商”的两项决议,为了实现这两项决议而展开了群众运动。6月,在东京成立思想团体和工人团体的“对俄不干涉同志会”。8月,表示日本人民对俄国欧洲部分的饥馑的同情,由总同盟的革命分子、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妇女成立“俄国饥馑救济委员会”。这些运动在秋季扩展到了关西地方。统一领导这些运动的“日本共产党”也于这年7月在地下组织起来了。(前引市川正一的书。赤松克彦《日本社会运动史》。菊川忠雄《学生社会运动史》)。

③ 除了前引的美国人所著各书以外,在G. F. Hudson, *The Far East in World Politics*, Oxford Press(1934)中关于日美的对立,也有扼要的记载。

始后那样在远东充当独裁者了。由于以上这些理由，1922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者终于不得不宣布从西伯利亚撤兵了。

10月25日，运载最后一批日本兵的船开出海参崴港。这时红军的西伯利亚第四军在俯瞰港口的高地上布置了炮列，作好日军如不及时撤退，随时将予歼灭的态势。

在整整四年零两个月的期间内，耗费了七亿六千万日圆军费，驱使七万三千名士兵徬徨在西伯利亚的旷野和森林中，进行武装干涉，结果以狼狈不堪的失败而告终。

当时帝国主义者仍然继续盘踞在库页岛，但是结果一无所得，终于在1925年5月不得不撤退了。那时正是男子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刚刚公布之后，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偶然的。

长达七年之久的对苏武装干涉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切非正义战争中最不正义的战争，武装干涉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本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天才的将军和政治家都无法避免的。

失败的不仅是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人，都一齐遭到了最狼狈的失败。

象日本那样对武装干涉越是积极的国家，它的失败也就越惨重。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日本的军事评论家们把西伯利亚惨败的原因归结为兵力不足和战略动摇。所谓兵力不足，其实就是士气不振的日军敌不过俄国全体人民的奋起，所谓战略动摇，并非政治家和军人个人的错误和优柔寡断，而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它的脆弱性。

换句话说，这就是帝国主义企图扼杀社会主义时所必然发生的现象。因为：

第一，尽管帝国主义怎样宣传社会主义是“过激派”、是魔鬼，但事实本身却教育了人民群众，帝国主义毕竟不能阻止群众的觉悟。所以，即便在天皇制的日本，也难以避免干涉军的士气低落和

后方人民的反战、厌战的情绪。

第二，完成了革命的人民群众，不论俄国人、中国人和朝鲜人，人人都有为保卫祖国和保护自己而战斗的清醒的觉悟，他们确信自己是站在历史的进步必然胜利的一方面，因而产生无比的勇气和周密的思考，对侵略者敢于抗战到底，直到最后一人为止。

第三，这次革命鼓舞了世界上的一切民族，特别是邻近的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奋起参加反帝斗争。

第四，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本消除。

第五，国内统治阶级各个集团间发生分裂，并且日益加深。

这些都是前文具体叙述的事实。由于这些理由，帝国主义必然发生兵力不足和战略动摇的现象，结果被社会主义打败。这是1918—1925年在日本，同时也是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的事实。但是帝国主义者并没有从1918—1925年的失败中汲取任何经验教训。当时上原参谋总长最信任的部下荒木贞夫（他在十月革命后任中校时组织谢苗诺夫军，充当反革命战争的先锋，1918年7月升为上校后，担任西伯利亚派遣军参谋，以特务机关长的身分忙于建立反革命政权，他是推进武装干涉战争的“骨干军官”），后来升为中将、大将，成了侵苏战争的不断的和最高的策划者和鼓吹者。因此，荒木现在被判为战犯，晚年不得不系身于囹圄中了。^①虽然如此，日本和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仿佛仍然没有从西伯利亚战争和荒木等人所遭遇的命运中汲取教训。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无视这些事实，帝国主义不可能战胜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规律，是永恒不变的，历史的教训仍然有效。哪怕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样小国家所进行的干涉，也是绝对不会胜利的，眼前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点。

^① 据报载，荒木在1958年4月已被岸信介政府不法释放。——译者